

HUANG HUA GANG


2004 年 第 2 期

總第 9 期

黃 花 崗

文 歷
化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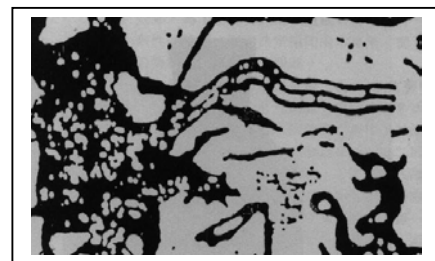
季
刊

- 
- 孫中山三民主義手稿整理并序
 -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中華的優秀文化是民主的賢內助
 - 我看五四
 - 浸著血淚的上書
 - 誰來平反六四？平反六四什麼？
 - 辨識新中國 還原蔣介石
 -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 斯大林操刀分割外蒙古
 - 從社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
 - 愛國的美名不屬於共產黨
 - 祇有中國問題 沒有台灣問題
 - 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 不贊成龍應台們為台灣民主的辯護
 - 分裂中國的“理論根據”和“歷史依據”
 - 郭自生公開澄清台北誣指辛灝年“匪諜”說
 - 徵選《復辟時代》中國真文學作品啟事





左上：香港夏斐爾出版公司新書。
 右上、中、下：為何冰姿女士遺作。
 左下：芝加哥《走向共和》賞評會。



黃花崗

歷史文化季刊

二零零四年 第二期 (總第九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09
Published
May 27, 2004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 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馬佩華、周美娟、姚鑫華、路人
董事會幹事 孫雲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易丹軒

主編 辛灝年

主編助理 李剛博士

特邀編審 吳學燦、李勇、王友琴

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

編委會名譽編委 王德耀、成其林、黃玉振、李勇、向厚祿
黃其柱、黃偉悌、麥青芬、趙增義、孫國欽、韋峰、于京山
張學海、陳慶國、張國威

編委: 丁抒 王友琴 王希哲 劉國凱 丁毅 蔡萌
尚戎 邢錚 羊子 高陽 余建文 郭平 傅申奇
陳維健 楊海平 官晨 周健 陸耘 陳一如 南明
林牧晨 王平 宋子 吳學燦 翟心海 孫雲 林才君
辛政 高優鏗 夏雲 葉寧 賴安志 應易中 楊柳春
楊三民 魏玲 魏碑 嚴青 陸中原

本刊法律顧問: 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 葉寧

黃花崗雜誌 第9期(增刊) 2004年第2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May 27, 2004

民主統一為中華 專欄

支持愛國民主運動

愛國的美名不屬於共產黨 本刊評論員 5

反共，才是真正的愛中國 李勇 13

沒有愛國賊 祇有愛黨賊 吳學燦 8

中國的民主與統一 研討

族羣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鄭義 16

不贊成龍應台們為台灣民主的辯護 王希哲 24

分裂中國的“理論根據”和“歷史依據” 陸耘 27

走出悲情的必由之路 傅申奇 39

新聞發佈會

祇有中國問題 沒有台灣問題 林山佟 41

郭自生公開澄清台北誣指辛灝年匪諜說 楊中時 44

新聞追蹤

吳稼祥攥文指李燈輝污指辛灝年是匪牒 吳稼祥 46

芝加哥舉辦《走向共和》賞評會 本刊記者 46

辛灝年應舊金山僑學界邀請發表電話講演 楊柳青 47

辛灝年被邀發表對台灣大選的簡單看法 南麗 48

余健文博士主持何冰姿女士追悼會 48

一個真實的生命典範 余健文 49

黃花崗雜誌義工追悼趙品潞先生 50

品潞，我的兄長，您放心地走好…… 孫雲 50

紀念六四十五週年 專欄

浸著血淚的上書 北京 蔣彥永 52

誰來平反六四？平反六四什麼？ 山西 馬曉明 56

學運讚 孫國棟 59

清明時節雨紛紛 北京 高月 60

國民黨共產黨民進黨驅散民眾抗議方式之比較 61

民主德國人民議院關於六四的兩份聲明 北京 申雪 61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研究

國父手著《三民主義》整理並序 寧仲康 64

誰是新中國 論戰

辨識新中國 還原蔣介石 北京 史可航 70

評點“新中國需要新構思”(下期預告) 河南 紫丹

讀者反饋《誰是新中國》 73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大陸 曾景忠 75

蔣介石不抵抗嗎？——為蔣介石翻一案 大陸網民 77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中共政權研究	對一個政權的心理分析報告	曉 黑	78
中共概念辨析	“解放思想”與“放寬政策”	加拿大 辛 明	79
中共文革研究	誰能阻止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革命	南京 鄭 易	82
	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動（下期預告）	高 華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牟宗三等	85
“握天樞以爭剝復”	余健文	85
中華的優秀文化是民主的賢內助	大陸 東海一鼻	92
我看“五四”	德國 徐 沛	95
論禮九章（下）	謝選駿	100

理論探討 專欄

社會主義研究	從社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	陳禮銘	105
民主運動理論研究	華夏復國告白	歐洲 王雍罡	115
中國經濟研究	稅務機構改革——朱熔基政策的敗筆之一	曾仁全	119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

中俄關係記實	斯大林操刀分割外蒙古	龍勝熊	124
	黃沙俄匪中華血	吳學燦摘編	131
	蘇軍佔領東北以後（下期預告）		

時代與文學 專欄

文藝評論	徵選《復辟時代》中國真文學作品啓事	本 刊	136
	《中國文學導論》研究	嵇義達	137
記實文學	死水憶波瀾	金漢平	138
詩歌	給川軍——聞王銘章師長殉國後寫	徐士豪	63
	絕不做專制的奴隸（歌詞）	北京 鄭 易	122
當代中國民間文學	憐 婦（新樂府）	淚 流	51
	賣湯婦（仿唐詩）	無名氏	123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中共官價知多少？	韓國豐	122
----------	-----	-----

《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

讀者反饋黃花崗		4
黃花崗雜誌守則		99
本刊董事會第九次財務公告		84
本刊致謝捐助和榮譽訂戶		40
敬啓者、敬告作者	104	114
《黃花崗》雜誌、《誰是新中國》訂單、編後		144

讀者反饋《黃花崗》 分期選載

尊敬的黃花崗雜誌辛主編和編輯同仁：

讀到《當代農民三甲起義》一文，我的淚水不知何故流了出來，我多麼希望我們的農民兄弟能夠都大著膽子和貪官污吏們鬥爭啊！農民始終是中國最苦的一羣人，我們的愛國民主運動，某種意義上，就是希望解除他們的苦楚、枷鎖。

還有《89 真英雄，湖南真壯士》一文，這是被世人遺忘的英雄！文章寫得這樣感人，而作者又因為此文被捕，讓我的心一直在痛著……

我們的愛國民主黨，會籌備大約半年左右，目前申請入黨者每日都在增加。希望黃花崗能夠選擇我們的一些文件發表，或者為我們登載一小小啓事。

另外，我的《魯迅：漢奸還是族魂》一文，雖然在網絡已經發表和被轉載，但原文仍屬粗糙，因此經過無數修改之後再送呈先生發表，同時為正視聽，再附《答讀者問》一文以配合。本人在此聲明，發表此文純粹為揭露魯迅偽族魂面目，不接受貴刊稿費。

清水君

馮素英（羊子）老師：

您好！復函已收到多日，多篇轉發文章也都收到，內容都很精彩，謝謝。

《黃花崗》新一期，我已從網上下載，內容豐富，觀點鮮明，立場堅定，極有特色，令人喜不釋手。事實上，每一期《黃花崗》，都是射向專制極權心臟的一顆重磅炮彈。

向辛老師學習，致敬！衷心祝願《黃花崗》越辦越好，衷心祝願所有的自由網站，所有的自由報刊，越辦越好。匆匆，暫且擱筆。

敬頌

春健！

國內民運人士××× 敬上

2004年2月14日

我是在偶然間，喜歡上了網絡，在和人聊天時我知道了無界限網絡，並在此看了您的書和聽了您的演講，還有黃花崗雜誌，我覺得好像又有了精神的力

量，反思後，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追求的是真理和正義。今天能寫信給您，我感到無比高興。

你們的忠實讀者

前後六期黃花崗雜誌已拜讀。觀點和材料都很新鮮，其中不少鮮為人知。學理性亦很強。老朋友們知道的，都在談你，談《誰是新中國》和「黃花崗」……

Q.E 於廣州

黃花崗雜誌：

我作為大陸留學生，能瞭解到祖國的真相讓我高興而又悲哀，我為我不再被騙而高興，為13億同胞仍然被騙甚至淪為幫兇可我不能幫他們而悲哀……再看看我週圍的人，一個個漠視的眼神，讓我覺得愧對新中國浴血奮戰的國民黨先烈，我心痛……

一個英國留學生於倫敦

尊敬的黃花崗的朋友，你們好！

非常感謝您的回信，我現在已經通過，動態網，訪問到《黃花崗》了；祇是由於時間不多還未盡覽！我會認真地閱讀和思考的。我想知道的是，我作為一個在大陸的中國人，能為祖國的民主、自由做些什麼呢？望賜教。

北京 萬濤

主題：評：共產革命台獨→社會主義台獨→反華惡性台獨

呂易

[博訊論壇] 這才是真民主人士應持的統獨觀。以民主統一中國，反對中共專制，反對極少數人分裂。民進黨、國民黨、中共及其他黨派，都可以在新的、經全民投票制定（通過）的憲法規範內公平競爭，公開競選。如此，第一，中共要首先放棄專制，實行民主；第二，全民公投憲法，確定國家的國體和政體等基本制度，確定國民的權利義務及如何予以保護；第三，進行大選，讓國民選擇執政黨和執政人。民主憲政實現日，統獨之爭烟消時。

註：“共產革命台……”，請參見“民主統一為中華”一文，黃花崗雜誌第八期。

民主統一為中華 研討專欄

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專題

堅持反共防獨，才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為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和平”而建立一個最為正確和最為廣泛的“民族民主聯合戰線”。這個聯合戰線一旦形成，其結果，一是中共打出的“假民族主義牌”將因此而失靈；二是反華台獨勢力的“假反共民主牌”將因此而失算；而反共在先、防獨在後；民主在先、統一在後；解決中共專制統治在先，追求中國國家統一在後——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治本在先、治表在後”的這樣一個正確的大戰略，蓋因它“義旗高揚”，從而必得大陸民心，必轉台灣人心，必結海外僑心，必能凝聚和奮發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海外華人為愛國而團結反共的偉大民族民主精神。

——引自辛灝年講演錄“民主統一為中華”（黃花崗雜誌第八期）

愛國的美名不屬於共產黨

二論民主運動要愛國

黃花崗雜誌評論員文章

一、中共向來黨、國不分，有人偏要不分黨、國

眾所周知，中共從來就是黨國不分。從中央到鄉村，全是黨政一家，黨凌駕於政，黨領導一切，黨就是國。所以，愛國必須愛黨，愛黨就是愛國，愛國不愛黨者誅，因此而被黨枉送掉性命的，何止成千上萬。

中共有兩隻歌，一隻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所以，愛黨必須是第一的。另一隻是“社會主義好”，意即“沒有社會主義，便沒有好中國”，所以，愛社會主義比愛國更重要。這是區別中共的馬列“新中國、好中國”和五千年的“舊中國、壞中國、黑暗中國”的陰陽界，不愛“社會主義新中國”者誅，為此而被黨枉送掉性命的，更何止成千上萬。

毛澤東死了，鄧小平掌了權，雖然改革開放，但是，歷經江、朱歲月，已到胡、溫“舊政”，卻都要守著“四個堅持”，而這四個堅持裡面，就沒有一條是要堅持“愛國”的。可見，中共的愛國，一是要愛黨，二是要愛社會主義，三才是黨國不分，四是專門對著別人的。顛倒了如此次序者誅，由此而被黨枉送掉性命的“別人”，亦何止成千上萬。

近些年來，好像有人因“心有靈犀一點通”，竟天才地發現了：既然中共黨國不分，要反共，就不能愛國，因為那是中共的國。這個天才的發現，不但有理，而且有恨，由於理恨交加，也就隨著中共要“黨、國不分”，有人偏要來他個“不分黨、

國”。反共就不能愛國的話，豈但應運而生；愛國就是愛共，也立即成了一條罪狀。接下去，海內外的英雄們，雖然至今沒有人敢罵一聲“愛共賊”，但“愛國罪”卻給罵得甚囂塵上。再接下去，又由於跟著共產黨殺中華民族、燒中華文化、謾罵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孽根性，又一如既往地成了時髦，更一如既往地掀起了高潮，一如八十年代一樣，將我們可憐的民族及其文化罵成了共產黨的替罪羊，所以，一些當代“愚民”，就是那些雖然反共卻要愛國者，祇因他們“既要愛祖宗留下來的那一片大好江山，更要愛祖宗傳下來的那十數億善良人民，還要愛祖宗發展起來的優秀民族文化”，雖是真正的中華兒女，而非馬列子孫，卻給那些偏要“不分黨國”的朋友，清濁不分地罵成是“愛國的賊”了。

於是，國，在這些人的眼睛裡，便當真祇是“黨的”了。這無疑與現代世界建設民主國家的觀念完全背道而馳。絕不是搞民主的人所敢言的。

於是，這就為中共“愛國就必須愛共”的專制邏輯，帶來了由所謂反對派所贈予的“合法性”。特別是祇敢罵“愛國賊”、而絕不敢罵“愛共賊”，便更是在“助共”，而不是在“反共”。原來，反共祇是在反“一個

黨”；而今，反共卻變成了要反“一個國”，“反中共”遂變成了“反中國”，孰對孰錯，孰難孰易，孰忠孰奸，還用得著一問嗎？

二、中共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禍國的黨

歷史告訴我們，中共從來就是一個禍國的黨。

一九二零年八月，由社會主義新沙皇列寧任命的第三共產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首先在理論上，就是一個“沒有祖國”的黨。也就是說“無國可愛”。而由他們自己宣稱的，歌唱的，“祇能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就更不是愛中國，而是在賣中國了。所以，愛國的美名，與他們這些“黑發黃皮的馬列子孫”斷然無緣。

其次是在事實上。首先，自從一九二零年八月蘇共建立了中共以來，中共不是號召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要獨立“走出中國”，甚至要加入“某個聯邦”；就是公開贊成蘇軍駐兵外蒙古、贊成外蒙古獨立；直到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公開背叛中國的國民革命，公然反叛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心武裝顛覆北伐打倒軍閥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政權”。所以，中共建黨伊始，就是賣國之端，愛國的美名與他斷然無關。

其後，不論是在 1929 年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之時，還是在 1931 年九一八日本陰謀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之後，中共不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要“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在第三國際“緊急任務案”的指示下，發動武裝暴動“乘國難”以顛覆中華民國，篡立“認俄作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非但從此開始製造“兩個中國”，並且為日本挾持溥儀“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豎立了楷模。而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第十四條所宣稱的，“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的徹底賣國綱領，竟然成了今日有人要“鼓吹台灣、甚至是中國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特別是建立一個“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新台灣國、新山東國、新上海國……等等“新國家”的重要歷史“根據”。至於中共是如何地巴望著日本早一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救命”；至於中共在中國人民的長期浴血抗戰中，是怎樣地游而不擊，祇圖擴張，專打友軍，不打日寇；是怎樣地不惜“通日賣國”，坐看“日

蔣火併”，並終於為它蓄意準備的“人民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今，祇需要隨便翻一翻中國大陸學界的現代史反思著作，或想辦法翻閱一點中共絕不敢公開解密的文件，甚至祇需要再認真“學習”一遍毛澤東的第三卷“雄文”；便可以一目了然，更令人“恨從中來”。所以，愛國的美名與中共的歷史便斷然沒有任何干系！

三、中共建國之後更是一個殘民以禍國的黨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因是一個禍國的黨，就不可能是一個愛國的黨，愛國的美名與他毫無干係，那末，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就更因他是一個“殘民”的黨，所以，愛國的美名就更不能屬於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又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二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構成國家”的三大條件之一，就是“人民”。並且，對一個國家而言，最要緊的，還是人民。其次才是江山土地，再其次是人民和土地的管理者——君主。而古人所謂“民為邦本”，所謂“邦畿千里，為民所止”，所謂“大畏民志，此為知本”，所謂“得眾得國，失眾失國”，所謂“保民而王，莫可禦也”，無非都是在說“認識民本”的重要性。並且，不論這一“以民為本”的思想，究竟是從維護人民出發，還是從維護君王著想，它起碼都是在告誡任何一個統治者，“殘民”是不能允許的。也就是說，不論是在中國自古有之的國家理論上，還是在中國歷代帝王爭霸天下和治理國家的歷史中，任何意在“殘民”的思想和行為，豈但為統治的理論所不能允許，而且為統治的方式所理應杜絕。

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繼承它二十八年罪行昭彰之“禍國歷史”的，便是數十年罪惡滔天的“殘民歷史”。八千萬條無辜中華兒女的生命，早已為他們這個馬列子孫集團留下了曠古的反民族奇罪和反人民重罪；一場又一場意在“殘民以逞”的所謂政治運動，就更是為中華五千年歷史留下了史無前例的汪汪血海；持續五十餘年不變的殘酷思想統治，無疑已將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中的大多數，推向了“腦死”、即“從不敢思考而至於不會思考”的不堪境地……古今中外，向未聞“殘民者竟然能為愛國者”，因為，“民者，天下國家

之根本也”！殘民，就是禍國。所以，愛國的美名，又怎麼能夠屬於這個殘民已極的“異族馬列子孫集團”——中國的共產黨？

或許有人會說，共產黨自鄧小平始，就已經在改了，就已經在改革開放了，就已經在“振興中華”了……否也！爲什麼？因爲它祇是相對弱化了殘民的行徑，祇是相對改變了殘民的方式，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殘民以逞的性質和目的。因爲，中共的改革開放，無非是在救自己，救自己的專制統治，救它這“無產階級的血染江山”，而不是真心地要救那個——已經被他禍害了太久、並且禍害得太深的中國，及其人民。君不見，古人尙知“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而今，中共經濟改革已經二十有五年，其暴君污吏豈止是“漫其經界”，早已是“漫其全黨全國，漫其整個黨國社會”了！所謂“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在今日，則是“共產黨率官以貪，而全黨全國之官從之”！古人尙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而縱橫今日之中國，則是“黨官者足，繫權者足，貪鄙者足，唯真百姓苦百姓橫遭盤剝而不足也”！古人尙知，“恩不可以及禽獸，而功不可不及於百姓”，然而，中共一黨，改革開放二十五歲，“其功，雖早已及於禽獸，卻斷然不願及於普通百姓”：漫流中國大陸的種種民謠，實已經道盡了“經濟發展大好形勢”之下億萬百姓的痛苦心聲……

或許還有人會說，中共在海內外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反對台獨，追求中國之統一，總該是“愛國”了吧？否也！因爲，在歷史上“製造、領導和支持過台獨”的中共，不過是假統一之名，以行統戰之實；舉旗反獨是假，與台獨“唱和”是真。多年以來的事實便是：惟中共反獨聲浪愈高，則台獨的進程便愈快愈橫，台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便滅亡愈速；惟海外統獨兩鬥愈酣，便愈加無人顧及反對中共專制，更不知懸大陸百姓苦難於心中……如此，中共何不樂其哉，台獨何不喜其哉！所謂台獨就意味著戰爭，所謂阿某上台就意味著台獨，不過是與空彈頭一般的干啞叫囂而已。如今，阿某果真沒有下台、卻又上台了，而且上得是那樣地麻煩，那樣地蹊蹺，那樣地引發了海內外的萬端疑雲，然而，中共何在？中共的“打聲”

何在？中共那實心的而非空心的飛彈又何在？而中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腳”的必然前途，也就在眼前了！

一言以蔽之，愛國的美名不屬於共產黨，過去不屬於，現在不屬於，將來也不可能屬於這家“來自異族的、禍害了我們中國的專制鐵血政黨”！

四、愛國的大旗不能拱手讓給共產黨

世所週知，無論中外古今，愛國是一個美名，愛國者必然愛民。但是，共產黨豈但不愛國，而是禍國；共產黨豈但不是愛民，而是殘民；則何能以愛國之美名與之？

但是，在今日的海內外，特別是海外，有一些朋友，不論是有背景的還是無背景的，是有人唆使的還是自己甘願的，他們雖然都是志在中國民主化的人士，祇因他們甘從於中共的黨國不分，又迷惑於他人的不分黨國，因而在不知不覺之間“將中共等同了中國”。於是，反共竟至於變成了反中國，反中華，更配合著國內外那一股至今都不敢批判否定馬列罪惡文化，卻仍然在跟著共產黨否定、辱罵、焚燒和坑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邪氣歪風，一時間，豈但是罵“愛國賊”甚囂塵上，而且，即便是有誰說了反共愛國的話，堅守了反共愛國的立場，也都是“愛國的賊”了！

如此這般，既然無人敢愛國了，則中共自然便會乘機將愛國的大蠱一肩扛起，招搖撞騙，既逗得那些天真的愛國憤青“盲人騎瞎馬”，又哄得那些真心的愛國華僑“夜半臨深池”，更率領著他得勝的“專制統戰隊伍”，而非“民主統一大軍”，當真在海內外，主要是海外，敷演起一場又一場標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連台大戲來了。如此，這個禍國殘民已經八十載、至今仍然不思悔改的馬列子孫集團，祇因爲有自謂搞民主者不准許愛國，不准許言愛國，不准許他人爲愛國而反共，有則罵之曰“愛國賊”，於是，共產黨豈但輕而易舉地就賺得了愛國的美名，而且更加輕而易舉地將凡是搞民主的人，都打成了“賣國的賊”。就不說在大罵“愛國賊”的人群中，還真藏著在搞民主的旗號下，“祇愛臺灣不愛中國”、“祇要中國分裂不要中國統一”的“真賣國賊”呢？

嗚呼！天下竟然就有如此甘願“奉旗與共、待共殺我”的反共民主人士嗎？中共在海內外到處煽風點火地

指責那些反共民主人士是台獨支持者，是分裂祖國分子，是出賣中國之反華分子的事實，是不是早已證明，大罵他人“愛國賊”的民主人士，恰為中共污蔑民主運動，污辱你們自己，親手提供了政治良機和事實理由呢？而某些已經被中共迷惑的國內同胞和海外華僑，之所以也會將你們罵成了“賣國的賊”，是否當真祇是為你們製造了一場“冤假錯案”呢？誠然，你們冤枉，但冤情恰是你們自己製造的。就不說在你們當中，也確實有“不冤枉者”。這才是中共之所以能夠在國內煽風，在海外煽情，甚至雖然“在大陸一天天地爛下去”，卻又能夠“在海外一天天地好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論是海內還是海外，都理應將一桿堅定的愛國主義的大旗，緊緊地攢在自己的手中，高高地舉起在民主大軍的前頭，一往無前地為了愛國而反共，為了愛國而要民主，更為了全中國的民主、統一與和平，而堅強地奮戰到底！倘能如此，則為斯人之幸，國人之幸，中國的民主共和前途之幸。

天，必將降大任於真正愛國之民主運動也！

沒有愛國賊

祇有愛黨賊

吳學燦

「愛國賊」是個新名詞，大概祇有兩三年的歷史。這個詞，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是在電腦網絡上。這個詞的發明權，不知究竟屬於誰。可是，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看到這個詞，是因為有人提出要愛國；批評者就寫文章，說愛國的人就是愛國賊。從此以後，愛國似乎就有罪了，就要被討伐、批判、抨擊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愛國。我現在是難民，住在美國，但我還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我還是熱愛自己

的國家——中國。為了中國能夠實現民主，我還在繼續奮鬥。

國家是什麼？

國家這個詞，一開始就是國和家的組合。對於國家的概念有爭議。對於家的概念還是比較一致的。

家，是人們休息的窩。吃喝拉撒睡的一個窩。一般的家，有丈夫、妻子、孩子。正常的家，是享受夫妻恩愛、母子親情、天倫之樂的甜蜜的、溫暖的、幸福的、愉快的“窩”。至於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現在已經很少見到了。

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新型的家庭也跟隨著產生。新型的家庭主要有：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組合型家庭等幾種。

國是什麼呢？國就是許許多多的家的組合體。

國家，是說“國是由家為基本單位組合而成的”。

國，就是大家的家，是大的家，是一大塊土地上的許許多多的家的組合體。

中國這個國家，就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大的家。

中國是什麼？

有人說，從來就沒有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從來就沒有有一個國家的名字叫中國。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中國是什麼？

中國就是以漢族為多數的五十幾個民族融合、發展而來的多民族國家。這是從國民的構成上來說的。

中國是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從歷史演變來說的。

中國是有五千年文明，曾經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過無比巨大的貢獻，而且是沒有被同化、沒有被征服成為殖民地的唯一的文明古國。這是從語言文字等文明主體一以貫之的角度來說的。

中國是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湯顯祖《牡丹亭》、清曹雪芹《紅樓夢》的誕生地。這是從漢語、漢字的豐富優美、意境高遠、無與倫比的角度來說的。

中國是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等思想家群星璀璨光耀全球的沃土和甘泉。

有人說，祇有西戎的秦、蒙古的元、滿族人的清和漢族人的兩漢兩晉隋唐宋明等國，沒有中國。

照這種邏輯推理，世界上從來沒有中國，也從來沒有美國、俄國、英國、法國和德國。

美國是什麼？

美國是英國的一塊殖民地。美國是十三個州開始組合發展而來的。照這種邏輯推理，祇有英國在美洲的一塊殖民地，沒有美國；祇有十三個州開始、後來發展到五十個州的美利堅合眾國，沒有美國；祇有印地安人的祖國，沒有美國。

如果說美國歷史短暫，不可比；那我們就說俄國、英國、法國和德國。

俄國是什麼？

是羅斯？是俄羅斯？是蘇維埃聯盟共和國？是獨立國家聯合體中的一個。照上面的邏輯，沒有俄國，祇有蘇聯，祇有遠古時代的羅斯，祇有彼得大帝的沙皇帝國，祇有葉卡捷琳娜波將金村時代的女沙皇帝國。

照上面的邏輯，祇有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沒有英國；祇有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沒有英國；祇有盎格魯---撒克遜，沒有英國。

法國呢？祇有法蘭西，沒有法國；祇有拿破侖帝國，沒有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貝當政府，祇是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地方政府，自然不算是法國。

如果說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不能被稱為中國，祇能稱為元國；滿州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不能稱為中國，祇能稱為清國；那麼，法國人不僅入主阿爾及利亞，而且把阿爾及利亞變成了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也要改稱法國了？包括阿爾及利亞等殖民地在內的國家，應該叫法國呢？還是叫法蘭西帝國？或者叫做法非帝國呢？

元朝和清朝的中國人并不說蒙古話和滿州話，仍然是講漢語、寫漢字，却不能稱為中國和中國人；而阿爾及利亞今天仍被稱為法語國家，反而不必叫法蘭西和法國，還是叫做阿爾及利亞。世界上有這樣蠻不講理的嗎？

至於德國，更是從來就沒有這個國家，如果說從來就沒有中國這個國家的話。照這種邏輯，沒有德國，祇有德意志；沒有德國，祇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沒有德國，祇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沒有德國，

祇有東德和西德；沒有德國，祇有普魯士；沒有德國，祇有神聖羅馬帝國。

罵別人為愛國賊的人，否認中國這個國家的存在；而那些被人罵為愛國賊的人，正是因為愛中國才挨罵的。這是個悖論。沒有中國，哪裡來的愛中國的愛國賊呢？因為別人愛國，就罵別人是愛國賊，這實在是毫無道理。

國，無非是千千萬萬個家的組合，而每一個家又是由單個的人組成的。因愛國被罵為愛國賊，愛自己的家不是也要被罵成愛家賊了嗎？因為愛家中的每一個人，不是又要被罵為愛人賊了嗎？這不是太荒唐了嗎？

罵別人是愛國賊的人，可能會狡辯：說愛國賊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更是莫明其妙。中華人民共和國祇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現代法西斯政權的名稱，而且名不副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既非人民的也不是共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像布什的共和黨政府、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政府可以更換，美國依然美好。不同的是：布什和克林頓是經過選舉才能夠建立政府的，而且任期祇有四年，祇能連任兩次（八年）；而共產黨呢？既不必經過選舉，又可以用槍桿子和掌控媒體來保證政府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但是，歷史是不依共產黨的愛好而發展的。共產黨的「永遠」，就像鴉片和搖頭丸，使黨的領導人以及愛黨賊們時常處於飄飄欲仙之中。君不見中國共產黨的恩師——蘇聯共產黨的「永遠」的政府，已經仙逝了十幾年了麼？曹雪琴早已用「忽啦啦似大廈傾」說明了一切貌似強大色厲內荏的強權的頃刻瓦解。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可以預料：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的頃刻瓦解，一定會比某些人想像得要快。

中國人講愛國，祇能是愛中國，就像文學大師林語堂所說的吾土吾民，愛中國的國土，愛中國的國民。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不是愛中國，祇是愛共產黨建立的政府；就像八旗子弟愛滿州人建立的清朝政府，而不是愛中國；就像忽必烈愛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府，而不是愛中國。

黨是什麼？

要弄清中國共產黨是什麼，就要先弄清黨是什麼。

關於黨，中國古代有過一些說法。如：朋黨、黨爭、君子群而不黨、結黨營私，等等。最著名的黨爭大概要算唐朝的牛李黨爭和宋朝的王安石、司馬光黨爭了。牛李黨爭捲入的名角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韓愈被貶潮州，柳宗元被貶柳州，於是又有了韓潮州、柳柳州的說法。

王安石、司馬光黨爭中捲入的蘇東坡和歐陽修，名氣比兩位黨爭的主角還要大。蘇東坡被流放海南，於是有了海南儋縣的蘇公祠，成為當地一大名勝。

中國古代的黨爭，實際上祇是皇權重壓下的朋黨之爭、幫派之爭，與現代政黨是根本不同的。

外國在古代也有黨爭，也有朋黨之爭和幫派之爭。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最早產生於英國。

1679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剝奪詹姆士王位繼承權的《排斥法》。圍繞王權在議會形成了維新的輝格黨和保王的托利黨。這兩黨後來分別發展為自由黨和保守黨。

現代社會中的黨，都是與獲得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的。因此，黨也叫做政黨。

作為現代政黨制度中的政黨，最早是由英國的《選舉改革法》在1832年形成的。

政黨的競爭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典型特徵。沒有政黨就沒有民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湯加王國、西薩摩亞、巴林國、阿曼蘇丹等君主制國家中沒有政黨。這些國家的政權是由國王掌握的，不存在什麼民主不民主的問題。

有政黨的國家不一定就有民主。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金正日的北朝鮮以及古巴、越南、緬甸，都有政黨，都沒有民主。

為了保證現代民主政治的健康運行，各國憲法和法律都對政黨作出若干規定。主要有三點。

一、政黨的成立。

政黨成立時，必須明確提出自己的宗旨。宗旨必須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的要求。

如：聯邦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如果根據政黨的宗旨或者黨員的行為，表明某一政

黨意圖侵犯或者廢除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該政黨就違反了憲法。」

二、各政黨一律平等。

聯邦德國《政黨法》規定：「如果一個公共權力機構對政黨供給某種設備，任其使用，或者給予某種支持，必須對所有的政黨平等對待。」如在競選期間，給予各政黨以平等的機會在新聞媒介中發表政綱，進行競選。

三、公開資金來源。

各政黨必須對自己的經費來源予以公開，司法部門有權調查各政黨的經費來源。聯邦德國規定各政黨每年對財務問題提出一份公開的報告書。報告書由經濟檢查事務所進行檢查。

政黨的目的在于於掌握國家政權，與全國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政黨的經費來源公開化并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才能防止政黨危害人民的利益，不允許他們祇謀求自己的一黨之私，就像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批評的「結黨營私」。美國的司法機構和新聞媒體調查中國共產黨通過黃建南等人給民主黨捐款的事，就是美國民眾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經費來源的監督和檢查。

上面說了黨和政黨。那麼，什麼叫做執政黨呢？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北朝鮮、古巴等一黨專制國家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王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政黨競選的制度。在多黨競選中取得議會多數的黨，才能執政。因此，也叫做執政黨。

執政黨通過競選取得了議會多數之後，并不能由黨來管理國家和社會。執政黨是通過掌握議會多數，由議會任命國家的主要官員，來體現對國家的管理。

在憲政民主國家，實行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這些國家，公職分為兩大類。一類叫做政務官或政治職位。這些職位的任職者是由選民選舉產生或者是通過政治任命產生的。另一類叫做事務官（或稱文官、公務員），一般是常務副部長或司局長以下的全部職位，通過考試錄用、晉升，不受政黨政治的影響。不管哪一個政黨在選舉中獲勝，都不得撤換未犯過失的事務官和公務員。這樣，國家機構就不會成為某一個黨派的附庸，而且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公務員是全體國民的服務者，而不能是某一個政黨的僕從。憲政民主國家不准任何政黨

建立軍隊，也不能在軍隊中建立黨的組織，不准在軍隊內部發展黨員。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農民中敢於冒險的人為主要成分組成的打天下、搶政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號人物毛澤東是富農的兒子。打天下的主要人物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王震、許世友等人，都是農民中的地痞、流氓、惡棍、潑皮、無賴。雖然其中的彭德懷、朱德還有點良心，但他們在搶奪政權、建立共產黨法西斯專政的過程中，還是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一樣，有槍就是草頭王。

毛澤東像劉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一樣，拉起隊伍是爲了做皇帝。劉邦、朱元璋、毛澤東當上了皇帝，是成功者；李自成、洪秀全先勝後敗，終於是失敗者。所謂成王敗寇，就是這個意思。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爲什麼能夠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呢？主要有以下五個原因。

第一、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把來自西方的流氓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拿來，與中國幾千年的帝王術和地痞流氓無賴潑皮惡棍二流子的種種手法混合雜交，產生了最有效的超級流氓理論——毛澤東思想。這種叫做毛澤東思想的流氓理論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紗，成爲共產黨控制的武裝力量的信仰和精神支柱。那些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邪教蒙蔽了的農民子弟，本來就沒有什麼文化，加上郭沫若、千家駒，於光遠、鄧拓、鄧力群、韋君宜、胡績偉等等大學生、大知識份子的示範作用，沒文化的自然就深信不疑了。在信仰的驅使下，由八路軍、新四軍和各種土匪武裝改編而成的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爭奪中國政權的所謂解放戰爭中，終於取得勝利。

第二、國民黨軍隊（中華民國政府軍）在蔣介石的指揮下，與侵略中國的日本皇軍進行了八年浴血奮戰，把日本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加上美國的支持和幫助，終於使日本侵略者投降認輸。然而，八年的時間過去了，國民黨的軍隊也被日本皇軍打得七零八落，真正實現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所夢寐以求的「兩敗俱傷」的願望。日本投降了，國民黨軍隊也被打垮了、打散了、打碎了。共產黨呢？躲在旁邊偷著樂。

一邊開荒種鴉片賣錢買槍，一邊收羅農民和傻帽知識份子加入共軍，擴大所謂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的地盤，還要譴責國民黨、蔣介石準備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這就是共產黨的「持久戰」。

第三、斯大林新沙皇爲了永遠地侵佔老沙皇從中國掠奪的幾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甚至還要得到中國更多的土地，對中國的叛國集團——共產黨給予大量的財力支持和軍事指導。武器彈藥是從蒙古、新疆、東北等漫長的中蘇邊界運來中國交到共產黨的手中，有時還用飛機緊急運送到延安等共產黨盤踞的地盤。共產黨賣國集團用新沙皇的盧布顛覆了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把中華民國政府擠到了台灣島上。

爲了報答斯大林新沙皇的指導和幫助，毛澤東默認了老沙皇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默認了新沙皇對外蒙古的侵佔和後來的蒙古獨立。直到江澤民這個中華民族的敗家子，才與俄國簽訂了真正的賣國條約，明確承認老沙皇的侵略成果。什麼海參威，什麼貝加爾湖（就是蘇武牧羊的北海），都在法律上成爲俄國的天然良港和境內湖泊。

第四、國民黨的領導人蔣介石等人，作爲一個政治家，當然有狠毒的一面。但是，蔣介石的“狠毒”，比起毛澤東，簡直不值得一提。共產黨拍的電影，宣傳國民黨的軍隊把老百姓押在軍隊前面，使共產黨不忍心開槍。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國民黨軍隊因爲考慮到老百姓的安危，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條件。如：傅作義在北京投降，就是考慮到北京的老百姓和古都、古建築的安危，當然還有他自己個人的如意算盤。他聽信了共產黨的謊言。尤其是他的女兒、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傅東，對她父親的投降起到了關鍵作用。

現在，已經有許多史料刊登在海外的媒體上，尤其是電腦網絡上，公開了被共產黨封閉了幾十年的珍貴史料。如：東北戰場上，林彪的軍隊爲了佔領長春、四平、吉林等東北重鎮，把國民黨軍隊連同幾十萬、上百萬老百姓圍困在城內，少則幾十天，多則幾個月。老百姓偷偷出城挖點野菜，毫無例外地被共產黨開槍打死。共產黨的理由是：老百姓挖的野菜會被國民黨軍隊拿去吃。就這樣，當國民黨軍隊突圍逃跑之後，城裏的老百姓也活活地餓死了。有的城市餓死幾千幾萬，有的餓死、渴死幾十萬。這就是共產黨的“人民解放戰爭”。

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口口聲聲說是爲了解放人民；實際是爲了奪取政權，不惜餓死渴死幾十萬、上百萬的人民。至於六零年餓死幾千萬，也是爲了毛主席的三面紅旗不能倒。老百姓被餓死了，實際上也是被解放了。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的繼續解放。這種解放，祇要共產黨還存在，就會沒完沒了。餓死了，就不用再受共產黨的罪了。這不是解放，是什麼呢？死了，涅槃了，圓滿了。這樣理解共產黨的“解放”，恐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第五、國民黨堅持新聞自由、半自由，而共產黨的新聞自由祇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共產黨頭目的自由。

在國民黨統治區，也是所謂解放戰爭中的國民黨的大後方，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新聞自由，隨意攻擊國民黨政府，真真假假，有真有假，使老百姓誤以爲國民黨真的比共產黨要壞幾千倍、幾萬倍。一直到決戰時刻的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在國民黨的心臟——首都南京還駐有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頭目先後主持第五縱隊的籌劃和安排。代表團駐地就在南京的梅園新村。

我的老上級胡績偉，從二十幾歲參加共產黨，一直從事新聞工作，直到六十幾歲才明白人民性高於黨性。在這之前，就是像胡績偉這樣的大學生、文化人，成千上萬地奔向共產黨盤踞的延安；就是因爲共產黨利用了國民黨的新聞自由，才矇騙了這些年紀輕輕、熱血沸騰的大學生、文化人。他們到延安後，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洗腦，成了有文化有信仰（西洋邪教信仰）能說會寫善於宣傳馬列毛邪教的宣傳兵。他們有的留在延安，有的進入八路軍、新四軍隊伍中，有的則返回國民黨統治區，成爲動搖國民黨政府根基的第五縱隊。這些第五縱隊的隊員，利用國民黨的新聞自由，大肆宣傳共產黨的邪教理論，拼命詆毀國民政府走向憲政的種種努力。他們還以拜師求教等種種手法，對魯迅、郭沫若、聞一多等名士大儒大灌迷魂湯。在這些所謂文化巨匠樂陶陶、昏昏然的時候，就被他們的學生拉上了共產主義邪教的賊船，站在共產主義邪教的立場上，用手中的筆寫成攻擊國民政府、毀謗憲政民主的文章，并自稱是什麼投槍和匕首，戳痛了中國人民走向民主的心。他們混淆了老百姓的視線，降低了老百姓的思考能力。

魯迅、郭沫若、聞一多這些文化巨匠背叛民主的國民政府，投向共產黨邪教的懷抱，對於中國人民幾十年來遭受的種種苦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將來中國真的實現民主了，一定要把魯迅、郭沫若、聞一多等文痞漢奸騙子手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成爲後世文化人永遠的警戒。具體辦法可採用在歷史書上寫明、在教科書上列入、在碑銘上篆刻等。魯迅、郭沫若、聞一多等人自命清高，以反叛者自居；實際上反叛的是正在艱難走向民主的國民政府，却投靠了根本沒有民主的共產黨邪教勢力。祇爲了「反叛者」的虛名，就被共產黨及愛黨賊們捧昏了頭，歡天喜地地、孜孜不倦地創作遵命文學，成爲革命文化的旗手。

愛國有理 愛黨有罪

中國是我的祖國，是我的家鄉。我愛中國，我愛家鄉，一點也不含糊。有人罵我是愛國賊，那就去罵好了。祇要他們有精神，有力氣，一天罵到晚也沒關係。如果他們有人供養，不用做工掙錢，還可以一年罵到頭。

我因爲被共產黨逼得實在熬不下去了，無可奈何之下，才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底，離開自己的祖國，告別了生我養我的故鄉，來到了太平洋對岸的美利堅。

來到美國後，遠離祖國和家鄉，時間越長，就越是思念祖國，想回故鄉。真是應了一句俗話：距離產生美。時間上、空間上距離越大，對祖國的山河越是懷念，對故鄉的風味小吃、兒時朋友越是懷念。我現在打電話最多的是小學老師和同學，就是爲了回憶童年時代的生活和學習。雖然回憶是痛苦的，因爲那時正是六零年前後差點餓死；但是與小學同學談到當年趣事，還是經常在電話裏笑得肚子生疼。

越是懷念祖國，越是想回故鄉，就越是痛恨共產黨。與小學老師同學談到當年餓死的老師和同學，恨不得把共產黨頭目統統地千刀萬剮。

爲什麼有人祇罵愛國賊，却不敢罵愛黨賊呢？因爲共產黨實在太可怕了。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在中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最好的證據就是毛澤東自己的文章。《湖南農民考察報告》中，客觀真實地記錄了共產黨領導農村的地痞流氓惡棍無賴的下流嘴臉：「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地主小姐是個年輕姑娘，到地主小姐的

牙床上去滾一滾，這是什麼行爲？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在新沙皇的支持下，利用孫中山「聯俄聯共」的錯誤，混進了國民政府，混進了國民黨中央。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共產黨更是賊喊捉賊地大發國難財。明明是他們趁著國民黨軍隊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的時候，在一邊乘涼、休整、訓練、發展，坐收魚翁之利；却倒打一耙說蔣介石坐在峨眉山上準備下來摘桃子。毛澤東感謝田中角榮和大平正方的話，就是最好的證明。就在全國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四散逃難的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叛國集團却歡天喜地、興高采烈、彈冠相慶。因為，國家的困難、人民的痛苦，正是他們這些亂世奸雄大顯身手、篡權奪位、稱王稱帝、出將入相、賣國求榮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

有人說毛澤東是千古一帝。不錯，毛澤東就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人類歷史上最凶殘、最暴虐、最陰險、最毒辣、最無耻、最狡詐，最不講信義、最沒有廉耻、最沒有良心，殺人最多、禍國最烈、誅心最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的千古一皇、萬年一帝。

以毛澤東為最高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最凶殘的敵人，是中國歷史上對國土破壞最徹底、對國民殺戮、摧殘最嚴重的一個統治集團。套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用語：以珠穆朗瑪峰作筆，以太平洋作墨，以藍天作紙，也寫不盡毛澤東、共產黨的罪惡！

奇怪的是，那些動輒罵別人是愛國賊的人，為什麼放著毛澤東、共產黨不罵，也不罵那些為了從共產黨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中分一杯羹的花某某、梁某某和陳文英之流。正是花某某、梁某某和陳文英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幹著愛黨賊的勾當。他們根本不愛中國，但他們確實愛中國共產黨。因為祇有中國共產黨才可以讓他們非常輕鬆、極其愉快地通過「做生意」祇賺不賠，每年都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美元進賬，還可以戴上共產黨送給他們的一頂花帽子——「愛國」。 2004年4月23日於美國維吉尼亞。

反共，

才是真正的愛中國！

李勇

七零年代以左傾馳名美國學術界的譚若思（Ross Terrill）最近寫了一本叫「一中帝國大夢」的書，把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四年種種有共

產特色的暴政當作是中國帝王傳統，把中共沿襲國際共產黨的種種倒行逆施視為中國的帝國文化。換句話說，他把中共稱為「中國」，把以毛共為首的政權當作「中國」，然後從這個角度來批判中國。因此，他不久前去台灣訪問有台獨傾向的陳水扁時，與陳一同批評「中國」，並對「中國人」有所非議，符合了台獨份子積極「去中國化」而獨立建國的目標。

譚若思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研究員兼教授，專門研究中國問題。七零年代，當舉世為中共政權唱讚歌時，他與費正清一樣歌頌中共這個「新中國」，並吹捧中共在文革中的種種表現。譚若思秉承費正清早年親中共的立場，不斷去北京向中共示好，被中共形容為「中國的好朋友」與「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直到毛死江囚之後，中共把文革定為浩劫，費正清首先「覺悟」，到了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慘案發生，譚若思才在親共的大夢中清醒過來。不同的是，譚若思並不因此而反共，他把共產當作是「中國」及「中華帝國」，把反共當作反華，這種言行與當前海外若干知識份子思維相似，都犯了「把中共當作中國」的謬誤，因此，他們因反共而變成反華的急先鋒。這種轉變是絕對錯誤的。

認識中共政權本質的人都清楚，中共決非中國，理由是他們承襲了國際共產那一套的馬列制度並“君臨”中國大地，他們的種種作為與從前的蘇聯斯大林同出一轍，與現在的金日成北韓、越共政權、古巴的卡斯楚政權完全相同。都是國際共產主義教廷的「同志加兄弟」。事實上，中共君臨中國大地半個多世紀，一切表現是徹底的去「中國化」。他們以蘇聯為師，並叫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他們照搬蘇聯斯大林那一套殘暴手段來統治中國大地，而且變本加厲地對付中國人。因此，他們否定中國傳統，摧殘

中華文化，分裂中國文字，破壞中國大地，屠殺中國人民。

今日人人罵台獨份子「去中國化」可惡，其實「去中國化」最徹底的是中共政權。他們為了「去中國化」曾經叫出「工人無祖國」，并以蘇維埃作為他們的國號，把中國的人倫禮道德破壞得蕩然無存，把中國人溫和謙恭的傳統消除得乾乾淨淨。一個如此仇視中國，傷害中國，禍害中國的政權，有什麼資格自稱代表中國？雖然問題不在中共自稱「中國」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而是許多海外華人也誤把中共當作中國而擁戴，因此他們把親共當作愛國，并認為反共就是反華。這種以訛傳訛的觀念漸漸深入人心，若干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反共知識份子（國內也同樣有著這樣一批所謂知識份子），也把中共當作中國，把中共的種種惡行當作是中國的弊端而鄙視之。久而久之，他們批判責罵的對象從中共轉化為中國，然後把「中國」與「中國人」說得一無是處。然而，作為一個熱愛中國的中國人，作為一個「義不帝秦」的中國人，作為一個逃共產災難而遠托異國的中國人，對這種誤把中共當作中國的言行深惡痛絕，而且應該全力澄清，不容中共魚目混珠，也不容海外愚昧華人混淆。

中共政權從奪權成功前的「一面倒倒向蘇聯」到今天「四個堅持」、「三個代表」，都以馬列主義的思想掛帥。在共產黨人心中，馬列是他們的祖宗，史毛是他們的爺爺，因此，共幹頭目一個個都把死亡形容是「去見馬克思」，與中國「見列祖列宗於地下」的觀念完全不同。這種政權有什麼資格代表中國，有什麼理由說他是中國！記得七零年代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在中共挑動下展開保釣運動，他們打著「保衛釣魚台」、「國土不容分裂」的口號反對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然後與中共勾結在一起，主張立即「解放台灣」，消滅中華民國，他們認為盤踞中國大陸的馬列政權就是中國，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親共，也非左傾，而是「熱愛中國」。

中共為了統戰需要，也處處以「中國」自居，并把海外反共的人加上「反華」、「反人民」的帽子。他們甚至造謠說台灣在蔣介石統治下已成為「美國殖民地」，「美蔣勾結分裂中國國土」是賣國行為。那時候，海外有一小撮來自台灣的留學生被中共的「假民族主義」迷惑，把中共當作中國吹捧。

畢竟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理智清明，分得清是非善惡，不會被中共所謂的民族主義所迷惑，再加上台灣的國府當局加強海外工作，及時拆穿中共的假面目，於是召集了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與僑界精英，成立了「反共愛國聯盟」，叫出「反共就是愛國」，「愛國必需反共」的口號，對中共的統戰展開了有力的反擊。

「反共愛國聯盟」的口號是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愛中國、愛中國同胞的中國人，怎麼能夠忍受外寇內賊蹂躪我們的國家？殺害我們的同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痛恨日本鬼子侵華，仇視馬列子孫禍國的原因。

想想看，日本鬼子侵略我們中國，八年來殺害中國人一千多萬，導致上億中國人流離失所、家園破碎。因此，當我們唱「松花江」時，淚流滿面，聽「黃河大合唱」時，悲不自勝。這就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自然流露的愛國感情。

同理，中共「解放」了大陸，「共產鄉國」，五十四年來，殺害中國人上億，餓死中國人四千五百萬，僅一個文化大革命，就使無數中國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直到今天，中國人祇要抓住機會，就千方百計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逃去國外，寄居他鄉。目的無他，祇是希望過一個沒有恐懼、不受迫害的自由生活而已。

任何一個去過中國大陸的中國人，都可以從大陸同胞口中聽到中共禍國殃民的種種陋行與暴行。儘管中共封鎖新聞，堅持馬列，偽稱改革，仍然無法掩飾他們荼毒中國的事實，也無法遮蓋他們猙獰的面目。

但是，今日生活在自由地區——美國、台灣的華人，由於反對台獨份子煽動族羣歧視，不滿台獨組織分裂國土，跟在中共偽飾的民族主義後面，搞什麼「反獨促統」與「促進和平統一」，并以為這就是愛國。

中共所謂反獨促統、所謂和平統一，目的不外是想把二千三百萬台灣的中國人納入共產制度下，讓那羣貪得無厭、凶殘成性的馬列子孫統治，過著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幸福生活」。

過去五十多年來，大陸同胞所過的「無產階級幸福生活」是什麼樣子，舉世皆見，何況海峽這邊的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因此，一個熱愛中國、關心台灣的

中國人，對中共的「促統」及「和平統一」沒有興趣。他們當然主張中國統一，但卻認為中國應統一在三民主義制度下。也就是說，中國未來的統一，必需在實行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制度下，而不是在馬列的共產制度之下。

台獨份子之所以「去中國化」，也是犯了把中共當作中國的謬誤，他們把中共禍國殃民的種種惡行視為中國人的醜陋，因此，以做中國人為耻。他們并根據中共就是中國的理由，希望台灣獨立建國，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不致被中共「解放」或「共產」。

站在逃避中共「解放」、「共產」的立場，台灣獨立的想法未可厚非，但如因恐共、恨共而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甚至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分成兩個「族羣」而排斥中國人，也就是他們嘴巴裡面的“外省人”，這就是無知幼稚的表現。台獨份子之所以可惡可恨的道理，也就在此。

海峽兩岸經過五十四年的分裂，兩岸人民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大陸的人，在中共以馬列意識形態統治下，經歷中共的「革命」洗禮、「解放」劫難與「共產」摧殘，中國文化傳統已經所剩無幾。尤其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倫理道德更是蕩然無存，今日的中國大陸之所以出現一片男盜女娼的風氣與巧取豪奪的潮流，均與中共對中國的破壞有關。反觀台灣，在蔣氏父子統治下，既曾有文化復興運動，也曾經鼓勵“讀經”風氣，五十四年來，國府在台灣不但提倡倫理道德教育，也美化中國傳統風俗習慣，使得台灣不但經濟起飛，而且社會祥和，台灣人過著富裕而有人情味的生活。若非台獨份子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離開族羣感情，台灣不會有今天的亂像，也不會讓台獨的分離意識高漲。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多年前，台灣民間組織與大陸民間組織交流，在台北舉辦一個「家譜」聯展，祇有二千三百萬中國人的台灣，從民間搜集到了大批「家譜」，其中竟有保存了千年之久的版本，而且數量不少。相反，有十三億中國大陸，祇找到幾本數百年的家譜，問他們祖宗留傳下來的家譜何在？他們都說已毀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了，現在可以找到幾本歷史不太悠久的家譜，還是從偏遠地區的鄉間找到的孤本。單從此處，就可以看到中共禍國之深重。這樣的政權憑什麼可以代表中國？有什麼資格自以為

是中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個真愛中國的中國人，豈可以不反對禍國殃民的中共政權，豈可把這個政權當作中國？

三年前，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頒獎給美國《國家評論》雜誌的編輯諾林傑，對他主持正義的反共立場表示贊許，公開表揚。諾林傑在領獎後發表講話說：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但是我反對禍害中國和中國人的國際共產黨人。因此，你們不要相信中共及其同路人對我的攻擊，他們罵我是“反華分子”，那是不正確的。在此，我要告訴大家，我祇是一個能明辨是非、分得清善惡的反共新聞工作者，我反對禍害世界長達一個世紀的共產制度，僅此而已。

美國學者譚若思，是一個立場東倒西歪、思想左右動搖的知識份子。七零年代，他誤把中共當作中國而親近，現在則誤把中國當作共產黨而排斥，并把中共政權形容為「中帝國」。其實，中共種種倒行逆施，與國際共產制度下的國家酷似，也就是前蘇聯、赤東與今日北韓政權的翻版。中國歷代王朝雖也專制獨裁，但其殘暴方式與統治手段則與中共大大相徑庭，完全不同。

可以這樣說，中共統治中國大地五十四年與中國歷代王朝有別，歷代王朝從未在短短半個世紀中，關起門來屠殺了上億中國人。為了討好他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他把大批糧食運去蘇聯與其它所謂「同志加兄弟」的國家，使中國人餓死達四千五百萬之眾。這樣的政權這麼會是中國的代表，這批馬列子孫還有什麼資格做中國人？

我完全同意歷史學者辛灝年教授的大作《誰是新中國》中所說，中共政權不够資格稱為新中國，他祇是中國從一九一一年走向共和、實行民主進程中的一股逆流。因為新中國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

今日中共所說的「一中」，與他們自稱的「中國」，根本就是中華民國。凡是愛中國的中國人，應該毫無疑問地反對異族（馬列黨族）在中國大地上所建立的馬列政權。

所以，反共就是愛國，愛國必需反共。這是今日理智清明的中國人應該有的認知，也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的共識。

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鄭義

本文為一家之言，難以完全避免偏見
及片面性，謹供活躍思想並歡迎批評。

「族群撕裂」源於種族主義煽動

我極端厭惡共產極權制度。八九民運慘遭鎮壓之後，我在漫長的逃亡路上完成了一部 50 萬字的《紅色紀念碑》。十多年過去，我仍然認為它是一本對共產極權制度具有相當深度的批判性著作。在這本書中，我認真地研究了權力、權力異化，獲益非淺。

我去過台灣，很喜歡那裏濃鬱的人情味，知識份子的書卷氣，女性的溫柔賢淑，還有那些大陸社會所完全沒有的各種自由……我對國民黨、民進黨都抱有好感，我認為那是一個自由的中國。有一天，同主張台獨的幾位大學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問她們反對甚至壓迫「外省人」的道理，答曰：外省人欺壓過我們。——好，我理解，那麼為什麼現在還要壓迫「外省人」的後代？答曰：他們的父輩欺壓過我們……——「這我就明白了」，我幡然醒悟道，「這就跟我們大陸的共產黨一樣了：我們殺地主富農是因為他們壓迫剝削我們，我們殺地富子弟則是因為他們的父輩欺壓過我們！據我對民主的理解，富人窮人，本省人外省人都是人民，更不用說他們的後代。我堅信一條真理：以任何名義在人民中製造仇恨與分裂都不是民主而必定是專制！」血緣、出身、種族、國籍等等歧視，與共產主義的階級歧視是性質相同的。從此我開始以警惕的目光注視台獨。隨著極端台獨派一波波煽動族群仇恨，一步步走上執政之途，我的這種思想也更加清晰。

此次台灣大選，「族群撕裂」已到鮮血淋漓之程度！

何謂「族群」？這真是一個奇妙的辭彙！

在我看來，「族群」一詞，是劃分「民族」或「種族」不得，便退而求其次的一個曖昧的辭彙。在人民中分割而挑撥之，最煽情的莫過於「民族」、「種族」和「階級」。極端台獨派搜索枯腸，竟也

找不出與中國大陸人之間的「民族」「種族」差別。（當然，也有人編造「科學證據」，聲言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台灣人有原住民的血液，等等。）福建人、客家人從人種上來說都是「外省人」（並非台灣原住民），怎麼也劃不清和時間上的「外省人」的種族界限。萬般無奈，祇好含糊其詞，弄出個「族群」來。到底是「族」還是「群」，就說不清楚了。既如此，「階級」、「專制」不好用嗎？反對國民黨政府可用，國民黨下台了就又不好了。要奪權保權就要喊「獨立」，要「獨立」就要喊「民族」「種族」，「族」字說不出口，就祇好再含含混混抓過一個「群」字作掩護。但那在「群」掩護下的名不正言不順的「族」，才是心照不宣的暗示、誓約與秘密。

就這樣，台灣民主化就變成了台灣「本土化」，變成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所謂「外來政權」，同樣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創造性辭彙。它骨子裏同樣是「非我族類」一律排斥的種族主義。「外來」？什麼「外來」？「殖民者」嗎？台獨自己就是大陸移民後裔。「侵略者」嗎？恰相反，是打敗侵略者的解放者。「外來」本是一中性辭彙。要知道，民主的德國和日本，都是「外來」的美國幫助建立的。「外來」有何貶義嗎？實在看不出來。政黨政治、民主制度、電腦軍艦都是「外來」的，也需要「打倒」並剷除其「殘餘」嗎？應該打倒的政權很多，有「專制政權」、「共產政權」、「種族主義政權」、「殖民政權」、「壓迫政權」、「殘暴政權」、「割據政權」……唯獨沒聽說過「外來政權」。對於民進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特殊種族「外省人」，以上種種「政權」都不好用，祇好杜撰出個「外來政權」。話說回來，即便把這文章做透徹了，鑑定好「外省人」或

「外來殘餘」的血液成分，就像當年納粹那樣言之有據地區別開各色人種，那又如何？最多也就是爭取到一頂「當代納粹」的桂冠！

歷史的殷鑑：希特勒起家

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是一塊神奇的阿拉伯飛毯，它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幾乎任何政客送上權力的天堂。

民族主義源遠流長，但現代德國民族主義從惡性爆發到納粹德國的覆滅，却是一個相當短暫的周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以及德國作為戰敗國所遭受的屈辱，是民族主義興起的絕好溫床。年輕的煽動家希特勒理解了這股蘊藏於德國人內心深處的幾乎可以創造出任何奇蹟的力量。可以這樣說，對這股力量的理解和掌握，是他走上權力頂峰的秘訣。他對德國魏瑪民主政權的顛覆，對民主憲法的摧毀，概得益於對這種非理性力量的操控。

1922 年秋，德國因經濟困難無法向法國支付戰爭賠款，法國軍隊隨即佔領了德國工業的心臟——魯爾。德國人民奮起反抗，魯爾的工人舉行總罷工，軍隊組織遊擊隊，可謂全國上下同仇敵愾。這一事件雖然點燃了民族仇恨的烈火，但希特勒卻很難利用：德國人團結在魏瑪民主政府周圍，大大增加了他篡奪政權的難度。於是他把被迫簽訂了停戰協定的魏瑪政府誣為「祖國的叛徒」，企圖把民族主義浪潮引向內部。法軍佔據魯爾後魏瑪政府不得已的對法國的妥協，在德國民族主義份子和共產黨人中間引起了歇斯底里的狂怒。納粹黨和共產黨都急於使這股潮流內轉，趁機奪取政權。

接下來，就是舉世皆知的「啤酒館政變」：希特勒率領一隊形同兒戲的武裝納粹份子，和象徵著德國軍隊的傳奇人物魯登道夫將軍肩并肩地向巴伐利亞邦陸軍部前進。開始一帆風順，所向披靡，最後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意外，使他們未能按原計劃把軍隊裹脅進一場納粹革命：一位僅有 100 名手下的警官似乎並不認識偉大的魯登道夫將軍，居然把住街口，拒不讓路。緊張對峙中，不知是誰開了一槍，一場好好的兵不血刃的和平政變，頃刻間變成一場幾十秒鐘的對射。祇有兩個人迎著警察的槍口泰然自若地繼續前進：魯登道夫將軍和他忠實的副官。除了倒在地上爬不起來的死者，納粹黨人頓作鳥獸散。而第一個拔腿

就逃的人，居然是希特勒！這次政變雖然以相當濃鬱的喜劇色彩失敗了，但政變的民族主義訴求和審判中希特勒義正詞嚴的自我辯護，使他成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至於誰是第一個拔腿就逃的人，再也無人提及。陷入種種政治狂熱的民眾，祇會以半瘋的目光崇拜他們的領袖，并輕而易舉地原諒和遺忘他的一切缺點甚至罪過。就是在那次審判中，有人提起希特勒不久之前還聲言自己願做愛國運動中的一名「鼓手」，而現在野心膨脹要當獨裁者了。希特勒竟然乾脆承認他就是當獨裁者，而且是「責無旁貸」。德國人聾了嗎？他們似乎沒有聽懂這種明明白白的語言，最終自己把這位獨裁者加在自己頭上。

集體瘋狂起源於煽動

歷史告訴我們，納粹的種族狂熱主要是煽動的結果。兩位公認的種族主義思想家——法國人戈平璫與英國人張伯倫（不是被希特勒屢屢欺騙的那位英國首相）——認為血統純粹的亞利安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是世界的希望。他們（特別是張伯倫）的思想，很快被德國人所接受。但他們如日中天卻是在希特勒當政的第三帝國時代。納粹黨人繼承了張伯倫的種族理論和他熾烈的德意志使命感。張伯倫被奉為偉大的「先知」，納粹德國的「精神創建人」。

在第三帝國崛起之前，德國的種族主義從來沒有達到過這種瘋顛的程度。以至於我們可以這樣說，那種歇斯底里大發作，完全來源於煽動。如果不是一些親睹第三帝國盛世的觀察家當年留下的文字，我們很難相信德國人（特別是女性）在希特勒演講現場那種如癡如醉的狂熱。當代史也告訴我們，共產黨的「階級」與「歷史」，民進黨的「排外」和「歷史」，與張伯倫學說的核心——「種族」與「歷史」實在差別不大。他們都試圖從人們的血液、出身、經濟狀況等差別及其形成史中去尋找異類，尋找仇恨的理由，并以此作為獵取權力和擴張權力的無可置疑的根據。遺憾的是，他們都得手了。被煽動起來的人們是瞎子、聾子和瘋子。他們極難戒絕仇恨的鴉片，往往心甘情願地跟著他們的救主走向最後毀滅。這方面，德國人表現最好。為了他們的元首，他們一直戰鬥到最後的「一兵一卒，一槍一彈」。

據一些台灣中年人回憶，在他們的學生時代，李登輝當政之前，尚無「族群撕裂」現象，同學之間亦無「省籍情節」。現在的「外省人」後代，小小年紀，在學校已經被罵成豬了（這種情形，本人深信不疑並深有體會。六十年代中期，同學之間依然沒有「階級」意識，但文革一來，階級煽動大興，同學、同桌、同宿舍轉瞬之間便視若仇寇）。本來，在民主社會，競選的內容很多，從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到稅制、外交、環保，國計民生當應有盡有。但是在台灣，却唯剩……「族群」。在民主社會中，煽動種族（「族群」）仇恨是應該被禁止的。但在台灣，陳水扁竟敢聲言本次大選是「愛與恨」的選舉，亦即愛台灣（「族群」）與恨台灣（「族群」）的對決！不管陳水扁們的辭彙如何遊走變幻，他們要在民眾中煽動仇恨以利於奪權護權之本意是清晰可辨的。

中共革命亦是絕佳例證。在中共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之前，中國社會並沒有過於激烈的階級衝突和鬥爭。甚至在共產黨用軍隊強行推動暴力土改之際，一般貧苦農民仍然「沒有階級覺悟」，甚至把白天分得的財帛夜裏悄悄給地主送回去。他們不忍心搶奪富裕鄉鄰的土地錢財，更不忍使用血腥手段。極富階級鬥爭經驗的中共領袖，嚴令各土改工作隊必須實行暴力土改，挑動鄉村流氓份子，殺害富裕農民甚至「斬草除根」。記得列寧有言：共產主義思想不可能自發產生，而必須灌輸。誠哉斯言！任何挑動仇恨分裂民眾的思想都不可能自發產生，都需要灌輸。隨著共產主義的世界性崩潰，其階級煽動已經破產，取而代之的新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他們既用民族主義來對抗西方民主制度，也用它來對抗台獨。中國失去的國土很多，東北丟給俄國，西南丟給印度，其面積遠超過台灣。奇怪的是無人過問，唯獨提起台獨就是一片打殺之聲。除其中自有台獨極端派的一份功勞，這也是大陸當局長期定向煽動的結果。一種集體瘋狂，無論是「階級」還是「種族」、「族群」仇恨，皆是政客精心策劃、煽動的結果。

煽動「悲情」之老手：納粹和中共

階級、民族之差異，以及階級、民族之間的衝突、壓迫皆為客觀存在。那些煽動仇恨的政治家倒也不是無風起浪，而是推波助瀾。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

戰敗，凡爾賽和約確有不公平之處，德國確實感受到民族的屈辱。這種「悲情」，便成為納粹進行煽動的最佳切入口。1933年，希特勒奪取德國最高權力的前一年，同時進行了兩次投票：一出令德國深感屈辱的日內瓦國際聯盟的全民公投，和幾乎清一色納粹議員的國會新選舉。希特勒很巧妙地把日期規定為11月12日：這是德國人充滿怨恨的國耻日（一次大戰停戰紀念日）的次日。希特勒是這樣發表競選演講的：「我們一定要使這一天在我國人民的歷史上成為得救的一天——歷史將這麼記載：在11月11日，德國人民正式喪失了它的榮譽，而在十五年後的11月12日，德國人民又恢復了它的榮譽。」

什麼叫「德國人民又恢復了它的榮譽」？就是把選票投給納粹黨，為希特勒想做的一切背書。人民回應了希特勒的煽動，把戰敗後壓抑了十五年的悲情與憤懣凝聚在手中的選票上。選民中96%參加了投票，其中95%贊成退出日內瓦國際聯盟，92%贊成納粹黨的候選人名單。雖然這次投票不能說沒有壓力或威脅，但毫無疑問，希特勒對抗外部世界的決心，是得到絕大多數德國人充滿「悲情」的擁護的。

中共也是煽動悲情的老手。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那句著名的長腔高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可謂經典。這「站起來」若是指民主革命，則辛亥革命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了。若指首創民主共和，那是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之光榮。若指抵抗外侮，抗日戰爭也早就勝利了。若指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一躍而成為舉世公認之「四強」，那是蔣介石先生率國軍將士浴血奮戰凡十四年之殊勳。何謂「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是毛皇帝和他的文臣武將們站起來了。豈止站起來了？他們一直爬到了中國人的頭頂之上！但毛就是要如此煽情，他一定要煽動仇恨，這是他對抗民主的法寶！他一定要把民眾煽動得兩眼發紅，指東殺東指西殺西！毛的知識奴僕們則作出血海深仇狀，控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把歷史和外部世界描寫成充滿凌辱與敵意的地獄。人民接受了種種煽動與暗示，調整了記憶，認同了統治者，并自作多情地「自居」於主子所賜予的「主人翁」地位。中年以上的大陸人，都忘不了無休無止的「憶苦思甜」活動。人們被迫誇張地回憶「舊社會」的黑暗，以顯示「新社會」之光

明，以感戴新主子的德政。做「憶苦飯」的粗糠，在嘴裏打十個轉兒也難以下咽，「貧下中農」悄悄說，「舊社會」裏，這種粗糠，連豬也是不吃的！越往後，這苦難竟越深重。……「蘇修」與美帝合流，南北包抄……毛主席身邊睡著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中共建政後居然一直是「資產階級專政」……善良的人們呀，跟著我高舉起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仇恨與壓迫的）大旗吧，否則就會“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千百萬人頭落地”！

期待曼德拉和圖途

至於台灣，有論者如此寫道：「台灣歷史如同我黨改寫的中國歷史一樣一目了然、黑白分明：民進黨上台前就是台灣的『解放前』，所有的政權不但都實行專制暴政，而且都是外來政權。因此，這種統治具有雙重的黑暗性：統治者不但是獨裁者，還是異族侵略者，人民不但是暴政下的奴隸，而且是呻吟在異族侵略者鐵蹄下的亡國奴。」

民進黨故意忘記了，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上是一部民主憲法。迄今為止，仍然是中國人自由理想的最高結晶。中國大陸人民苦苦追求而至今不得的私有產權、政黨政治、權力制衡、法治人權自由平等、軍隊國家化等等民主憲政要素，大體上已經為這部憲法所確立。我這裏暫不論李（陳當政以來的幾次修改）。民進黨故意忘記了，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在共產狂瀾中巍然挺立，台灣早就淪為與大陸一樣的悲慘境地。民進黨更故意忘了，他們是和平奪權。那個他們痛恨之極的掌握著軍隊警察法庭全部國家暴力機器的國民黨政權，是和平地把政權移交給他們的。他們煽動仇恨奪取權力，又煽動仇恨衛護權力。他們更像誰呢？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比較近似納粹黨和共產黨而不近似於南非國民黨：曼德拉們推翻了種族主義政權，但他們沒有煽動反向種族仇恨，以仇恨立國，以仇恨執政。記得那位偉大的黑人主教圖途嗎？他傳播的是愛而不是恨。辛亥革命有「驅逐韃虜」之說，但革命成功旋即淡化，而大力提倡五族共和。再往前，滿清入主中原，本為異族入侵，卻努力淡化民族仇恨，提倡滿漢一體，皇帝皇子皇孫學習漢文化，禮待漢儒，拜謁明孝陵，承接明王朝法統。至少不是反其道而行，追隨亡元。

台灣會出一位曼德拉或一位圖途嗎？
我沒有信心而唯有期待。

被煽動的民意

此次槍擊案發生後，有論者認為台灣「本土意識」上升，民進黨得票穩步增長，比上次大選增長 100 餘萬票。這顯然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想說明什麼呢？無非是人多勢眾，成了多數吧？

其實，「多數」及其形成都是需要分析的。

人多勢眾就是民主嗎？特別是被煽動起來的人多勢眾。

就此而言，民進黨極端台獨派比納粹差之甚遠。

在納粹黨人看來，德國的歷史可以被簡化為三個帝國。第一帝國是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是普法戰爭勝利之後由「鐵血宰相」俾斯麥所創立的霍亨佐倫帝國，第三帝國則是希特勒納粹黨人的傑作。納粹黨人認為，在第三帝國和第二帝國之間存在的那個德意志共和國（魏瑪共和國），僅僅是德國歷史上一段短促的不幸。因為它承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的恥辱，還因為它民主、溫和、軟弱。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不公平的。正是因了這個民主共和國的溫和與軟弱，納粹第三帝國才可能以和平手段建立。納粹政權與共產政權有所不同，它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而完完全全是德國人加諸自己頭上的。

讓我們來看看德國人「本土意識」之覺醒——

1930 年 9 月的國會大選。德國命運的一個轉捩點。兩年前，納粹黨在國會中祇有 12 個議席，這一次，希特勒估計能搞到 50 席，但結果却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107 席，從位居第 9 的最小黨一役而成為第二大黨！他的民族主義煽動迅速見效了。他代表并開始引領德國人的意志。

過兩年不到點，1932 年 7 月的國會選舉中，國家社會黨（納粹黨）再獲大勝：兩年來選票增加了 7 百萬張，翻了一番；國會席次從 107 席增長到 230 席，翻了一番多。

再兩年後，1934 年 8 月初，老總統興登堡病逝，希特勒接掌德國最高軍政大權。半個月後，舉行批准總統權力移交的公民投票。情況如何？95% 的選民參與投票，其中的 90%（3 千 8 百多萬）投了贊成票。

簡直妙極了！德國人終於用自己手中神聖的選票把這個魔王送上了最高權力的寶座！

在德國後來的一些投票選舉中，這兩個 95%和 90%的比例數位並不算高。讓我們再繼續看被民族主義煽動所深度麻醉的「民意」。

又兩年後，1936 年 3 月所舉行的關於進軍萊茵蘭的公民投票中，99%的選民去投了票，其中 98.8%的人贊成對萊茵蘭的入侵。又是兩年之後，1938 年 4 月所舉行的一次關於奧地利是否與德國合并的公投中，竟然有 99.08%的大德意志人和 99.75%的奧地利人投了希特勒的贊成票。雖然這兩次公投是在希特勒掌權之後有作票之嫌，但希特勒獲得德國人民衷心擁戴卻是不爭的事實。

什麼是「人民的意志」？

以階級和民族（民進黨稱「族群」）為訴求的政治煽動可以達到神奇的境界。還想要多高的投票率和得票率呢？再往上就是金正日和薩達姆的 100%了！納粹深知這種煽動（後來加上了暴力）的效果，那是屢試不爽的。以至於他們動不動就解散國會，高呼「選舉！選舉！直接訴諸人民！」（戈倍爾）。文革之初，毛澤東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劉試圖以憲法自衛。毛說了句名言：「我們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是工人農民賦予的。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憑記憶）他知道，被煽動得如癡如狂的民眾是站在他那一邊的！此種煽動一旦得勢，事情就很難逆轉，一直要走向最後毀滅！文革中要搞「全民直選」，毛得票不會比希特勒差多少！就是在餓死人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獨裁者，同樣會高票當選！絕大多數民眾，會支援、贊同、默認將給自己帶來浩劫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政綱！祇有在瞭解國情的中共高層內部，毛澤東才是少數。就跟今日之李登輝陳水扁一樣，這位毛老太爺煽動悲情，挑動階級仇民族恨，對外反對「帝修反」（民主派），對內打到「走資派」（溫和派），棄黨規憲法如鄙履，「直接依靠人民」，輕而易舉地剿滅政敵，瓦解了共產黨，率數億人民走向災難！

這叫什麼？這就叫「民意被煽動了」！

人多勢眾就是民主嗎？這就是需要思之再三的了。

我們的先賢不是沒有思考過這種困境。方法之一就是：在充分承認人民意志（這裏具體化為絕大多數）是法的根本來源之後，再補充一條憲法具有崇高地位不允許隨意修改。美國憲法的偉大闡釋者與捍衛者漢密爾頓曾如是寫道：當群眾被「玩弄陰謀之人」煽動起來時，大法官的神聖職責就是「保衛憲法」。「憲法對人民整體及個別部分均同樣有其約束力」，請注意：「不論……虛假的或是真正的民意，均無權採取違憲的行動。」

修憲可以嗎？當然可以，人民意志是法的根本來源。但請注意，修憲一般要經歷複雜程式和漫長周期。我理解，其目的至少有二：一，不為目前當政者所用，二，以時間和充分討論來為集體狂熱降溫。

此一話題恕不展開。

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嗎？

以上嚴酷歷史教訓，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政治學問題：一人一票就必定是民主嗎？我不知道政治學家們是如何回答的。從生活出發，我要保持必要的懷疑。

民主選舉的要義之一，就是對政治權力的防範，不信任。而階級煽動與民族煽動分裂了人民，把人民對政治權力的戒備監督變成「死忠」、「票庫」。一旦人民與政治家們的關係變成了完全代表、絕對信任，通往專制之門就豁然洞開。民主制度說，權力必須置衡監督。納粹黨說，希特勒代表了德國民族的千年夢幻，他就是最偉大的救主！共產黨說，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善），毛澤東是大救星！民進黨說，一號台灣，二號中國！選阿扁，台灣之子！——當這種煽動完成，民主即死，公民投票遂成爲一具失去靈魂的僵屍。

（倘若再輔以適當威脅，諸如愛國、愛黨、愛元首、愛社會主義、愛台灣、愛香港等等，其效果當最佳。誰個不愛台灣呢？必定是賣台份子！在香港，則祇有「愛國者」才能參選。不愛香港不能參選，「反中亂港」份子不能參選，這道理也是充分得很哩！中共「合作化運動」，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再明搶回來，居然沒有多少人敢於抵制。其中的恫嚇手段就是宣佈

「地富不准入社！」這一下好了，都爭先恐後了。希特勒進入奧地利，受到奧地利人「暴風雨般的」歡迎。但是，花束後面并非沒有恫嚇：奧地利合法政府被顛覆，軍隊進入，大逮捕開始。）

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有一個不言而喻的邏輯前提，即：每一位投票者都大體上瞭解自己的利益所在。那末，對於一位被仇恨煽動得近於瘋狂的投票者呢？

一人一票的選舉當然是民主，但我希望在這前面加上這樣一組限制詞：「未經階級或民族（族群、種族、省籍等等）偏見所長期煽動的」。

追隨煽動者的人民也絕無好下場

那末，我是想暗示今日之台灣是第三帝國，陳水扁是希特勒嗎？

不，不是，不是的。

我不是說台灣已成專制，與大陸相比，差別還是十分明顯的，拿台灣與大陸比，那實在很民主了！但台灣民主確實面臨滑向專制的危險。與納粹第三帝國相比，陳水扁、民進黨尚未搞暴力，更沒有以暴力來壓制人民，摧毀民主憲法。

我想說的是：今日之台灣，或繼續「族」群撕裂以至於納粹化，或消除仇恨提升民主，兩種前途同時存在。

現在沒搞暴力不等於永遠不搞暴力。煽動起多數，卻壓不下少數，又行政、立法、司法、軍警大權在握，那時刻，暴力的誘惑便油然而生，難以抗拒。再嚴密的憲法，也經不住三日一小改，五日一大改式的「修憲」……

對內停止仇恨煽動，兩黨平分秋色，大體輪流執政；對外放棄戰爭邊緣政策，維持現狀，確保台灣安全，把統獨權衡留給沒有仇恨的後代解決——一句話，放棄台獨綱領，台灣就變得和睦、安全而生動了。

進一步萬丈深淵，退一步天高海闊呀！

當然這一步也不那麼好退，對「外省人」「外來政權」就不能斬盡殺絕，權力就不能獨佔而要分享，「出埃及」的千秋功業就要毀於一旦，「割喉」亦不能盡興「割到斷」。但台灣民主進一步「提升」有

望，撫平族群撕裂創傷有望。戰爭遠離，兩岸的人民有福了。

附帶多說一句：作為「種族」與「階級」等等「主義」的載體，被煽動起來的民眾一般也絕無好下場。

中共暴力土改使無數貧苦農民獲得了土地，但幾年之後，奪取了政治權力的共黨又把土地全部收回來，成為全國唯一的壟斷的大地主。全體農民則淪為喪失了土地、耕牛甚至人身自由的農奴。希特勒曾預言第三帝國將歷經千年而不衰。在納粹黨人的格式化語言中，它更被尊稱為「千秋帝國」。在它存在的十二年零四個月中，德國人民被戰爭之神送上了世界史的頂峰。在西起英吉利海峽東至伏爾加河北達極圈南抵北非的幾乎整個歐洲的遼闊土地上，「純種的」亞利安人成了其他「劣等民族」的趾高氣揚的主子。惜乎好景不長，當報應的日子到來之際，憤怒的正義之神把他們連同他們的救主一起化為齏粉。

一個人群、民族的瘋狂與個體的瘋狂有近似之處，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失去責任能力！但最後的苦果還得自己吞咽，正所謂「孽由自作，咎由自取」！曾瘋狂擁戴過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階級專政主義煽動者的德國人、日本人和中國人，應該是前車之鑑了！

台灣問題的三個視角

台灣問題，至少可以有三個視角：台灣最高權力爭奪，兩岸關係，東亞和平穩定繁榮。

民進黨著力渲染并誘導人們關注的是第二視角，即抗共倡獨。究其實，民進黨極端台獨派是以抗拒中共（他們稱之為「中國」）統一之名，行島內奪權之實。倘若真個拒共，何不釐清「中國」與「中共」之界限，公開聲明反共不反中？蓋因反共不能分裂民眾，唯有反中，才能够在人民中砍出一道深深血口子，才能撕裂社會，製造仇恨，才能把「外省人」打成「中國」、「中國豬」，以利於打江山、坐江山。他們真反共嗎？不是的不是的，他們是反中捎帶著反共，或者乾脆是反中不反共。無論是直接承受著并反抗著中共暴政的大陸民眾，還是流亡天涯的大陸民主人士、大陸偷渡者、甚至於無辜的「大陸新娘」，他們毫無同情之心，且一概蔑視、仇視、敵視。當然，大陸人民也不會乞求同情。我們受的罪，那是我們的

命。但是，台獨也犯不著往我們傷口上撒鹽！龍應台先生說得多麼得好呀：「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大陸人民在深重苦難下度日如年地煎熬，所承受的壓榨掠奪世所罕見！台獨會來拍拍大陸人民的肩膀，給他們一點默默的溫暖嗎？在民進黨族群仇恨的驅趕下，成百萬的「外省人」及其後代被迫告別寶島，流落天涯。有誰來拍拍這些台灣人的肩膀，給他們一點默默的溫暖嗎？看一看香港民主派，你也許就能多少劃清反共與反中的界限了，那些政治家才真正是與香港人以及大陸人同呼吸共命運的。

也有論者為陳水扁們辯解，說，「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場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中共目前治權不及台灣，用兩岸關係來解釋台島族群撕裂是缺乏說服力的。越共席捲南越後，百萬難民投奔怒海，那是越共逼的。中共接手香港前後，大量港人出走避秦，那是中共逼的。上百萬台灣人也是共產黨逼走的嗎？

在李、陳的長期煽動下，民進黨成了抗拒中共專制的化身，居然是批評不得的了。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希特勒（對不起，又提起希先生了）更反共，從起家起就反，一直反到莫斯科。在柏林被圍的最後時刻，還想憑他反共的老資格與美英通融，結成美英德聯盟，一起抵抗蘇聯。沒用，人家根本不予理會。如今，碰一下民進黨你就是「抹黑台灣民主」，就有戴紅帽子之虞，這共產黨簡直成了打人的棍子了！誰反共？稍微回顧一下歷史，似乎民進黨必欲「鏟除」的「外來政權」，過去才是一直反共的吧？

有論者連提八問：「『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陳水扁出現才出現的嗎？1949年以來，五十多年，堅決抵抗『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的，難道不正是藍軍嗎？藍軍流了多少鮮血？李

登輝在哪裡？陳水扁在哪裡？難道陳水扁以後，藍軍就忽然成了不抵抗『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的勢力了嗎？蔣經國開放民主的三條件之一，不就是反共嗎？難道不正是綠軍民進黨不願意接受這一條，而提出要與中共『和平競爭』甚至『睦鄰友好』嗎？」（參見本期王希哲文）

那麼，他們或許是反對「外來政權」了？且慢，為何唯獨不反貨真價實的「外來政權」日本？試問李登輝先生以下台獨極端派頭面人物有幾人不親日媚日？日本有悠久文化高度文明，又是民主國家，自然是親得媚得的。惟台獨們所親所媚的，卻是皇軍「進出」亞洲各國，從東亞殺到南亞殺到南太平洋，把整個東方殺得血流漂杵的那個“日”！既如此，又何必腆顏高唱反對「外來政權」？說「反共」、「反外來政權」不過是台獨酒家的幌子，冤枉他們了嗎？他們反的是除民進黨和大日本皇軍以「外」的一切政權！權力權力權力！爲了那份權力，他們可以不顧一切，對內壓迫同喝台灣水長大的同胞，對外挑釁中共強權，千方百計拉美國下水，置東亞和平於不顧，甚至不惜一戰（——不惜挑動美中一戰）。

台獨將鑄成大劫巨禍

李登輝陳水扁可能成爲中華民族之大劫巨禍！

由於他們的挑動，台灣有可能從初步民主走向民進黨一黨獨大甚而民進黨專政，「南非化」，大陸則可能從爭民主變成打內戰。由於李登輝陳水扁的存在，中國可能偏離共產主義普遍崩潰的歷史大潮，走上一條格外艱難格外血腥的坎坷之途。戰端一開，共產黨必定利用台獨煽動民族主義，凝聚人心。無論台海之戰結局如何，都可能以領導了「維護祖國統一」的戰爭而獲得合法性，以「外患」、民族仇恨（仇美）扭轉自由民主之潮流。無論從島內政治、大陸前途還是兩岸關係、東亞和平諸種角度來看，李陳皆爲大禍！他們不挑動族群仇恨，台灣島內不會「族群撕裂」；他們不挑動「台獨」，大陸很難以民族主義瘋狂來爲氣息奄奄的共產極權招魂。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用對外戰爭造成巨禍，李陳沒有這個能量，他們能做到的，也就是玩戰爭邊緣遊戲，以奪取和鞏固權力。當然，絕大多數論者持樂觀態度，認爲戰端一啓，中共必敗，一敗則垮。大陸軍民也可能趁機作亂，裏應

外合，一舉顛覆中共專制。這種估計，泰半是一廂情願。問過大陸百姓嗎？不喜歡共產黨的壓迫，就一定要歡迎民進黨的仇視嗎？這不是從火坑跳進糞坑嗎？

歷史是需要留心的。

許多後世研究者對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大惑不解：為何要東西兩線同時作戰？謎底是，對人心估計錯誤。納粹黨人把勝利的希望寄托於蘇聯的內亂。他們堅信，史達林一旦遭到重大失敗，就立刻會被人民推翻。希特勒本人也確實這樣說過：「我們祇要往門上踢一脚，整個破房子就會倒下來。」據回憶，在蘇德大戰爆發後，「絕大多數」西方人士也有同樣錯誤的估計。1941年6月22日清晨3點半，希特勒以他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百萬大軍狠狠地往門上踢了一腳，然後是第二腳，第三腳……結果如何？房子……確實倒了，但不是蘇聯那座破房子，而是納粹德國那座好房子！在德軍逼近莫斯科的那些最艱難的戰鬥中，納粹將領們大惑不解：為什麼這些飽受共產暴政欺凌，並遭受德軍沉重打擊的蘇聯人如此堅韌頑強，慷慨捐軀？德國人實在過於自戀了，他們居然不想想自己是什麼貨色！納粹政客和西方觀察家從來沒有站在蘇聯人的角度稍微作一番算計——憑什麼！——蘇聯人不喜歡史達林，是的，沒錯，史達林混蛋，但希特勒就是好蛋，天鵝蛋，鳳凰蛋？希特勒不僅要壓迫掠奪，還要毀滅、踐踏。蘇聯人憑什麼一定要喜歡希特勒！

回到台海兩岸。如果是國共開戰，台灣打的是反共旗子，那可以說成是內戰的繼續，軍民倒戈，箠食壺漿以迎王師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是民進黨和共產黨打，打起反華的旗子，大陸人民恐怕祇有拿起槍「為中國而戰」了。憑什麼大陸人民要擁護仇恨中國和中國人的民進黨？這種道理是怎麼也講不通的。這當然也僅僅是一種可能。提供給不惜一戰的樂觀派們參考，望三思！這不僅是一場血腥的漢族自相殘殺的戰爭，還可能是一場延續中共極權統治的戰爭。倘若打得和美國互相扔起原子彈來了，台灣就不用再說什麼了，全世界都要跟著遭殃。

禁止仇恨，連狗都不行！

最後，讓我們放鬆一下，講一段笑話。

但也是一個真實的事件，一條新聞。全文照錄如下：

題目：「德人教狗行希特勒式舉手禮被起訴」

【大紀元2003年10月15日報導】(據中廣新聞報導)德國一名男子因為教狗行希特勒式舉手禮被起訴。

五十四歲、住在柏林的羅蘭德，養了一隻黑色混種牧羊犬，並教狗兒舉起右前腳，行(希特勒式)舉手禮。去年他因為對路人大吼大叫，路人報警。警方趕到時，羅蘭德還叫小狗向警察行(希特勒式)舉手禮，並高喊「勝利萬歲」的(納粹)口號。

他因為使用違憲組織的符號而被起訴。一旦被定罪，最高可能被判三年徒刑。狗狗則不需要負任何責任。(10/15/2003 2:02:13 PM)

——對，就得這樣！連狗都不許！

我們要想個什麼辦法，或創造一種社會禁忌，或制定一條憲法修正案，或堅持一條看似限制了公民自由的「國家安全法」，至少要在二三十年甚至百年之內，禁止任何一個美國人歧視黑人，禁止任何一個日本人宣揚軍國主義，禁止任何一個中國人提倡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禁止任何一個台灣人挑動「族群」仇恨！要想一個辦法，要使某一種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最大危險成為原罪和現行罪！要讓挑動階級、種族、國家仇恨者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和法庭判決的罪人！

——在我們堅決捍衛公民利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憲政原則之同時，我們是否能夠要求這樣一條被申明為破例的必要的唯一的破例？

——事實上，這已經是人類成功的法律實踐。從法哲學出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未被仇恨所煽動的民意，才是整個民主制度的基石。

我們是否可以確定這樣一條政治—法律原則：

「永遠不能以任何理由在人民中挑動仇恨與對立。」

任何(重復一遍：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許，並且是永遠。

祝台灣人民和睦、幸福！

2004年4月23日

不贊成龍應台們

為台灣民主的

辯護

王希哲

龍應台女士寫出文章，焦急地要「與華人世界對話」，為台灣「民主」辯護。龍應台女士，我不能接受你和你們的辯護。

首先，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內主張台獨，煽動台獨，推行台獨，達到最後消滅中華民國的目的，這怎麼會是「民主」？這分明是革命，一場台獨民粹主義革命。

我曾批評了一位民運朋友企圖把兩蔣拉下水來為他今天的轉向親綠墊腳。但他有一句話表達的意思是很對的，蔣經國推動回歸憲政，開放民主，他就不會不意識到中華民國將要冒被台獨主義吞沒的風險。為什麼？道理太簡單了：由於內戰的失敗，中華民國不得不正視自己必須在台灣省長期堅持的事實，而又到了必須開放民主以榜樣全中國的時候，那麼，中華民國在開放民主之前，就必須與台灣省人民有個政治約定，限定台灣人民開放民主的範圍。如果是無限的「民主」，如果沒有任何政治條件的限制，僅憑一人一票的多數，就能奪得政權，就能趕走或消滅「外來政權」，一個稍曉事的人都能明白，在台灣，鼓吹台灣人主義的勢力，那是必定取得最後的勝利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這難道還需要懷疑嗎？中華民國最終亡於台獨之手，就是必然的，無待著龜的了！

陳水扁無數次洋洋得意的說，他在台灣「支持率」的增長，證明他是「站在社會主流價值的一邊，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是因為他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而是他深諳民粹的秘訣，深諳1933年的德國某人煽動種族主義仇恨和他陳水扁今天在台灣煽動族群主義仇恨，所必將為他帶來的利益。

真的！假使蔣經國在決定開放民主時，沒有警惕到這一點，沒有對台灣人做任何約定，他就不是在「開放民主」，毋寧說，他正是如前面那位朋友所說，在存心把中華民國導向死亡了。

但是，我們知道，蔣經國是對剛剛開始衝擊黨禁的民進黨提出了條件的。那時的民進黨還不完全是台獨黨，它是「黨外」各類反對力量的集合。當民進黨在圓山飯店忽然成立，全台都緊張地盯著它是否被取締時，僅僅十天之後，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格雷厄姆夫人時，提出：民進黨如果「符合承認憲法，反共，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即台獨運動等三項條件，國民黨將允許其成立。」

（註：這段史料，各種版本的兩岸關係書籍都能找到）

蔣經國的這三項著名條件，就是代表中華民國對台灣人的約定，對台灣開放民主的基本規範。它作為最首要的要件，被寫進了《國家安全法》。

為結束戒嚴體制，規範民主體制必須制定《國家安全法》。民進黨大吵大鬧。美國也相當關注。

蔣經國在他最後的歲月，為了順利地推動回歸憲政，已經多次的向民進黨（或其前身黨外運動）作出善意的讓步和妥協，但這次，他毫不動搖，堅定地領導了國安法的制定、完成和發佈。他僅僅指示《國家安全法》研擬小組，要把「對人民的限制減至最低程度」。（《1986年12月17日指示》）

請注意，在蔣經國那裏，「對人民的限制減至最低程度」也仍然堅持了這三條，說明了這是中華民國開放民主的最後底線。突破了這個底線，就不是體制內的「民主」，而是叛亂，而是台獨革命了！

《國家安全法》的意義在哪裡呢？它是「反自由」的嗎？不！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憲政，精神上她始終堅持自己代表了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她的播遷台灣，使她事實上無法從積極方面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但她必須保證從消極方面，不侵犯和損害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台

澎金馬) 回歸憲政, 開放民主了,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開始享受他們的民主權利了。那麼, 「中華民國不自由地區人民」又怎麼辦呢? 假設, 這些「自由地區人民」若濫用他們的「民主」侵犯「不自由地區人民」的權利, 又怎麼辦呢? 比如, 台灣省是中華民國「固有之疆域」的一部分。依據憲法,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那麼當然, 台灣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同時屬於「中華民國不自由地區人民」。若果「自由地區人民」鬧片面獨立, 侵犯了不自由地區人民對台灣的主權, 有誰來為「不自由地區人民」的權利提供保衛? 祇有國安法的那三條!

因此, 蔣經國手訂的《國家安全法》, 就成了中華民國不自由地區人民權利不受自由地區人民侵犯的保證書!

《國家安全法》的意義就在這裏, 它民主的性質就在這裏!

因此, 在李登輝的卵翼下所謂「大法官」對《國家安全法》的任意解釋, 玩忽, 使民進黨得以突破了《國家安全法》為所欲為, 就不是「台灣民主」, 而是叛亂, 而是台獨民粹主義革命, 而是對「中華民國不自由地區人民」權利的侵犯了! (注意, 即便「第445號大法官解釋」, 也祇是出於保障言論自由之理由, 才取消了對台獨團體的集會申請需依據國家安全法事先的審查, 並沒有取消國安法的三條本身, 即國家仍有事後追究台獨刑事犯罪行為的責任)

在注視著「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行使民主, 却忘記了「中華民國不自由地區人民」權利也應該受到保護的龍應台們, 及一切為「台灣民主」鼓吹的人們, 你們能夠懂嗎? 你們能夠對「中華民國不自由地區人民」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憤怒感情, 給予一點理解和同情, 「拍拍肩膀」, 也「給他們一點默默的溫暖」嗎?

何況, 煽動族群主義仇恨與煽動種族主義仇恨攫取利益一樣, 是對人類的犯罪。怎麼能是「台灣民主」?

事實上, 李登輝等等台獨頭面人物, 他們的心底, 也從不把他們在台灣1996, 特別是2000年的勝利看作「台灣民主」的結果, 而把它視為多少年「革命的果實」。因此, 2004年的「選舉」, 他們是以

「保衛革命果實」, 反對「外來政權剩餘勢力復辟」, 「呼籲台灣人民要投票把外來政權的殘餘勢力全部消滅」為號召的。理解了這一點, 才可以理解「台灣民主」的本質, 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獨主義者在「民主選舉」中, 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了!

現在, 「台灣民主」, 完全成了台獨主義者的“迷彩服”。他們要突破中華民國憲法, 突破保衛中華民國憲法的柱石《國家安全法》時, 他們是「革命」的, 一切中華民國的法統、法制全然不在他們的話下; 而他們上了台, 攫取了「果實」, 他們要鎮壓被他們用骯髒手段打倒在地的在野黨的「復辟」造反時, 他們就忽然成為「民主」的了, 他們就要叫喊「中華民國的法制」, 要「按中華民國的法制辦事」了! (但這裏的「法制」僅是警察制度, 憲法還是絕不要的!) 他們一會兒「革命」, 一會兒「民主」, 「台灣民主」的性質究竟是革命的還是民主的, 全看他們的需要。

似曾相識, 難道我們忘了中共當年的奪權伎倆? 「革命」和「民主」是奪權的兩手。「武裝割據」時, 向政府軍進攻, 擴張「解放區」時, 他們是革命的; 中華民國政府要限制他們, 打擊他們, 要取締他們時, 他們就是「民主」的了; 限制他們, 打擊他們, 取締他們, 倒是反民主的「國民黨專制」, 倒是國民黨「發動內戰」了!

為什麼需要兩手? 毛澤東知道, 完全在體制外「革命」, 那是沒有指望的, 在必要的時候, 可以向政府輸誠贏得合法化, 可以承認中華民國的法統, 承認「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 甚至讓自己的軍隊帶上國民黨的帽徽, 序列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第四軍」, 但是, 什麼時候上演「革命」奪取地盤, 什麼時候上演「民主」作給人看, 那就完全是一種「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了!

也許有人辯護, 蔣經國提出開放台灣民主三條件時, 民進黨並沒有照單接收, 並沒有如中共當年那樣, 聲明接受呀!

是的, 這也許是民進黨略誠實於共產黨的地方。但是, 你要是真的誠實, 你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國號和憲法, 祇願意為台灣地方人民「打拚」, 不願維護全中國人民的利益, 你就應該堅持革命路線, 堅持台

灣革命黨當年對中華民國法統的革命推翻政策。你革命推翻了國民黨，靠自己奮鬥顛覆了中華民國上得台來搞台獨，名正言順，堂堂正正，誰能對你有話說？有誰能引證中華民國憲法質疑你？但你不是，你也沒有聲明拒絕蔣經國的三條件，你事實上接受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進入了這個體制，你們的領袖李登輝、陳水扁在孫中山像前舉手向全世界宣誓忠於中華民國，恪守中華民國憲法，國民黨相信了你們，與你們玩民主遊戲，你們贏了，國民黨把百年的政權（包括軍隊）和平交了出來，交到你們手裏，你們臉一翻，就宣稱這是你們「革命的果實」，不允許國民黨「復辟」了，「呼籲台灣人民要投票把外來政權的殘餘勢力全部消滅」了！好手段！

委屈進入體制，佔得合法地位，再充分利用合法地位把台獨民粹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最後消滅敵人，這個「革命」「民主」兩手交叉使用的策略，本質上難道不正是當年中共奪權策略的翻版嗎？

龍應台和一切台獨辯護士們，「台灣民主」在哪裡？你們究竟是在為「民主」辯護，還是在為台獨民粹主義革命辯護？

既然民進黨可以用「革命」「民主」的兩手對付藍軍，藍軍一旦醒悟，為什麼就沒有了權利同樣用「革命」和「民主」的兩手對付民進黨了呢？現在「世界的華人」在幹什麼？就是在支持藍軍用「革命」和「民主」的兩手對付台獨民進黨。龍應台女士，你著急了嗎？為什麼綠軍總司令李登輝發出要消滅藍軍的號令時，不見你出來著急呢？

龍應台也看出了當前台灣政治民粹革命與反民粹革命之爭的特徵：雙方「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

是的，一派要使另一派死無葬身之地，一派則拼死捍衛自己在台灣的「安身立命」。這場鬥爭，可以是民主麼？

一派要消滅一派，一派要拼命反消滅，這難道可以是民主的「核心價值之爭」麼？

龍應台表面也打了陳水扁一板子，說他「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她却把陳水扁「玩弄民粹」因而「有民意支持」的消滅藍軍方針，歸結於「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

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祇要這個「極權統治」還在，「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

龍應台先生，「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陳水扁出現才出現的嗎？1949年以來，五十多年，堅決抵抗「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的，難道不正是藍軍的前身——兩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嗎？他們流了多少鮮血？李登輝在哪裡？陳水扁在哪裡？難道陳水扁以後，藍軍就忽然“完全、徹底”地成了不抵抗「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的勢力了嗎？蔣經國開放民主的三條件之一，不就是反共嗎（編者按：雖然今天的藍軍沒有像蔣經國要求的那樣，堅持住，堅持好.....）？難道不正是綠軍民進黨不願意接受這一條，而提出要與中共「和平競爭」甚至「睦鄰友好」嗎？藍軍的原罪是什麼？「陳水扁的操弄空間」是什麼？無他，無非是她堅持中華民國的憲政和法統，在理論上和精神上始終堅持站在維護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的立場罷了（編者按：藍軍仍然要堅持中華民國的憲政和法統不假。但祇因他們起碼是放棄了要在全中國堅持中華民國的憲政和法統的追求，動搖了要維護全中國人民利益和權利的立場，在信念和理論上已經出了問題，與他的對手比賽“本土化”，以己之短，比人之長，才會給不擇手段的敵軍造就了機遇。這也才是他們今天既不堪一擊，又無心、甚至無力“挽狂瀾於既倒”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大陸的民心始終都在藍軍這一邊）。

龍應台先生，你若是還剩一點點良心的華人作家，藍軍的這個立場有什麼不對之處呢？值得你為陳水扁綠軍的「操弄中國妖魔牌」打擊藍軍「而贏得權力」焦急開脫辯解呢？

甚至真想不到你還冷血心腸地盼望著藍軍的被消滅：「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衝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

藍軍國親兩黨把百年的政權交了出來，在台灣這個它是「外來人」的地方與「本地人」綠黨玩民主遊戲，這還不算「有熱情理想、有革新衝勁」（編者按：不能忽視李登輝“假民主之演進以求台獨之路”的陰謀手段對這個必然結果的很大影響。但向來被污蔑為“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整體，能夠接受首次民選事實

並願意和平還政於民，不能不說是“舉世無雙”)？全世界還能找到第二個這樣「有熱情理想、有革新衝勁」敢於放棄自己特權的黨嗎？難道非要放棄全中國人民利益的立場，迎合綠軍搞台獨，徹底葬送中華民國法統憲政體制，才算「有熱情理想、有革新衝勁」，才不該死，不該被消滅；否則就該死，就該「因而消滅」，以成全台灣的「民主的進步」嗎？

龍應台先生的辯護，不但不公正，而且本身公然加入了陳水扁綠軍的「操弄中國妖魔牌」，成為誣蔑打擊藍軍的幫凶了。（2004年4月21日美西海灣）

分裂中國的

“理論根據”和“歷史根據”

依據之二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同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

中國人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終於得到恢復。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恢復是根據《對日宣戰布告》，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然

後是《波茨坦公告》並在日本投降以後恢復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華民國政府的《對日宣戰布告》，宣布「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當然包括廢止《馬關條約》。

中、美、英三國首腦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開羅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協調對日作戰的共同軍事問題和戰後如何處置日本等政治問題，史稱「開羅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開羅會談後所要發表的聲明內容乃告確定。該聲明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發表，全文如下：

羅斯福總統、蔣介石委員長、丘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業已完畢，茲發表共同宣言如下：

一些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和事實，常被分裂主義者從自己的願望出發拿來作不同的解釋，因此有必要對這些事實進行澄清。對歷史，我們必須心懷虔誠。

一、台灣的主權

涉及台灣主權的事實與事件，分述如下：

依據之一

從歷史來考察台灣的「主權」問題。

根據《台灣府志》的記載認為，《尚書·禹貢篇》所說的揚州指的就是今天的台灣。這說明中國最早發現了台灣。三國時代東吳孫權曾派諸葛直和衛溫到台灣。也是到了三國吳時，才漸漸地可以確定當時《臨海水土志》所言的東夷就是今天的台灣。到了隋朝，朝廷又派了人去台灣。從現代和近代的國際法的觀點來看，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鄭成功與當時的荷蘭行政長官揆一簽定《十八項協定》，是台灣「主權」確立的開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聯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次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也無拓展領土之意思。三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也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聯盟拈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獨立。

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項目標，并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目標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有美國總統杜魯門、中華民國主席蔣介石、大英帝國首相丘吉爾具名，發表《波茲坦公告》，催促日本投降。第八項條款是：《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我們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

當初在波茲坦公告上署名的祇有三個國家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宣布對日作戰，於是便成為美、中、英、蘇之四國公告。八月十四日，日本通知聯合國，願意接受波茲坦公告。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便於八月十五日結束。九月二日，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於東京灣內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在投降文書上簽字。該投降文件中有關的重要條款內容如下：

第 1 條：余等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并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領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茲坦所發表，其後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舉之條款。

第 6 條：余等茲代表天皇與日本政府，及其繼承者，擔任忠實執行波茲坦宣言之各項條款……

投降書中這些對《波茲坦宣言》的承諾，實際上等於承認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

日本國在投降書中明確表示，它向美英中蘇四國（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向四國投降當然包括了向中國投降。日本向中國無條件投降，表示它承認了中國在宣戰書上所開列的條件，當然《對日宣戰布告》有國際法的約束力。

這樣，《中國對日宣戰布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無條件投降書》，這四個文件組成了環環相扣的國際法律鏈條，明確無誤地確認了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保證了台灣回歸中國的國際協議具有無可否認的有效性。

關於《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有必要說明如下：

第一。《開羅宣言》的法律約束力早已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國際社會的絕大多數早已確認其法律效力，國際法上也有充分的根據來證明。《開羅宣言》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名義共同發表，表達了三國政府的共同意願；記載了三國領導人達成的協議；明確規定了三國對日作戰的行為規則，包括確認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承諾務使日本在戰後將台灣歸還中國。《開羅宣言》所具有的這三個條件，不但使它從本質上成為一項法律文件，區別於國家間的一般政策性聲明，而且具備了國際法上條約構成的法律要素，成為三國間的一項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第二。國際法上沒有任何規則規定條約的必要形式。確定一項文件的法律性質是否一個條約，決定因素在於它是否意圖在締結國之間創設權利和義務。《開羅宣言》被公認為具有條約或協議的性質，正是依據其簽署國之間協訂的有關戰後對日本處理安排的權利義務承諾。

第三。《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本質上來說是同盟國之間的條約，之所以用宣言和公告的措辭，主要是向日本國表示了決戰到底的決心，呼籲日本國無條件投降。根據傳統的國際法，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但是，如果條約當事國有意在條約中確立一項義務，這種義務又經第三國書面接受，則該第三國對此負有義務。最初該宣言對日本國（第三國）並沒有什麼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波茲坦公告》規定《開羅宣言》的條款必須

執行，而日本國在投降書中又明確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項規定。另外，國際法實踐中，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都可以成為國際條約。因此，《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對日本國（第三國）所規定的義務便成為國際法條約意義上的義務，此時，日本已經不是第三國，而是條約的當事國了。

第四。一份國際文件具有法律效力還表現在它被其它具法律效力的國際文件所引用。一九四五年七月中美英三國首腦發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八節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進一步驗證和加強了《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效力。同年九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書》昭告世界，「承擔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其中毫無疑問包含無條件接受《開羅宣言》并履行其必須將台灣歸還給中國的義務。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及盟國間協議收復對台灣的主權後，世界各國都均以多種方式對《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及台灣回歸中國的法律地位予以確認。

依據之三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日本國與中華民國締結了《日本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和平條約》（簡稱《日華和約》）。從國際法上來看，《日華和平條約》是有效的。

《日華和約》本文第二條，關於台灣，做了如下的規定：「茲承認依照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國舊金山簽定之對日和約第二條，日本業已放棄對於台灣、澎湖羣島，以及南沙羣島及西沙羣島之一切權利、權原及請求權」。

在《日華和約》的第四條規定：「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這些被規定為無效的條約中，當然包含著《馬關條約》，因此，廢除《馬關條約》的結果，台灣就當然歸屬其原來的權者，即歸屬中國。換言之，即使在《日華和約》中，日本國也是間接地承認了將台灣歸還給中國。根據國際法上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理以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54條和第56條第一款的有關規定，廢除《馬關條約》的國家行為

是符合國際法的。所以，廢除《馬關條約》將台灣歸還給原所有者中國，不僅完全符合國際法，同時也是日本國認可的。

從理論上看，中國方面可以作出全面廢止條約的一切內容之選擇。事實上中國作為戰勝國在確定廢除宣戰前中日間一切條約的大政方針後，對於《馬關條約》中哪些條款應該廢除，有自己的選擇權。

依據之四

中國民國收復并佔有台灣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派陳儀上將赴台受降，并接受台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統權、軍政設施及資產。日酋安藤利吉率十六萬駐台日軍繳械投降。

同一天，陳儀長官經由廣播電台，聲明從十月二十五日開始，「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以至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第二年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發布訓令，謂台灣人民從這一天，也就是回溯到十月二十五日起，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主張其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當中國對日宣戰并且廢止了馬關條約始，中華民國便征服了台灣、澎湖，并將之并入其領土範圍內，自此台灣、澎湖的主權應已從日本移轉至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基於上述理由而宣稱其在台灣擁有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駐聯合國代表吳氏於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聯合國的演講中指出：

「當中國政府接受了日本在台武裝部隊的投降并在台灣建立主權，台灣不僅在法律上（de jure）且在事實上（de facto）成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自一九四五年後一直享有同樣的地位。由是，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七日的過去五年中，從未有人對台灣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均屬中國歷史上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份提出質疑。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澎湖聲稱其主權乃是基於其以國民黨政府的法律繼承者地位，而國民黨政府已經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依據佔領原則確定其在台灣的權利。」

這裏，中華民國取得台灣主權可根據：

1。中華民國系依據佔領的原則而取得台灣領土的合法主權。日本放棄台灣領土主權以後，中華民國在台的權利，將由交戰國之佔領形式轉換成擁有其明確的主權，循此，中華民國便可將台灣，澎湖的所謂遺棄地（terra derelicta）併入版圖，因為尚無任何國際法的學理能駁斥這種主張。

2。中華民國也可基於時效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escription）而取得台灣主權。領土的主權可因在一段時間內，未曾中斷且無人爭奪（uninterrupted and uncontested）的佔有一領土而獲得；國家可因在一領土是上持續且未被侵犯（continuous and undisturbed）此運行其主權，經過一段足夠的時間後而取得其領土主權，中華民國透過時效原則，對於台灣、澎湖有合法的權利，因為它對此地和平、繼續地實際佔領與管理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依據以上的分析，台灣、澎湖地區在戰後係無主地（terra nullius or res nullius）中華民國由國際法的佔有取得原則，取得其合法地位。

依據之五

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合法性質疑。

一九五一年冷戰產物的《舊金山和約》，雖然當時四十九國代表在條約上簽了字，但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沒有被邀請參加（更別說簽署），印度、緬甸等國也沒有參加，而且，簽約當天，參加和會的五十二個國家中，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國拒絕簽字。所以，「舊金山和約」不足以視為對日的全面講和。因為該條約是針對戰敗國日本，而主要戰勝國中國與蘇聯都分別沒參加與簽字，所以其合法性是頗受質疑的。

《舊金山和約》的第二章第二條 B 項規定：「日本放棄其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或譯為「權利根據」）與要求。」。但是《舊金山和約》祇有要日本人放棄，放棄給誰沒有說，這就叫做「台灣地位未定論」。今天「台獨」的主張就是根據這個所謂的《舊金山和約》，所以彭明敏講，戰後的台灣「主權」屬於中國，在國際法上沒有規定。由於《舊金山和約》將台灣的地位處置在未定的地位上，由此，可以推導出今天的台灣仍然不屬於中華民國

國也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按照主權在民的理論，台灣人民有權決定是否獨立。

《舊金山和約》沒有規定，沒錯，但是「舊金山和會」沒有任何中國的代表出席。

就《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代表「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葉公超曾發表聲明，講到「中華民國政府」不接受《舊金山和約》的約束。當時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外交部長周恩來也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堅決反對非法召開的「舊金山和會」及其《舊金山和約》。

沒有任何中國代表簽字的和約，中國當然不會接受。《舊金山和約》不僅中國代表沒有簽字，後來蘇聯的代表也沒有簽字。這樣的一個「台灣主權未定」，說《開羅宣言》祇是戰時公約，沒有約束力。但是，《開羅宣言》中的每一條都有約束力，卻只有台灣、澎湖歸還中國沒有約束力。這能說得通嗎？

如果《開羅宣言》沒有約束力，那麼根據《開羅宣言》而來的《波茨坦公告》當然也沒有約束力了。那根據《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也沒有約束力了，根據日本投降召開的「舊金山和會」也沒有約束力了，那根據和會簽定的《舊金山和約》也沒有約束力了，那由《舊金山和約》推論的「台灣主權未定」當然也沒有約束力了，大家都沒有約束力了！

如此推論下來，我們又要回到二戰中去了。

一九四二年簽署的《聯合國宣言》，不僅是約定全力對軸心國作戰，同時又明確規定了同盟國不得單獨與軸心國講和、停戰（Each Government pledges itself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s signatory hereto and not to make a separate armistice or peace with the enemies.）。同盟國作出了明確的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定，一項宣言本身應該祇能拘束參加宣言的國家，對他國不具有拘束力。雖然它本身并不拘束日本國，但是，該宣言中關於同盟國不單獨地與軸心國締結和約和停戰的規定，這不僅僅是一項政策說明，對於宣言國來說，是有著法律上的拘束力，無庸置疑它屬於國際法上的條約。而《舊金山和約》恰恰違反了該宣言，在沒有中國和蘇聯等該宣言的同盟國加入的情況下，美英等國公然違反《聯合國宣言》的上述有關規定，擅自拋出《舊金山和約》。因此，《舊金山和約》是不具有合

法性的。理所當然，該「和約」中擅自改變根據《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書》中有關將從中國所竊取的台灣領土歸還給中華民國的規定，不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

有學者認為日本投降書祇是停戰協定，它不表示交戰國之間法律狀態的結束，結束國家之間的戰爭狀態必須通過締結和約，《舊金山和約》是終止對日戰爭狀態的最終法律文件。這觀點固然是對的。可是《舊金山和約》除非得到事後中國的認可，否則根據國際法的規定「條約不能拘束第三者」的原則，它是不能對中國產生法律效力的。

即使《舊金山和約》沒有說明台灣的歸屬，據《日華和平條約》，中國也具有台灣、澎湖的主權（參見上述依據之三）。

所以，「台灣地位未定論」根本就是無稽之談！這裏，爲了更好的說明台灣的歸屬問題，就是退一萬步說，假設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馬關條約》合法有效，《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條款》《舊金山和約》及《對日和平條約》都沒有說明台灣的歸屬，那麼，日本在這個問題上就比美國具有更大的發言權。可是，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一年取得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之後，它與日本國簽署了毫無「法律爭議」的《中日聯合聲明》，其第 2 條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這裏的第八條也就是「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更是《開羅宣言》中的「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及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滿洲（或譯爲東北四省）、台灣（或直譯爲福摩莎）、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如此清楚明白的國際條約、建交條約，豈有「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不知歸誰」之謬理的存在空間？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PRC)與中華民國(ROC)政府

之爭(及過去的國共之爭)，也祇不過是雙方在國際上的「代表權」之爭，而并非「國家主權之爭」。

依據之六

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之日起，包括台灣的全中國的主權就屬於全中國的人民，包括海峽兩岸的人民。（參見附註一）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地區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到台澎金馬。從法律上而言，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是一個新的政府，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僅是一個中國中先後兩個政府的稱號而已。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各自聲稱是代表著整個中國的中央政府。現在中華民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仍然沿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憲法。

對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全中國」代表權之爭，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有不同的認識。

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大陸中共政權是非法的，中華民國具有包括大陸和台灣之全中國的主權。

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則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央政府，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利繼承舊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對領土的領有權利。按一位網絡台獨人士「台灣佬」的說法，是一種註釋：「從法律的層面而言，大陸變色就是中華民國被它自己的國民行使『制憲權』否定掉了」。（這位「台灣佬」的本意是反駁筆者所稱的，「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大陸中共政權是非法的」），因此，新政府當然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的權利和義務。聯合國 2758 號決議，「聯合國大會，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 5 個常任理事會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爲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這一決議充分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替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的代表）被聯

合國和國際社會所承認。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的繼承者而存在。

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政治現實。所有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均承認或認知：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撇開合法政府代表問題不說，目前仍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也並不是承認台灣地區是獨立主權的國家，他們祇是將中華民國這一政府看作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已。同時，這種承認中華民國和與其建立外交關係也佐證了這樣的一個基本事實，即這些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也承認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目前的分治狀態，是內戰造成的，雙方對對方而言，都祇是對抗的交戰實體而已。兩岸之間戰爭的法律狀態依然存在；大陸和台灣仍然是一個中國的領土。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日華和約》的內容沒有進行過具體明示的審查宣告（其實，這一行為也不一定需要。因為，日本當時是與代表全中國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締結的《日華和約》，當日本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中華民國的法律繼承者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該和約），但是一九七二年，在《中日聯合聲明》中重申了中國的一貫立場。該聲明第二條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茲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由此人們不難看出，不論是《中日聯合聲明》也好，還是《日華和約》也罷，兩者在將台灣歸還給中國的問題上都有直接和間接的表明。

《中日聯合聲明》同時也表明了，日本國政府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主權權利。《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友好條約》這兩項條約又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歸還中國，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事實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

附註一：日本在投降書中明確表示，它向美英中蘇四國（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向四國投降當然包括

了向中國投降。日本向中國無條件投降，表示它承認了中國在宣戰書上所開列的條件，因而這些條件，即「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包括廢止《馬關條約》），就具有了國際法的約束力。台灣就當然歸屬其原來的主權者，即歸屬中國。

附註二：目前中國處於分治狀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自依其憲法代表全中國，則分治期間各自對外簽定的條約，另一方可選擇承認或不接受，或適當時機對其重新審查。雙方都有共同維護國家主權的義務，特別是涉及國家領土、資源等的對外條約，另一方當有否決權。

依據之七

辛亥革命後，中國政府為了台灣同胞的利益、為了收復台灣而做了不懈的努力。蔣介石多次闡述了收復台灣的重大戰略意義。

一九一四年，蔣介石受命赴東北策動討袁軍事，孫中山對他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台灣交還我們，并保護朝鮮的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由於國弱民窮，孫中山等人當時尚無力收復台灣，但蔣介石依然關注台灣的命運。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主席任內，加強台灣和大陸的民間交往，一部分台籍青年輾轉來到大陸，自動組織團體，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并尋求國民政府的資助。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劇了侵略中國的步伐。一九三四年四月，蔣介石在撫州公開稱：中國「又受了日本一個最大的侮辱」，不僅是東四省的失地我們要收復，而且台灣、琉球這些地方都是我們的舊有領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們手裏收回。一九三八年四月，蔣介石發表講話：過去甲午之戰，日本侵佔我們的台灣和琉球……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要講求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斷不能讓高麗和台灣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必須針對著日本之積極侵略的陰謀，以解放高麗、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次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向中外宣告「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據此，中日過去所訂的條約當然廢棄，《馬關

條約》對台灣的束縛完全消失。於是就國際法而言，台灣自中國對日宣戰之日起，即已恢復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指出日本所侵佔之土地均應於戰後交還原主，「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一九四三年初《大公報》發表題為《中國必須收復台灣——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的文章，指出「根據國際公法，台灣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日本從中國手裏奪去台灣，台灣應該歸還中國。根據大西洋憲章，台灣也該歸還中國」，呼籲「中央對台灣問題最好即作具體的措置，以淪陷省區待遇台灣」。

一九四三年初，宋美齡訪美，蔣介石囑其會見羅斯福總統時，可商洽中國被日本強佔的領土處置問題。二月，駐美大使魏道明電告蔣介石，羅斯福總統已表示「日寇所有島嶼，除其本國外，均應就同盟國警備立場支配之，台灣當然歸還中國。」

三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文，在「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一章中指出：台灣、澎湖列島本是漢人開發的區域，屹峙東南，久為我們中國的屏藩，迄至明末，乃為荷蘭人所侵據，而終為我鄭成功所收復，其事蹟真可歌可泣。以國防的需要而論，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如有一個區域受異族的侵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蔣介石應羅斯福總統及丘吉爾首相的邀請，赴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十一月二十三日，他與羅斯福商談，提出「日本於『九·一八』事變後自中國侵佔之領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羅斯福承諾「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

二十六日，中美英三方簽署開羅會議宣言，明確表示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無疑，在當時中國尚無充分的軍事力量直接從日本帝國主義手裏收回台灣的情況下，蔣介石通過外交上的努力，使美英兩大國承諾將台灣的主權歸還中國，解決台灣在日本戰敗後的歸屬問題，為中國最終收復台灣奠定國際法的依據，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當是，在大陸參加抗戰的台胞聞迅致電蔣介石說：「頃見報載開羅會議重大成功，台澎等地歸還中國，凡我台胞同深感奮，如蒙鞭策，願效馳驅。」

《開羅宣言》發表後，蔣介石遂著手收復台灣工作，成立調查與籌備機構，進行組織及人事準備，訓練台灣行政、警察、銀行、教育等幹部、專業人員，規劃未來台灣行政體制及各種機構接收辦法。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再次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灣，重歸祖國，始為我抗戰徹底之勝利」。其間，他接見台灣淪陷五十年來第一位台籍國民黨代表謝東閔，問詢有關台灣的情況，要謝東閔轉告台胞「台灣的光復快要到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收復台灣終於進入實施階段。八月二十四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國防最高委員聯席會議上說，台灣不能回到祖國懷抱，則國家的獨立自由就無從談起，而抗戰的目的亦無由達成，要求部屬全力以赴完成台灣接收工作。二十七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不久又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九月一日，陳儀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臨時辦事處，開始籌劃去台受降接收的有關事宜。

九月九日，蔣介石向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達第一號命令：在中國境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台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所有一切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本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向日本台灣總督兼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下達第一號手令：本官奉令「接受台灣、澎湖列島地區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之投降，并接收台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安藤利吉在簽具的受領證中表示：對於本命令及以後之一切命令、規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屬與所代表之各機關部隊之全體官兵，均負有完全執行之責任。

至此，日本將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竊據的台灣、澎湖列島交還中國的一切法律手續均告完成。台灣終於回歸祖國，洗却了中華民族在甲午戰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大收穫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人員尚未去台，台灣民眾即自動爭掛國旗，爭學國語，自覺維持社會秩序，以實際行動響應接收。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和軍隊赴台，均受到台灣同胞歡迎。

結論

據以上所述，台灣和澎湖的主權屬於中國是無疑的。特別是「依據之一、二、三、四、六、七」，任何一條都足以說明台灣和澎湖屬於中國。

附註：釣魚台羣島為台灣的附屬島嶼，并非屬於琉球羣島。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同日本簽定《馬關條約》，釣魚台羣島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一同割讓日本。據以上「依據之一、二、三、六、七」，釣魚台羣島當屬中國無疑。

二、中國

常見一些陰謀分裂中國或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宣稱，世界上沒有中國這個國家，世界上有過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唐國」、「宋國」、「漢國」等等，沒有一個叫「中國」的國家，古往今來從來沒有。

這些人的如意算盤是，否定了「中國」的存在，就否定了中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也就否定了中國的歷史傳承關係。而他們在否定中國的同時，也是否定中國人的存在的。他們說，有「唐人」、「宋人」、「中華民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等等，就是沒有「中國人」，「中國人」的稱法「不科學」、「不够周密」。「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才建國，從來沒有領有「台澎金馬」地區，而「台澎金馬」頂著的「中華民國」的國號，又名不正，言不順，所以要「正名」為「台灣國」。為了替台獨製造理論根據，真是費盡了心思。

雖然本來是很明白的事情，但有人胡攪蠻纏，特別是有台獨日本皇民李登輝這樣的人領軍，也需要應對一下。

查《辭海》等文獻，中國一詞，和中國這塊地方有關的，有兩個意思。1、古時有指京師，後多指華夏族、漢族地區和所統轄的地區。《史記·天官書》：「其後秦遂以兵滅六國，并中國」。十九世紀以來，

「中國」專指我國家全部領土，不作他用（參見《辭海》解釋）。2、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或中華民國的簡稱。

從以上解釋可知，「中國」既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指其國家全部領土，也就是說「中國」包含現代國家的全部含義，即是國民，領土，祖國，文化，國家權力等的綜合體。而就歷史文化意義上來說，「中國」一詞則指其土地、人民和其所建立的歷代政權。

實際上，人們歷來也都是這樣認知和使用的。說中國的歷史，我們就會想到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及其後的歷朝歷代及其所發生的事情，直至近代的共和國（民國）。所謂「唐史」、「宋史」、「明史」等，祇是中國歷史的片段，古人也明白這個道理。國家與王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同一個國家，可以經歷若干不同王朝，如中國歷史上的商、周、漢、唐、宋、元、明、清，都是不同的王朝。當新朝建立的時候，當政者都明白本朝是繼承了前朝的土地、人民和文化的，而且有意無意地處理一些前朝的問題，如修編前朝的歷史等，古人也明白自己祇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員，中國的歷史，有過去，有現在，也有未來，未來的人們將會記著我們現在所做的事，自己也會成為古人。

歷史和文化是演變進化的。到了近代，普通民眾也都明白，「大清帝國」、「中華民國」，都是中國的國號，國號可以變更，由於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民族的文化沒有亡，我們中國就沒有滅亡。即使歷史上曾有過短暫的亡國時期，但侵略者最終融入中國、融入中華文化，成為中國大家庭中的一員，中國獲得再生、發展、壯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滿清王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大清帝國被中華民國所繼承。中國從帝王時代進入共和時代，中國獲得了新生。

現在，在中國傳統的疆域內（或曰中國認定的國土範圍內），事實上存在著兩個互不隸屬的政府，中國事實上處於分裂狀態。那麼，現代中國的概念，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呢？站在不同的立場，可能會有不同的認識。但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都不承認對方的合法性，各自憲法認定

的國土範圍都包括「全中國」。這是為國人所接收的。誰試圖改變這一認定，誰就被認為是分裂中國。因而，講到國家意義的中國，可能是指「中華民國」，也可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是互相排斥的，承認「中華民國」的國統，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偽政權、偽政府。講到領土意義的中國，就較少分歧，就是中國傳統的疆域（或講中國認定的國土範圍）。

相同的情況在二戰後的德國、韓國等國都出現過。所不同的是德韓兩國的分裂，有更多的國際因素，因而，更「國際化」，出於無奈，這些國家祇好接受國際上的「雙重承認」，但統一前的西德，就不承認東德的合法性，韓國情況也類似。

國際上即使同東西德國、南北韓都同時建交的國家，也都認為他們是分裂的國家。所以，當國際阻力消失，東西德國合并的時候，就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情，不懷惡意的國家和人民，都為德國的統一而高興。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分合，如三國時期，三個國家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三個國家都不承認對方的「主權」，實際上，就是三個國家都不承認其它兩方為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任何一方都把其它兩方視為「佔山為王」的「山大王」，都想著如何把另外兩方「吃掉」，「統一中國」，因此，是為歷史上的分裂時期。而歷史上由於人民不斷向外發展，不斷征戰，周邊部落、人口被同化或并入，使國家統轄的地區擴大，中國的疆界也在變化。但是，不論分裂或統一時期，中國都存在著，這裏，「中國」兩字首先是指一個「地域」，另外，也指在這一「地域」上建立的國家及其文化。

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稱法，如法國，歷史上也曾有過不同的王朝，但我們能說世界上有「法蘭西共和國」，而沒有「法國」嗎？我們能說有「加佩王朝」歷史而沒有法國歷史嗎？另如美國，雖然歷史很短，可是我們能說有美利堅合眾國而沒有美國嗎？美國人有時會用 AMERICAN 來稱呼自己，而一般不用 PEOPLE OF THE U.S.A. 我們能說 AMERICAN 的稱法「不科學」、「不够周密」，因為我們可能不知他是指美國人或是美洲人，我們也可能不知他是指殖民地時代的人或是指獨立後的美國人嗎？美國人說的

BUY AMERICA（這句話的含意是「買美國貨」），這裏 AMERICA 指美國，這與中國人說的「中華」、「中國」同法類似，而 AMERICAN 與中國人說的「中華民族」、「華人」、「中國人」的用法類似。

語言不是數學，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語言要表達思想，也要交流。有時需要精確，有時需要模糊或泛指。有歷史的國家的語言都是這樣，它豐富了人類的思想、文化和情感。

現代，中國是指中國這塊傳統疆域上的國家「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現在是分裂的，但她必將統一，因為，這個疆域上的人民認為我們都屬於「一個中國」，這才是中國統一的基礎。

中國，是真實存在的。這是世界上各國都認知的簡單事實，也是中國人都認知的。祇有蓄謀分裂中國者才會在這一事實上無的放矢，混淆是非，意圖搞亂人們的思想。

三、中華

中華，據《辭海》等文獻，有兩個意思。1、古時對華夏族、漢族的稱謂。2、古代華夏族、漢族居地。其初，但指黃河中下游而言，其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統轄，皆稱中華，也稱中國。

可見，中華之稱，古來即有，延續到現在，其意與「地域」意義上的中國意思相近。隨著中國疆土的擴展，凡中國之地，皆為中華。慈禧所講「量我中華物力，給人家就是了」中的「中華」，也是這個意思。

這本不應有任何疑問的。

四、美國的獨立

美國是通過獨立戰爭，取得勝利後獨立成功的例子。一些人以美國獨立成功來說明獨立是地區人民的「自由權利」，事實是怎樣的呢？

美國獨立時的十三州，原是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殖民地和英國本土有很大區別，英國在美洲殖民地實行歧視性法律，殖民地人民要向英國政府交稅，但是，美洲殖民地在英國國會却沒有同英國本土一樣的同比例的國會議員，結果是，美洲殖民地人民

的利益得不到英國政府的重視，英國爲了使北美永遠作爲它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竭力壓制北美經濟的發展。他們禁止北美生產某些工業品；禁止北美向阿巴拉契亞山以西移民；一再向北美人民徵收重稅。北美人民非常不滿，反抗情緒日益高漲。

18世紀60年代，北美人民開始了大規模的反英鬥爭。1773年12月16日，一批波士頓青年爲反對英國到北美殖民地傾銷積壓的茶葉，偽裝成印第安人，潛入停泊在波士頓港口的英國茶船上，把300多箱茶葉統統倒入大海，這就是有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導火綫）。面對北美人民的反抗情緒，英國殖民者採取高壓政策，北美人民的反抗情緒更加激烈。1774年9月5日，北美各殖民地在費城召開第一屆大陸會議，商討共同對付英國的辦法。很多地方的人民組織起來，準備武裝鬥爭。大陸會議成爲獨立戰爭的領導機構。1775年4月18日英軍襲擊馬薩諸塞康科德的民兵軍火庫，第二天清晨在萊克星頓遭到民兵伏擊，1775年6月北美殖民地組織大陸軍，獨立戰爭爆發。

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宣布13個殖民地獨立。

之後，美洲大陸軍同英國軍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戰鬥，1778年美法訂立同盟，西班牙和荷蘭也分別於1779年和1780年加入反英戰爭。

1781年10月19日維吉尼亞約克城的英軍投降，導致英國內閣倒台，新政府於1782年11月30日與美國停戰，1783年9月3日，雙方簽定「巴黎和約」，承認美國獨立。

由上可知，英國在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歧視統治，導致了北美人民反抗；獨立戰爭的勝利，使美國獨立得以實現；而法、西、荷等國加入反英戰爭，是確保北美獨立戰爭勝利的國際因素。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殖民歧視統治、反抗、戰爭和國際政治，沒有「獨立自由權利」，沒有「公投產生主權」，也沒有「地區人民的自決權」。

5. 美國南北戰爭的原因和目的

常常聽到「泛住民自決權」的鼓吹者混淆人權和主權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宣稱，美國南北戰爭的目的

的是解放黑奴，因而美國南北戰爭是符合「人權原則」的。那麼，事實是怎樣呢？

現在，美國歷史學家大都認爲，美國南北戰爭的原因是複雜的，這些原因包括：不同的州之間對待黑奴的不同態度，導致的南方諸州的獨立要求和北方反對南方獨立、維護聯邦統一的對立；對聯邦權力的不同認識；政治的混亂；對自由的定義的不同認識；聯邦的維護；黑奴的命運；不同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等。

紐約市中學教科書《美國歷史》（《AMERICAN HISTORY》，EDMUND J. GEOBEL、MARY. RICHARDINE、JOHN E. OLOUGHLIN 合著，LAIDLAW BROTHERS 出版社出版）第258頁寫到，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開始時說，北方戰鬥的目的是維護聯邦統一，而不是解放黑奴。可是，隨著戰爭的拖延，許多人建議林肯總統解放南方的黑奴，如此做的一個原因是這樣做可以幫助北方打贏戰爭。

這裏講的再清楚不過了，美國南北戰爭的目的是爲了維護聯邦統一，而不是解放黑奴。解放南方的黑奴也是爲了打贏戰爭，維護聯邦的統一！是解放敵人的奴隸，解放南方的奴隸，北方有三個州，密西西比州、田納西州等，在這三個州裏也是有奴隸的。林肯並沒有解放他們。這些州擁護聯邦政府，是自家人，自己家的奴隸並未解放。至於美國結束奴隸制度，那是南北戰爭以後的事。

南北戰爭前，林肯總統曾嘗試在南方等奴隸州保持奴隸制度，以避免戰爭。南方諸州考慮到全國政治力量對比，執意求去，導致林肯總統的聯邦政府進行維護聯邦統一的南北戰爭。

這裏講一個有趣的故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在嚴肅的、艱難的會談期間，也總要有些輕鬆的話題。尼克松，基辛格，毛澤東，周恩來談起了美國的歷史，周恩來說，他很敬佩林肯總統，因爲，爲了解放黑奴，林肯總統打了南北戰爭。尼克松立即回答，總理先生，你錯誤理解了美國的歷史，林肯總統打南北戰爭是爲了維護國家的統一，而不是爲了解放黑奴。（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看當時的報道和基辛格的回憶錄）

林肯總統被美國人民認爲是偉大的總統，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建有林肯紀念堂。林肯紀念堂大廳林肯像的背後牆上，刻有紀念林肯總統的文字：「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人民心中永遠銘記亞伯拉罕。林肯，他維護了聯邦的統一)。刻在林肯紀念堂大廳的紀念文字，自然體現了林肯總統對美國做出的最大貢獻，也就是說，「維護了聯邦的統一」是美國人民得以永遠紀念林肯總統的最大原因。

美國南北戰爭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南北戰爭目的是明確的，這就是維護聯邦的統一。

附註：這裏引用紐約市中學教科書《美國歷史》的說法，是基於中學教科書對問題的說明簡單明確，敘述的是一般的、普遍的認識。

六、東帝汶的獨立

印尼於 1945 年從荷蘭獨立時，領土并不包括東帝汶，其時東帝汶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印尼并不主張擁有東帝汶主權。

1975 年葡萄牙撤出東帝汶，東帝汶宣布獨立。其後，印尼軍隊進入東帝汶，1976 年印尼宣布東帝汶為其領土，完成了對東帝汶的吞并。

對於印尼非法吞并東帝汶，世界許多國家和聯合國都強烈譴責。當時的蘇聯和中國都積極支持東帝汶人民反抗印尼侵略的游擊戰爭。美國當時在這一事件上態度曖昧，暗中是支持印尼政府的。

印尼吞并東帝汶的理由，并非東帝汶為其「固有領土」，而是聲稱東帝汶對印尼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其背後的意思是，獨立後的東帝汶，可能依附蘇中等共產國家，從而使共產主義滲透印尼。

印尼并未擁有具東帝汶主權的法律和國際條約的依據。

因此，東帝汶的人民自決，并不能理解為導致了印尼的分裂。因而，并不違反聯合國：「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

七、加拿大魁北克的分離運動

魁北克公投常被引用為民主自決的表徵。那麼魁北克獨立運動的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加拿大魁北克的分離運動，溯源自 1837 年法裔民族意識逐漸在法裔的農工階層展開，經過了 1930 年的經濟危機，使原本對外經濟以製造業為主的魁北克省民意識到：法裔人口在加拿大所扮演的不平等角色。而在這段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二十世紀中葉，魁省的法裔基於魁省既有的工業基礎，在經濟、政治，乃至女權運動皆有長足的發展。而法裔人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升，謂之寧靜革命。「現代化」導致了法裔團體的「文化自覺」，藉此衝擊又衍發了民族自決的分離運動問題。

加拿大魁北克鬧獨立的主要是法裔，因為這塊土地本是法國移民開拓的，後來法國在英法戰爭中戰敗，將北美的殖民地割讓給英國，因緣而成為加拿大的一部分。在加拿大，他們是女皇的「子民」，是被征服的失敗者，他們永遠不能在加拿大民主中享受一次多數，他們感到自己的文化正處於風霜雪雨之中。魁北克在一九六零年代以前，大部分的商業與政治活動都受英裔加拿大人控制。在蒙特利爾市，大部分的服務都是以英文為主。就在不太久的幾十年之前，在蒙特利爾講法語是少數甚至是卑賤；公司的老闆總是講英語的，夥計總是講法語的。一位婦女，甚至將獨立的根據追溯到加拿大早年她的祖輩死於和英裔移民的敗仗，說今天是清洗耻辱的時候了。近年來兩次修改憲法以承認魁北克為獨特社會的努力均告失敗，英裔多數派反對的理由是人人平等，每個省平等，不能給魁北克更多的權力。

魁北克獨立問題雖然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但有組織、有綱領的獨立運動是從 20 世紀中葉才開始的。寧靜革命後所產生的自信心，以及「法裔民族意識」在 1960 年代逐漸升溫發展成暴力抗爭。這期間發生了魁北克最猛烈的暴力事件。當中最有力的推動組織為「魁北克自由陣綫」(FLQ)。該組織於 1962—1972 年間造成七人喪命，傷者無數，以及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損失。然而，較理性的運動組織(如魁北克獨立社會主義行動聯盟)逐漸以排斥暴力為宗旨，並呼籲以冷靜和諧的方式抗爭。加上聯邦政府於 1960 年代未曾有效壓制，造成「魁北克自由陣綫」的式微，而放棄了法律邊緣的抗爭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的憲政抗爭。

上世紀 60 年代末，法裔魁北克人中的「主權派」組建了魁人黨，并且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支持。1976

年，力主獨立的魁人黨贏得省內選舉之後，要求獨立的呼聲迅速提高。加拿大政府是反對魁北克獨立的。正是由於加拿大政府的反對，魁北克的分離勢力儘管已經取得了當地的執政權，也沒有擅自宣布獨立。而是要等到全民公投獲得多數以後。在 1980 年舉行的公民投票中，獨派雖然最終被擊敗，但已經得到了 40% 左右的民意支持。而在 1995 年的再次公投中，獨派竟得到了 49.44% 的支持。

聯邦陣營在險勝之後痛定思痛，決定對魁獨採取強硬的法律手段。1998 年 8 月 20 日，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魁北克不能單方面決定獨立，而必須得到聯邦和其他省份的認可。1999 年 12 月，聯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法案規定，今後魁北克省若再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不論結果如何，都必須得到聯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最高法院指出，無論加拿大法律或國際法都不允許魁北克在未經談判，未獲聯邦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片面宣布獨立。

在 1995 年魁北克公投前的國會會議上，克雷蒂安總理堅定地說：「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個國家？這不是民主！」公民投票方式無疑比戰爭手段要好，但如果一個省、一個城市由於有某種不滿情緒就擅自舉行公投，以達到從國家母體中分裂出去的目的，這完全是對民主政治的歪曲。

加拿大政府的立場是：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省。魁北克的命運不能祇由魁北克居民來決定，而必須要獲得全體加拿大人民、加拿大各州政府和加拿大聯邦政府的共同決定。加拿大政府並且特別說明，這個原則不是加拿大的獨創，而是西方所有民主國家普遍遵守的通行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對加拿大政府的這一立場，美國政府在發布的一份官方文件中也予以全面的引述，而且並沒有表達批評或反對的立場（美國國務院 1997 年人權報告加拿大部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分裂人士往往對他們的獨立訴求振振有詞，但却不允許這種「民主」在其小領域內延伸。在 1995 年魁北克公投之前的 10 月 26 日，魁北克的印第安土族也舉行了公民投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投票表明即使魁北克獨立，他們也要留在加拿大，他們的屬地應屬於加拿大，既然加拿大可以分裂，魁北克也可以分裂。獨派魁北克人黨的律師飛快地指出這是「非法的」，「因為那土地屬於魁北克」。十月

二十八日，和渥太華隔河相望的魁北克霍爾市人游行，要求留在加拿大。據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報道，魁北克的省長巴裏素的反應是他可以分裂加拿大，但「沒人可以分裂魁北克」。由此可見，分裂人士祇把公投的權利留給自己，而並不允許他人享受同樣的權利。印第安土族在那片土地上住了更長日子，他們的文化也很獨特，他們的土地屬於魁北克的理由并不比魁北克屬於加拿大的多。

還有更有意思的事情。

就在幾年前，多倫多市有些人認為，身在安大略省，飽受累贅，難以飛速發展，故提出從安大略省分離出去。2000 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提出，該省每年要向聯邦政府繳稅 220 億元，但祇能從聯邦政府得到約 190 億元的福利等，所以也提出了獨立訴求。這類訴求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見，當然都是以失敗而告終。如果祇是因為有不滿，就去煽動民眾以公投為手段鬧獨立，那麼這個世界上恐怕要出現上千、上萬個國家。而且，隨之而來的衝突和戰爭也會倍增。

對待分離運動，即便是加拿大政府，動用武力也不是不可能。

舉例來說，一九七一年十月，當一魁北克獨立組織（FLQ）激進地要求魁北克獨立并謀殺了兩個政府官員，加拿大總理杜魯道（Pierre Trudeau）派軍進入魁北克，宣布戒嚴法，并逮捕許多無辜民眾。儘管魁北克人至今仍然譴責杜魯道當年過於激烈的做法，此事却也讓雙方體會到和平解決魁北克問題的重要性。

而即便是加拿大政府宣稱和平協商解決問題，即便是聯邦主義者險勝主權主義者的選票（祇相差 0.8%），在 Lawrence Martin 於 2003 年 10 月出版前加拿大總理克瑞祥（Jean Chretien）的傳記《Iron Man: the Defiant Reign of Jean Chretien》中，前加國國防部長 David Collenette 透露，武力解決主權問題仍是加拿大政府最壞的打算。萬一輸了公投，聯邦軍隊會以保護聯邦政府在魁北克的資產為由予以軍事解決。

即使付出巨大代價，獨立成功了，受益者也僅限於少數當政者。在 1995 年魁北克公投之前，一位女學生說，她希望魁北克人民不要被那些嗜權政客（power-thirsty-politicians）所蒙蔽。這也是我們應該深思和警惕的。

魁北克的問題，是包含了對殖民者的反彈、民族地區自決等多重意義的分離運動，從加拿大聯邦政府的態度，我們應該對類似的問題有所體會了。

（註釋和參考資料參見第 121 頁右下）

走出悲情的必由之路

傅申奇

台灣實現了充分的民主，政黨輪替後進行了第二屆總統大選，這說明中國文化完全能夠適應民主政治。然而這次大選結束了半個多月還不能落幕，抗爭還在繼續，甚至還發生了流血事件，這又顯示了台灣民主的悲情。

這次台灣大選也有經濟、社會問題等一系列的話題，但真正的主題却是台灣自身的定位，也就是國家認同意識：台灣是中華民國本身呢？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台灣將要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呢？還是應該建立獨立的台灣國？妾身未明的台灣，民主政治還不很成熟，却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選擇，選民們圍繞著這些難題激情紛爭，這實在是很殘酷的。於是台灣民主的種種悲劇性的情懷和情景就不可避免。

陳水扁說：我贏得這次總統選舉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台灣認同意識的增加，是因為台灣人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一個新的、脫離中國的獨立國家的國民」。他說得“對”，他成了百分之五十有這種傾向的選民的總統。而三二七抗議集會上，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以人民的名義宣告連宋當選為下一任總統、副總統。他也是對的，連戰確實是百分之五十不贊成陳水扁國家認同意識的選民的“總統”。

台灣出現了合法與不合法的兩個總統，台灣社會被撕裂了。不管目前的抗爭以什麼方式結束，台灣社會的撕裂和台灣民主的悲情還將長期存在。造成這種撕裂、釀成這般悲情的根本原因，是大陸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的存在。這個制度讓當到民主、自由滋味的台灣人民本能地產生抵觸情緒，即便是香港式的一國

兩制也是台灣民眾無法接受的，於是台灣民眾與大陸漸行漸遠，中共所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完全落空了。

大陸的專制制度成了台獨傾向的原動力，祇要這個制度繼續存在，持有台灣認同意識的選民比例還會繼續增長。許多評論家認為：中共是陳水扁最好的助選員，那是千真萬確的。

當今世界上，文化、文字和人種都有很大不同的歐洲國家正在實現一體化的過程，而且在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著更大差異的東歐七個新民主國家也加入了這個“一體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硬要把同種、同文，經濟上日益融合起來的台灣和大陸殘忍地撕裂開來，實在不是一種善舉，說得坦率一點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但假如把民主的台灣推進中共專制的懷抱却是十足的罪惡。於是，大陸和台灣的民眾在民族和國家認同的問題上都同樣感到困惑，同樣的無所適從，同樣的陷於悲情之中。大陸許多連自己基本權利都沒有的民眾，出於民族一體的認知，甚至支持專制的中共政權攻打台灣，也是可悲之極。

兩岸人民走出悲情的出路在哪裡呢？台灣獨立建國嗎？此路不通。這條路既不合中國人的民族特性，也不合當今世界的大潮流。一國兩制嗎？也行不通。這實際上是低水平的專制統一，同樣也不合歷史潮流。世界上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真正的一國兩制。台灣假如進入這個“兩制”，必然被專制強權壓垮。

我們認為，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中國，中國都應當也必然會統一。但這個統一應該是“民主統一”。

在我們看來，要達到民主統一的境界，需要大陸和台灣人民來共同建立新的國家認同意識，那就是：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那不是馬列子孫的中國，而是中華兒女的中國，即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中華民國應該在全中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一旦大陸人民建立起這樣的國家認同意識，必然會奮起努力，儘快結束一黨專政，再次走向共和，重建中華民國，從而為國家的民主統一鋪平道路。

而堅持中華民國的民主傳統，率先享受了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生活的台灣人民，如果也能夠確立

這樣的國家認同意識，便可以耐心等待和積極幫助大陸人民擺脫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真正合乎世界歷史潮流的國家統一。

有了這樣的國家認同意識，大陸人民的悲情才能被要改變政治落後現狀的急情所代替。

有了這樣的國家認同意識，台灣人民的悲情才能被為全中國擔綱負重的激情所代替。

有了這樣的國家認同意識，海峽兩岸的人民和海外廣大的華人，便能夠找到一個結合點，携起手來，為中國的民主統一而奮鬥。

由此可見，重建國家認同意識，重建中華民國才是兩岸人民走出悲情的必由之路。

(上接第 143 頁)

和英語老師被農民專政，學校的童子軍教官和訓導主任都失去了工作。孟老師還保持了教學的職位，說明當局區別對待，還要用他。鎮反運動中整他是為了鞏固政權，拍桌打椅可以提高師生的覺悟。他挺一挺也就過去了，即使在監獄裏關幾年也會放他的。

孟老師不應當死，因為「士可殺不可辱」的觀念太陳舊。幾十年的階級鬥爭證明士可殺更可辱，在革命隊伍裏不應當有個人的尊嚴。挨整和整人是革命前進的推動力，是革命者基本的生活方式。數學老師湯增光為人忠實可靠，解放後被同事推選接管學校後勤總務。只因有錢財經手，在「三反」運動中成為我校的「老虎」。他坐在一個空教室的中央，接受二十四小時的審問，夜間不能睡覺。白天有初中十三、四歲的女孩分批輪班，

圍著他唱：「貪污分子你睜開眼，兩條道路由你挑，一條活路一條死路，一條光明一條黑暗。」湯老師沒有孟老師那樣敏感，也就沒有孟老師那樣脆弱。他接受侮辱，活過來了，和新舊兩代人共同見識烏托邦的實踐和破滅。一九九九年，國內的同學回萍鄉參加中學校慶，還見到湯老師，八十老翁依然眼明身健。

我到武漢大學入學的時候，思想改造運動剛剛結束，那裏的中學校友津津樂道徐懋庸責令教授們在體育館罰跪的場面。他戴著左翼作家聯盟秘書長的光環，以無產階級的權威統治了珞珈山。講臺前沿跪了一排教授，大殺了「資產階級學者」的威風。五五年肅反輪到徐懋庸本人挨整，他自認革命有功，挨整後

感謝田耕先生等大陸新華僑 捐款 4800 美元

本刊新贈榮譽訂戶

張欣教授、黃偉悌教授
Mr. DICK CHEN

不服氣，寫小品文發牢騷，五七年成了欽定的右派，發落到天津郊區勞動。他沒有尋短見，而是在中科院哲學研究所混日子，文革中被當作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批鬥，繼續苟且偷生。

孟老師不應當死，因為老天爺還沒有絕他的後路。我一位中學同學的姐夫在國務院某部當黨委辦公室主任，只是處級幹部，他在北京款待老家來的幹部，略施小計就改變了丈人的階級成分，從地主變成了團結對象。文革中，孟老師的妹夫官拜南京和廣州兩大軍區的司令員，從收音機裏常聽到他妹妹也去飛機場接送外賓。每次聽到她的名字就有一個念頭襲來，如果孟老師還活著，他妹夫完全有能力庇護他，軍區司令員可比處長大多了。

孟老師的弟弟孟文濤是位作曲家，戴眼鏡，性格沈靜，四七年代替我們音樂老師上過幾堂課，給我們講了一點樂理，教唱了一首俄羅斯民歌。後來從報上得知，他在解放軍文藝學院任教。當時我不理解那首民歌妙在何處，甚至覺得有點怪。時間久了，才慢慢體會其中意境。這首歌伴隨了我一生，從東海岸唱到西海岸，回味無窮。每當我唱到「為什麼這人世生活像毒蛇似的咬人痛，……」就會想到教唱的老師和他不幸的哥哥。

事隔五十四年，我初中畢業的題詞本早已失落，粉紅箋上孟老師的柳體墨跡仍在閃耀。

年輕人不要做沼池中的死水，
應當做海洋中壯闊的波瀾。

他，一個富於幻想的文人，為海天相接的開闊遠景而振奮，歡呼排空的巨浪，從岸邊涉水迎上去。他低估了海水吞噬人的能力，歡聲未落就被浪濤捲走。

“祇有中國問題，

沒有台灣問題。”

辛灝年於 2004 年 4 月 3 日講於芝加哥中華會館禮堂

芝加哥新世紀電視台記者 林占峯 專題報導

新聞發佈會之一

2004 年 4 月 3 日，辛灝年先生應芝加哥僑學界的邀請，赴芝加哥講演“祇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猶如歷次應邀赴芝加哥講演一樣，他再一次受到熱情歡迎和高度評價。講演之後，場面十分感人。現綜合新世紀電視台、世界日報和芝加哥各報報導，將辛灝年先生講演的主要內容報導如下：

辛灝年講演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台灣是不是問題”？

辛灝年首先告訴大家，“祇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是二十年前蔣經國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現在看來，這句話，不僅在二十年前是正確的，而且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也是正確的。

他說，從外部看台灣，台灣島對這個世界，**根本不是問題**。因為，從經濟上看，台灣自七十年代起，就開始了經濟起飛，很快就獲得了“亞洲四小龍”的美譽；台灣自八十年代起，就已經開始逐步結束中華民國民主憲政體制下的“恢復訓政”，走向了旨在“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於今已經是一個確認、並確立了基本民主制度的地區；從國際戰略上來看台灣，台灣祇會遭遇來自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的威脅，卻不存在世界和東亞各國對它的威脅，更不存在它對東亞和世界的威脅。所以，祇要台灣自己不走向歪路，台灣對這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根本不是問題**。

但他轉而指出：從內部看台灣，台灣對它的祖國——中國而言，**卻是一個大問題**。他說，我這裡所說的中國，既不是馬列黨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專

指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是指擁有著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山川土地和百代兒女的“中國”，而不是由任何國號所代表的任何朝代或政權。正是對於這樣一個中國，當今的台灣島，竟然為她製造了兩個**憂患**，一個就是台灣現在的**明確分裂傾向**，將會給當今危機重重的中國，帶來

多**多米諾式的分裂效應**。因為同文同種的台灣都能趁中國大陸的所謂變革之“亂”分裂出去，那末，那些不同文、不同種的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在他們早已將**中共的殘酷專制統治錯當成了漢民族的殘酷民族統治**之後，為什麼就不會紛起倣尤，從而使中國“國將不國”呢？

另一個則是台灣島在東亞的**戰略地位**。這個地位，對於中國來說，是絕不能夠放棄或削弱的，因為它關係到了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發展，關係到了中國在東亞以至整個世界戰略中的命運。應該說，不論是歷史的中國，還是現實的中國，不論是專制的中國，還是民主的中國，任何一個當政者，祇要他膽敢放棄台灣，承認或縱容台灣獨立，他就不僅是中國的罪人，而且是我們民族的罪人，他都必將遭遇炎黃子孫、即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這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都一定、都必須要注重的國家民族利益，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政黨與任何政權，特



別是今天的北京政權和台北政權，都最好不要對此掉以輕心，不要存心挑釁我們民族和人民的歷史命運和前途。

其次，今天的台灣島，又製造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兩個困境。一個困境就是，中國大陸人民本著對自己民族國家的基本民族感情，其絕大多數、甚至是那些恨不能用分裂來瓦解中共北京政權的少數民眾，在實際上，都是堅決要反對台獨的。但是，這個反對，卻立即被某些別有用心者認為，他們是在幫助共產黨威脅台灣，或是在張揚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在某些有背景者的眼裡，甚至是誰反台獨，誰就是在“助共為虐”。另一個困境就是，倘若不反台獨，不反對分裂中國，卻又絕難為中國大陸的民心所容，或者說，大陸人民根本做不到。所以，在台獨勢力已經愈行愈遠、甚至愈走愈橫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民，海外所有的愛國華僑，真是“好為難”。因為他們既不願意幫助共產黨政權，又不能夠容忍台獨的分裂行徑。

再就是，今天的台灣島，又給中共及其北京政權，增加了兩個痛苦，一個痛苦就是真反獨，不敢打。因為對於一個素富野心的專制政權來說，祇要一天台灣不能納入它的專制版圖之內，他就不能高枕無憂，這就是它的真痛苦所在。但是，雖然真痛苦，卻又祇能天天喊打，實際上卻是“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已經成了當今中共北京政權的“命根子”。因為，連一個要去天安門廣場為鄧小平送花圈的普通工人，都必須先抓起來再說；連給一個被強暴致死的北京大學女學生開一個小小的追悼會，都要由中共高層下命令不准開，原因竟然都是“不利於穩定”；那末，中共這個搖搖欲墜的專制政權，還敢於大打一場“內戰”嗎？還敢於在人民已經並正在徹底地否定它這個“新中國”的時候，它還敢於將一九四九年的內戰，重新地打起來嗎？更何況，在中國大陸，還有著無數的痛苦民眾，當他們在對現今的台灣日漸產生絕望之後，竟然已經萌生了“借共打台以革命滅共”的念頭呢？這次大選之前，中共那句“台獨就意味著戰爭，陳水扁上台，就是台獨”的大話，該是說得怎樣的“牛氣”，但是，面對台灣大選這樣一個令全球不安的結果，中共在哪里？中共可敢再講出一句“要真打”或“真地要打了”或“馬上就打”的狠話來？除掉他為救自己的命而敢於冒險犯難。

另一個痛苦，則是假痛苦。而這個假痛苦的實質就是假反獨，真統戰。因為，既然中共“有種喊打，沒種真打”，有種放“空彈頭”，沒種放“實彈頭”，那末，他的要馬上統一中國，就是假的；他的要維護祖國的統一，就是虛的。既如此，中共，這個從前“沒有祖國”，今日還要“四個堅持”的馬列子孫集團，為什麼又要年年月月地海內外、特別是海外，高舉著那一桿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高喊著反對台獨呢？一句話，他是為了“統戰”，而不是為了“統一”；是為了馬列政權的統戰，而不是為了中華中國的統一。這雖然騙不了大陸人民，騙不了大陸新華僑，卻是對付其它形形色色海外愛國華僑的一個了不得的好手段，甚至已經成果非凡。

辛灝年說，其實，中共在台獨的問題上，既有真痛苦，又有假痛苦，歸根結蒂，還是中共自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說，誠如他在“共產革命台獨——社會主義台獨——反華惡性台獨”的講演中早已說過的那樣，中共就是台獨的製造者，是一九二七年在共產國際指示下，和日本共產黨一起為台灣共產黨製造第一份台獨綱領的元兇之一；是一九二八年為台灣共產黨製造“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和台灣革命”之三大綱領的首惡；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社會主義台獨的領導者和支持者；是當今在海外歲歲年年地製造統獨鬥爭、統獨陣營和統獨輿論，以誘導海外華人“愛國不反共”的“另一半”。至於中共本身，是怎樣從蘇聯製造中共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出賣中華民族、顛覆中華民國和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的，他說，祇要大家願意看一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著述，讀一讀他的那一本《誰是新中國》，便可以瞭然於胸了。^{註1}

辛灝年講演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台灣有沒有問題”？

他說，台灣現在確實出了問題，而且問題不少，還很大。但說到底，就是因為“不要三民主義”才出現了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不要民族主義才產生了國家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造成了台灣社會的巨大亂像，甚至成了台灣問題的亂源。這已經成了不爭的現實。台灣東勝電視台在大選前曾和紐約《世界日報》邀請我充當藍、綠兩大陣營大選辯論會的評講

人，並在海外、台灣和中國大陸部份地區直播。可我一再地謝絕了。爲什麼？就是因爲我早已看到，藍營一方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都舉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旗，這自然是天經地義。但綠營雖然也在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卻全都不舉中華民國的國旗，而是舉它們那面標誌著否定中華民國和訴求台灣獨立的“綠旗”。這自然在人格、黨格上，爲正常人所不屑，也使這場辯論會、甚至是總統大選變得毫無意義。所以，我才沒有辦法去充當這樣一個評講人。因爲我在台上要說的第一句講評，就會使這個辯論會“炸了鍋”。因爲我會說“我沒有看見藍綠兩黨在競選中華民國總統，而祇看見藍黨在選舉中華民族國總統，並且不存在競選的問題，因爲另一半不是來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大家想想，要是像我這樣評講，還不要被綠黨轟下台去嗎？現在，選舉的結果出來了，卻是不認中華民國的綠黨，被選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世界上自有總統選舉以來，出現過這樣如此令人感到滑稽的總統選舉嗎？而這一切，都是近二十年來，民進黨反對民族主義、製造族群主義，國民黨拋棄民族主義、祇講“自由、民主、均富”，和形形色色的李登輝們在台灣瘋狂詆毀三民主義、踐踏民族主義的嚴重歷史惡果。

辛灝年說第二個問題，就是民權主義在民主的台灣遭到了扭曲和壓迫。說直了，就是在不要民族主義的前提下，以製造族群鬥爭壓迫民權發展，使得已經確認、確立了現代民主制度的台灣，於民主進程中出現了不應有的嚴重倒退，爲未來的全中國民主進程做出了一個壞的榜樣，爲中共進一步瘋狂詆毀民主，維護專制，威脅台灣，貢獻了“天賜良機”，帶去了“現實根據”。而台灣民權所遭遇的扭曲和壓迫，無疑將使台灣的民主前途，產生嚴重的內憂外患——它將本來就處於中共專制烏雲下的民主台灣，將本來也已經處於族群鬥爭之中的台灣民主，推向了一個更其雷聲隆隆和烏雲沉沉的天空和大地，後果堪虞。

他說，第三個問題，就是民生建設出了問題。原因和現狀，就是志在台灣獨立的綠黨，上台執政四年來，以台獨的意識形態治理台灣，以求台獨的民粹主義精神來引導台灣，卻將三民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主義——“以建設民生爲首要”的民生主義，置諸腦後，從而，將七十年代以來就一直在實現著巨大經濟進步的台灣，在經濟的發展上和人民的生活上，製造了不

應有的倒退。這是四年來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此番大選，造成主張台獨的執政黨情緒過於緊張的原因。自然，過於緊張的情緒就會導致不正常手段的出現。辛灝年說，過去，中國的寶島台灣，就是因爲在一步一步地實現三民主義建設台灣之偉大藍圖的進程中，才把台灣建設成了一個走向了民主繁榮的“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然而，今天，也正是因爲台灣拋棄了三民主義的民族原則，扭曲了三民主義的民權發展，輕視了三民主義的民生理想，才使得今日台灣亂像叢生，前途堪憂。雖然，它倒是給正在反思三民主義和追求三民主義的大陸人民，提供了又一個令人痛心的現實教訓。

辛灝年講演第三個大問題，就是“台灣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都因中共的問題而來”。

辛灝年接著說，雖然台灣有了問題，但是，台灣問題，又全然因爲中國的問題而起。從歷史上看，是因爲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清王朝被迫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歷史才爲中國留下了台灣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也才給台灣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悲情。但是，也正是因爲中華民國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和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終於勝利，曾被清王朝割讓出去的台灣，才又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歷史的事實證明，台灣的問題來自中國的問題，而中國問題的解決，又勢必會解決台灣的問題。

他說，如他前面所講，近現代台灣島追求台獨的問題，與世界共產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密不可分，實際上是與第三共產國際、日本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休戚相關。所以，於一九二八年就已經確立的，“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這三大主張和運動，就在事實上成了世界共產革命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它既爲中共所製造，又爲中共所利用，還爲中共所支持，所配合，是中共用來推翻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一個力量和一種手段。今次大選之前，中共不打自招地供認了它對台灣二二八事件曾領導和發動的史實；早已爲人所知的，六、七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就是爲中共所支持、所配合的事實，都已經確鑿地證明了，中共及其革命和八十年來時斷時續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關係。^{註2} 就不用說，如果二

戰之後沒有中共在前蘇共的支持下，“暴力奪權成功”，則戰後已經統一了的中華民國，和已經被中華民國統一了的台灣，也就不再可能有什麼台獨的問題了。所以，一言以蔽之，台獨問題是因中國的問題而起；現當代中國的問題，都是由中共所製造。因此，要想徹底解決台獨的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中共的問題，就是要解決中共這個洋教政權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專制復辟統治這個最大的問題。如果這個最大的問題不能解決，所謂解決台灣問題，那祇能是天方夜譚。

辛灝年在講演中所說的最後一個大問題，就是“防止台獨、反對分裂、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正確途徑和方向，就是要高舉反共反獨的民族民主大旗，在全球建立一個志在追求中國‘民主、統一、和平’的民族民主聯合戰線”

他說：

第一、堅持反共防獨，就能夠將大陸人民反共要民主的萬難追求，包括在對於祖國民主統一前途的偉大歷史追求之中去，從而為我們的民主奮鬥大大地增強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助力。

第二、堅持反共防獨，就要堅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它不但會叫大陸人民開心，讓台灣人民放心，而且將使中國境內的各民族有了信心，有利於台海兩岸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從而大大減弱台灣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對我們偉大民族和國家的離心力。

第三、堅持反共防獨，才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為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和平”而建立一個最為正確和最為廣泛的“民族民主聯合戰線”。這個聯合戰線一旦形成，其結果，一是中共打出的“假民族主義牌”將因此而失靈；二是反華台獨勢力“反共不愛國”的“反華牌”，將因此而失算；而反共在先、防獨在後；民主在先、統一在後；解決中共專制統治在先，追求中國國家統一在後——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治本在先、治表在後”的這樣一個正確的大戰略，蓋因它“義旗高揚”，從而必得大陸民心，必轉台灣人心，必改海外僑心，必能凝聚和奮發整個中華民族和海外華人為愛國而團結反共的偉大民族民主精神。

註3

辛灝年最後說道：朋友們，堅持反共防獨，堅持民主、統一、和平之追求，才是大陸人民之福，才是台灣人民之幸，才是台灣問題和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之路，也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中國能夠在將來實現民主統一的希望所在。

如往常一樣，辛灝年沒有講稿的激情講演結束後，引發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更有大陸聽眾圍上前去，與他流淚交談，一位來自上海的大姐哽咽著喊道：“祇要一天不能推翻共產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還有海外的華人，就一天不能得到安寧，誰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註釋：

1、參見黃花崗雜誌第七期辛灝年講演錄之二“民主統一為中華”一文。

2、3、同上。

新聞發佈會之二

芝加哥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

公開澄清台北長期 誣指辛灝年匪諜說

【黃花崗雜誌駐芝加哥記者楊中時綜合芝加哥各報報導】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處、芝加哥中華會館、國民黨美中支部、三民主義大同盟、國民黨美中服務處 2004 年 4 月 3 日於芝加哥聯合舉辦了紀念國父孫中山暨先總統蔣公逝世與青年節（黃花崗起義日）活動，並邀請來自紐約的著名大陸歷史學家、黃花崗雜誌主編、《誰是心中國》一書作者辛灝年做了題為“祇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的精彩講演，獲得與會者熱情歡迎，高度肯定，反響熱烈，場面感人。中華民國駐芝加哥代表處處長鄭天壽、僑教中心主任琮枝、中華會館董事長關其煉、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劉天同、國民黨美中聯絡處常委郭正崇、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前香港立法委員任善寧等，均參加了此次活動並講了話。

芝加哥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博士在講話中著意通報了台灣大選前夕，北美洲各地三民主義大同盟分盟在台北召開年會時曾為大陸學者辛灝年辯誣

一事。他說，在本次台北年會上，當他代表芝加哥分盟，向台北總盟提出邀請和安排辛灝年赴台講演和在北美洲巡回講演的請求時，才知道總盟一向以“辛灝年是匪諜”為理由而加以抵制。這使得去年才擔任芝加哥大同盟秘書長的他，感到十分的意外和不滿。

實際上，郭自生秘書長並不知道，多年以來，台北國民黨上層和台北三民主義大同盟總盟，一直都以辛灝年具“匪諜”之嫌，即辛灝年是“中共高級特務”，而一再地拒絕過海外各地僑團和許多分盟的這項要求。李登輝時期的台灣政府，甚至其後的國民黨駐海外某些機構，都曾長期地和一再地抵制、阻撓過所屬海外華僑團體邀請辛灝年講演。

然而，本次台北年會，因有不知情的郭秘書長“發難”，舊事重提，從而造成一片“炮聲隆隆”的景象。有人即以充分肯定中華民國、肯定中國國民黨歷史貢獻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作者“怎麼可能是中共匪諜”，來反斥這一懷疑和誣蔑的荒唐。有人則將辛灝年在海外各地講演次次引發轟動，倍受華僑和大陸留學生歡迎，從而迭遭中共及其民運特務圍堵、打擊的事實，來指責國民黨上層和同盟高層的荒謬。來自紐約的大同盟秘書長、著名報人李勇先生則歷數了總盟過去一再在海外和台灣阻撓安排辛灝年講演的事實，表示了他的痛心和憤懣，他甚至對著主席台斥責說：“長期污蔑辛灝年是中共匪諜，祇能說明，不是國民黨有人投共，就是中共已經打進了國民黨……”；現居紐約、原在台灣執教的成功教授甚至在大會上公開“呼呀”說：“如果辛灝年是匪諜，那就請國民黨求中共多派幾個辛灝年到海外來、到台灣來吧！”……

於是，就象多年前在華盛頓召開的大同盟第十四次年會一樣，本次年會一致通過了邀請並安排辛灝年赴台灣和在北美洲各地巡回講演的提案。由於多年前通過的提案被國民黨存心“銷跡”，本次年會在通過提案後，便在提案人和與會者的要求下，由三民主義大同盟台北總盟秘書長高銘輝先生向大會表示，總盟一定會“落實”大會提案，邀請和安排辛灝年來台巡回講演和在北美洲巡回講演。在台灣國民黨上層和同盟總盟上層已經延燒了將近八年的“辛灝年匪諜說”，這次終於在台北遭遇了自己人要求“澄清”的隆隆炮火。

當郭先生在台上剛剛說起台北國民黨高層竟然長期謠誣辛灝年先生是匪諜時，整個會場都發出了一陣

陣笑聲，這一陣令人覺得實在是好笑的笑聲，也使得在笑聲中走上了講台的辛灝年不覺莞爾一笑。面對著台下許許多多十分熟悉、親切的面孔，辛灝年在正式講演之前，也不覺笑著說：“我既不是共產黨，又不是國民黨，更不是民運人士，祇是一個來自大陸的普通學者，祇因為寫了一本《誰是新中國》，反對了共產黨，肯定了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為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作了應有的辯護，在北美洲講演受到華僑和留學生的歡迎，於是我就變成了“匪諜”，而且這頂帽子，一戴就是七、八年了……”

說到這裡，來聽他講演的人都笑了，辛灝年也笑了，然後他真誠凝重地說：我不但對台灣和海外許多真正的中國國民黨人、海外各地三民主義大同盟分盟和個別膽大的國民黨駐外機構，特別是許多國民革命前輩，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歡迎、鼓勵和邀請，深懷感激；並且，我不僅理解、更不責怪台灣國民黨。因為，這恰恰說明，我這個大陸學者，研究和肯定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研究和肯定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功勞及其基本的民主政黨性質，確實是與現在台灣的那個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是我自己在大陸從事研究的結果，是我們大陸學者反思歷史的成果，是我們大陸民間二十年來反思中國現代史的一個痛苦成就，也是偉大成就。我在海外遭遇台北國民黨長期的抵制和污蔑，它反而使我獲得了國內許多朋友的信賴。因為，他們正是由此而瞭解到，他們的朋友辛灝年（高爾品）出國後，沒有陷入任何政治經濟背景，沒有聽從過任何人的指使，更沒有忘了國家和民族的大義。而我本人，之所以到海外以後，能夠長期在公開的圍堵、暗中的抵制和形形色色的污蔑持續不斷的情形下，雖然痛心，卻能夠堅持不改初衷，像“傳教”一樣，從不收分文地到處奔波講演，就是因為，我和無數大陸學者一樣，對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的信念，和為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中國國民黨的辯誣，都是在我們的祖國大陸地區艱苦形成的，而不是在海外，更不是在台灣。所以，我的信念才經受住了台灣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所給予我的嚴酷考驗。也許，這個嚴酷考驗，還沒有完……

他顯得有些傷感地接著說道：五十四年來，即便是生長在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民，大概也沒有一個人像

我這個大陸人，年已四十有七，還能夠主動拋棄所已經獲得的名利地位，所已經擁有的一切，甘冒著生命的危險，敢於“自我流放”，來到海外，“吃著太太的飯，做著為中華民國正名、為中國國民黨歷史辯誣的事情”，將自己的後半生，都奉獻給了中華民國和真正的中國國民黨……爲了什麼？就是爲了反對中共這個洋教政權，這個專制政權，這個復辟政權；就是爲了我們的人民能夠在對歷史的反思中，徹底地清醒過來，像世界上所有推翻過專制、又遭遇過復辟的國家一樣，推倒專制復辟，重建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說到這里，他的講話，旋被一陣激越的掌聲所淹沒。

掌聲稍止，他又接著平靜地說道，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我，雖然祇是一個文化人，從來沒有做過民運，但我一定要把在思想、文化、歷史上“掃地”的工作堅持做下去。因爲成了中國絕對統治思想的西洋馬列邪教，實行了五十年殘暴專制統治的中國馬列子孫，他們毀我中華民族文化，殺我中華民族兒女，更將太多的思想文化垃圾和無邊的歷史謊言堆滿在中國人民追求自己祖國民主統一的大路之上。所以，他才要和無數大陸的知識份子一起，無怨無悔地繼續“掃”下去，好讓後來人能夠在追求的道路，走得平安一些，松快一些，更加有信心、有自尊一些……

在又一陣激情的掌聲之後，辛灝年才正式的開講了。他講的題目，就是蔣經國先生的那一句名言：“祇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

新聞追蹤

著名民主人士、八九年前中共中央辦公廳
聯絡員吳稼祥曾攥文指國民黨前主席
李登輝污蔑辛灝年是大陸中共特務

我有個老鄉，筆名辛灝年，寫了本好書「誰是新中國」，對蔣氏父子在台灣的功績給予崇高評價，這書，台灣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或者說敢出版。據說，李登輝先生還通知美國華僑組織說，辛先生是大陸中共特務。說辛先生是「特務」倒有可能，他履行的是爭取中國統一、自由、民主的特殊任務，但絕不是中

共的，是上帝的。回憶起李先生在蔣經國先生靈柩前的啜泣，讓人感慨系之。

（吳稼祥文：“戰則兩傷，和則俱興”——四勸中共當局認真考慮邦聯制統一方案。著名歷史文化網站：《浴火鳳凰》，GOOGLE 搜索網站）



新聞發佈會之三

郭自生主持芝加哥賞評會

辛灝年第五次評講走向共和

兩百位各界觀眾參加 賞評會場面激動人心

新世紀電視台記者 林山佟

【芝加哥新世紀電視台記者林山佟綜合各報報導】四月四日下午，應芝加哥三民主義大同盟、中華會館、國民黨美中支部、三民主義大同盟和國民黨美中服務處、中山學社等僑團邀請，專程從紐約趕來的辛灝年先生代表黃花崗雜誌和主持人及僑領們一起，於芝加哥遠郊開闊、漂亮的文教中心，放映了史詩《走向共和》的“精華版”，並舉行了研討會，受到二百餘位華僑人士的熱烈歡迎和贊賞。

放映研討會由芝加哥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主持。郭先生首先介紹了大型史詩《走向共和》在中國大陸所遭遇的命運，介紹了《走向共和》編、導、演員們艱苦的創作歷程和卓越的藝術貢獻，也介紹了辛灝年

先生和黃花崗雜誌為在海外推展電視劇《走向共和》的影響所做的工作，和他們在紐約、舊金山舉辦四次賞評研討會所受到的熱情贊揚。並且，他仍然不忘為辛灝年先生澄清“國民黨誣指匪諜說”，再一次為辛灝年先生辯誣，引起台下一片會心的笑聲。

由黃花崗雜誌剪輯的《走向共和》精華版，即提供研究用的“學術版”，在經過第四次剪輯之後，不僅在故事情節的連貫上，還是在人物形像的完整性上，都比以前有明顯的進步。著名藝術家揚逢時博士都誇獎說：“剪得好”！象往常一樣，每放映一個段落，就有辛灝年作一小段評講；而每一次評講，又都會引來一陣熱烈的掌聲。整個精華版，連同辛灝年的評講共放映了三個小時，然而，絕大多數聽眾都沒有離開會場，而是積極踴躍地提問題，談感想，而辛灝年即興講演式的回答問題，則引爆了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以至人人皆不知天色之將晚。這場賞評研討會足足延續了六個多小時才告結束，許多與會者慷慨激昂的提問和發言，和無一人表示質疑與批評的激情氣氛，再一次顯示了海外僑胞對於《走向共和》的真心誇贊，顯示了海外華僑追求和平革命、再做當代中國共和革命之母的歷史可能性。

新聞發佈會之四

辛灝年應舊金山僑學界邀請發表電話講演

本刊記者 楊柳青

【本刊訊】四月十日下午，剛剛從芝加哥講演歸來的辛灝年，在紐約應舊金山僑學界“撤除飛彈、撥款興學”研討會的邀約，發表“電話講演”並多次回答問題，受到研討會的熱情贊揚。

辛灝年首先針對該研討會要求他發表對於正在舊金山召開的“世界和平統一大會”的看法，毫不含糊地從四個方面指出，和統會不能變成中共的“武統會”，也不能甘心去做中共在海外的“統戰會”。

由於辛灝年的電話講演獲得研討會的興趣和贊揚，所以，遠在六千哩之外的與會者們，紛紛通過電話，向辛灝年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提問人中，更不乏象著名教授嵇義達先生、著名評論家趙紫龍先

生、著名的政論家王德耀先生等這樣一些蜚聲舊金山華人社區的重要知識份子。辛灝年針對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在電話中分別地和逐一地予以了回答，特別是對此番台灣大選和諸如“等到中國大陸民主了、自由了之後，台灣人民能不能夠獨立”，以及“能不能指望美國在中國的台海問題解決上、甚至是幫助台灣獨立上，起到很大的作用”等在海外十分敏感的問題，作了明確和誠懇的回答。

辛灝年首先回答說，“為什麼要等呢？為什麼台灣人民祇想等到中國大陸人民獲得民主自由之後呢？為什麼不能和大陸人民一起，為推翻中共的洋教專制復辟統治，為在全中國建立一個和台灣一樣好的民主社會制度而共同奮鬥呢？這雖然是在支持大陸人民，卻不也是在從根本上消除中共專制政權對自己的可怕威脅嗎？這可是在保護自己呀！要知道，面對那個專制復辟政權，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實在是一致的，沒有任何沖突的.....至於中國大陸民主自由之後，台灣人民能不能夠要求獨立，應該說，我們還是按照歷史的進程來考慮吧！誠如歷史劇《走向共和》裡的李中堂所言，一代人祇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我們這一代人也不要包攬太多。因為，到了那時候，不論大陸人，還是台灣人，都會有了更新的想法，也已經擁有了在兩海兩岸表達自己統獨觀的自由，更能夠不在飛彈的威脅之下來進行真正“和平的與平等的”談判.....也許，連這一切都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到了那時候，台灣人民根本就已經不存在獨立的要求了.....所以，我認為，還是讓我們更多地考慮和解決眼前大家共同存在的問題、甚至是共同的痛苦為好.....”

辛灝年還回答說，美國作為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國家，它不僅擁有堅定的民主理念和歷史的自由觀念，而且確實為維護和發展這個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起到了、並且還在起著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猶如與我們同文同種的 2300 萬台灣人民，都並不情願來幫助大陸人民解決也與她自己休戚相關的中共專制復辟統治一樣；由於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即使是在一個中國的範圍之內，大陸人民也祇能依靠自己來解決自己的萬難民主追求，甚至極其痛苦地置身在“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的孤軍奮戰之中；所以，如果我們、特別是台灣人民，一心指望美國來幫

助他們解決台海問題，甚至指望美國能夠幫助他們獨立，這大約也祇能是“一相情願”的。因為，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二十世紀南韓和南越的歷史，特別是當前伊拉克的現狀，都能夠證明我對此看法的正確。更何況，美國和西方強國，他們還有著他們必須顧慮的自身國家利益呢！所以，在爭取別人同情和支持的同時，我們必須建立依靠自己的信念，台灣人民要靠自己，大陸人民更要靠自己，中國的事情祇有靠大陸和台灣一起來解決。這才是我們應有的立場和精神。

辛灝年在即時回答了很多問題之後，針對有人友好地、也是直截了當地問他“贊不贊成台灣獨立”時，他亦乾脆明確地回答說，“我首先是一個中國的民主統一論者。並且願意為自己的祖國能夠最終地走向民主統一，而盡一個普通國民之責，而盡一個普通學者之心”。言罷，他轉而同樣明確地說道：“我對大約佔百分之六十五的台灣人民不願意現在就為中共的專制政權所統，則懷著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因為，我們沒有理由和權力讓沒有遭受過中共殘酷專制統治的台灣人民，也來遭遇我們十三億人民已經和正在遭受的巨大痛苦。雖然這無疑是暫時的。”

幾乎所有遙遙六千哩之外的提問者，都對他的講演和即興回答，感到相當的滿意。會議主持人舊金山夕谷民主基金會的胡秘書長當場在電話中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新聞發佈會之五

辛灝年被邀發表對台灣大選的簡單看法

紐約僑聲電台記者 南麗

三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辛灝年被紐約僑聲電台誠請赴會發表對台灣大選看法。他說：中國台灣在民主進程中不管出現了任何問題，都是民主進程中的問題，雖然以族群問題干擾甚至壓迫民權問題，會使台灣的民主走向歧途，本次大選就是教訓；而本次大選中出現的問題，則是對中國大陸和整個中國的未來民主發展，製造了一個不應有的“榜樣”。他強調說，中國國民黨祇有重新確立“反共救國保台灣”的路線，才

有可能擁有在台灣的前途，並擁有在全中國的前途，否則祇會“失了前方，更失了後方”——即失去中國廣袤的大陸地區及其民心。在氣氛相當壓抑和“藍營人士大部都去了台北投票的紐約會場”上，他的講話和回答問題，居然一再地引起百餘位聽眾的有力掌聲。

新聞發佈會之六

本刊編委余健文博士

於舊金山主持何冰姿女士追悼會

【本刊訊】黃花崗雜誌編輯委員會主任孫國棟教授夫人，教育家、雕塑家何冰姿女士的追悼會於 2004 年 2 月 11 日在舊金山唐人街一家殯儀館舉行。由于孫教授在海內外學界的崇高威望，及何冰姿女士在舊金山僑社的很高聲望，金山各界約二百人參加了她的追悼會。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駐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等均送了輓聯或花圈。正在外地出差的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先生也繞道舊金山參加了追悼會，並在主持人余健文博士介紹過何冰姿女士的生平之後，首先發



余健文博士主持何冰姿女士追悼會

言悼念愛他如弟子的老師母。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蔣亨蘭女士，著名民運人士林牧晨先生、郭平博士和八九學生運動領袖周鋒鎖先生等都發言表示了自己真切的哀悼。何冰姿女士的長子孫經武先生則代表孫家後人對自己母親的一生表達了深深的追念之情。整個追悼會雖然瀰漫著哀傷的氛圍，但是，幾乎所有發言悼念者都對何冰姿女士作為一個教育家、藝術家，特別是她作為一位巾幗英雄的立場和氣派，深感崇敬不已。都聲言要繼承她的遺志，踏著她的腳印，為告慰她“但悲未見九州同”的遺恨而堅持奮鬥下去。

孫夫人何冰姿女士是中國廣東省三水縣人，生於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十三日，終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一歲。

一個真實的生命典範

余健文

認識孫國棟夫人何冰姿女士，是在十五年前六四前後。那時在每一次聲援北京民主運動的集會遊行中都見到孫先生夫婦積極參與。那是一段激動人心，亦使人無限悲痛的日子。在血色之中，我對於昔日之理想作了徹底的反省。從膚淺的唯物主義轉而向內作生命的探求。在這段期間，孫先生與孫夫人給了我精神上的扶持與啟發，孫先生向我開示了中國的歷史文化意識，使我認識到傳統慧命之所在。孫夫人則以其生命形態具體的展現了此文化精神的面貌，使我能真切體認到真實的生命之學問。

與孫夫人接觸過的人，都會感覺到她是一個獨特的生命，給人一種溫馨而舒暢的感受。其獨特處在於她有一片赤子之心，愛憎分明，並時時表現出活潑的生機。其所以給人一種舒暢從容之感，則在於其真誠坦側之情，無論是初相識或老朋友，她都以誠相待，不作無聊的應酬，不作隨便的敷衍。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孫夫人不是聖人，不能直下表現天道之本然，但她一生遵循人道而行，一本人事之當然，她是「誠之」者。故她處處表現出擇善固執之情。對於民主理想之堅持，對於自由之追求，對於專制政權的厭惡，終生未有改變。每言及中共摧毀中國文化與壓制人民的種種惡行，其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更常會拍案而起，謂要消滅暴政，必須使用非常之手段，甚至訴諸於暴力革命，亦不為過。有人以為她的言論過於偏激，不切實際，不夠客觀持平。但我以為這恰恰表現了她至誠生命的本質。她不以現實表面的是非為是非，不以實然之事亂當然之理，事事能以人文社會當然之義以衡量批判現實之惡。此正是她能擇善而固執之所至。今日一般知識分子之所謂客觀

持平者，實無真實的是非觀念，不過祇是以現實為是，以存在為必然合理。美其名曰實事求是，其實是浮淺無知之論。他們不識實然之事上，更有當然之理。要求真是非，必本於實事而求之於超越現實以上的當然之理，方能得之。

在孫夫人身上我看不到老年人的暮氣，而是感受到一顆年輕跳躍的心。數十年的戰亂流離，彷彿沒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蹟。就算是在她患病的最後兩年中，雖然體力已大不如前，但每次與她談及她的工藝創作與文字學研究，她都會滔滔不絕，詳盡的介紹每件作品的涵意，每點研究成果的意義，使人覺得生趣盎



王希哲夫人蘇江流淚悼念孫夫人何冰姿女士

然、如沐春風。每次看望她後，我總能感受到她的生機不斷，深切感悟到周易乾道所謂的「生機活潑」，此生生不已的生機，正就是誠體之流行。雖然她患的是不治之症，我總覺得人的主觀精神生命總能克服自然生命之不足。

「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孫夫人的一生，客觀化了「誠之者人之道也」一語。她以其至誠之心盡了天命之性，成就了一個真實的生命。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常人的生命往往膠著於外在的物質世界，以身心逐物，不能反身而誠，故祇是一物質的、自然的存有，無價值世界的意義，其生命亦非實有，即如「無物」。孫夫人以誠為體，故處處能表現生機之不滯，純粹至善以貫切終始。牟宗三先生有言「理非空言，道不虛懸，必待人之體現。」我有幸認識孫夫人，得到她的教誨，使我得悉一活活潑潑真實無妄之生命。使中庸所謂「至誠無

息」之義，具體呈現於我目前，由此而得知先賢所示決非虛妄之空言。

新聞發佈會之七

黃花崗雜誌義工

追悼著名民運人士趙品潞先生

著名民運人士連勝德、李進進、葉寧主持追悼會

【本刊訊】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雜誌有多位義工參加了著名民運人士趙品潞先生的追悼會，辛灝年首先發言贊揚他的民運好朋友趙品潞先生：一是對得起父母，因為絕不是天下的父母都能夠擁有這樣一個忠於人民民主事業的好兒子；二是對得起自己的國家民族，因為趙品潞曾經對他說過，他干民運就是爲了愛國，如果不是爲了愛國，那就繼續讓共產黨把中國糟蹋下去好了，何必還要搞什麼民運呢；三是對得起民運，因為他完全依靠自己，認認真真地搞民運，清清白白地做人士，令人欽佩……辛灝年表示，趙品潞一再期望他這個普通學者要堅持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道路的遺言，他將永遠銘記在心。黃花崗雜誌義工民運人士孫耘因與趙品潞先生是多年的摯友，他那流著眼淚的發言，動人心魄，催人淚下（全文另發）。黃花崗雜誌義工，也是趙品潞摯友的民運人士羊子、陸耘、魏玲多人等也在會上發言深切悼念趙品潞，個個令人動容。整個追悼會瀰漫著一片愛中國、恨中共的深沉氣息，爲多年來海外民主集會所少見。

孫雲：

品潞，我的兄長，您放心地走好……

品潞英年早逝，他的親人和朋友們都很悲傷，我自不例外。

去年十二月底，品潞因肺癌晚期引發胸腔積水而住進 ELMHURST 醫院時，我專門詢問了癌症專家，耶魯大學的張育明教授。他當時告訴我說品潞大約還有二個月左右的時間，所以我是已經有心理準備的。在最

後一次去看品潞和他告別時，我已有了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的預感，所以特意和他握了握手并囑他打電話讓兒子趙磊從南部打工的地方回來，同時我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嫂子。

十一年的相處

我和品潞是在一九九三年初認識的。那時他來看望王若望先生，因為我和王老他們是一起分租的房客，這樣我和品潞就認識并成了好朋友。

和他認識後不久，我陪他去中國城職業介紹所找工作。一路上他話并不多，這和以後他給人總是侃侃而談的印象完全不同。品潞他多才多藝，能歌善舞；他用他那特有的雄混的男子漢的嗓音唱的歌曲「中國人」，至今還在我的耳邊回盪。

愛國，不愛黨

一九九四年九月底，中共在紐約第一次組織親共人士大遊行，紀念中共的「國慶節」；民運人士則針鋒相對，組織了車隊遊行抗議中共的專制獨裁。其間品潞和我開的車在孔子銅像附近被數百名親共人士包圍（這也成了第二天的頭版頭條新聞）。當時他們對我們高聲叫罵漢奸賣國賊，品潞則下車，面對人羣大義凜然的說道：「同胞們，我們愛國不愛黨！」我記得當時世界日報的魏碧洲先生也在場。多麼正確的回答，多麼響亮的聲音。這和多年以後有人「祇批愛國賊，不批愛黨賊」；共產黨假愛國，他不批；我們要真愛國，他倒要批；該是成了多麼鮮明的對照啊。

我們靠自己站起來

在我們的相處中，我時常聽到他講的一句話是：我們靠自己站起來。他的這句話給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確是靠自己的雙手謀生，從而站立起來的民運人士和工人運動領袖。在他謀生自立的艱難過程中我是見證人。我們一起搬過家，我們也一起攪拌過水泥，我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我們也一起分擔挫折。他力氣很大，一百磅一包的水泥，他左右開弓，一邊一包，抱起來就走；而我兩手捧一包，走起路來還搖搖晃晃。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幹活，那位東家悄悄跟他講，你請的這位工人好像不怎麼會幹活，他却哈哈大笑指著我道：你說他，那可是我的老闆！他就

是這麼一個樂觀豁達，有自信有能力的人。我為有幸曾和他一起同甘共苦而感到自豪。

民運鍾馗

民間有鍾馗打鬼這一說。而在我的心目中品潞就是民運鍾馗。

品潞他為人正直，疾惡如仇，而敢作敢為更是他的特色。為此我們以前還不時能聽到或看到有關他與人發生爭執的消息和報道。現在他人已經離我們而去，這樣的消息和報道以後不會再有了，而往事祇能作為我們永遠的回憶。我相信不管是他的朋友還是以前和他有過爭執的人，都會對他的道德人格發自內心的敬佩。因為他是個公私分明、從不因私與人爭執的人。

他的追求和願望

有道是「賢於內而及於外」。品潞從事於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他熱愛家庭、和睦親友的一種外延。從參加八九民運到浪跡海外，他這種對家庭的愛和對國家人民的神聖職責始終堅定如一。

對家庭，品潞一直希望他心愛的兒子快快長大成人，能像他一樣成為一個正真的男子漢。

對國家，雖然他不能親自看到共產專制被推翻的那一天，但他一直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他這種對民主的執著追求，他對家庭的愛，他對國家的忠誠與責任感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和表率。我們祇有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完成品潞未完成的民主追求和願望，來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品潞，我尊敬的兄長，您要放心地走好……

切莫不量力，以卵去碰石；
保命是第一，切莫去講理！

家中老父母，從此拜託你，
本想長相守，不忍早離去；
夫君多辛苦，早晚須留意，
我命換教訓，盼君長長記！

清明勿燒紙，省錢養兒女，
忍辱且負重，吾恨藏心底；
一朝入公門，鵬程千萬里，
來日做高官，為吾申冤屈。

淚 流

農家小夫妻，賣蔥早早起，
足登舊棉靴，身罩破棉衣；
駕駛農用車，顛簸來集市，
祇盼掙倆錢，送兒上學去。

天寒手腳僵，行動不如意，
不想蹭寶馬，遭遇蛇蠍女。
寶馬來勢凶，車主巡撫媳；
貴婦蘇秀文，下車農婦指。

草民無錢賠，小心論道理；
論理不平等，繼而口角起。
路人來相勸，惹怒巡撫媳，
誰敢說我錯，開車撞死你。

貴婦隨上車，開啓發動機，
忽然一瞬間，寶馬如衝刺。
可憐一民女，當場把命斃，
自製土棉鞋，飛起一丈餘。

可恨蘇秀文，宛若無其事，
連頭也不回，揚長便離去。
如此殺人案，竟然作肇事，
雷公何所在，速把人獸劈！

夫君大慟哭，悲憤不能已，
恩愛蓬間雀，生死兩別離；
兒女肝腸斷，陰陽千萬里，
慈母手中線，難縫身上衣。

可憐賣菜婦，平生多拮据，
勞作複勞作，祇求兒不饑。
不敢望小康，但願兒出息，
誰想禍天降，命喪大都市。

冰冷黑土地，寒風如哭泣，
賤民如草芥，新墳又堆起；
民女自離去，雙目不忍閉，
誰去陪父母，誰來養兒女？

托夢勸夫君，勿去大都市；
見車繞道走，遇事打自己；

(轉左下)

浸著血淚的上書

蔣彥永醫生上本屆「人大」「政協」會議書

(2004年3月6日北京「兩會」快訊)

編者按語：中國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改良運動，中共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於今已經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後的春天，當中共的所謂人大、政協在北京開會伊始，著名的蔣彥永醫生，繼去歲大膽揭穿中共專制統治者隱瞞 SARS 病情之後，又獨自一人向「兩會」上書，要求將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運動正名為「學生愛國運動」，從而引發了今年海內外紀念八九民主改良運動和六四死難志士的第一個高潮。雖然它難有結果，但卻振奮人心。因為它標誌著，中國人，還沒有忘記歷史，甚至正在更加深入地反思著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無數慘痛歷史中的那一頁。

或許是出於對既愛民主，又愛中國的黃花崗雜誌的信任吧，在北京，有獲上書者，在中共兩會召開前夕，就將上書及其附件用傳真傳給了我們。而我們，也在查實之後，遵囑在兩會召開之後的第二天，首先將它們在黃花崗雜誌等海外網站上依次地發表了。其結果，便是海外要求平反六四和要求為八九正名的聲浪勃然而起，和各種簽名紀念活動的迅疾展開。

現在，本刊第九期印刷出版，在紀念八九民主改良運動十五週年專輯中，再將蔣醫生的上書文件予以發表，亦是想為歷史留下一個可以視作根據的記錄。似乎應該說明的是，曾為黃花崗雜誌首發在網站上的蔣醫生上書，其標題：浸著血淚的上書——蔣彥永醫生上本屆「人大」「政協」會議書，是為本刊所加。除此全文未作任何改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
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
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

1989年，北京學生針對當時的政府腐敗，提出反腐敗，反官倒，要廉政的正義要求。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北京市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但少數維護腐敗的領導却採取世界和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手段，用坦克、機槍等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進行瘋狂鎮壓，造成了數百名無辜青年慘死北京街頭和數千人民致傷致殘。之後，當局隨即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編制謊言，并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15年過去了，當局希望人們會漸漸淡忘：過去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暴亂」，後來就改稱為「89年的政治風波」。這種對事件名稱的更改，正說明肇事者的心虛。既然是風波，何以要動用數十萬軍隊去鎮壓？怎麼能用機槍坦克去殘殺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議，要為89年六四學

生愛國運動正名。

我是解放軍301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89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約10點鐘，我在宿舍裏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裏。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

手術室。我們院共有 18 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 10 點多開始到半夜 12 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 89 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 7 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大夫們在醫院的 18 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 20 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 4、5 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到快 10 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我檢查這位傷員，祇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祇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却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裏，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



蔣彥永醫生和他的妻、子攝於北京 301 醫院

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涌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却的。

約在 12 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 片顯示碎片和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他算是幸運的，祇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員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 301 門口，就不再有傷員送到我們醫院來了。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

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北京的戒嚴是從5月19日開始的，當時進來的部隊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攔，無法進到城內，就分別駐進沿復興路的301醫院、裝甲兵、炮兵、通訊兵等部隊單位。進駐301醫院的部隊，經過我院廣大醫護人員和他們的交談，漸漸瞭解了學生運動的真相，於是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會參加鎮壓學生的活動。那時，每天清早6點左右，從西郊機場有一架直升機沿復興路由西向東慢慢飛過，與駐在各單位的部隊負責人（在我們醫院裏是一位團長）進行聯繫，讓部隊隨時做好出發準備。部隊在這段時間裏整裝列隊，等直升飛機飛來，那位團長用通訊設備與之聯繫：報告部隊已隨時做好準備。飛機一過去，官兵們就又分散和醫院的同志交談、聊天。就是因為這批部隊已經不可能被用來鎮壓學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這批部隊就撤離了。據說後來參與鎮壓學生的部隊，是緊急從山東等地調來的。那些部隊中不少是去過越南戰場的，在戰場上和敵方對峙，開過槍，打死過人。他們被運往北京時，在火車上沒有報看，沒有收音機聽，完全是被蒙在鼓裏。一到北京後，就被告知：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要他們去鎮壓。在這種情況下，無知的戰士，聽從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慘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參加搶救的醫護人員都萬萬沒想到會出現這種使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慘事。我當時也以為不知是哪個部隊的頭頭在胡來。我和當時到急診室來參加搶救的廖院長說，是否可以和上面通電話，告訴他們在我們面前發生的意外情況，請上面趕快制止。廖院長也和我們一樣，不斷流淚，不知如何是好。6月4日上午有一輛坦克開到301醫院門診樓邊，從車內抬下了兩位昏迷的戰士。我當時還在急診室，從送來的人員那裏瞭解到，兩位戰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長商量，我們對面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應該知道如何處理這類毒氣傷。我們一面打電話聯繫，一面想辦法把他們從地下通道轉移到我們對面的307醫院。我和廖院長等其他院裏的同志，都為老百姓和戰士受到這樣的傷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鄧小平召集各單位領導講了話，緊接著就開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學、腦內科主任朱克

教授找我，他說院裏托他先找我談，讓我說清5月中旬和醫院進修生上街去天安門的事。我告訴朱說：這事你不必管，院裏誰管這事的來找我談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來找我。他告訴我，上面從一份錄像帶上看到我和醫院進修生進城，他們乘一輛卡車，打著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聲援隊的大旗，敲鑼打鼓地駛在復興路上；我在一側騎自行車跟著他們進城，讓我把此事說清楚。我告訴他，那天是星期三，我們科原定下午進城參加北京外科學會的學術活動，我已訂好了車。當我們去車隊時，被告知路上全是遊行隊伍，所以不能發車。此時，我看到在301大門內有不少進修生，他們都穿著白大褂，準備登車去天安門聲援學生的行動。他們見到我後，請我和他們同去。我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他們告訴我他們要安營扎寨。我就說我不能和他們一起去，我騎了自行車，在他們卡車的一側，一路走，一路聊。到禮士路，汽車已無法通行，他們下車步行進城，我繼續騎車到了天安門。因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廣場轉了一圈，就趕快返回醫院。我去天安門之事是誰都知道的，我的這個行動沒有任何錯誤，和我談心的同志就祇好如實地去彙報。此後談到六四的問題，我始終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為此，在那年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為標準來處理。如我們的兄弟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領導班子的調整。那時的院長秦伯益教授當上面領導來找他談話時，很坦率地表示他對待六四問題沒有不妥之處：如當時戒嚴部隊無法進入城區，就分散進入沿途的一些軍事單位，根據軍事醫學科學院擔負的任務，秦伯益院長提出，如部隊要進入，應擔負起保衛該單位安全的任務，否則如部隊駐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進，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結果部隊就沒有駐入；關於給天安門絕食的學生送水的問題，當時院內群眾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並派了車，因為很多國家單位都那樣做了，等等。考察的結果，秦的職務被免去了。一個副院長是我的同學唐佩弦教授，他和領導談話時說，他在解放前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祇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沒有開槍鎮壓。而現在是人民的軍隊，却對學生運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做使人實在無法理解。於是，唐的副院長職務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為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

表態好，就被提升為正院長了。

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业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像。在這漫長的15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為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我總希望這個錯誤有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出來，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那時我國的食品極其缺乏，什麼都要憑票，但老百姓仍能和黨一起來克服各種困難，使國家在短短的20年內就大變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物資豐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況糾正六四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祇要我們黨的領導痛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1997年我去吳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訴我，他在那次全國政協會上要求發言，會議主持人要他先送發言稿，後來沒讓他做大會發言，他祇在文藝組發言。他說：他先肯定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20年來使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的這一功勞。接著指出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問題上是有錯的；現在鄧已病故，我們應該重新評估六四。89年時鄧已高齡，瞭解外面的情況主要靠別人反映。當時北京市的陳希同打了假報告，聲稱學生後面有國內外反動勢力在煽動，所以鄧是上了陳的當，受了陳的騙。現在陳已經是個貪污犯，主要罪責是陳，應該使六四恢復本來面目。吳告訴我，他發言後，到會的沒有一人對他的意見表示反對（當然不會有人說出反對的理由），但是，會上沒有一人附議。這使他傷透了心。因為他知道，在場的都是些很有頭腦的知識份子，在私下裏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會上却都不敢說心裏話，這實在使他傷心透頂。他的夫人新鳳霞和我說，她總是勸他不要再去提意見了，提了也沒有用，而吳總是不聽，一有機會就要提意見。吳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裏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我後來還去找了雷潔瓊老師和吳階平老師，他們都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師長，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301醫院搶救

傷員時的所見，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表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瞭解得那麼具體，但都認為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他們現在無能為力，將來一定會解決的。

我在1998年會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楊尚昆同志家去，向他彙報我去台灣的情況（楊是一直分工領導台灣問題的主要負責人），我談了堂兄蔣彥士對兩岸統一的一些看法。隨後我告訴他，我是在六四時負責處理送到301醫院來的傷員的外科主任，問他是否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表示願意聽，我就把我的所見如實地告訴了他，還把我1998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信給了他。楊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

楊尚昆同志的意見其實是許多老同志的共識。六四事件發生後，中顧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對於光遠、杜潤生、李銳、李昌四位老同志開了批判會，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讓他們四位黨員重新登記的決定。但後來陳雲同志給中顧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體中顧委委員宣讀。大意是，這件事再不能這樣做了，我們過去在這方面教訓已經很多，難道將來還要再給他們平反嗎？薄讀完信後說，這個問題算了，不再談了，到此為止。陳雲同志的這封信已很明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雲同志這一重要意見是否已向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作過傳達。

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17歲的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并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1995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

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過去的。

我在上面寫了不少，總的意思是：既然 16 大後我們黨和國家的新領導，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要貫徹憲法，要以人爲本，那麼，人大常委、政協常委、16 屆中共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就應該用國家的憲法和黨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則：「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爲標準來重新審定六四。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絕不會造成人心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祇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爲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逐漸減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我經過反復思考，覺得有必要寫此信給各位領導。當然我也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如果領導認爲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

信如收到，請告我。

我的地址：萬壽路朱各莊 26 號，5-1204

郵編：100036

電話：68134451

北京 301 醫院外科 蔣彥永

2004 年 2 月 24 日

（黃花崗網站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六日首發）

「蔣彥永醫生上書」附件

說明：

附件一：一群老共產黨員「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和附件二：北京兩會期間出現的傳單“我所目睹的六四”，因黃花崗雜誌網站已用特稿形式發表，此處從略。

誰來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什麼？

山西 馬曉明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語：八九民運十五週年紀念日就要到了。每年快到六·四的時候，各種紀念、回憶文章都會與讀者見面。今年的六·四，共產黨專制政府狗急跳牆，逮捕了丁子霖等三位天安門母親。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共產黨不得不把她們放出來。這裏發表的馬曉明先生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馬曉明先生作爲「六·四」的參加者和受害者，作爲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民運人士，向中共專制政府發出明確的通知：對於六·四，共產黨祇有認罪，接受審判，別無它途。

平反，理正幽枉也。意爲把冤屈誤判的案件糾正過來。就本文所說的「平反」，我認爲其意思大概是由中共統治集團重新爲八九民運定性，重新對軍隊血腥屠殺人民、鎮壓八九民主運動作出含混的結論，對因參加八九民運和在六·四屠殺中受害遇難的人們恢復名譽，補償損失。像「正名」、「重新評價」等類的意，我認爲與這種「平反」大同小異。這種做法基本上是沿襲了封建專制體制幾千年一貫制，由專制統治集團製造冤假錯案，殘害無辜，再由枉屈的製造者糾正過來，搏得臣民「吾主聖明」、「國之大幸，民之大幸」的由衷稱譽。這個過程一切取決於專制統治者的意志，自然談不上什麼民主、人權、法制。在封建專制社會裏，這種做法是必然的，有時甚至不失它的積極意義；但是在現今，在人類大部分已步入民主社會的條件下，在中國人民已勇敢地向民主制度挺進的時刻，對於追求民主、人權、自由、法制并勇於爲此獻身的民運人士而言，要求專制統治集團爲八九民運、六·四慘案及一切大大小小的此類冤案平反，就顯得十分落後荒謬，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首先，是由誰來平反？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都是要求中共統治集團、中國政府爲「六·四」平反。這種要

求合適麼？由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爲被屠殺者平反？由鎮壓人民的專制集團爲被鎮壓、被迫害的人們平反？這就好比一個無辜的人被強盜打了、搶了、殺了，還要用強盜給被打、被搶、被殺的受害者恢復名譽、正名，重新評價；而強盜或強盜集團却不受到應受的法律制裁。被害的無辜者爲什麼祇能由劊子手平反？劊子手又有什麼資格替受害者平反、正名？起碼是糊塗！

也許有人會說：鎮壓八九民運的是中共的一些前任領導，現在新上任的人馬與六·四鎮壓無直接的責任。不錯，人馬是換了，但專制體制變了嗎？對人民實行侵犯、愚弄、鎮壓的做法變了嗎？不主動實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繼續頑固地實行一黨專制，不主動解決六·四大冤案，本身就表明這樣的班子到目前爲止還是一個執行高壓專權統治的政治集團。到目前爲止，我還看不出這個班子有明顯的實質改革的跡象。哪怕是一點點的實質的跡象。

也許有人會認爲，在現時的體制下，有效地解決「六·四」問題，以此爲突破口，促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祇有通過促使中共集團平反「六·四」這樣的途徑，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不要忘了，我們是民運人士，我們的大目標是爲在中國建立并逐步完善民主制度，我們就是爲了實現這個制度而發起、參與八九民運的，解決「六·四」慘案，也要遵循民主、法制的原則。爲什麼要沿用中共幾十年、專制社會千百年的方式呢？我認爲，在現今條件下解決「六·四」問題，選擇正確的方式比乞求中共平反要有益得多。選擇民主、法制的方式解決六·四問題，例如要求自由充分地披露真相、多方參加并受全民監督的事實調查、獨立公正的司法審判等，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嘗試。至於中共統治集團是否真心誠意地平反「六·四」，這主要取決於中共統治集團自身。這個羞辱他們要背，就由他們背著去吧。我們祇能通過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而對中共實行政治改革增加外部壓力，而絕不能乞求其平反這個、平反那個。

乞盼中共實行什麼樣的平反？中共在大陸全面執政前後，發起過各種各樣的運動，與這些運動如影相隨的是數不清的冤假錯案。在四九年以前，就有「肅反」、「整風」、「反托派」等等。四九年以後，僅重大的就有「胡風反黨集團案」、「反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鎮壓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鎮壓西單民主

牆、「反對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六·四平息反革命動亂、暴亂」、鎮壓民主黨、「取締法輪功」、鎮壓網上異議人士等等，僅非正常死亡就達數千萬人。對這些事件已經平反的，總的情況是打一巴掌揉三揉，但是不追究、也不可能追究冤假錯案製造者的法律責任，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祇是以「犯了錯誤」、「出現偏差」、「失誤」、「交了學費」等等搪塞過去。這種平反是被動、被迫、含混、敷衍的。例如最著名的劉少奇判徒內奸工賊案及文革中大大小小無數件的冤案，由於文革受害者重新執政，使這些冤案得到平反，受害者得以昭雪恢復名譽，重新工作官復原職，并得到經濟補償，但罪過統統推到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頭上。「右派」平反，有意地留下個別「右派份子」不予公開平反，以證明「反右是正確的，不過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還有許多受害人已死、家庭已散的平民百姓，往往是無人過問，沈冤千古。由於強行農業集體化、文革武鬥等之類看似沒被列入冤案的數千萬死者，中共集團可曾給他們喊過一句冤、補償過一點損失？可曾允許披露過一點兒實情？年輕的中國人不知這十幾二十年前的慘痛歷史，談何吸取教訓呢？所有這些冤案，都成了無頭案，罪過都是帝修反、地富反壞右、敵對勢力、這個那個反黨集團幹的。這些冤案的元凶，至今還被陳屍於紀念堂中，作爲拯救貧愚民眾出水火的偉大聖潔英明的領袖供人民瞻仰，似乎有他一個還不够，還要有更多的效仿者。中國共產黨也從未作過像樣的認錯，謝罪於中國人民，這個黨始終是英明、偉大、光榮、正確的。

早在八九民運被血腥鎮壓後不久，就有這樣的說法：「鄧小平派軍隊是出之不得已，是爲了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大局」，「鄧小平是聽了陳希同、李鵬等人的不實彙報，才作出派軍隊決定的」云云。還有人爲平反「六·四」設計出了原則上肯定、具體上否定（給予平反），原則上否定、具體上肯定，由某某人出面承擔責任等一些方案。最近又聽說，楊尚昆事後私下說：「六·四」事件是中共歷史上犯下的最大的錯誤，等等。我們從中也能看出平反「六·四」如果真做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古人尚知入人園圃，竊人桃李，眾聞則非之。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罪益厚。殺一人，謂之不義；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現代的統治者認爲屠殺人民僅僅是個「最大的錯誤」，能說得過去嗎？我們認可這樣的平反嗎？能要求中共進

行這樣的平反嗎？

平反又能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批判「兩個凡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政權為大多數右派平了反，為在許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害的黨員幹部、人民群眾平了反，請不要忽視還有許多重大的案件並沒有平反。幾乎就在這些平反的同時，中共的新領導人就開始繼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繼續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繼續製造冤假錯案；而且，這樣的事態向更廣的範圍、更深的程度發展，並且一改憑藉行政的、政治運動的方式而為借助「法律」的手段，形成冤案—平反—新冤案—再平反這樣的輪換交替惡性循環。原因很簡單，這樣的平反是由冤假錯案的製造集團進行的。這個集團實行的專制制度沒有改變。他們實行的平反帶有專制性，不是在民主法制意義上的通過公平公正的法律渠道糾正錯判枉判，不追究冤假錯案製造者的法律責任，更不改變形成這些冤假錯案的政治體制。這就給執政者、鐵腕人物維護自己統治、鎮壓政治反對力量保持了一個合適的大環境，使專制統治者繼續鎮壓人民製造冤假錯案的心理得以滋長。讓強盜劊子手給受害者平反，那祇能使作惡者繼續作惡，還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嗎？民運人士能訴求這樣結果的平反嗎？

我決無「六·四」慘案不需要平反、受難受害者不需要公正對待的意思。恰恰相反，這件事絕不能就這樣像歷次冤案那樣悄無聲息或不明不白、糊裏糊塗地了斷。「六·四」慘案事實必須得到徹底澄清並公布於世，必須得到公正合理的審判，慘案的製造者必須得到法律制裁，受難受害者必須得到法律的公正評判和合理賠償。當然，這些訴求的實現，有待於打破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在中國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根本變革、實現這一訴求的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起碼我們不能沿襲封建專制觀念，不能重提「平反」、「正名」、「重新評價」這樣傳統性的口號。不僅是不能提這樣的口號，重要的是不能沿襲這樣的觀念，不能有這樣的訴求。現今條件下，丁子霖等二百多位「六·四」難屬提出的要求比較妥當：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待。民運人士的訴求應該是公正審判「六·四」慘案。

我不贊成「平反六·四」的訴求，但也並不反對廣大民眾「平反六·四」的要求。中共的一些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提出「平反六·四」的要

求，是要有良知和相當的勇氣的，是要冒相當大的風險的。對這種良知和勇氣，我敬佩支持。但是作為在中國追求民主制度的民運人士來說，就不能停留在這個認識水平上。人們的認識程序不同，訴求就不同。要求「平反六·四」的人們，往往是對中共體制和政權抱有相當的希望。中共黨內有希望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改善人權狀況的有識之士，他們也是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的健康力量。但是，到目前為止，看不出專制腐敗的中共有什麼挽救自身的希望，看不出中共有什麼實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中共政權對「六·四」慘案作出了這樣那樣的類似以前的那種平反，也意義不大。法輪功修煉者尚且能够依法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國家起訴鎮壓法輪的中共前任領導人，難道我們追求民主人權法制的人士連法輪功都不如嗎？

說到這裏，有必要提到戈爾巴喬夫提倡的新思維。民運人士應該有與封建專制觀念完全不同的思維。在同專制獨裁體制鬥爭的同時，民運人士應該不斷地審視自己的思想觀念，摒棄千百年來、特別是幾十年共產專制社會灌輸給我們的專制觀念，以符合現代社會民主、人權、法制精神的標準和思維方式思考和判斷問題。

民運人士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大，認識得更深刻。既然是要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奮鬥，那就不能顧慮專制集團的鎮壓迫害。從這種意義上講，因參與八九民運等遭鎮壓迫害，對民運人士而言，就不存在要求平反的問題。原因除本文上面提到的那些外，另外還因為，八九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是客觀的，它不以人們主觀的褒貶而改變，不論說它是「動亂」、「暴亂」、「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還是說它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它的事實和性質都是客觀的，它就是那麼一回事。參加這樣的運動，矛頭直指中共專制腐敗的統治，必然要遭到專制統治集團的血腥殺戮和殘酷迫害。這一點，從專制制度下生活過來的人，都應該明白。民運人士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和思想準備，去面對這樣的鎮壓迫害。應該明白自己做了些什麼事，不要聽別人這樣說那樣說，就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產生懷疑動搖。更沒必要捶胸頓足，「悔不該當初」。受到這樣的鎮壓和迫害時，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但不應動搖變節，也不應過多地花費時間精力考慮自身的遭遇，而應把時間和精力放到追求大目標上。「讓別人去說吧，走自己的路。」

「六·四」遇難者和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因為追求民主、參加民主運動而遭難受害。從宏觀上講，這些人得到公正合法的待遇，有待於中國打破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祇要國內外、體制內外一切有志於推動政治改革、創建民主體制的力量合成一氣，共同奮鬥，這個目標一定會達到。像韓國審判盧泰愚、全斗煥，德國人民審判昂納克，國際法庭審判米洛舍維奇一樣，中國人民終將會把鎮壓八九民運、製造「六·四」慘案的凶手置於歷史的審判席上。這一天已為期不遠了。

學 運 贊

凜凜千古

烈烈英魂

大哉生命

取義成仁

孫 國 棟

自從四月中旬，北京學生發動愛國運動，兩個月來，如春雷乍響，震驚全球。電視報章，不斷傳出使人驚心動魄的畫面——百萬人和平請願、三千學生大絕食、以一人血肉之軀攔截十八輛坦克、幾千人并肩攜手橫眉冷對著機關槍口、在軍隊重重圍困下而興辦民主大學……對著這些壯烈的場面，中華兒女仿佛感到一次民族的呼喚，再一次觸及到了民族的靈魂！不但炎黃子孫被感動，全球有良心正義的人莫不同聲讚嘆。所以這次學生運動，其波瀾之壯闊，無疑的超過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學生運動，而其遭遇之慘痛，亦超越世界史上任何一次學生運動！

用絕食的方式要求與政權對話，用攜手靜坐以迎接坦克機槍的圍攻，不要求絲毫個人的私利。而自我犧牲對政權作死諫，這是何等莊嚴、何等勇敢、又何等高貴的行誼！他們為了民族的前途，不惜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所以這次學運，它的目標雖是政治的，但其意義，已遠超越政治。它顯露出人格的光輝與尊嚴；它向

全人類表示，中國青年實秉賦一種高貴的品質；它洗去近年來世人認為大陸上的中國青年都無情、自私、祇向錢看的壞印象；它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高貴品質的民族；同時證明中國文化有其極可珍貴的一面。連美國總統布什也被感動，他勉勵美國的青年去效法北京學生的道德精神。

道德不是循常蹈故，它是發自內心一番最真切的感情。維其情之至切，於是可以摒除一切利害得失、生死榮辱，用赤裸裸的心去擁抱正義的行為，故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既足於內，無待於外，所以道德行為并無固定的格式，更未必與流俗的觀念相適合。以血肉之軀，擋冷酷的坦克巨輪，這種大勇行為，豈合乎流俗？三千學生絕食，至休克二百餘人，他們對理想追求的堅定，又豈是流俗之人所敢想望？六月四日坦克合圍，以赤裸裸的生命，對冷森森的鐵輪，常人必以為不智。幾十萬軍隊已重重圍困，而競興意辦民主大學，這種圍城講學的精神，又是何等氣度？古人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學生們堅持七星期，在圍城之中，攜手高歌，視生死安危如無物，豈非從容就義？有人認為他們太天真，少不更事、不懂政治。不錯，他們都太天真不懂政治，然正惟其天真無邪、不懂政治，乃愈覺其生命之純潔可貴。凡此種種，皆拔乎流俗而使人歌泣贊嘆、感動奮發，是之謂「立德」。中國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而以「立德」冠其首。「立德」不是流俗中「好人」之謂，必其行誼卓犖不羣，其流風餘韻可以風動百世，使人聞之而興起者。北京學生今日可謂「立德」矣！

我每次在螢光幕前，見到北京學生之軒昂磊落、從容就義的氣概，總不期然於腦際浮現出歷史上踐仁蹈義而死的豪傑義士，而正對眼前的却是些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這羣青年人竟與古往今來的豪傑義士相比肩而絕無愧色，乃不禁為之心折。他們以青春之年而赴死，固然可憫；然而生命的價值，原不問久暫，與其卑微猥瑣而苟且偷生，何如充實光輝、軒昂磊落而赴死！這番道理，惟中國人體會為最深。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既聞道矣，生命已圓滿無憾，則雖死亦何所恨？故踐仁蹈義而死，是之謂「成仁」，所以仁義當前，生死可以輕一擲，此之謂「大生命」。可敬的北京青年學生們啊，你們竟為民族的前途，輕擲其凜然的生命！

兩月前，我常被北京學生的行為感動得熱淚盈眶。

我從事教育多年，自愧德操勇氣，遠遠不如眼前這一羣青年學生，爰草此短文，表示我對他們的欽敬與對死難者的哀悼，并為之贊曰：「凜凜千古，烈烈英魂，大哉生命，取義成仁！」

清明時節雨紛紛

北京 高 月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又到了中國傳統的清明節，人們要祭奠逝去的親人。在北京萬安公墓、福田公墓，有許多亡靈的死亡日期都是同一天：198*年*月*日。他（她）們是被解放軍開槍打死的，死後還被政府指為「反革命暴徒」。每年的清明和死者的忌日，他（她）們的親人都在便衣警察的跟踪下來掃墓。掃墓要被便衣監控，全世界祇在中國有。

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是政府指定的「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198*年*月鄧小平簽署命令，授予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死亡的十二名戒嚴部隊官兵「共和國衛士」稱號，并批准將他們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但是今天，八寶山革命公墓已見不到「共和國衛士」的骨灰盒了，不知甚麼時候早就被撤掉了。官方不敢利用「共和國衛士」的「獻身」經歷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甚至不敢讓青少年瞭解這一段歷史。這是在共產黨中國的歷史上，第一次把榮膺國家榮譽的所謂「烈士」不明不白地趕出八寶山，打入冷宮。在這以前，祇有黨的副主席康生的骨灰曾被勒令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康生在死後被開除出黨）。

以後，看得見的是中共政權的強硬面目，看不見的是民意的潛流汹涌。人民大眾以劃線論是非，以劃線看官員。凡是參加了大屠殺的部隊，哪怕它是戰功顯赫的王牌軍，也為人所蔑視，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朱熔基正是因為說了「歷史終將做出結論」的話才有了民望，儘管他隔天又改口「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

大屠殺的殘暴為上個世紀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南京大屠殺有守軍抵抗，抵抗失敗遭到屠城，是異族入侵。大屠殺是共產黨政權動用現代化的野戰軍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是對本民族的大屠殺，其道德倫理上的

惡劣，甚於南京大屠殺。

大屠殺的元凶、劊子手們，殺人殺得自己都害怕了。他們患上了「劊子手恐懼症」。元凶鄧小平抓緊能抓住的任何一根稻草。過後布什派遣特使伊格爾伯格和斯考克羅夫特訪華；中央電視台滾動播出鄧小平會見美國特使的新聞，以外國人壓國人，為罪責尋找合法性和開脫。鄧小平一再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但他深知自己死後將被人民掘墓鞭屍，嚇得死後屍骨無存。劊子手李鵬在公眾場合一定要抱吻天真無邪的孩子，妄想用孩子的純潔來洗刷自己血淋淋的雙手。

大屠殺對解放軍軍心的瓦解是空前的。那些受到嚴密信息封鎖的軍人愚蠢而殘暴，屠殺過後論功行賞時方才噩夢初醒。評軍功成了數罪惡，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共和國衛士」正是殺人惡魔的別名。那些「共和國衛士」彰顯罪惡，遭人鄙視，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室，成了拷問靈魂的審判台，他們連下地獄都不如，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中共政權對人民無情，對走狗無義，它們連欺騙人民的膽量都沒有了，終於把「共和國衛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

名不正則言不順。官方這種怕見陽光的偷偷摸摸的做法，表明它心虛理虧，不敢正視現實。這凸顯了政府在道義上、道德上，法理上、情理上的徹底破產。共產黨再也沒有可利用的精神資源了。大屠殺的決策者和執行者感到了來自全世界全中國的强大壓力，「人民解放軍」遭到了它建軍以來前所未有的全民的徹底厭惡。當局被迫把為他們賣命的「共和國衛士」掃地出門，也使所有盲從共產黨命令的殺人工具得到教訓；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獨裁政權的決策，是經不住歷史的檢驗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不到；時間一到，一切全報。

歷史自有公論；人間不平事，陰間已分明。「青山有幸埋忠骨，黑鐵無辜鑄佞人」。安葬在萬安公墓、福田公墓的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他（她）們的英靈得到了親人的小心呵護，并為大眾所景仰。他（她）們的英魂將光照千秋萬代，與日月同輝。而那些執行了大屠殺命令的「共和國衛士」已成了孤魂野鬼，不知所終；他們的主子——劊子手鄧小平、李鵬將世世代代為國人所唾罵、唾棄，成為民族罪人。

301 醫院軍醫蔣彥永在今年兩會前夕上書中央，要求為八九年的運動正名，表達了最廣大人民的心聲。歷

史潮流不可抗拒，一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府，就是一個反人民的反動政府。申張正義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凶手送上審判台。沒有懲罰就沒有懺悔。忘記過去，就會使罪惡重演。陰間裏的乾坤扭轉，必定會成為人世間的莊嚴正名。

1989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永垂青史，被劊子手殺害的學生市民永垂不朽。

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 驅散抗議民眾方式之比較

深受愛戴的北京大學「三老」（張中行、季羨林、金克木）之一的張中行教授曾在一篇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參加學生運動的文章中寫道，他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和一群熱血青年一起從北平（北京）南下到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請願。那時雖然沒有抗議遊行的自由，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這些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學生娃娃還是相當客氣的，指示軍警對張中行他們這批和平請願的學生要好言相勸，讓他們返回北平（北京），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如果萬一請願學生以暴力手段威脅到維持秩序的軍警的人身安全時，軍警對學生採取強制措施的底線祇是可以動用繩索暫時捆綁，但一旦送上遣返北平

（北京）的火車就必須鬆綁。由於學生的請願活動都很理性，所以並沒有與軍警發生衝突。事後那些護送請願學生返回北平（北京）的軍警私下和張中行說：「由於長官下達了那樣嚴格的儘量避免衝突的命令，所以我們本來對你們很害怕，但以後看到你們並沒有打罵我們，一個個挺文靜的，我們這才放心了。」

一晃 70 多年過去了，台灣人民從民主憲政中獲得了更多的權利和自由，不但可以合法地舉行抗議遊行集會，即使部份民眾逾時非法集會抗議，政府也祇命令警察柔性勸導，對經再三再四的柔性勸導後仍不肯散去的民眾，警察也祇是將這些民眾抬離集會現場而已。「3.27 總統府廣場 50 萬人大集會的善後處理過程便是明證（台灣警方甚至為了保障攀上高架的最後一個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動用了救生氣墊和消防雲梯）。

反觀共產黨驅散抗議民眾的方式又是什麼呢？眾所周知，人們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中看到的是全副武裝的野戰部隊用機槍、坦克來屠殺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學生、市民！所沒有動用的手段，祇剩下用重型轟炸機向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市民進行地毯式轟炸了！嗚乎！行文至此，我實在寫不下去了..... [博訊網站]

民主德國人民議院 關於六四的兩份聲明

北京 申雪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中共政權空前孤立。即使在前「社會主義陣營」，也祇有朝鮮的金日成和古巴的卡斯特羅跳出來支持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葉利欽要求蘇聯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法國國民議會議長法比尤斯的話集中代表了西方民主國家的義憤，法比尤斯說：「中國政府的行為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冒犯」。

可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從歐洲傳來了一個令人厭惡的聲音，民主德國人民議院公開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的行為表示「支持和理解」；由於它是以國家政權的最高形式——人民議院的名義發表的聲明，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人民議院的聲明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友好的兄弟國家，兩國在十月都將各自迎來建國 40 週年的大典，人民議院的議員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和政府希望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意圖受到違憲勢力的阻礙，因此人民政權被迫使用武裝力量維持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人員傷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將北京事件看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反對任何形式的外國干預。民主德國人民議院的代表堅信：中國政府和人民會共同努力澄清事實，繼續走在 40 年前自由選定的社會主義道路上」。

民主德國人民議院的這份聲明，顛倒黑白，助紂為虐，宣示了中德兩國關係史上最可恥的一頁。這份聲明，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

感情。當時，中共開動所有宣傳機器，一遍一遍地不厭其煩地播放這份聲明，以為其法西斯暴行尋找合法性依據。

民主德國在八十年代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人民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很多民主運動的組織如雨後春筍，民主運動轟轟烈烈，早就成為政府的一塊心病。北京發生的血腥事件，使東德官方和民間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六·一七事件，當時在民主德國由工潮演變成全民抗爭，人民的民主訴求遭到了蘇聯坦克的殘酷鎮壓，有 125 人被打死，2300 多人被捕入獄，18 人被處決。獲得諾貝爾獎的德語作家貢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界》裏記錄了這一天并指出有數目不詳的蘇聯士兵因拒絕向民眾射擊而被槍決。東德國家領導人依然籠罩在過去的陰影中，他們想以支持中國政府鎮壓的方式向本國民眾發出一個明確的警告。當時的黨領導人埃貢·克倫茨在六四過後立即飛往北京，和中國尋求在外交政策上的共同立場。

民主德國的聲明發表後，在東德引起了許多知識份子和學者的強烈不滿，他們大部份人對於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立場表示吃驚和震驚。位於德國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海德里希·奧古斯特·溫格勒回憶說：「這是民主德國政府發給其民眾的一個信號，支持中國的鎮壓是爲了威嚇本國人民。但是這在統一社會黨內部引起了很大的疑惑和失落。我記得我當時在萊比錫講座的時候，和東德的歷史學家們談起人民議院的決定，徵求他們的看法，他們要麼沈默，要麼藉口還沒有讀不予答復。這表明有許多人并不支持國家的決定，甚至有許多統一社會黨的黨員都沒有緊跟黨的路線」。

民主德國的這一公開聲明同時也在聯邦德國和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在反復琢磨統一社會黨的幕僚們到底想要做甚麼？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魯道夫·瓦格納教授回憶道：「當時基本上所有德國的學生、學者和跟中國有關係的人，都認爲東德政府的舉動完全不可以同意。當時東德有很多人從西方的電視台看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慘案的全過程，他們知道政府也可能這樣做。所以他們在以後的示威活動中，第一保持安定，以避免武力；第二希望東德政府中有一些人看到天安門大屠殺在世界上引起的強烈反應及其嚴重後果，期望東德政府不用一樣的做法和壓力對付東德的和平示威活動」。東德有一批知識份子和人權組織一方面組織

人們去東柏林中國使館門前示威遊行，另一方面展開個人攻勢，試圖對東德的內政施加影響。比如當時萊比錫交響樂團國際著名指揮家庫爾特·馬蘇爾看了電視就努力避免在東德發生這樣的衝突。他決定做東德領導人的工作，做自己能作的事。他對昂納克說：「我完全希望你不要做跟中國同樣的事」。受西方文明強大影響的東德斯大林份子，畢竟不同於東方的專制魔王，同時他也瞭解到，東德領導人私下裏認爲「中國政府的行爲完全像一隻失去了理智的野獸」。

原民主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平淡，因爲東德國家電視台和中國政府以及中央電視台站在同一立場上，使得他們無法真正瞭解發生了甚麼事情。原聯邦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學生會主席錢越軍回憶說：「派到東柏林的留學生極少，并完全在中國使館的控制之下，他們所聽到的全部是中國官方的報道，他們本身不是很清楚北京到底發生了甚麼」。與此相反，在聯邦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對民主德國政府愚弄輿論、向民眾隱瞞真相的做法十分不滿；特別對民主德國政府全套照搬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而且通過人民政權的最高機構向世界公開宣布支持中國政府的做法非常氣憤。他們派了三個學生寫了抗議書趕到東柏林，把抗議書遞交給民主德國的內政部和外交部，當時內政部拒絕接受，學生們把抗議信投到內政部的信箱裏；外交部接受了。三人在回西柏林時在東德海關被扣留并被調查，最後還是放回來了。民主德國武裝力量對在中國使館門前進行請願的民主人士沒有採取暴力手段，而僅僅是將請願的人士拘留不到 12 個小時後釋放并罰款 200 到 600 馬克不等的治安管理處罰金。兩德統一後，這些民主人士和曾從西柏林到東柏林請願的中國留學生曾經到東德調閱當時的檔案，卻沒有在秘密警察的檔案中找到他們的相關資料。

現德國聯邦議會基層民盟代表原東柏林教區牧師萊納·埃伯曼這樣解釋東德軍警的做法，人民議院雖然通過了支持中國政府的決議，但實際上他們嚇慌了，色厲內荏；政府變得不知所措，更加謹慎。一九八九年已經有了第一批民運組織，但政府十分不願意直接與人民發生衝突，政府也不願意由於行動激怒西德，因爲在危機時刻能夠提供支援的不是蘇聯盟友而是西德同胞。克倫茨堅持中間路線，還因爲害怕使用中國方案發生內亂，同時戈爾巴喬夫也不會允許民主德國使用中國方

案，因為這樣會打亂他的設想。所以，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層清楚地考慮到如果使用武力會使局勢複雜化，并不一定得到蘇聯的支持。蘇聯的態度使在萊比錫 10 月 9 日的遊行沒有受到軍隊的干預。出於這麼複雜的原因，可以說中國夏天發生的事件對東德秋天發生的和平革命起了積極的影響。

萊納·埃伯曼牧師當時在聖瑪利亞教堂為中國死難學生做紀念彌撒，人們獻上了白花，并且用漢語寫著「我們思念你們，我們與你們同在」。許多東德的普通居民來到教堂，加入悼念的隊伍，他們沒想到共產黨在中國會走到這個地步，愈發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難以維持，因而積極投入到民主運動當中。以為對民眾的要求讓步就可以保持政權，僅僅是一種幻想，幻想屬於沒落的專制政府，民主德國也不例外。

一九九零年六月，民主德國第一次通過全民公開選舉產生的人民議院發表了第二份關於六四的聲明：「對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聲明表示公開道歉，人民議院全體成員，對死難者表示深切哀悼」。中國政府對海外的幾乎所有華語電台進行強大干擾，力圖阻斷這條消息的傳播，至使大部份中國人至今不知道民主德國人民議院關於六四的第二份聲明。

林牧晨提供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抗戰詩選（續）

給 川 軍

——聞王銘章師長殉國後寫——

徐 士 豪

枉在戰場上混了二十幾年，
却無一天你們真正見過敵人的面。
現在，真正的敵人一站在跟前，
你們才第一次明白為什麼要戰。
二十幾年的回憶像一條毒蛇：

你們流過的血，徒然換來舉國的罵。
現在你們要把自己的血重新估價，
「四川」從現在起也要擔起一份「中華」。
門外的世界并不陌生：
每個老百姓都成了你們的親人。
二十幾年來從戰爭得來的怨憤，
現在仍然是給你們泄清。

現在不用再問誰的首領姓劉或姓孫……，
「百家姓」已給戰火融成了一條心！
昔日相打的手現在握得緊緊，
全四川的槍尖祇共支住這一個戰爭！
啊，戰爭！你們是為了戰爭才出川！
你們在征戰中生活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操練，二十幾年的經驗。
就是為了這個偉大的今天！
布一個背水陣在誓節渡邊，
築一座血肉的長城保衛津浦綫。
純熟的技術今天要全部施展，
今天要作一次生平最痛快的戰！
衝！一聲呼嘯，響似沙漠風，
人之流，勝過峽江之水的汹涌，
倒了一個，又一個上去補充，
四川健兒生命的源流沒有止窮！
流血嗎，四川健兒可從不掛念，
這血的雨將要澆息敵人的凶焰！
死亡嗎，這是四川健兒的家常便飯，
四川健兒的英靈還要保衛這江山！
四川健兒今天尋得最偉大的死！
四川健兒今天給四川留下最光榮的史！
四川健兒今天給國家做到最緊要的事！
四川健兒今天給人類寫了最悲壯的詩！
不管我們的戰爭打到十年或八年，
不管我們的人馬祇剩一萬或八千，
我們的四川健兒永遠記住這誓言：
強敵未滅，永不重返四川！

引自《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民前六年【1905】和民國八年【1919】

國父孫中山先生手著

《三民主義》

整理並序

寧仲康

(附：論資本)

這個小冊子，謹精選中山先生於1905—1919共十四年間的講詞和專著，不足兩萬言的三篇經典文獻，經精密分段、調整標題後，重刊面世。奉獻給三民主義者及遠近的朋友們，溫故知新，參考、研究。

第一篇為1905《民報》發刊詞(編按：本刊已於創刊號刊載，此處不再)，是根據中國明成祖掃蕩「黃禍」定都「北京」後，於「歐美之進化」總過程中，由中山先生慎重篩滌而出的「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等到「三大主義」，引進於中國國民革命戰爭的劃時代文獻。

第二篇為1906《民報》週年紀念的講詞。首先宣示三位一體、淨土「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正式降臨於人間，作為中國革命的正前方標竿。是為五年以後1911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誕生、奠基的磐石。

第三篇為1917、民六年，中山先生唯一手著的《三民主義》，微量含有「因應」蘇俄十月革命的作用，但明文指出：「我當懷歐、美的前車之鑑，為我之曲突徒薪，不可學俄人之焦頭爛額」。

其中，民生主義的闡述，約佔全文的一半。這表示中山先生對民生問題的加倍重視。文末附述「論資本」，全文僅約七千字，並不起眼，但質量卻與七磅半的《資本論》八兩半斤。是世上唯一僅有的《資本論》巨毒的解藥。

馬克思的《資本論》精裝三冊而兩大一小，約兩千七百餘頁，以「資本」一詞而三意，論述了三個資本：

1、農工革命資本產品的交換關係

2、極權暴君資本產品的交換關係

3、現代企業資本產品的生產關係

由於馬克思「資本」一詞而三意，致使世上很多高水平的博士專家，窮經皓首白白喪失寶貴的生命。但：

中山先生卻三言

兩語化解得一清二白。

至於《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剩餘價值論」騙局：

A、暗算工人為資產階級

B、消滅工資於可變資本

中山先生雖沒有指明，但祇要知道「資本」一詞，在馬克思運用之下的三個概念，我們自會逐漸領略其大端。

因而，如果把《資本論》看成一個意識形態的鐵鎖，那麼中山先生的「論資本」就是唯一打開鐵鎖的鎖匙。

寧仲康二零零二年九月初於多倫多

一、總論

革命方略之所以不能行者，以當時革命黨人不能真正瞭解於革命之目的也。

革命之目的，即欲實行三民主義也。

何謂三民主義？

曰民族主義、曰民權主義、曰民生主義是也。

中國革命何以必須行此三民主義？以在此二十世紀之時代，世界文明進化之潮流已達於民生主義也；而中國則尚在異族專制之下，則民族之革命以驅除異族、與民權之革命以推覆專制，已為勢所不能免者也。然我民族、民權之革命時機，適逢此世界民生革命之潮流，此民生革命又我所不能避也。以其既不能免、而又不能避之三大革命已乘世界之進化潮流催迫而至，我不革命而甘於淪亡，為天然之淘汰則已；如其不然，則曷不為一勞永逸之舉，以一度之革命，而達此三進化之階段也。此予之所以主張三民主義之革命也。

夫世界古今何爲而有革命？乃所以破除人類之不公平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之時義大矣哉。

滿洲以一游牧部落之少數人，而徵服漢族四萬萬人，壓製之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此天下之至不平之事；而漢族人民欲圖種族之生存，不得不行民族主義者也。

專制君主，本弱肉強食之獸性，野蠻爭奪之遺傳，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視億兆爲其臣僕，生殺予奪，爲所欲爲，此人類之至不平也；而人民欲圖平等自由，不得不行民權主義者也。

自工業革命之後，用機器以代人工，生產力陡增，而歐美工業發達之國，有富者日富、貧者日貧，遂生出資本家之專制，孔子曰：「天下不患貧，而患不均。」是今日歐美文明先進之國，其民族、民權兩問題皆已解決矣，惟民生問題則日陷苦境。資主則日虞生產過盛，苦於銷場；工人則俯仰不給，罷工要值。貧富懸殊，競爭日劇。是知欲由革命以圖國治民福者，不得不行民生主義也。

二、「今請進而論民族主義」

中華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龐然一大民族則有之，而民族主義則向所未有也。

何爲民族主義？即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也。惟其無正義、無精神，故一亡於胡元，再亡於滿清，而不以爲恥，反謂他人父，謂他人君，承命惟謹，爭事之恐不及。此有民族而無民族主義者之所謂也。

夫民族主義之起源甚遠，而發達於十九世紀，盛行於二十世紀，日爾曼之脫拿破侖羈絆、希利尼之離土耳其而獨立、意大利之排奧地利而統一，皆民族主義爲之也；今回歐洲大戰，芬蘭離俄而獨立、波蘭乘機而光復，捷克士拉夫叛奧而建國、查哥士拉夫離奧而合邦於塞維爾亞，亦民族主義之結果也。

民族主義這範圍，有以血統宗教爲歸者，有以歷史習尚爲歸者，語言文字爲歸者，夔乎遠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則以意志爲歸者也。

如瑞士之民族，則合日爾曼、意大利、法蘭西三國之人民而成者也。此三者各有血統、歷史、語言也，而

以互相接壤於亞刺山麓，同習於凌山越穀，履險如夷，尙自治，各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遂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國，由是而成爲一瑞士之民族。此民族之意志，爲共圖直接民權之發達，是以有異乎其本來之日、意、法三民族也。

又美利堅之民族，乃合歐洲之各種族而容治爲一爐者也。自解放黑奴之後，則吸收數百萬非洲之黑人而同化之，成爲世界一最進步、最偉大、最富強之民族，爲今世民權共和之元祖；今出而維持世界之和平，主張人道之正誼，不惜犧牲無數之性命金錢，務期其目的之達者，此美利堅民族之發揚光大，亦民族主義之發揚光大也。

我國人自漢族推覆滿清政權，脫離異族羈厄之後，則以民族主義已達目的矣；更有無知妄作者，於革命成功之初，創爲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官僚從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員五色旗，爲我中華民族之國旗，以爲五色者，代表漢、滿、蒙、回、藏也，而革命黨人亦多不察，而捨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陸皓東先生所定之中華民國之青天白日國旗，而採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爭之不已，而參議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爲海軍旗。

嗚呼！此民國成立以來，所以長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軍所以有常常主持正義也。此民國之不幸，皆中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

夫清朝之黃龍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武員之五色旗，此無怪清帝之專制可以推覆，而清朝武人之專制難以滅絕也。天意乎？人事乎？

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祇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

積極目的爲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爲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治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爲積極之目的也。五族雲乎哉。

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義，而爲積極之行動，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吾不久必能駕美軼歐而爲世界之冠，此固理有當然、勢所必至也。國人其無餒。

三、「今請進而論民權主義」

民權者民衆之主權也。世界進化由野蠻而至文明，心性進化由無知而至有知。天生聰明睿智先知先覺者，本以師導人群，贊佐化育；乃人每多原欲未化，私心難純，遂多擅用其聰明才智，以圖一己之私，而罔顧人群之利，役使群眾，有如牛馬，生殺予奪，威福自雄，一之民，畏之如神明，承命惟謹，不敢議其非者，由是履霜堅冰，積爲專制。

我中國數千年來聖賢明哲，授受相傳，皆以爲天地生人，固當知是，遂成君臣主義，立爲三綱之一，以束縛人民。此中國政治之所以不能進化也。雖其中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又有「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民爲貴，君爲輕。」……「國以民爲本」等主論；然此不過一隙之明，終莫挽狂流之勢。

乃自近代民智日開，又值哥林巴士冒險航海，發現西半球之新大陸，由歐洲之宗教名流、政潮志士，多與湖海俠客、無業遊民，同冒險徒步居於新地，以冀各遂生平之抱負也。以此富於冒險精神之人，不得志於本國，梯航萬里，而至於新天地，以抒其尤勃不平、積久必申之氣，而與其拓殖事業，宜乎其結果爲開發一新政治思潮，而後卒美洲之共和世界。此新世界之共和，則大異乎古昔希臘、羅馬之共和，與夫歐洲中世紀之共和也；蓋往昔之所謂共和者，亦不過多數人之專制而已，而美洲之共和乃真民權之共和也。

夫美國之開基，本英之殖民地而離母國以獨立，其創國之民，多習於英人好自由、長自治之風尚，加以採盧梭之盟約，與孟氏之法意，而成其三權憲法，爲政治之本；此爲民憲之先河，而開有史以來未有之創局也。有美國共和，而後始有政府爲民而設之真理出現於世。

林肯氏曰：「爲民而有，爲民而治，爲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爲一國之主也。國家之元首百官，始變而爲人民之公僕，服役於民者矣。此爲政治之革命也。

美國獨立之後，旋而有法國之大革命，旋而有歐洲之大革命，此皆人類之智識日開，覺悟漸發，而乃知人者皆同類也；既爲同類，則人人皆當得平等自由也。其特出之聰明才智者，不得以詐以力，以奪他人應有之自由權利而獨享之也。其佔據人類之優等地位而號爲君主

王侯與及一切貴族，奪民以自享，皆爲不平等者也；故當推覆之，而平人類之不平。於是十八世紀之末，以至此二十世紀之初，百餘年來，皆君權與民權競爭之時代。從此民權日發達，君權日削亡，經此次歐戰之後，專制之國悉數敗亡，大陸之上幾無君主立足之地矣。此世界政治進化之潮流，而非人力所能抵抗者，即古人所謂天意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之謂也。

繼美國之成文憲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則有瑞士之憲法也。美國之憲法，雖以民權爲宗，然猶是代表之政治，而國民祇得取選舉之權而已。而瑞士之憲法，則直接以行民政，國民選舉之權，有複決之權，有創制之權，有罷官之權（其要領原理，當另著專書詳之）。此所謂四大民權也。人民而此四大權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駕馭官吏，防範官吏，然後始得稱爲一國之主而無愧色也。

予之定名中華民國者，蓋欲於革命之際，在破壞時則行軍政，在建設時則行訓政，所謂訓政者，即訓練清朝之遺民，而成爲民國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權也。有訓政爲過渡期，則人民無程度不足之尤也。乃當日革命黨員多注重於民族主義，而鮮留心於民權主義，故破壞成功之後，官僚則曰人民程度不足也，而吾黨之士又從而和之，曰人民程度不足，不可以行直接民權也。

嗚呼！是何異謂小孩曰：「孩子不識字，不可入校讀書也。」試問今之爲人父兄者，有是言乎？而革命志士自負爲先知先覺者，即新進國民之父兄，有訓導之責任者也；乃有以國民程度太低，不能行直接民權爲言，而不欲訓練之以行其權，是真可怪之甚也。彼輩既承認此革命後之新國爲中華民國矣，而又承認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於國民全體矣，是即承認四萬萬之人民將必爲此中華民國之主人矣；而今之行政首長，凡百官吏與及政客、議員者，皆即此四萬萬人民之臣僕也。既爲其臣僕，而又敢公然曰：「吾之主人知識幼稚，程度太低，不可直接以行其主權也。」以是故也，予所以有訓政時期之主張；而此輩又群起而反對之。

予又試問：今之所謂志士黨人、官僚政客者將欲何爲也？既不甘爲諸葛亮、文天祥之鞠躬盡瘁以事其主，又不肯爲伊尹、周公之訓政以輔其君，則其勢必至大者爲王莽、曹操、袁世凱之僭奪，而小者則圖私害民爲國之賊也。此非民國所宜有，當歸天然淘汰之列也。

觀歐洲百餘年來之政治進化，人權競爭，其始也，

少數聰明才智之人以自由平等為號召，而革獨頭專制君主之命；及其成功也，則此少數人又從而行專制，其為禍更烈於君主之專制也，而大多數人又起而革此少數人之命，必至政權歸於平民而後已。

今之武人官吏乘革命之賜，幸而得有高位，而不盡心民事者，勿以人民可欺，而能久假不歸也。世界潮流，天然淘汰，必無幸者也。

民國之主人，今日幼稚，然民國之名有一日之存在，則顧名思義，自覺者必日多，而自由平等之思想亦必日進，則民權之發達終不可抑遏，此蓋進化自然之天道也。順天則昌，逆天則亡，此之謂也。

四、「今請進而論民生主義」

(一)

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貧富不齊，豪強侵奪，自古有之，然不若歐美今日之甚也。歐美自政治革命而後，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於工商事業，經濟進步，機器發明，而生產之力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資本之優勢者，悉成暴富，而無土地及資本之人，則轉因之謀食日艱。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則貧富之階級日分，而民生之問題起矣。

此問題在歐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非至發生社會之大革命不止也。

俄國已發其端，德國又見告矣，英美諸國將恐不免也。惟中國之於社會革命也則尚未種其因，如能思患預防，先為陡薪曲突之謀，則此一度之革命，洵可免除也。此民生主義之所以不得不可行也。中國之行民生主義，即所以消弭社會革命於未然也。

夫社會革命之因，何從而來也？曰從機器發明而來也。

歐美自機器發明而後，萬般工業皆用機器代之。夫用機器以羈勒自然之力，如汽力、電力以代人工，本可減省人之勞力，應為造福於人間，而何以反生出社會之痛苦？所以然者，則機器之發明而施用於工業也，乃突如其來，而社會之舊組織一時不能為這變更，亦不知為之變更，故無從應付也。為資本家者，祇知機器之為利，而不恤社會之被其害也。

今試以織業言之：當昔用人工以織布，每人日織不過一丈，使有資本家，日雇千人為之織，日出千丈之布，其所給工值，假設為每人一元，此一元之工值，當與織

工獨立自織之價值相若也；倘所差太甚，則織工必不願受資主之雇，而必自織其布也。蓋以人工作業之時，則工人容易自行獨立以營業，而資主不能為之壟斷也。惟一旦以機器代人工，則生產至少可加十倍，前以千人日祇出布千丈，今則用百人而出布千丈矣。倘使銷場如故也，則用手工生產之時，資主當雇千人，日給工資千元，乃能出千丈之布。今用機器生產，則布仍為千丈也，而工則減去九百人，祇用百人而已足。此百人之工值，若仍其舊也，則資主前費千元者，今費百元已足矣。或更有甚者，則前用手工生產之時，工人能退而自營其業，不專靠資主之雇以謀生活也；惟今失業之百人，若退而自營其業，則彼手工之生產，必不及機器生產價值之廉，是工人萬不能與資主競爭，則惟有仰給資主以為生活，資主所需一百之工，則有千人貶價以爭雇，前之工值一元者，今或半元而已有受雇者矣。

由此觀之，用手工生產之時，所出千丈之布，工人所得工值為千元，資主日獲利亦設為千元；今用機器生產，所出布千丈，工人所得之值不過百元，甚或至五十元，而資主今之獲利，每日增加九百至九百五十元矣。如是則工人立形困苦，其不遷徙流離，則必坐以待斃而已。倘若銷場擴大，則資主所備，仍不減千人，工資如故也，而機器之生產，則人加十倍，前之每日出布千丈者，今可出布萬丈，而資主每日之利則九千元。倘市場更增，資主能雇用萬人者，則日能獲利九萬元，而工人亦不過日獲一元而已。一家如是，家家如是。一業如是，業業如是。市場愈大，機器愈精，則資本家之勢力愈宏厚，而工人則生產愈多，而工值愈微。此機器代手工生產，泰西學者所謂工業革命者也。

(二)

工業革命之後，資本膨脹，而地價亦因而大增，蓋機器之生產事業利於集中，故城市首先發達，以易致工人也；其次則煤鐵之場，製造事業亦以繁興，蓋便於取料也；其三則交通之地，工廠亦隨而林立，以便於運輸也。凡有此三要素之地，工業必從而發達，人口則為增加，以等工業繁盛之城市，其地價之增加，有畝至十百萬元者。而地主多有承先人之遺業，不耕不織，無思無維，而陡成巨富者，是地主以地增價而成資本家，資本家以工業獲利而成大地主；城市之地，固盡為此輩所壟斷，而附廓之田，亦為之所收買，漸而至於郊外之沃野

荒原，亦陸續爲此輩佔有。由是地價則日增，而工值則日賤，蓋工人欲退而歸農，亦無田可耕，則耕亦不能償其租值，於是更不得不全靠工爲活矣。

工業愈進步，商業愈發達，則資本案與地主之利愈大，而工人則窮苦矣。此歐美工商發達，經濟進步後所生出社會貧富階級之情形，而社會革命之所以不能免也。

中國近代進步雖遲，似有不幸，然若能取鑑於歐美之工業革命、經濟發達所生出種種流弊而預爲設法以杜絕之，則後來居上，亦未始非一大幸也。顧思患預防之法爲何？即防止少數人之壟斷土地、資本二者而已。

中國自廢井田而後，土地雖歸私有，然因向以手工爲生產之具，而資本尙未發達，地價亦尙未增加，故尙少大地主，及今而整頓土地，猶易爲力。故同盟會之主張，創立民國後，則繼之平均地權，尙能達此目的，則社會問題已解決過半矣。

平均地權者，即井田之遺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滯而不可複用，則惟有師其意而已。

中國之工商尙未發達，地價尙未增加，則宜乘此時定全國之地價。其定價之法隨業主所報以爲定；惟當範圍之以兩條件：

一、所報之價，則以後照價年納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以爲地稅。

二、以後公家有用其地，則永遠法此價收買，不行增加；至若私相賣買，則以所增之價，悉歸公有，地主祇能得原有地價，而新主則照新地價而納稅。

有此二條件，則定地價毫無煩擾欺瞞之弊，蓋此二條件，爲互相牽制者也。

倘使地主有瞞稅之心，將現值之地價，以多報少；假使在上海市之地，有值萬元至十萬元一畝者，地主以值十萬元一畝之地而報價萬元，則值百抽一之稅爲百元，若十萬元一畝，則值百抽一，其稅爲千元矣。如此於瞞稅方面，地主則得矣；惟政府可隨時範圍之以第二條件備價而收買其地，其原值十萬元一畝，今照彼所報納稅之價萬元而收買之，則地主食虧九萬元矣。

又倘地主有投機之心，預測公家他日必需其地，將現在所值百元一畝之地，而報其價至十萬者；如此則於公家未收買其地之先，每年當納千元之稅，如此則利未見而本先虧矣。故於兩條件範圍之中，地主當必先自訟而後報其價值，則其價值必爲時下當然之價矣。

此辦法較之英國數年前所行之法，利便多矣。英國自議院通過地價稅案之後，政府特設估價衙門，以定全國地價；而又設控訴衙門，以理控訴，倘地主有不以估價衙門而定之價爲公平，可控訴之。由控訴衙門複加裁判以爲定，其煩擾爲何如耶。

夫照價抽稅，較之現行之照畝抽稅，其公平與不公平，真有天壤之別矣。照畝抽稅，祇分上中下三等而已。設有郊外田一畝，其價一元，而抽其下稅若干；又有市內地一畝，其價一萬，而抽其上稅若干。上稅與下稅之所差，不能過十倍也，而其價值之差，即一與萬之比也，使農民之負擔賦稅，比之市民重一千倍矣。

是照價抽稅者，質而言之，即減輕農田之稅耳。且先定地價，而待經濟之發達，則公共之事容易舉辦，而能收大利矣。今以一事證之：

如中國交通運輸之事業發達，則凡於鐵路集中之地，水陸交會之區，大市鎮必從而生焉。以中國之大，此種新市鎮，當必得百數十處也。如國家爲之經營，照現價以收買其地，辟以廣大之衢，設備公用之具，如自來水、煤氣、電燈、電話等事，則數元一畝收來之地，一轉瞬間，至值必加至千倍或至萬倍矣。此等所謂不勞而獲之利，倘公家不收之以爲公用，則必入於私人之手；一入於私人之手，則必生出社會之不平均，而害隨之矣。經濟家之言，生財之元素有三：土地、人工、資本是也。中國今日地大人衆，倘知採民生主義之計劃，以謀工業之發展，則資本易致也。資本與民生主義之計劃，下章繼續論之。

(三)

中國土地之問題，自廢井田而後，以至於今，無甚大變者也，雖農民之苦，較井田時或有加重，然人人得爲小地主，則農民之勤儉者，均有爲小地主之希望，而民生之路未盡絕也。惟歐風東漸，我之實業革命，工商發達，亦勢所必至，則以後亦成爲有者益有，而無者益無，此時而欲由小農而成小地主，欲由小工而成小資本案，爲萬不可能之事矣。如此則民生之路絕矣。歐美各政治先進之國，而經濟革命之風潮則澎湃鼓蕩而來者，此也。所幸者，我中國今日尙未經實業革命、資本發達之階段，未雨綢繆，時哉勿失。

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其簡便易行，既而如上章所述矣；今專就資本之問題，以求解決之方。

歐美資本之問題，激爭數十年，而未能得良法以解決者，初以資本之發達，為世人所不及料，故由不知不覺而盡入少數人之手；是猶政治發達之初，而政權歸少數人之手，同一理也。而其平之方法，則必待多數人之覺悟，而決心為大犧牲，不惜殺人流血，始能達自由平等之目的也。

今歐美之苦工農民，已全數覺悟矣，而猶未能解決經濟問題者，何也？以此問題之解決，其煩難當有百十倍於政治問題也。

為此故也，則我當懷歐美前車之鑑，為我之曲突徙薪，不可學俄人之焦頭爛額也。

夫惟我之資本尚未發生也，則我防患未然自易；此中國之後來居上，將必為世界第一富強安樂之邦之大希望也。道在今日之仁人志士、先知先覺之行而已。

五、「今請進而論資本」

經濟家之言曰：資本者，勞力之所獲，以給其需要之餘，而用以為生利之需者，則為資本者。如農之餘粟，工之餘布，用以交易其需要之外，而複用之以廣其田園，增其器械；此農之田園，工之器械，則謂之資本也。以此田園、器械能多生其粟、多出其布也。倘此農工以其所餘，而易肥馬輕裘以自娛，此農工之肥馬輕裘，則不得謂之為資本也。是故如家中之飯，設備以自給者，不得為資本，而飯店之設備以應沽，即為資本矣。由此例推，筐中之衣服，富室之汽車，皆不得為資本；而縫店之衣服，車店之汽車，即皆為資本也。

夫資本者，生產三大元素之一，其始也，凡勤儉之小工，以其餘財而再圖生利者，皆能為資本家；及機器之興也，則以一人而用機器，可作百十人之工，則不獨小工永絕為資本家之希望，而小資本家亦難以自立，而見並於大資本家，而大資本家又見並於更大之資本家；由是大魚食細魚，遂生出歐美等國資主與工人之兩階級，貧富之懸殊，乃以日而甚矣。

歐美資本發達後，其為患於社會如此其大者，以歐美土地問題，未能於資本未發達之前而先為之解決，故地主與資本家二者合而為一，如虎如翼，其橫暴遂不可制止矣。

今各國政治家之解決社會問題者，亦必先從土地問題著手；雷佐治之於英國施行土地照價抽稅之法是也。

然英國資本之發達，已百有餘年矣，而全數早已悉落私人之手；故當民國建元之前後，已施行土地照價抽稅之法，而七八年來，社會競爭之問題依然激烈也，同盟罷工之風潮依然不止也。

惟當此次歐戰發生之後，英國曾為社會突飛之進步，鐵路海運，俱收歸國有，而一切製造工廠，亦收歸官辦，以供給軍用品也。

惟今後戰後經營，英國其能力排資本家之優勢，以順世界之潮流，而進英國為一集產之國家乎？抑仍受資本家之握制，而退歸私人之所有也，此今後之一大問題也。

（上接第 77 頁）

量無謂的犧牲和損失，甚至連經營 10 年之久的寧滬杭國防工事也在大潰敗中一槍不發地放棄了，而上海的潰敗直接導致了南京的慘劇（編者按：實際上蔣介石決心為之上海會戰，多少是有作者所言之“情緒”在內的，不過更是為了打給這個沒有公理的世界看的。但這都不是蔣的主要動機和戰略。事實是，正是三個月上海會戰的慘烈和與之配合的京漢、津浦、京包三線由北向南的節節抵抗，及其慘烈犧牲，才真正地將日寇“三月亡華”的狂夢破滅了，從而達成了前期抗戰以“時間爭取空間”，即遷移大後方、保護大後方以備長期抗戰的目的。這才為以“空間爭取時間”的抗日戰爭總戰略的勝利奠定了基石）。

客觀地說，蔣介石是一位有著嚴重缺陷的領袖人物，重大的戰略失誤也斑斑可考，但我認為，蔣介石面臨民族大義的歷史關頭時，其表現起碼是合格的：他畢竟堅持抗日而沒作汪精衛，為中國在聯合國爭到了否決權，退居台灣後雖「複國」無望但仍嚴厲鎮壓台獨，雖然丟了外蒙但屬於上當受騙更隨之反悔，西藏一直抓得很牢……這些都是明擺的事實，所以蔣介石 1931 年的「絕對不抵抗」，絕不是白送滿洲給日本——他是要搶回來的。

抗戰勝利後，蔣派人到美國國會去要錢打共產黨，并囑咐使團官員留心美國的山川風土政治民情，說將來萬一兩國決裂開戰，可資情報之用。可見蔣是確實是一個愛國主義的領袖，這也是他不可能做汪精衛的原因。

最近，終於讀到了《誰是新中國》的全本。也讀到了朋友悄悄送來的黃花崗雜誌第八期。竟夜之讀的結果，就是壓抑不住地想寫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就用“辨識新中國，還原蔣介石”。

——作者

一、《誰是新中國》一書的 歷史性挑戰意義

《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確實具有歷史性的挑戰意義。理由如次：

第一、對二十世紀所創建的兩個新中國，不僅明確地提出了“誰是新中國”的歷史命題，而且明確地肯定“推倒了滿清、創建了共和”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新中國”，而毛澤東和共產黨推倒民國所創建的“共和國”，則被作者視為“專制倒退”，視為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又一段“復辟亂世”，是對辛亥革命的“徹底反動”，是“假新中國”。雖然它打著革命的旗號，並且歷時長久，猶如前蘇聯一樣。立論觸目驚心，令人為之一震。

第二、該書提出了區別真假新中國的“兩個共同標準”，一個就是“愛國和賣國的標準”，一個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誠如作者所言，“就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和判斷而言，這個共同的標準，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愛國和賣國的標準**。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主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曲求全者，就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找到了這個標準，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

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像，辨別事情，回答種種的污蔑和詬難”。作者提出這兩個“共同標準”的意義，實為“真假兩個新中國的創建歷史和統治歷史”，豎起了檢驗的標尺；為在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徹底擺脫“黨派”立場，特別是擺脫“我黨”的立場，帶來了嶄新的、並且是可信的理論根據。顯然，這兩個“共同標準”的創立，絕非“一夕之功”。

第三、《誰是新中國》一書對中國現代史實的公開揭露和深入辨析，特別是根據歷史的基本事實，對歷次重大事件所進行說理思辨的成功，確實有力地推

倒了“我黨”八十年來所制造的種種歷史謊言，證明了“我黨”制造中華民族大倒退的不堪歷史，予人震聳發聵，令人不堪回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對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之滿卷“不抗日、假抗日和真擴張、真磨察”之透骨揭露分析，將使我們每一位“認真”學習過毛主席著作的人汗顏。

第四、由《誰是新中國》一書所建立的“中國民主革命史理論體系”，特別是“革命與復辟”的原創性理論，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世界民主革命歷程的高度一致性，第一次對世界範圍內民主過渡的反復性、複雜性及其普遍的倒退過程，提出了精準的理論見解。它足以提升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促使國人認清我黨在“革命名義下復辟專制制度”的本質，更使我們看到了專制復辟終將會被推倒、民主共和必將重新降臨的真理目標。這個理論的建立，是一件大事，是我們中國的學者首創的，猶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說它是對世界近現代歷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甚至是為研究世界近、現代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和全方位的理論視角，應不為過。

第五、不待言的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它在中國現代歷史的幾乎所有領域，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明確、徹底和成功地推倒了中共革命和建國的理論與實踐，都明確、徹底和成功地重新打通了中國人民自己的革命建國

辨識新中國

還原蔣介石

北京 史可航

道路。這個道路，猶如作者所言，就是孫中山的道路，就是孫中山道路在中國的重現和發展。客觀地說，為尋找這條被我黨用人民鮮血阻斷的道路，二十年來，作者和無數的大陸學者都是共同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的。

二、質疑《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依據從何而來？

就我們在國內所知，目前讀過這本書的人還不多，因為它很難進入國內。該書在海外出版已將五年，但“我黨”尚未對這本書組織過一篇批判文章。至於海外，據說雖然“圍堵重重”，但迄今亦似乎沒有出現對該書的真正挑戰，祇有在網上謾罵的，或有個別民運人士公開對它執行否定“判決”，屬於“一言定性”，不是講事實、說道理一類，就是說根本不存在學術批評。但這本書的影響卻不脛而走，不僅在海外引發了震動，更在國內引起了震撼。它的理論，已經在國內知識界和民間廣泛流傳，配合著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歷史反思，甚至已經在讀者中產生了高度的共鳴。許多讀過該書的人，似乎都有“惡夢初醒”或“眼前一亮”的感覺。特別是在歷史劇《走向共和》既播又禁之後。這種情形，自然也已經引起當權者的詫異和不安。

但是，並非不存在對該書的質疑。而質疑《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主要依據，筆者以為，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來自“我黨”革命建國以來長期製造成功的社會思想文化觀念：一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因半個世紀的強行灌輸而得以普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則因半個世紀的隔絕，甚至祇與曾遭遇殘酷鎮壓的“反動黨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惡名相連”，早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朦朧的、陌生的、甚至是陰暗的思想”。而共產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孫中山的革命則是資產階級革命、或“舊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是失敗的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則是勝利的革命；中華民國是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新中國等等；就更是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因謊言支撐著我黨的“一言堂”，而成為“歷史的定論”，或曰“思想的堤壩”，巍峨高聳，令人望而生畏，決然沖撞不得。

二是“我黨”自建黨以來，即全面批判、否定中華民族歷史和中華民族文化；“我黨”在掌權之後，又持續否定中華民族歷史和否定中華民族文化；它顯然已經造成

一種嚴重的歷史文化惡果：不僅早已將毛澤東曾在延安批判過的“言必稱希臘”的“黨風”，改變成為“言必稱馬列”的“國風”；它甚至早已成為我們中國人“數典忘祖”和“數典思馬”的思想習慣，或曰思想方式。

三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共產黨為人民”的宣傳，早已成為普及全國、甚至普及世界的“歷史政治概念”，輕易動搖不得。

四是對“蔣介石是獨裁者”和“毛主席是大救星”的宣傳早已深入幾代人心。即便對毛澤東是不是大救星，當代人已經十分明瞭，甚至對毛痛恨有加，但一般人對“蔣介石是獨裁者”卻是深信不疑。因為蔣早已被毛“批臭”了，加之“毛近蔣遠”，蔣家王朝早已滅亡，毛家王朝尤在。

上述四大社會思想文化觀念的造成，自然會使得一些人，在突然讀到一本要明確、徹底地批判與否定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毛澤東和共產黨，反過來竟要為孫中山、蔣介石的革命建國翻案，甚至“橫加歌頌”，自然就會產生一種本能的抵制，有的自然會感覺痛苦和厭惡。而在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沒有讀過《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人，或是根本就不想讀的人，或是一聽到這個書名，就覺得莫名其妙、沒有好感的人。

第二，就是我黨在長期不準他人說話的前提下，系統地、持續地編造歷史、製造謊言，使得我黨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解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北伐和抗日是共產黨領導打”的；“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國民黨不抵抗”等等；諸如“中山艦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西安事變”、“皖南事變”、“沈崇事件”、“李公僕、聞一多事件”、“王孝和事件”等等，長期以來，祇有我黨“定論”的權威，沒有別人指陳的權力。所以，由對這些歷史事件的“長期紅色宣傳”，所產生的對蔣介石、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痛恨情緒，和對共產黨的無邊好感，實為外人與後人所不能想像。加之，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知識份子是有基本的、或是起碼的新聞言論自由的，民間的報紙電台、通信社，比比皆是。三、四十年代文人對當權的國民黨蔣介石的公開批評、批判甚至是謾罵，自然就成為共產黨宣傳國民黨是反動派、蔣介石是獨裁者的“歷史證明”。自然，很多人是不會去想“國民黨蔣介石為什麼給他們罵？讓別人罵的本身說明了什麼？共產黨毛澤東給他們罵嗎？共產黨和毛澤東又是怎樣不給罵的？”而製造社會觀念和進行謊言宣傳的

結果，便是中華民國是舊中國，中國國民黨是反動派，蔣介石是獨裁者……這些結論對於《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來說，恰好都是它要推倒的，翻案的，所以，一個在知識結構上、思想情緒上已經長年為共產黨所左右的人，對這本書聞之即發生懷疑、甚至發生惡感，便不能以為怪，因為是共產黨剝奪了他們對歷史的知情權。但是，一個讀者若能夠懷著平常心，先看完書再說，大概，他有的便是震撼甚至是痛苦了。因為他會發現，自己居然會被騙了這末久。這就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力量所在。

第三，就是“我黨”對學術研究的長期控制和鎮壓，對知識份子實行持續地殘酷洗腦，造成了一派虛假和荒唐的學術局面。首先，“人必學馬列，言必稱馬列”，這對於研究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無異於是一個“緊箍咒”。思想因自由才能獲得的創造性，皆因此而泯滅；任何學術研究的成果，不過是成了證明“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一顆“螺絲釘”。

其次是為符合馬列思想、我黨政策，制造學術謊言，司空見貫，非但見怪不怪，而且有苦不苦。其間，從不安到麻木，再從麻木到無所謂，直至從無所謂到“理所當然”，中國幾代知識份子中的大多數人，已經達到了在學術上“講大話、假話”，非但不知恥，而且振振有詞的“學術高度”。所謂習慣成自然。

這種情形，也影響到了二十年的歷史反思，影響到正處在痛苦反思和深沉反思中的歷史學者、甚至是各界學人。祇因為想把真話講出來，所以又不得不“加上”假話，或又不得不保留原有的某些假話，或無論如何都要在表面上先守住“我黨”的立場，這就使得唯有知情的讀者才能解其真假、甘苦和“曲筆”，而不知情的讀者就渾然難知其孰為真話、孰為假話了。幾位從台灣和海外回來的學者，就曾直接問過筆者本人，“在你們的書里，究竟什麼話是真的、什麼話是假的呢？我們實在看不出來……。”對此，我們祇能苦笑，雖然我們自己說得清，可是他人讀不懂。應該說，《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實為中國十餘年現代史反思（1985-）的集大成者，除掉作者所建立的理論高度和極富思辨的才華之外，他在立場和敘述上的明確與徹底，應該說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和一大功勞。但是，如果該書作者沒有去成海外，並敢於放手寫作，那末，除掉他祇想藏之深山，否則，他也祇能為出版而一樣地要“藏頭去尾”、“真話假話”難分了！

這是必然的。

再則，謊言寫進了教科書，謊言便代代相傳，豈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血為肉，其遺禍之深，能夠想象。後輩學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聞《誰是新中國》則驚者，也有聞《誰是新中國》則喜者，亦有聞《誰是新中國》而“不可思議”、甚至表示“絕難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乾脆、徹底、明確地將被“我黨”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實在是觸動、也觸痛了許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慣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

三、質疑《誰是新中國》的焦點在於蔣介石一身

有一個問題是十分值得我們思考的。那就是，從對《誰是新中國》的很少負面批評中（指已經形諸於文字者），蔣介石似乎成了該書挨批的“焦點”。因為，在批評該書的人中，幾乎沒有人敢公然地將作者肯定和維護孫中山革命建國的思想道路，來作為他們攻擊的目標，卻都是把該書對蔣介石肯定太多和頌揚太過，來作為他們批評的方向。海外某種人士“我黨”式的語錄體定性批判，雖不足道，但即便是充分肯定該書的國內青年讀者，雖然並不否認該書所陳述的關於蔣介石的業績和事實，卻也有人認為作者對蔣介石的評價“太高”。然而，幾乎所有讀過這本書的人，真正被震撼的，又恰恰是書中對蔣介石和共產黨歷史關係的徹底翻案和明確辨析。這又是為什麼？

第一，是因為“我黨”革命的主要對像和實際對像，就是蔣介石。或曰，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才是我黨要集中打擊、徹底推翻和消滅乾淨的敵人。為此，我黨從思想、理論、歷史“事實”、甚至是“文學藝術”上，都對蔣介石進行了“不擇手段”的反復宣傳和長期宣傳。如前所說，這個宣傳，在一九四九年前，採取的是統戰和包圍的作戰方式，即利用形形色色的反蔣勢力，和蔣介石、國民黨所給予的種種自由，以達到宣傳“要打倒蔣介石”的目的；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則是在絕不允許任何人說話的前提下，對蔣介石進行批判、否定、謾罵，甚至是全方位的人身攻擊。包括運用文學形式以進行長期的丑化和污蔑，比如由我黨廳局級作家唐人受命赴香港寫作和出版的那本“金陵春夢”，其謠誑之大膽無限，污蔑之深廣久遠，也是一個“史無前例”。由此，蔣介石及其獨裁者的形象，

在幾代中國人的心目中，豈但早已被“定論”，而且早已被“定型”，猶如京劇的臉譜。為蔣介石翻案的難度可以想像。現在，突然出現了《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在其對歷史事實的論辨中，不僅充分地肯定了蔣介石，否定了共產黨，而且稱他為“民族英雄”，且為大陸學者所著，它所造成的刺激、震撼和懷疑，可想而知。

第二，是因為我黨利用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特別是“成王敗寇”的傳統文化。或如《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所言，是利用了我們民族文化中的非優秀成份，以一個勝利者當然是正確的和進步的，一個失敗者當然是錯誤的和反動的為理由，制造了“打贏了的共產黨一切都對，打敗了的蔣介石一切都壞”——這樣一個所謂的“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個“真理”一旦又擁有強權的長期維護和殘酷維護，蔣介石作為獨裁者、反動派和“一切都錯、都壞、都反動”的形像，也就無可反駁和無人敢駁了。《誰是新中國》一書畢竟是在中國歷史學界、思想學界和廣大民間進行了十餘年反思之後才得以在海外成書出版的，如果該書“有幸”早出世二十年或更早，則全中國大概從上而下都一定都要召開各種各樣規模不一的批判鬥爭大會，甚至全國人民都主動地要站起身來“口誅筆伐”的。然而，畢竟時移代遷，“今不如昔”了。

第三，是因為說到底，還是由於我黨在思想學術以及一切領域的長期獨裁專制，才造成了我們人民、甚至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徹底無知”。雖然這個無知由於二十年的歷史反思而日漸“開化”，但，知者依然很少，不知者依然很多；膽大敢言的依然很少，膽小不敢言的依然很多；就不說那些遠離國土、完全不了解國內人民反思之艱難和成就的海外人士們了。所以，由於對基本歷史事實的無知，由於恰恰祇對我黨自話自說的“黨史”有知，所以，當《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問世之後，才會造成某些人的痛苦。這種痛苦之所以比震撼來得更叫人受不了，其根源，還是來自該書對蔣介石的徹底翻案，而且翻案之確實有理。因為，畢竟事實勝於雄辯。至於非要以徹底否定蔣介石來否定《誰是新中國》，甚至端出的理由就是“沒有蔣介石的獨裁，哪有毛澤東的獨裁”，說到底，還是“無知”而已。因為，這一類的批判家，祇要將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述並已經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一類反思毛澤東和我黨歷史的著作，找來讀一讀，稍稍了解一下上個世紀三

十年代，在蔣介石被左派文人在報紙上公開罵作“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歲月裡，毛澤東又是怎樣效法斯大林獨裁專制、殺人如麻和陰謀起家的事實，批判家們就不會硬要將毛澤東和蔣介石拴在一起，也更不會把“毛澤東獨裁之罪”禍為“蔣介石的獨裁之功”了。當然，也就不會如此輕率地既要跟著“我黨”繼續否定蔣介石，又要以否定蔣介石來徹底否定《誰是新中國》這本書。

第四，就是台灣中國國民黨的逐漸變性，台灣中華民國越來越呈現的深重危機，台灣學界的缺乏遠見，和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們的缺少真知，特別是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由於政治、經濟和學術研究環境上的不可能一致，所帶來的“認知迥異”，不僅為中國民間反思自己的現代歷史帶來了外在的困難和困境，甚至也帶來了評價《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不同立場和出發點。其中，有的雖可以理解，有的屬於正常的批評，有的則與我們中國大陸民眾的立場和利益背道而馳。

總而言之，正是《誰是新中國》一書根據基本歷史事實對蔣介石的大膽翻案，才從根本上帶來了該書的震撼效應；相反，恰恰也是該書對蔣介石這個失敗者的重現認識和充分肯定，又惹來了對該書的所謂負面評價。雖然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學術現象，卻深藏著由《誰是新中國》一書所帶來的一個歷史性陣痛，所發軔的一場歷史性較量。它不僅預示著“還原蔣介石和辨識新中國”，乃具有極其重要的關係；而且，由它所包含的，“還原了蔣介石，才能夠辨識新中國”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內容，已經成為我們的歷史使命。

歷史的挑戰，已逢其時。

讀者反饋《誰是新中國》

……誰是新中國？這個問題可以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從苦悶和困惑中猛醒和覺悟過來……青年時代我也十分認真，而且虔誠地閱讀過毛澤東選集，（以及一些馬列文件），可是當我看了您對三卷與四卷的區別進行分析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豁然開朗的徹悟。您說出了我心中長久鬱悶沒有找到的感覺。毛澤東根本無意於抗日，純粹是集蓄力量，以備奪權。從這一

點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的長期本質：從來就把一黨的集團利益放在高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

歐洲 彭小明

「爾品的著作中，搏動著一種歷史的良知，澄明著最難的一段歷史。我們為他的堅韌、洞見和苦難中的承擔精神而驕傲。若有機會，代我們問好和致敬。」餘略。

大陸 老友

辛教授；……您的書和思想我和朋友一直在推廣，我希望中國人能儘早的覺醒，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同時在您的書和思想讓大陸人知道的時候，也是您最危險的時候，我很害怕中共會有什麼下三爛的手段危及先生的人生安全，這是我最近最放心不下的。希望您能保重，也要做相應的防範。

請先生注意身體和安全。

一位大陸青年

辛教授您好；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受到極大的鼓舞，更堅定了我為國父之三民主義在全中華的實現而奮鬥的決心和信念。更堅定了我在反對共產黨邪惡專制道路上前進的力量。希望您能教給我更多的知識和力量，為我在大陸宣傳和調查作努力。看了您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我感慨萬千。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完整的接觸中國近代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的謊言歷史……

大陸一青年

我把您的書和演講錄音，還有黃花崗雜誌下載後給我的朋友看和聽，他們聽完後的一致表現，是無法接受這個嚴酷的事實……共產黨的真理在他們心中破碎了……

大陸青年 思樹

2003年12月18日

謝謝您的回信。我看了您在新唐人電視台的三集系列片，對您的人格產生了由衷的傾佩和深深的敬慕。中國當前，缺少的正是您這樣的人。明哲保身者祇能說是

先覺者但也祇是歷史的匆匆過客而已。真正為了人民的疾苦而探索終生的人才會永遠活在每個良知者的心裏。歷史終會把最有分量東西留下來。祝您身體健康，也為您做出的貢獻代表全體蒙昧的或是良知的國人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動。我想買一本《誰是新中國》但如何彙錢呢？

……再次感謝您於百忙之中看我的信。

柳偉義 於東北某地

辛老師：您好！

我剛剛在呂家平的個人主頁上找到了一篇：江澤民的歷史和入黨時間等問題應該調查。其中有兩段話我附在了這封 email 的結尾。

我認為這兩段話所揭示的問題值得研究，因為眾所周知，抗日期間，國統區有很多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學生組織。那麼我的問題就是：在淪陷區是否有這樣的組織。我希望您有時間能夠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並寫一點文章。因為我想這個問題可以直接論證您在《誰是新中國》中的很多觀點。

雖然，您在那本書和您的演講裏已經談論了很多歷史，足以否定我所學過的歷史課本。但是我認為對於罪惡應該進行最徹底的揭露。任何符合事實的揭露都不是多餘的。

大陸留美學生 賀辛

編輯您好：

我在 boxun.com 上讀了辛老師的《誰是新中國》，辛老師的很多觀點我非常贊同，但是他竟然數次把四行倉庫說成五行倉庫（包括他在新唐人的訪談節目裏）把「以空間換取時間」說反了。我認為這樣的錯誤不因該發生在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身上，這樣的錯誤祇會降低整本書所述歷史的可信性。

賀辛

附 辛灝年覆信：

賀先生：你好！編輯部將你的信立即轉給了我，謝謝你的來信和很重要的意見。你的第一個意見是完全對

的，这是我的错误，而且是习惯性错误，我一定改正，也希望你能告诉你认识的朋友，帮助我改正。《谁》书正要再版，你提的正是时候。你的第二个意见，我想向你解释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于整个抗战的总方针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但对第一期抗战的方针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自津浦、京广、京包三线的节节抵抗，到上海保卫战，直到武汉保卫战为止的第一期抗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都是在转移东南物资和建设西南大后方，为持久抗战、即为实现“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作准备。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个人研究的一点心得。我在书中，便是这样写的，也许我没有特别强调，所以才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从国内带着资料（两万张卡片）出来，为不打草惊蛇，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孤独地完成了此书的，书中尚有一些错误和错印的地方，特别是几个人名，虽然不多，但仍然是错误，这次再版均将予以改正。如您在阅读中又发现了错误，务必尽早告诉我。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也是真心地感谢您。祝好！

作者敬致

親愛的辛灝年先生：

您好！我是上海的一名剛畢業的學生，看了您的著作以後覺得和我原來所想的不謀而合，也有些是我所不瞭解的。您說的很對，我們真的需要民主。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其腐敗，極其殘暴專制的政黨的領導之下！一直以來這個政黨就善於欺騙善良的群眾，愚化百姓，殘害異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沒有多少人是支持這個黨的，全國更是如此。我們需要自由，我們會團結起來爭取自由的……我看到了你們的電視節目，但是在光盤中看到的。我想訂購《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不知你們的地址，就是出版社的那個行不行，錢怎樣寄過去才能收到？我不知能不能和你們取得聯繫，我非常想要看到那本書。

辛教授：您好！

讀了您的書，有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但我和很多人一樣，覺得您對蔣公的評價似乎過高了。即使您所說的都是事實，但也不適合在當前的形勢下表達出來。我們需要給蔣公平反，但由於中共長期的誣衊和詆毀，蔣公的形象并不太好。（接右下）

“不抵抗命令， 是我下的”

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 2004 年第一期發表
張學良自述：（1990 年 6 月 8 日，張學良接受日本 NHK 電視台記者採訪）

曾景忠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學良的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裏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 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

（接下頁）

（接左下）蔣公被認為是一個獨裁者。過高評價蔣公不利於我們爭取廣泛的支持，會被人們認為我們要復辟蔣公時代的獨裁制度。

這祇是我的一點個人意見，我一直是非常尊敬蔣公的，蔣公在中國的現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並且無可替代。
大陸 江士勇（第二封信）

我看了辛灝年關於《誰是新中國》的陳說的時候。我震撼很大，雖然我對共產黨那一套早已經不相信了。但是有機會對自己國家的現代歷史有更加客觀的瞭解。我感覺受益很大……我討厭共產黨。共產黨是個靠俄國人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黨，他竊取了民國政府的政權，把剛剛建立的民主思想扼殺掉了，還假借革命之名實行獨裁專政。我相信將來的中國也會出現像孫中山一樣的先賢，或者更多像他那樣有著民主意識的人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日本 陳勇義

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并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作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台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學良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 1990 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 6 月 1 日，台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學良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我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回憶錄捉刀」（按：這是海外“炒新聞”，事實並非如此）。1991 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開始了）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 年 5 月 28 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 8 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

曾給張學良 10 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電函，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倫敦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于鳳至手中，說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註）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够，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

蔣介石不抵抗嗎？

為蔣介石翻一案

選自大陸網站

上學的時候一想起 9.18 就對蔣介石恨得牙根癢癢，總覺得那「絕對不抵抗」的手諭簡直是混蛋無耻到極點，五分之一的大好河山便那樣拱手相送，其賣國行徑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僅憑這一條，蔣介石之罪該萬死，幾乎可以蓋棺論定了。

然而，痴長了幾歲後，我對蔣介石的這段醜史却有了一點體諒。我知道這話講出來立馬會被亂磚拍死，不過畢竟不吐不快，說出來如果有不對，也好請大家趕快懲前毖後，把我這漢奸苗頭扼殺在繯襪中。

首先，蔣介石為什麼「絕對不抵抗」？這種不可思議的赤裸裸的「賣國」決策是憑什麼做出的？我們的教科書一直說蔣介石是要專心「剿共」，沒心思抗日。我認為這有點抬舉當時的中共了，1931 年的紅軍才幾萬人，裝備低劣，活躍於三不管地帶，蔣雖然仇恨共產主義，「剿共」積極而且“殘忍”，但說中共是當時蔣最大的威脅却言過其實，中共的威脅遠不如那些表面「歸附中央」，實際蠢蠢欲動的割據軍閥大。1931 年距東北易幟（蔣名義上統一中國的象徵）不過 3 年，而席捲半個中國的「中原大戰」剛結束 1 年，國內滿目創痍，百廢待興，國家機器尚不能有效運作，統一的局面也不穩定，可以說彼時的中國，不論經濟，政治，軍事都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而蔣的「領袖」地位也不鞏固，根本沒有把握指揮全國的割據力量與日本做決死戰。在這種局面下，如果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中國幾乎是毫無成算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蔣介石更多地是考慮到當時中國尚無能力與日本決戰，如果勉力為之，恐有滅頂之虞，因此才「忍悲含憤，函待國聯解決」。（蔣 9.18 後對民

眾的講話），而實際上，從 1931 年起到 7.7 事變，蔣的確在背著「賣國」罵名苦心經營戰備：抓緊修築寧滬杭國防工事，購置西式軍火，聘請德國「教習」訓練軍隊，組建德式機械化師，拉攏收編割據勢力，鞏固中央地位（剿共也可看作是努力的一部分），同時國內經濟和基本建設也有了初步積累，使中國初具現代國家之雛形。正因為蔣介石的這些努力，中國才能在抗戰爆發後動員數百萬大軍與日寇做殊死搏鬥，并重創日軍，使其速亡中國的計劃破產。儘管如此，從戰爭的進程看，中國的實力仍和日本有較大差距，戰爭初期一路喪師失地，半壁江山淪落敵手。從中國軍隊的不濟，我們可以設想假如這場戰爭爆發於 1931 年，中國可能連重慶也守不住，損失、犧牲會更大。可見，東三省的放棄，可以看作是一種戰略上的退却，是為進一步有效的反攻爭取時間，積累力量。毛澤東棄延安老巢於不顧，拱手讓與胡宗南，人人都說高明；列寧當年也曾與德國簽定平等條約；蔣守東北，雖不敢說「高明」，但自知之明還是有一點。蔣介石到「強盜俱樂部」國聯告狀，似乎是笑柄，但國聯雖然沒有懲戒日本的實際行動，畢竟通過了譴責日本軍事行動的「李頓報告」，使日本在道義上處於不利地位，而未能短時間內把中國拉入全面戰爭的深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駐守東北的是非嫡系的張學良部。後來蔣讓張學良去進攻紅軍，有人說蔣是借紅軍來打擊異己部隊。但蔣介石為何不拿東北軍去喂更為強悍的日軍呢？那樣即可以更有效地「打擊異己部隊」，又能贏得「抗戰領袖」的美名，何必讓東北軍「完整地躲進關內呢？可見蔣的妥協的確是從中國的全局考慮，避免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并非出於一己私利。

我不知道蔣介石從 1931 到 1937 年承受「賣國」的罵名，心情是否很痛苦。當然蔣是領袖，可能承受力較強，但我覺得蔣是有點委屈的，這從抗戰初期蔣介石在淞滬會戰中不顧一切地與日軍硬拼就可以看出些端倪。蔣幾乎拼光了中央軍的精華（包括苦心經營的德式樣機械化師），并反復對部下大喊：「把日寇趕到黃浦江裏去！」其對日本怨恨之深，復仇願望之強，與 1931 年的退讓正成鮮明對比，連毛澤東都批評他是不切實際的「速勝論」，看得出他極欲洗刷「賣國」的罪名。可惜這一次他又太急了，淞滬會戰中義和團式的蠻幹造成大（下接第 69 頁）

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一個人成年後的心理問題往往是童年和幼年時期某種經歷的結果，這種影響甚至不為本人所明確感知，而成爲「潛意

對一個政權的心理分析報告

曉 黑

識」。對夢的解析，就是對潛意識的破解。假如我們將中共政權也比擬成一個具有人格的個人，那麼，我相信，中共的政治經歷和歷史記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的觀點、態度和政治選擇。它甚至畫地爲牢，完全生活在自己狹隘和偏執的潛意識當中。

首先，我們在中共的政治話語中，常常聽到對於「議會民主」的輕蔑。這不僅來源於其信奉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中對議會制的排斥，也來源於中國歷史上那一段短暫而不太成功的議會民主實踐所提供的一個負面例證。中國在成立民國到蔣介石建立全國政權這一段時間內，一直實行著一種表面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就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專制統治的國度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儘管議會制是協調社會各方利益衝突的一個有效安全閥，但由於當時社會階層財富和教育水準差別太大，能够真正在議會這種外來的政治體制中發出聲音，進行民主運作的人，暫時祇能是少數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西式思想以及有相應經濟資源的精英層。而其運作，必然十分欠缺成熟的一面。這一點，便成爲自稱代表工農的中共攻擊議會民主「虛偽」的一個例證。袁世凱對於國會的敵視和解散，宋教仁的被刺，以及後來曹錕時期的賄選又更加深了中共對合法的議會鬥爭的懷疑和否定，加強了對暴力的迷信和依賴。事實上，同是袁世凱的暴政，對於孫中山和中共的衝擊是不一樣的。雖然孫中山決心依賴武力討袁，但他對憲政和議會民主本身的信仰並沒有改變。袁的行爲，在孫中山看來是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的反民主體現，在中共的解讀中却更是議會民主軟弱無用的表現。中共每次提到「西方式議會民主」的時候，它所指涉的對象其實不過是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時期這個極不成熟的、也不太成功的國會制，

它的視野爲這個例證局限，從不願意去理解一個成熟的議會制度在西方甚至日本如何有效地發揮了作用。每次面臨來自民間的呼聲時，它就把這個經過它解釋的、自以爲是的「歷史經驗」，拿出來嚇唬別人，試圖阻止對議會制的追求。然而問題是：中共爲什麼就不能走出自己狹隘的歷史經驗，像孫中山那樣，研究世界上成熟和成功的議會制，思考它們在中國大地上的可行性？

第二，中共還經常用「軍閥混戰」來說事，比如嚇唬大家說，搞民主就會回到「軍閥混戰」的混亂局面云云。這個法寶也常常奏效，吸引不少人，因爲大家都不希望軍閥混戰，於是也就覺得維護「穩定」和「統一」是理所當然的。這一方面顯示出中共的歷史記憶中，軍閥混戰的慘烈局面一直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另一方面，用軍閥混戰作藉口，却證明中共的歷史觀其實是混亂和腐朽的。1920年代的中國軍閥是在帝制崩潰後，無法建立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時軍人執掌政權的現象，是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並不是永恒不變的現象。社會和民主制度的進步完全可以將軍閥混戰的社會和物質基礎從根本上消除，這在別的國家也做到了。日本實行憲政制度後發生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戰國局面嗎？沒有。難道中國今天仍然處在一個隨時會軍閥混戰的局面下嗎？人們完全可以對此提出問題：21世紀的中國，誰是軍閥？誰跟誰會混戰？大軍區與大軍區之間還是軍兵種之間？爲什麼假定一旦沒有了中共，就會軍閥混戰？歷史的重復難道是不可避免的嗎？軍閥混戰是民主造成的還是專制瓦解而民主還不健全引發的？退一步說，假如今天中國真的存在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唯一的出路也祇能是軍隊國家化。因爲祇有軍隊國家化才能從根本上制止軍人干預內政的軍閥化傾向，而軍人干政正是20年代軍閥混戰的制度本質，但軍隊國家化恰恰又是中共死也不肯的。於是中共陷入了一個邏輯怪圈：祇能依賴更加强有力的政權干預去防止中央控制一旦崩潰後的混戰局面。它既不設法從積極的方面採取法制措施來根本上消除這種落後現象萌生的可能性，一邊又拿著其實不堪一駁的「歷史教訓」來加強其極權的合法性。一個聲稱「與時俱進」的政黨爲什麼始終對一百年前的社會現象耿耿於懷，擔心重來？

第三，當李鵬在1989年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提到「革命先烈」的時候，不僅僅在提及他自己的父親，同時表現出死去的先烈是中共的歷史記憶中至為慘痛的一幕。對民主運動的鎮壓被解釋為維護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共和國”。在中共的記憶中，充滿了因失去政權和主導權而被殺戮的恐懼，毛時代對「復辟」，對「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描述，就是這種恐懼的具體寫照。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中共覺得天下最恐怖的事情莫過於喪失政權，因為其結果必然是又一次被殘酷的血洗。在這一點上，中共其實深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影響。即：它堅信「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古語，根本不相信在現代國家中，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是可以受尊重，也可以通過合法途徑東山再起的。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共絕對不肯、也不敢在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祇敢以毫不妥協的姿態將對手徹底打垮。他也無意建立一個與自身以外的力量互動的遊戲機制，因為它潛在的相信，對手的得勢一定是建立在將自己置於死地的基礎上。假如執政黨一直秉持這樣一種零和遊戲邏輯，中國在政治上實現現代化的希望將非常渺茫。

第四，擔心文革重演的文革情結。這種同樣貌似合理的藉口一再重復了上述那種被記憶折磨的迫害狂心態，也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群眾心理。中共元老在1989年的危機中，曾反復提及「文革」。因為文革中被迫害和羞辱的記憶如此深刻，以至作為個人的元老們，如彭真、薄一波，有理由認為在1989年等待他們的又將是一次災難。80歲老人們的恐懼情有可原，但他們的邏輯仍然是荒誕的。首先，發動文革的並不是學生而是他們自己供奉起來的偉大領袖，領袖利用學生的狂熱來打擊他們，最後又拋棄了學生，他們的憎恨却留在了學生的身上，而在當時，最凶狠猖狂的紅衛兵也恰恰是他們自認為「最可靠」的嫡系後代。另外，在政治老人的直覺中，80年代的學生一定會用過去那種殘酷的方式對待他們。但是，他們忘了，60年代學生的殘忍的世界觀正是他們自己教育的結果，而80年代的學生已經把他們灌輸的東西嘔吐出來，提出了理性與非暴力這種他們想都不敢想的口號。事實上，89年的學生想要建立的，正是一個以啓蒙主義理想為基礎的，平等和尊重個體的制度，而這個制度絕對不尋求對這些高齡老人進行從靈魂到肉體的報復。

然而，對於老人們來說，這種深刻的內在變化是他們的「智慧和經驗」所不及，也不屑於去瞭解的。對他們來說，祇要學生上街，就是文革，祇要他的專車遇到阻塞，就是無政府主義。

綜上所述，中共對「歷史重演」的恐懼和對不愉快的歷史記憶的反復強調，暴露出中共並沒有對於社會進步和民主的真正信心，不相信社會是在向前發展的。在宏觀理論層面，它似乎信奉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進步”觀點，但由於共產主義前景的暗淡，骨子裏它已經退回到中國固有的一治一亂的思維模式和歷史會重演的「螺旋狀」發展模式。負面的歷史記憶和過時的解釋主宰著中共的政治和歷史觀，折磨著它的神經。特別是在當前，由於正面信念缺乏，既沒有毛時代的自負的理想主義，又不接受理性人權的價值觀，它祇能懷著焦慮，一再地去歷史的垃圾堆裏尋找負面的「教訓」，再試圖用膚淺和粗陋的解釋方式，聳人聽聞地展示給大眾。它所能提供的不再是「可以」怎樣怎樣，而是「不能」怎樣怎樣。如同一個給別人帶來恐懼的人，他自己首先就生活在絮絮叨叨的恐懼和自我折磨之中。

「解放思想」與「放寬政策」

由中共的口號剖析中共專制統治的反動性

加拿大 辛明

編者按：從中共製造的一系列概念出發，辨析它的虛偽性和荒唐性，著名政論家辛明先生開始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澄清工作，其意義非同小可。因為，我們許多朋友，至今仍然陷身在共產黨概念的怪圈之中，甚至仍然在運用著共產黨的概念，“追求著人民的民主和解放”……

中國共產黨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但在實際上是卑鄙、虛偽、殘暴的黨。它的一貫作風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為了掩飾其反人民的反動罪惡統治，它提出過許多動聽的口號，都是它的智囊們的嘔心瀝血之作，

表面上自然冠冕堂皇，但是祇要進行一番分析，我們就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某些口號，正在不打自招地供認著它的反動性。筆者在此僅以中國共產黨在後毛澤東時代喊得最多的兩個口號為例，來論證其反動性。

一、“解放思想”

進入後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思想方面喊得最多的口號是「解放思想」。思想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它的基本屬性就是海闊天空的、無拘無束的、自由放任的、千姿百態的。正是基於思想在本質上就是自由的這一屬性，人類才有別於動物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才成了世界萬物的主宰。在後毛澤東時代，「解放思想」居然成了政治思想領域裏的一個重要任務，這說明中國人民的思想長期處在被束縛、被壓迫的非自由、非自然狀態。而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就是進行思想束縛和思想壓迫的罪魁禍首。

從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起，它就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全中國人民進行思想上的閹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宣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宗教教義，祇許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許人民質疑和批評。接著，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反右傾、社教四清等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人民的思想閹割得越來越徹底，越來越乾淨。中國人除了信奉馬列主義邪教之外再沒有別的活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把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一掃而空。毛澤東思想被林彪吹捧成了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任何人，哪怕是由於口誤筆誤，說出或做出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或行動，就會立即被當作現行反革命份子逮捕。當時的中國，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全國人民的頭腦，十億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思維能力。唯一的一個衰老的、狂妄的、自私的頭腦控制了全中國人民的思想……在毛澤東死後，他「親自選定

的接班人」華國鋒還想用「兩個凡是」繼續死死地束縛全國人民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剝奪中國人民的一切，連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的權利都徹底剝奪，其統治之嚴酷是史無前例的。

思想的本質屬性就是自由，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大張旗鼓地「解放思想」，這等於不打自招地向國際輿論和中國人民供認了它多年來閹割中國人民思想的滔天罪行。黨國領導人洋洋得意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口號，他們沒有考慮過，他們對此沒有絲毫值得驕傲之處，反而應該對全國人民真誠地悔罪。

何況，實際情況是，哪怕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號，中國共產黨仍然不容許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展開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把「解放思想」當成政治思想領域裏的重要任務。但是，他還是要以毛澤東思想做幌子，在一黨專制下來發展社會主義招牌下的資本主義（美其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項原則就是「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哪裡是「解放思想」？充其量也祇是「鬆寬思想」而已！

江澤民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則更為荒唐。在他的授意下，《人民日報》於2001年年底居然發表了題為《從思想解放中統一思想》的社論，把「思想解放」和「統一思想」這樣兩個互相排斥的概念，變成了互為因果的關係。「思想解放」指的是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主義中把思想解放出來，而「統一思想」又是要把思想統一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同語反復的詭辯，週而復始的怪圈和原地踏步的騷動，在黨的第一號喉舌上以社論形式發表，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方面已經不信仰馬列毛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須拿馬列毛思想當旗幟來保持其統治的合法性。這種兩難困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一個對祖國對人民犯下了深重罪孽的黨，而且是一個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徹底破產了的黨。

二、“放寬政策”

進入後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叫得最響的口號是「放寬政策、搞活經濟」。黨國的智囊們提出這個口號的時候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在這裏告訴了世人，黨的政策與國民經濟從來就是對立的。祇有把政策放寬，才能為經濟鬆綁，才能把經濟搞活。這個口號在客觀上不容置疑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本質上就是束縛經濟發展的，毫不含糊地默認了它在經濟政策上的一貫失誤，儘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許沒有意識到它的這一層含意。

在獲得解放後，農民分得土地時的笑臉還沒有來得及綻開，中國共產黨就把分給他們的土地又收走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體出工、公共食堂，農民一步一步地、越來越嚴重地變成了黨國的農奴。在“解放”前，農民租種地主老財的土地，起碼還可以自己決定種什麼、何時種、如何種、何時收？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黨國的計劃經濟統管一切，農民連最起码的自主權都喪失了。1958年是一個豐年，他們祇能眼睜睜地看著成熟的莊稼倒在地裏、爛在地裏，却要去砍樹、找礦、大煉鋼鐵。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出了豐產不豐收的「人間奇蹟」。接著，在隨後三年裏，他們被活活餓死或者餓得半死不活……文化大革命中逼迫老百姓搞「窮過度」，下蛋的雞、擠奶的羊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少得可憐的一點點零花錢一直是靠在雞屁股裏摳、在羊奶子裏擠的，現在居然也摳不成、擠不成了！但是他們還要跟著中國共產黨高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麼多年的煎熬中，中國農民居然能夠活下來，居然還能傳宗接代，延綿至今，這簡直是生物學上的奇蹟。

城市裏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50年代初就實行了「統購統銷」。1956年倉促完成了「三大改造」，實現了全國範圍內各行各業的公私合營。資本家開始還叫資方代表，還拿一點定息。後來資方代表取消了，定息也沒有了，大家都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工人比資本家強一點，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但是，除了這個空洞的頭銜，他們還是一無所有。一切都由黨的計劃經濟統管著。由於黨是被至高無上的黨魁所領導的，因此黨的計劃經濟實際上是聽命於黨魁個人意志的雜亂無章的無計劃經濟。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工程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過

一會兒又再上馬……到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就更加亂了章法。毛澤東一聲號令，「各行各業都為鋼鐵元帥升帳讓路」，什麼都可以停下不做，全民大煉鋼鐵。結果「超英趕美」的目標沒有實現，倒是出現了近百種票證，其中最重要的是糧票——因為全國人民一起餓肚子了（毛澤東也有幾個月沒有吃肉，改成了吃海鮮！）。

餓了三年，剛剛過上半饑半飽的生活，毛澤東又急著要奪回旁落的權力。1962年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6年乾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過搞亂全國，從下至上地推翻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來重建他個人的封建王朝。「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雖然從第一天起就寫在《十六條》裏，但是在十年時間裏，幾乎沒有幾個人認真看待過它。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然熬過了漫無止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地球上，這也可以算作政治學上的奇蹟。當然，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中國早已被開除球籍了。不過，這是一句假大空的話。誰也不能開除具有13億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球籍。

西方一位經濟學家說：「如果說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那麼它就是一種專門破壞經濟的經濟制度。」中國（和其他所有既往的和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證明了這是千真萬確的至理名言。哪怕是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搞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招牌下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還是永久性地處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中。黨的「放寬政策、搞活經濟」，並不能使中國的經濟良性發展。

出路在哪裡？出路在於取消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國，名副其實地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在中國共產黨仍在頑固地堅持其一黨專制的今天，筆者無法斷定實現這一轉變需要多長的時間。但是筆者現在就可以肯定地說：「解放思想」與「放寬政策」這兩個口號在客觀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反人民、反歷史前進的反動本質，在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無意識中對自己所犯罪行和過錯的不打自招的供認。它們正在不停地左右開弓地抽打著中國共產黨的耳光。而中國共產黨似乎還

在為這兩個動聽的口號而得意和自豪，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模樣是多麼難看和尷尬。

誰能阻止 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革命？

南京 鄭易

編者按：來自一位大陸青年的文章，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深具洞察力，對自己的民族懷著深深的憂心，更對中國人民應有的進步方向——孫中山的道路，抱有堅強的信念，這篇文章，不可不讀。

中共還會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嗎？那就要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的覺醒是否了，覺醒的程度如何了，覺醒的力量是否堅韌而不拔了！

文化大革命是留給所有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我們大陸人祇知道文革是錯誤的，那個年代是罪惡的，但很少有人去反思，文革為何會發生，它的目的和思想的來源在哪裡。在我拜讀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後，思想逐漸醒悟。結合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我覺得文革有其必然性和重復性，願意在此和大家共同探討。

一、左翼文人對文革發生在思想上的促成因素

中華民族經過國父與共和革命先烈（不是共產革命先烈）的不懈努力，終於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並在中華的土地上第一次起草了人民當家做主的臨時憲法《臨時約法》，建立了自由民主的體制，成立了自由的中華民國。

但幾千年專制的殘渣餘孽思想，並不可能隨著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就可以馬上消亡。而恰恰此時袁世凱和張勳的復辟，導致以魯訊為代表的左

翼文人認為，祇有徹底推翻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思想，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起新思想和新文化，專制復辟的事才不會重蹈，中華才会有希望，這就是新文化運動。魯訊先生在此思想下構思和完成了其代表作《阿 Q 正傳》這本著作，不僅僅打擊了人的皮肉，更抽擊了所有中華人的靈魂。然而魯訊先生忽視了，以阿 Q 為代表的當時大多數中華人的思想和行為，不過是幾千年專制統治遺留下來的殘餘，即使沒有新文化運動，隨著自由民主體制的不斷深入和完善，中華將不會再增加阿 Q 的數量，阿 Q 自身也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逐漸消亡。

二、左翼文人和中共法西斯專制的本質區別

更可悲的是中國人把共產主義當作左翼思想，把共產主義和左翼思想混為一談，把左翼思想和共產黨的法西斯專制混為一談。而不是加以正確區分。

也正是因為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支持，才會讓大陸民眾在中共的連哄帶騙下上了它的賊船，復辟了專制體制。

在左翼文人的鼓吹下，“推倒重來論”已深入人

心，導致在毛澤東發動文革時，由於他的陰謀、狡詐和殘忍，而得到了大陸大多數人的“支持”。但當左翼人發現共產黨的“推倒重來論”並不是自己所需要時，都在驚呼“不要”時，為時已晚。毛澤東不僅僅要在文革中整垮政治對手，也要對左翼人進行壓制，這就是所謂的“引蛇出洞，



關門打狗”。同時更要繼續徹底地消滅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重新建立一個符合共產黨專制利益所需要的共

產法西斯文化，這就是“破四舊、立四新”，可謂一石三鳥，實在是高明。終於，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罪惡，在左翼文人的無心鼓吹下，在中共的有心實踐下，終於將禍水潑向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毛澤東不是說過“如果魯訊還活著，他應該待在監獄裏”。由此可見，左翼思想和共產法西斯的思想在本質和性質上都是不同的。

同時左翼文人忘記了，他們自己就是在相對自由之民主體制下的產物。在專制體制下，祇存在專制文化和禦用文化，是不存在左翼思想文化的，這也是中共在掌權前要利用左翼文人、掌權後卻要打左翼文人的原因。

三、文革後的反思和對大陸社會造成的影響

文革帶給了所有大陸人心中抹不去的痛，特別是經歷和參加者，憑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子女，不要相信共產黨，不要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拼命掙錢，不擇手段放棄良知地去掙錢。這就是導致大陸道德倫理敗壞的思想來源，也是現在大陸社會動蕩，人心思變的根本。

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成了大陸自由民主的催化劑，雖然遭到法西斯鐵蹄的野蠻鎮壓，但大多數的大陸人開始覺醒反思了，甚至反思到了我們的前輩怎麼會做出如此錯誤的選擇。反思同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就是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從這本書裏，我們知道了過去，現在和應該選擇怎樣的未來。同時，我們是否現在就應該做出自己的選擇：爲了民族的大義，爲了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仁愛和均富的國家，而義無反顧的投身於反對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洪流之中呢？還是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繼續做“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奴隸呢？

我將《誰是新中國》的書送給大陸有名大學的一位近八十歲的教授看，這位老共產黨員看過之後的評價是：公正，事實，客觀。

有位文革的參加者曾對我談起：“他先參加保守派保衛毛主席，結果站錯了隊挨整。毛主席說造反有理，他又聽從毛主席的召喚去參加造反派，結果文革結束後中央的評論是兩派都錯了”。他總結了共產黨的

言行談到：“不是我錯了，是共產黨錯了，是共產黨製造和領導下的專制體制錯了”。

在一次喝酒聊天時，他對我袒露：“不要相信共產黨，更不要相信共產黨的謊言。對待共產黨并從中得到最大利益的方法是，把黨和領導的話當聖旨，要順著黨和領導的意圖去說話，要討他們喜歡，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說自己心裏想說的話。黨和領導要你去做的事，明明知道是錯誤的，也要毫不猶豫的按領導的意圖去做，如此如此……在自己受到提拔，可以掌握控制一些人、財、物時，要抓住機會，爲自己留條後路，中共的專制體制肯定是要垮台的。”

四、中共為維護其專制統治必將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

隨著共產主義謊言的破滅，法西斯反動集團的洋務派鄧小平上台，隨之推行了改革開放。大陸人這時候才瞭解外面那個被中共描述成“人吃人”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出國留學，出國經商，出國考察，讓一部分大陸人瞭解了自由民主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外資，港資台資進入大陸辦廠經商，也讓大陸人知道了我們和他們的思考方式差別是如此之大。

真的如中共所說，社會主義專制體制有無比的優越性嗎？或者竟是他們自由民主的國家地區才更有優越性？現在的世界到底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是自由與獨裁，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呢？大陸人的頭腦裏充滿了問題，隨著不斷的思考和求證，部分有文化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大陸人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到，我們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區別是：我們是專制國家，專制體制鉗制了人的創造力，所以我們的國家貧窮落後，而發達國家則相反。

大陸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思不僅僅帶動了部分人民的覺醒，更損害了中共的專制利益，動搖了其政權的合法性。讓自由民主傷害到中共的專制利益，這是中共絕對不能容忍的。洋務派的原本之意並不是要在大陸實現自由民主，讓中國走上持久和平發展富裕的道路，而是要加強自己的專制統治，攫取其一黨一族的利益，好讓中共馬列黨族永享榮華富貴。中共的這種思想爲文革的再次發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爲了維護自己的專制利益，在人民逐漸覺醒下，中共有以下三種選擇。

1、欺騙。極力歪曲污蔑所有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法制。但這一方法，在大陸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越來越具有清醒追求的認識下，想靠欺騙來歪曲誤導，對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大。

2、收買。把已經或在覺醒的知識分子收買進專制利益之中，讓他們為一黨的專制權力和利益服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覺醒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中共不可能全部地和完全地收買成功。

3、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如果大陸人繼續反省，越來越多的大陸人知道了真相，在中共的謊言騙不下去，直到威脅其專制制度和利益時，文化大革命的再次爆發將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或許有人對中共抱有不合實際的幻想，認為通過對話，中共的自身改造，人權寫入憲法，中共還是可以感化的。但我不這麼看。我覺得，祇有在權力做到制衡，人民有言論自由和民權，軍隊已經國有化，任何黨派個人不再擁有特權之後，自由民主才能真正的實現，悲劇才能被有效地阻止。否則一切都是幻想，中共隨時可以將大陸恢復到 1978 年以前的奴隸社會。

而中共為了自己的專制統治和利益，必將置國家民族利益與不顧，再次發動文革，鏟除對自己專制利益不利的思想和觀念。然後再搞出個“洋務運動”來安撫人心，“讓人民看到希望，但永遠也不要想達到目的”。

如果說上一次是在“推倒重來論”，權力鬥爭，打壓民主黨派左翼文人為目標而發動文革的話，那這一次就是以打擊侵犯其專制利益並已經覺醒的民主人士為目的了。

有人會覺得，新文革一定會發生嗎？我覺得：中共為了自己的專制利益，一定會。

有人問，這次還叫文化大革命嗎？我覺得；不會，這次中共會精心挑選一個更鼓舞大陸人心的口號，還會讓大多數的大陸人為之激動不已。

結束語

中華民族飽經磨難，但還未歷經滄桑，在專制體制下，我們國家民族的苦難還沒有就此結束。我們是否應該思考，我們應該為國家和民族做一些什麼呢？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在國父軍政，訓政，憲政思想的指引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政治上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民主體制進行了有效的嫁接，雖然因統獨問題導致政黨對立，社會動蕩，矛盾增多，但在去除台獨後，那裏仍將是全中華的希望。

或許有人覺得，現在的台灣太亂，三民主義不適合中國。但亂的根源却是來源於台獨，是台灣沒有堅持國父的民族主義，居然容忍分裂賣國賊公然鼓吹台獨。

所以，如果把現在的台灣當做反面教材，那就更加體現了三民主義的重要性和正確性。祇有堅定不移地按國父的道路走，把堅持民族獨立，民權伸張，民生發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子，同時貫徹實施，社會才會穩定繁榮進步。

走孫中山的路，是中華復興的唯一希望，也是防止悲劇再次發生的最好方式。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九次財務報告

(1/1/04 - 3/31/04)

總收入 (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7479.20
---------------------------	------------------

總開支	\$22068.14
------------	-------------------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總開支	\$8434.22
雜誌社房租	\$2400.00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費)	\$580.25
辦公室添置用品及雜費	\$1562.18
雜誌出廠運輸費	\$75.00

雜誌社差旅費 (包括邀請人員)	\$2440.09
雜誌社及研究中心招待費	\$1009.80
會計師事務所報稅及律師諮詢費	1650.00
追悼金堯如、何冰姿和趙品潞花圈費	\$516.60
捐助民運人士趙品潞紀念基金會	\$1000.00

研究中心“反思現代史”攝製室租金	\$2400.00
------------------	-----------

說明:

- 1、主編第八期稿酬 \$600 美元已經全部回捐雜誌社專款專用。
- 2、本期財務報告由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4/26/04)。

為中國文化 敬告世界人士 宣言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 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牟宗三 徐復觀 張君勱 唐君毅 合撰

本刊編委余健文博士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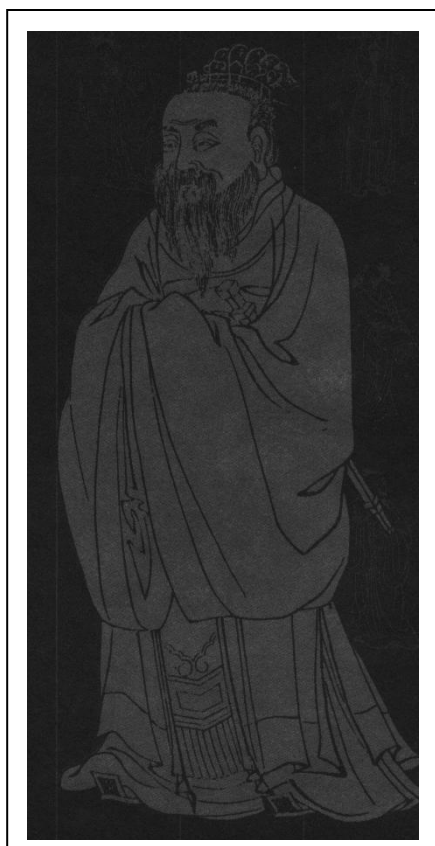
握天樞以爭剝復

——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反復修正，後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一九五八年。其緣起見原編者按語中。五十年來，此文被廣泛徵引，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思。故其涵蓋面極廣：由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基本應有之態度、中國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學之異同、中國文化之倫理與宗教及心性之學之意義、如何從中國文化中開出民主與科學、由近世中國政治的現實中尋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學習融通之途。充份表現了四位大師一生之志業與學術成果。五十年後之今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之認識，進而由之啓發出高遠廣大的理想。

明末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一直處於一種萎縮的狀態中，清末西方文化挾其物質文明之強勢入侵，使此本來已現衰頹之象的文化，全面解體。生於斯世，有良知的知識人多能注意中國文化的問題，有「要改造中國的現實，必須從文化入手」之共同認識。但建設更新文化之途則人見人殊。有人主張以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為本、有人提倡全盤西化，然而，數十年來，中國的政局混亂，戰禍不斷，知識人只能用心於現實的政治中，或在社會文化的表層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變，一直未能從根本上作深徹的省察。文化的建設只是斷斷續續，在紛爭中遲緩不進。四九年大陸變色，從此十億炎黃子孫生活在專制高壓的統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地萬馬齊喑，學術文化被拴於馬列毛之下，全歸於虛無。

大陸之淪於共黨，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災難，五十年代一羣流亡港台的學人，遭遇此空前之大變局。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對中國及其文化之淪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們並沒有悲觀的情緒、更不輕言放棄，他們認為「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於是他們發大悲願，以重建中華文化、建設民主共和為終身之志。其心境與志業只有明末顧、黃、王等大儒可比。今日的知



識份子要真切認識了解此一心願，已復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在大陸只能講馬列毛，在台灣中華民國仍是胡適西化自由主義派的天下。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則以教會為主導，中國文化更備受輕視。在此艱難孤獨的環境中，這羣懷抱共同志向的學者在海外獨樹一幟，以中華文化之傳承為使命，學術界稱他們為「當代新儒家」。「新儒家」之所以為新，並非只是時間上的新，而是在於他們能相應時代的課題，對儒家文化作一深徹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有更高更深的發展，令中華民族的客觀精神生命得到充份的表現。「新儒家」學者們首先直下「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懇求研究中國文化者以此為心。他們指出「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視之為人類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我們首當注目而加以承認的，當是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有正面價值的方面。」故他們用心於正面的發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與其正面的價值，以釐清五四以來一般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企圖扭轉人們由誤解而生的對中國文化的否定與厭惡之情。

「新儒家」學者們肯定中國文化，但他們決非「國粹主義」者，以為東方文化必優於西方，以為西方之文明，中國亦「古已有之」。反之，他們從不諱言中國文化從宋明以來只偏重於道德心性，以至於發展至近代弊端盡顯。在他們早期論著中，很多是批判中國文化之不足處的。如牟宗三先生「認識心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知性主體之不立，「政道與治道」則批評傳統儒家只有直線之思維，未能曲節的由內聖開外王，至使中國傳統政治有治道而無政道等。對於西方文化之優點，他們多採取欣賞與肯定的態度，更進而將西方現代文明之本源，與中國文化一一相對照，由之而凸顯出中西文化之相異處。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國文化精神為「綜和盡理」與「綜和盡氣」，而獨缺西方之「分解盡理」之精神，表現於歷史政治上，則中國是「理性的運用表現」，而西方是「理性的架構表現」。然而，「人間需要通過一些架構而實現價值。」故中國文化之建設必有取法於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實之，而後方能見其充實之美。

讀過「新儒家」宣言或對「新儒家」學者們略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們非一般人誤解的無條件擁護傳統，而排拒西方文化者，他們反對的是「五四」以來

一種激進的事事求新，盲目反中國文化的風潮。如唐君毅先生言，「我們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進步，而以保守與進步為相對相反之名，進步為美名，保守為惡名…由此認識之膚淺與差誤，再以變異即進步，遂非至傾水棄兒，偏於共產黨之以進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於中風狂走而不止。」他們是從歷史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情，見中國文化之不足處，乃在於只重道德主體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獨立發展，故中華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實踐其理想與表現多元的價值。他們從中國文化內在之要求出發，接受吸收西方之長，以改造更新中國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將民主人權與科學理性等普世之價值，吸納於中國文化之根本處，擴大貞定吾民族未來之理想，重建中華民族生命之常道。

五四以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種種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態度作合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卻是本著一種情緒的反應，全面反對中國文化，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吸鴉片、纏小足」、一無是處，覺得西方文化處處優於中國，鼓吹「打倒孔家店」，以為中國人應絕棄自己所有而全盤西化，美其名曰「破舊立新」。然而他們見到的只是今日西方科技文明與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絕少能用心於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歷史傳統。他們這種推倒一切的激進情緒，推至其邏輯的結論，必然是一種物量化的純否定，此即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最終反而間接的幫助了中共專制政權的建立。五十多年的高壓專制，使此等自由主義者有所省悟。本於知識人之良知，他們對專制政權作出強力的批判，並反思其根源與本質。但他們的這種「反思」，往往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對中共的批判，最後又歸結到「中國文化之專制傳統」上。不過他們口稱的「專制傳統」其實並非源自中國文化，而是他們自己對文化的無知，以至將馬列主義之專制本質誤作中國文化之正宗，於是其所謂之反省批判又回到八十年前「五四」時代的原點，說是「重新啓蒙」，其實是在一個圓圈中循環往返，對文化則一無建樹。

相反，「新儒家」學者們面對自己文化之不足處，採取的是一種理性的態度，他們以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內部要求，藉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開出中西文化會通之正道。這才是

一種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真誠負責的態度。就一事一物或針對某一種現象作些言辭激烈的批評，又或以犬儒的機智，賣弄小聰明作巧言的譏諷，人人可以為之，卻於事無補。要能就文化現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進而能夠有所建立，則非至仁大義者，不能為也。「新儒家」學者們雖未能完成此偉業（文化之建設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們的確為後來者開創了一條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仁者悲憫之情懷，積極闡揚儒家傳統的人文精神，喚起人們的文化意識，道德理性。著述以外，他更與錢穆等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在大陸一片摧毀中國文化之嘶殺聲中，於海外艱苦的環境下傳承並發展了中國文化之正宗，為中華文化保留一點血脈，此可謂「盛德大業」也。牟宗三先生表現的是一個大智者的氣質，他在哲學上成果豐碩。他首先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以誠意正心的內聖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國平天下之外王大業，認為以內聖之學為本以開出現代文明——民主政治與科學理性——必須以「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樹立知性主體而後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王」三書正是本著其歷史悲情，重建中國文化的道統，並由此開出中國文化之政統與學統。他更以哲學家的識見，重新將魏晉至宋明之中國哲學作詳盡的疏理，正本清源，中國文化之統緒，得以大明於世。最終他以儒家心性之學為本，會通西方康德以來理性主義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學」哲學體系，以「智的直覺」達至福德一致的「圓善」之境。如果說唐、牟的學術以哲學思考與建構為主，徐復觀先生的學術方向則重於中國思想史的考證論述，對中國思想史作現代的疏釋。他更以其特殊的實際政治與軍旅生活經驗，以雄健的文風，通過大量的時政雜文，發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貞定了民主自由的意識。他發表於報張雜誌的雜文達七百篇，對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臺的社會與文化界影響極深。

很多人一直以來有一種印象，以為「新儒家」就是「新權威主義者」，是反西方、反自由人權的「保守主義者」。中國文化與「新儒家」之所以給人此等負面形象，一方面是由於現代的知識人毫無價值意識，以功利之心看文化，以為文化只是現實政治的工具，他們「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在的自然物」，「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本沒有同情

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對於自己的傳統，他們沒有基本的同情與敬意，故亦不能有真實的理解。另一方面則不能不歸罪於中共「文化黨官」在介紹「新儒家」時束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陸出版的「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文化意識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收錄此文時，對「敏感」字句任意刪節達十處之多，其中第十節「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竟全節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說明的刪節在引介新儒家的書本上，屢見不鮮。

今日中國大陸上馬列主義之幽靈仍在徘徊，但其思想之囚籠已慢慢開始解體，重讀「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由此我們重新認識「新儒家」的志業與理想，正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國文化為主體，通過中西文化傳統的批判比較來吸收西方文化之優良處，並在現實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以期中華民族更能客觀化其精神生命。「握天樞以爭剝復」，中華民族與其文化剝之將盡而至於一陽來復之幾，正在當下。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五日

正文：

原編者案：此宣言之緣起，初是由張君勱先生去年春與唐君毅先生在美談到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之研究方式，及對中國文化與政治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實足生心害政，遂由張先生兼函在台之牟宗三徐復觀二先生，徵求同意，共同發表一文。後經徐牟二先生贊同，並書陳意見，由唐先生與張先生商後，在美草定初稿，再寄徐牟二先生修正。往復函商，遂成此文。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發表，故內容與語氣，多為針對若干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之意見而說。但中文定稿後，因循數月，未及遑譯。諸先生又欲轉移西方人士之觀念上之成見，亦非此文之所能為功。最重要者仍為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故決定先以中文交《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號同時發表。特此致謝。

目 錄

1. 前言 — 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
2. 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
3. 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4. 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不同。
5. 中國文化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
6. 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
7. 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
8. 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
9. 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
10. 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
11. 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於東方之智慧者。
12. 我們對於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一、前言 — 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

在正式開始本宣言正文之前，我們要先說明，我們之聯名發出此宣言，曾迭經考慮。首先，我們相信：如我們所說的是真理，則用一人的名義說出，與用數人的名義說出，其真理之價值毫無增減。其次，我們之思想，並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體相同的中西人士，亦並不必要僅我們數人。再其次，我們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運動文化運動之形成，主要有賴於人與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響後，而各自發出類似的思想。若祇由少數已有某種思想的人，先以文字宣稱其近於定型的思想，反易使此外的人感覺這些思想與自己並不相干，因而造成了這些思想在散佈上的阻隔。但我們從另一方面想，我們至少在對中國文化之許多主張上是大體相同，並無形間成爲我們的共信。固然成爲一時少數人的共信的，不必即是真理，但真理亦至少必須以二人以上的共信爲其客觀的見證。如果我不將已成爲我們所共信的主張說出，則我們主張中可成爲真理的成份，不易爲世人所共見。因此，亦將減輕了我們願爲真理向世人多方採證的願望。至於抱有大致相同思想的中西人士，我們在此宣言上未能一一與之聯絡，則爲節省書疏往返之繁。但

我們絕不願意這些思想只被稱爲我們幾個人的思想。這是在此宣言正文之前，應當加以預先聲明的。

在此宣言中，我們所要說的，是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與現在之基本認識及對其前途之展望，與今日中國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及中國問題應取的方向，並附及我們對世界文化的期望。對於這些問題，雖然爲我們數十年來所注意，亦爲中國及世界無數專家學者政治家們所注意；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則我們亦不會對這些問題能認得如此清楚。我們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爲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

如果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們，及十年前的我們，與其他中國學者們，莫有經過同類的憂患，或是同一的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這許多問題，則恐怕不免爲一片面的觀點的限制，而產生無數的誤解，因而不必能認識我們之所認識。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所認識者，去掉一些世俗的虛文，先後結論上宣告世界，以求世界及中國人士之指教。我們之所以要把我們對自己國家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前途的看法，向世界宣告，是因爲我們真切相信：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們姑不論中國爲數千年文化歷史，迄未斷絕之世界上極少的國家之一，及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稱美，與中國文化對於人類文化已有的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託，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爲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爲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爲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而此問題之解決，實繫於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如果中國文化不被了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託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

二、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

中國學術文化之成爲世界學術研究的對象，被稱爲所謂中國學或漢學已有數百年之歷史。而中國之成爲一問題，亦已爲百年來之中國人士及世界人士所注意。但是究竟中國學術文化之精神的中心在那裡？其發展之方向如何？中國今日文化問題之癥結何在？順著中國學術文化精神之中心，以再向前發展之道路如何？則百年來之中國人，或有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處，此姑不論。而世界人士之了解中國與其學術文化，亦有因其出發之動機不同，而限於片面的觀點，此觀點便阻礙其作更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認識。此有三者可說。由此三者，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文化，並未能真被世界人士所認識，而獲得其在世界上應得的地位。

(一) 中國學術文化之介紹入西方，最初是三百年前耶穌會士的功績。耶穌會士之到中國，其動機是傳教。爲傳教而輸入西方宗教教義，及若干科學知識技術到中國。再回歐洲即將中國的經籍，及當時之宋明理學一些思想，介紹至西方。當然他們這些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績，都是極大的。但是亦正因其動機乃在向中國傳教，所以他們對中國學術思想之注目點，一方是在中國詩書中言及上帝及中國古儒之尊天敬神之處，而一方則對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極力加以反對。

此種反對之著作，可以利瑪竇之天主實義，孫璋之性理真詮作代表。他們回到歐洲，介紹宋明儒思想，祇是報導性質，並不能得其要點。故不免將宋明儒思想，只作一般西方當時之理性主義、自然主義、以至唯物主義思想看。故當時介紹至歐洲之宋明思想，恆被歐洲之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引爲同調。照我們所了解，宋明儒之思想，實與當時西方康德以下之理想主義哲學更爲接近。但是西方之理想主義者，卻並不引宋明儒爲同調。此正由耶穌會士之根本動機是在中國傳教，其在中國之思想戰線，乃在援六經及孔子之教，以反宋明儒、反佛老，故他們對宋明儒思想之介紹，不是順著中國文化自身之發展，去加以了解，而只是立足於傳教的立場之上。

(二) 近百年來，世界對中國文化之研究，乃由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中國門戶逐漸洞開而再引起。此時西方人士研究中國文化之動機，實來自對運入西方，及在中國發現之中國文物之好奇心。例如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所發現之文物所引起之所謂敦煌學之類。由此動機而研究中國美術考古，研究中國之西北地理，中國之邊疆史、西域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以及遼金元史，研究古代金石甲骨之文字，以及中國之方言、中國文字與語言之特性等，皆由此一動機一串相連。對此諸方面之學問，數十年來中國及歐洲之漢學家，各有其不朽之貢獻。但是我們同時亦不能否認，西方人從中國文物所引起之好奇心，及到處走發現、收買、搬運中國文物，以作研究材料之興趣，並不是直接注目於中國這個活的民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精神之來源與發展之路向的。此種興趣，與西方學者，要考證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亞細亞文明、波斯文明，而到處去發現、收買、搬運此諸文明之遺物之興趣，在本質上並無分別。而中國清學之方向，原是重文物材料之考證。直到民國，所謂新文化運動時整理國故之風，亦是以清代之治學方法爲標準。中西學風，在對中國文化之研究上，兩相湊泊，而此類之漢學研究，即宛成爲世界人士對中國文化研究之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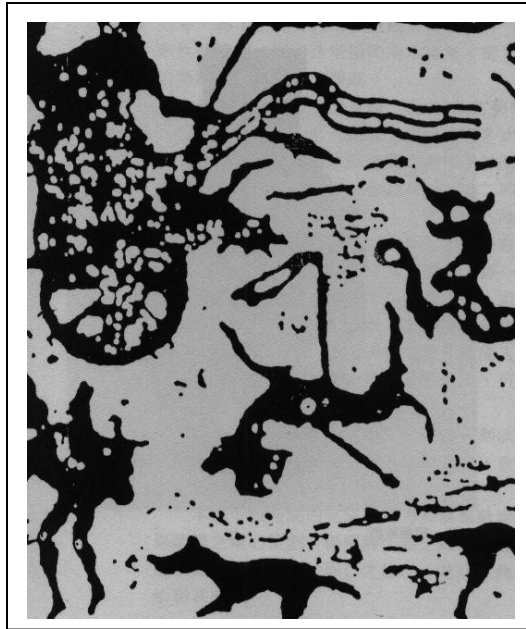
(三) 至最近一二十年之世界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研究，則又似發展出一新方向，此即對於中國近代史之興趣。此種興趣，可謂由中日戰爭及中國大陸之赤化所引起。在中日戰爭中，西方顧問及外交界人士之來中國者，今日即多已成爲中國近代史研究之領導人物。此種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動機，其初乃由西方人士與中國政治社會之現實的接觸，及對中國政治與國際局勢之現實的關係之注意而引起。此種現實的動機，與上述由對文物之好奇心，而作對文物之純學術的研究之動機，正成一對反。而此種動機，亦似較易引起人去注意活的中華民族之諸問題。但由現實政治之觀點，去研究中國歷史者，乃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之觀點。當前之現實政治在變化之中，如研究者對現實政治之態度，亦各不一致，而時在變化之中。如研究者之動機，僅由接觸何種之現實政治而引起，則其所擬定之問題，所注目之事實，所用以解釋事實之假設，所導向之結論，皆不免爲其個人接

觸某種現實政治時之個人之感情，及其對某種現實政治之主觀的態度所決定。此皆易使其陷於個人及一時一地之偏見。欲去此弊，則必須順中國文化歷史之次序，由古至今，由源至流，由因至果之逐漸發展之方向，更須把握中國文化之本質，及其在歷史中所經之曲折，乃能了解中國近代史之意義，及中國文化歷史之未來與前途。由此以研究近代史，則研究者必須先超越其個人對現實政治之主觀態度，並須常想到其在現實政治中所接觸之事實，或只為偶然不重要之事實，或只為在未來歷史中即將改變之事實，或係由中國文化所遇之曲折而發生之事實。由是而其所擬定之問題，當注目之事實，及用以解釋事實之假設，與導向之結論，皆須由其對中國文化歷史之整個發展方向之認識，以為決定。然因世界漢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之興趣，本多由其對中國政治社會之現實的接觸，及對中國政治與國際局勢之現實關係之注意而起，則上述之偏弊，成為在實際上最難除去者。我們以上所說，並無意否認根據任何動機，以從事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史者所作之努力，在客觀上之價值。此客觀價值亦儘可超出於其最初研究時之主觀動機之外。而研究者在其研究過程中，亦可不斷然改變其原來之主觀動機。但是我們不能不說此諸主觀動機，在事實上常使研究者只取一片面的觀點去研究中國之學術文化，而在事實上亦已產生不少對於中國學術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誤解。故我們不能不提出另一種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動機與態度，同時把我們本此動機與態度去研究所得的關於中國學術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結論，在大端上加以指出，以懇求世界人士的注意。

三、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們不能否認，在許多西方人與中國人之心目中，中國文化已經死了。如斯賓格勒，即以中國文化到漢代已死。而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流行之整理國故之口號，亦是把中國以前之學術文化，統於一「國故」之名詞之

下，而不免視之如字紙簍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歸檔存案的。而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及今十分之九的中國人之在列寧斯大林之像前緘默無言，不及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之漂流於臺灣孤島及海外，更似客觀的證明中國文化的生命已經死亡，於是一切對中國學術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憑弔古蹟。這一種觀念，我們首先要懇求大家將其去掉。我們不否認，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曾屢使愛護中國的中國人士與世界人士，不斷失望。我們亦不否認，中國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許多奇形怪狀之贅瘤，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們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醫學家之解剖研究。至於要問中國文化只是生病而非死亡之證據在那裡？在客觀方面的證據，後文再說。但另有一眼前的證據，當下即是。就是在發表此文的我們，自知我們並未死亡。如果讀者們是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你們亦沒有死亡。如果我們同你們都是活的，而大家心目中同有中國文化，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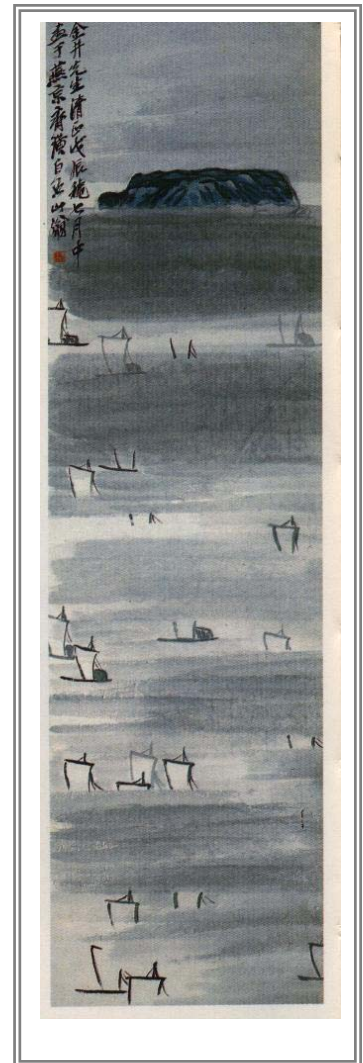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便不能是死的。在人之活的心靈中的東西，縱使是已過去的死的，此心靈亦能使之復活。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亦一直活在研究者的了解，憑弔，懷念的心靈中。這個道理，本是不難承認的極平凡的道理。亦沒有一個研究人類過去歷史文化的

人，不自認自己是活人，不自認其所著的書，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貫注的書，不自認其生命心血之貫注處；一切過去的東西，如在目前。但是一個自以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對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手邊只有這些文物，於是總易忘了此過去之歷史文化之本身，亦是無數代的人，以其生命心

血，一頁一頁的寫成的；總易忘了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因為忘了這些，便不能把此過去之歷史文化，當作是一客觀的人類之精神生命之表現。遂在研究之時，沒有同情，沒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能繼續的發展下去，更不會想到，今日還有真實存在於此歷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繼續發展下去，因而對之亦發生一些同情和敬意。這些事，在此種研究者的心中，認為是情感上的事，是妨礙客觀冷靜的研究的，是文學家，政治宣傳家，或渲染歷史文化之色彩的哲學家的事，不是研究者的事。但是這種研究者之根本錯誤就在這裡。這一種把情感與理智割裂的態度，忽略其所研究之歷史文化，是人類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的態度，正是緣於此種研究者之最大的自私，即只承認其研究工作中有生命有心血，此外皆無生命無心血。此是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在的自然物而只以對客觀外在之自然物之研究態度，來對人類之歷史文化。此是把人類之歷史文化，化同於自然界的化石。這中間不僅包含一道德上的罪孽，同時也是對人類歷史文化的最不客觀的態度。因為客觀上的歷史文化，本來自始即是人類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我們可以說，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本沒有同情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因一切人間事物之呈現於我們之感覺界者，只是表象。此表象之意義，只有由我們自己的生命心靈，透到此表象之後面，去同情體驗其依於什麼一種人類之生命心靈而有，然後能有真實的了解。我們要透至此表象之後面，則我們必須先能超越我們個人自己之主觀的生命心靈，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觀的人類生命心靈之敬意。此敬意是一導引我們之智慧的光輝，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靈之內部之一引線。只有此引線，而無智慧之運用，以從事研究，固然無了解。但是莫有此敬意為引線，則我們將對此呈現於感覺界之諸表象，只憑我們在主觀上之習慣的成見加以解釋，以至憑任意聯想或偶發奇想加以解釋。這就必然產生無數的誤解，而不能成就客觀的了解。要成就此客觀的了解，則必須以我們對所欲了解者的敬意，導其先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運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麼地方停止，則智慧

之運用，亦即呆滯不前，人間事物之表象，即成為祇是如此如此呈現之一感覺界事物，或一無生命心靈存在於其內部之自然物；再下一步，便又只成為憑我們主觀的自由，任意加以猜想解釋的對象，於以產生誤解。所以照我們的意思，如果任何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實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乃係無數代的中國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寫成，而為一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因而多少寄以同情與敬意，則中國之歷史文化，在他們之前，必然只等於一堆無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然而由此遽推斷中國文化為已死，卻係大錯。這只因從死的眼光中，所看出來的東西永遠是死的而已。然而我們仍承認一切以死的眼光看中國文化的人，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其精神生命是活的，其著的書是活的精神生命之表現。我們的懇求，只是望大家推擴自己之當下自覺是活的之一念，而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亦是繼續不斷的一活的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由此研究所得的結論，將更有其客觀的意義。如果無此肯定，或有之而不能時時被自覺的提起，則一切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皆似最冷靜客觀，而實則亦可能祇是最主觀的自由任意的猜想與解釋，在根本上可完全不能相應。所以研究者切實把自己的研究動機，加以反省檢討，乃推進研究工作的重大關鍵。

(待續)



中華的優秀文化 是民主的賢內助

為儒家文化翻案兼與曉波兄商榷

東海一梟

編者按語：本刊鄭重向讀者推薦這篇文章，並希望引起討論。有不同觀點的文章，甚至是完全相反立場的稿件，本刊一樣會予以發表，只要你是在說理。是時候了，是到了辨析中華文明和馬列文化之根本區別的時候了。

五四以來，多數專家學者對傳統文化抱有一種深刻的偏見和誤解，認為傳統文化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的，祇有徹底打倒砸碎，中國才有望走上民主新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強力掃蕩和文化大革命的肆意摧殘，中華文化的廢墟上一片狼藉。

在這個問題上，許多民主文雄、民運志士也持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敵對主義的態度，把特權腐敗的根源、把制度造成的罪惡和專制本身統統歸因於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反特權反腐敗反專制的同時，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衰微無力奄奄一息的儒家文化踢上幾腳，如我所尊重的劉曉波兄，就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認為它閹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沒有人性，祇有奴性，早該後繼無人了。余杰甚至牽怒於書法，把官場腐敗怪罪到書法這門古老的藝術…。對此我祇能說，精神可嘉，目標有誤。

不錯，西漢以來，儒學作為歷代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當然有與君主專制臭味相投賦性默契的一面，但在整個封建時代，真正受到重視的是法家，統治者往往表面上標榜儒家，暗地裏推崇法家，外儒內法，明儒暗法，各取所長，各有所用。較為寬容、開明的朝代，儒學佔上風，暴虐、動亂的時代，則法家領風騷。

當代中國專制主義的主要文化背景，由亞西方的馬列主義（明）與傳統中最惡劣陰暗的法家文化（暗）結合而成，現代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學說苟合古代陰毒的法、術、勢等帝王思想封建糟粕，集古今

中外凶殘欺騙陰謀陽謀厚黑之大成。所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一黨專政，比起以儒家學說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君主專制更加變本加厲，專制程度更高、範圍更廣。野心家陰謀家造謠造假專家們張揚著所謂的社會主義文化，撕去了儒家那一片薄薄的溫情面紗，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中國就命定了落入更為邪惡的僭主專制魔掌和更為巨大的災禍深淵，惡之花迎風怒放。

關於儒學與民主之間的關聯問題，曾在學界引起長期爭議，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蕭欣義先生將新儒家有關於此問題的各種觀點綜合為四派：一是主張徹底打倒，推倒重來；一是認為民主人權不合東方國情；一是強調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學。最能涵蓋全面、切合事理的一派認為，儒家思想中有濃厚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祇不過在長期專制政治壓制下，滲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權的成分，甚至質變為專制的護身符，因此不能籠統談反對或接受，而必須首先釐清種種混淆。對此已有不少儒學專家予以闡釋，在下也在多篇文章中談及。

二

儒家文化中除了包涵著濃郁的民本思想外，還蘊含著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人道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具體表現千姿百態，概乎言之，可歸納為維護人的權力、肯定人的價值、以人為本位，體現為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人道主義思想中，自由、平等居核心地位，而東方傳統的人道主義的基礎主要是博愛、仁愛。

在中國人文文化中，人道主義傳統既以理論的形式分布於歷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又作為一種實踐活動體現於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中及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以儒家的仁愛精神為理論基礎，以政府、宗族、家庭為依托，以存養鰥寡孤獨、賑災救荒、撫恤殘疾者為實踐內容。《禮記·禮運》篇描述的大同社會，就是一種充滿人道主義理想的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人道觀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強調「博施於民而泛而眾」，反對殺戮生命和凌辱人格；在政治上孔子主張德治，以禮義道德教化萬民；孟子的人道觀體現在「仁政」思想上，例如，要讓百姓有生存之產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要「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要讓百姓過上安逸的生活。後世儒家繼承并發揚了孔孟的仁愛思想。唐韓愈的「博愛」，宋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與孔孟一脈相承。這些人道主義思想，滲透到封建朝廷的仁政政策和人民的日常倫理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把人道觀變爲實際的人道行動。

中國古代人道主義實踐表現爲以家族爲基礎，以政府爲主導力量的社會性特徵。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才出現救濟院之類慈善機構，1780年瑞士才創立了殘疾人福利院；在中國，周代就有專司「寬疾」職責的官吏，歷朝歷代都有由政府劃撥經費、由專人管理的專管鰥寡孤獨殘者的社會慈養機構。

同時，在個人道德實踐中，人道行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褒獎和社會的普遍支持。例如，在古代，一個人是否品德高尚、孝順父母，往往會影響到他的社會地位。一個有孝行有道德的士人，會廣受推崇，還可以被舉入仕。這就激發培養了人的仁愛之心，使人道主義深入人心（當然，因有利可圖，道德行爲背後往往染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成爲假道學偽君子，這是另一個問題，此處不贅）。

三

孔子提出的以「仁」爲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同時也是一種道德譜系。《論語》把中庸、禮、義、智、信、勇、忠、恕、孝、悌、溫、良、恭、儉、讓、寬、敏、惠、敬、和、愛、友、善、遜、廉、正、聰、莊都劃歸此一譜系之中。孟子以仁義禮智爲「四德」，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倫，視仁義爲最高道德典範。

不可否認，在封建專制統治下，傳統道德模式受到別有用心的扭曲和利用，產生了許多負面作用，成

爲桎梏人性、束縛人民的工具。但傳統道德并非是專制統治者的專利，其中一些道德富有永恆的魅力，一些內容值得加以借鑑和改造。孫中山就主張對舊道德賦予新的內涵，作出新的闡釋。他曾沿用儒家道德範疇，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達德」。他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對此說得很具體：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爲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爲，不知道是鄉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宇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爲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要忠字；以爲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的；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爲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爲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爲四萬萬人去效忠。爲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爲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尤

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在我心目中，孔子是個平易、慈祥、高貴、富有性格力量、具有哲學智慧的小老頭兒。他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以仁、智、勇為根基，達到「不憂、不惑、不懼」的境界。他有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他以仁、智為人格核心，展開忠恕的人格立場，推崇「殺身成仁」的人格態度。

比起孔子來，孟子更為可敬可愛。政治理論上，他繼承了孔子的仁愛思想，策劃了一套更有平民品格和民本思想的「仁政」。在人格上，他是一個「善養吾浩然之氣」、富於狂狷魅力的豪杰之士、「不召之臣」、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作為儒家「亞聖」，對歷代知識份子（士大夫）、對我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這一筆巨大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去挖掘、開發。即使從功利的角度看，一些異議份子民運志士對於民族、文化遺產表現出的虛無主義態度，也容易招致民眾的疑惑反感，無異於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其實在具體生活和鬥爭實踐中，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崇高道德和高貴精神，往往與歷代仁人志士一脉相承，也與他們深惡痛絕的孔孟之道千古遙接互相輝映。

四

對於傳統文化，全盤打倒、一概斥為醬缸垃圾，或僵屍迷戀、無條件贊美，都不是科學的負責任的態度。不但儒家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和深厚的道德資源，如果祛除某些封建糟粕，諸子百家，也都各富營養。如墨子的兼愛：「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如道家以正治國的政治理想，法本於道的法律思想，少私寡欲的倫理思想和逍遙玄遠的審美思想，都各極其妙。包括法家，那種相對嚴格地依法辦事、不畏強暴的精神，也是值得鏡鑑的。

在向世界先進文化特別是西方政治文明學習的同時，我們也應很好地珍惜、發掘、繼承、復興我們自

己傳統的珍寶，在民主自由等普適性價值的觀照下，對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寶藏進行一番去粗存精、去偽存真、去劣取優的工作，以探索和創造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文化。

至於文化與制度的關係，異常錯綜複雜，許多思想人士和民主鬥士都是文化決定論者。他們祇強調文化對制度的必然性，而忽略了制度對文化的能動作用；祇強調制度是文化的產物，而忘記了文化也可以由制度改變的。這就容易得出一切不合理的現實都有難以改變的必然性的結論，無意中給專制政權推遲和抗拒政改提供了理由：瞧，一切都是文化的錯嘛。你們要民主自由，可咱中國沒有那樣的文化背景呀。一些黨用文奴甚至把一切官場腐敗、社會弊病、政治疾患一古腦兒推到文化身上。文化成了受氣包替死鬼。當今官場腐爛道德崩潰，主要是制度造成的，但同時我認為，這與儒家價值體系被我黨全面摧毀不無干係。

我也明白文化乃制度的大背景，許多問題靠單純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也贊同文化的養成比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制度層面，更帶有根本性。但是，文化的建設，觀念的改變、民主自由等普適價值的養成，也需要制度的創新、配合和引導，需要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政治環境，需要突破蒙昧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籬藩，讓真正的先進思想文化獲得完善有效的傳播渠道，有適合民眾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傳形式，讓民眾獲得精神滋潤和思想啟蒙。不然，一面濫用權力壓制思想言論自由，阻絕先進文化的吸收傳播和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禁止真理的自由探討，一方面又將一切頑疾卸責於文化，豈非南轅北轍，豈非是文化的「難以承受之重」？結果必然是阻礙人類精神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改革，造成社會的停滯不前。

而且，如果片面強調以改造文化去推動制度的進步，而忽略創新制度來推動文化的發展，就像傾西江之水以濟涸轍之魚，未免緩不濟急。文化與制度之間，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創造、互相能動的。制度與文化都是人的創造物，都需要也可以由人去改變。關鍵還是人，是社會、特別是權力的享有者能不能在創新制度創新文化的實踐活動中發揮有益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成為攔路虎和破壞者。

對於當今中國的一黨專制，儒家文化有一定責任，但不是罪魁禍首萬惡根源。它有缺陷有錯誤有醜陋的一面，嫁雞變成雞，嫁狗變了狗，被迫嫁給歷代君主，它就成了專制的幫閑幫忙。但我相信，如果嫁給了民主自由，它就會去醜揚美去惡揚善，煥發新的風采永恒的魅力，成為大家貴婦人和民主賢內助，成

為中華新文化大家族的重要成員。（梟鳴天下之二三五，2003、7、9）

本文參考書籍：

- 一、《孟子》
- 二、《人道主義研究叢書》，陳明主編。

我看“五四”

徐沛

編者按語：這是一篇有著許多真知灼見的好文章，大膽，潑辣，思路奇突，發人深省。它對後來被托名為「五四」的「中國新文化」，及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作出了十分有價值的反思和探討。它甚至乾脆謳歌被打倒的舊文化，反對「打倒了舊文化」的所謂新文化，這就對那個在中共長期和全面坑殺我們民族文化之後，仍然不願意批判否定馬列文化，還要繼續批判、否定、誣蔑和咒罵我們優秀民族文化的「當代文化異象」，無疑是一個直面的反擊。而由它所揭穿的，這個「當代文化異象」之所以產生的原由——實際上就是不知、不解我們的民族文化，甚至仍然是在維護馬列洋教文化的本相，則理應引起我們自身的慚愧和惶恐。而它對「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者所持的批評態度，特別是對魯迅的明確批判立場；還有它對「五四運動」和中共及其革命的關係，「五四運動」和北大的關係，「五四」和「六四」的關係，以及「百年北大」在中國所起的很大負面作用，所表達的新穎、獨到、甚至是尖銳的的見解，不僅值得深入思考，而且應該引起廣泛討論。至於歷史上的「五四運動」，究竟與中共及其革命有沒有關係，有多大關係，是思想關係，還是實際關係，關係是深還是淺，我們也希望能夠進一步地展開反思和辨識，以求徹底地走出中共的謊言體系和思想桎梏，以達成解放思想和解放歷史的新發展和新境界。

歡迎大家參加討論。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在北京

我

我是誰？對這個問題存在不同的答案。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說：我祇不過是個有心與魯迅這個祇知戀母，不懂尊孔敬神的中國文化殺手背道而馳的女人，除了西化外，我別的都是東方的。我自己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但却見識了好些神秘人物……

其中一名的自我介紹如下：「我是一名在美國的中國人。我出生在農村，後來有幸考上一所頂尖的大學。後來在國內拿了一個理學博士學位，然後來到美國，拿了一個心理學博士學位。當然這都是表面現象。其實我是一個修煉的人，一個佛家獨修大法的傳人。師傅找到我的時候，我還 14 歲。在 16 歲的時候，修成金剛不壞之體。無人的時候，師傅帶我演練神通，可以自由飛翔，穿牆而過。後來就帶我到諸佛世界去聽法，聖潔莊嚴，美妙無限。許多經歷，不足與外人道焉。……」

對這個佛家獨修大法的傳人我坦誠曰，我祇能算個凡婦俗女。在東與西，人與神之間當個傳媒似乎是我的命。

20年前我就相信人命天定，我祇能順著面前的路走下去。我沒法不信神敬天，因為我從小就耳聞目睹神人奇事。比如一位陌生的農婦曾一眼看出家人和我的過去，她還斷定我們家就我會遠走高飛，果然父母五個孩子，祇我一人出國，雖然我嚮往出家，而兄弟們全都留在故鄉。

20年的上下求索也一再證明我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我從83年考進四川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後就如魚得水，88年底到德國半年便發表了德文處女作。我的個人專著有4本德文詩集和1本博士論文。用外文表達我的中國情思比使用母語簡單易行。因為中共上台後已被簡化的漢語更加政治化，我在這種語境中長大，古文底子薄，我會的現代漢語很難用來吟詩作詞表達豐富的內涵。「作詩如作文」的胡適名言和他的一系列主張，比如號召不引經據典的「八不」，在我眼裏都貽害無窮。

然而夜有所夢，日有所思。我多夢也多思，但夢什麼思什麼都不由我作主。發現這一現象時我還很小。當時我一邊在家裏做數學作業，一邊想，老師說上課要專心致志，否則就解答不了問題，我想專心聽課却總是走神，為什麼我還能解這些數學題？也因為我無法不思念故國，曾兩次試圖葉落歸根，却目睹在江澤民當權下故國已淪為倍遭天譴亂象叢生的險惡之地。我祇好繼續旅居德國，但却不能見死不救。人都說難，你輕易做到，你想做的，即使容易，却做不了，這就是天命。

天命也在於人不能自己選擇兒女和父母。我曾希望生在別人家裏，現在才意識到我有生在福中不知福之嫌。而父母則抱怨為什麼會有我這樣的女兒。生長在山西農村的父親18歲時被革命的浪潮捲入劉鄧大軍，曾為中共奪取政權出生入死，苦勞比日本漢奸之子江澤民大，也因此他沒有像江澤民那樣在漢奸和蘇共手下學會兩面三刀欺世害人，更沒有江澤民的權欲，而是在56歲時就自願離休。因為有這樣一個勤勞樸實的「大老粗」父親，我既不像饑餓的兒女們一樣飽嘗苦難，一肚子苦水，也不像高官的兒女們一樣至今生活在害人害己的父輩的陰影下，而是心靈沒有

受到扭曲的自然人：表裏如一，心直口快，崇尚真善美。除此之外，我的個性很強，排斥異己的各種主義，祇關心與己有關的種種問題，愛打破沙鍋問到底，沈浸在自己的小天地裏。

我22歲來到歐洲目睹六四屠殺後才走向中共的對立面。六四撕下了中共的畫皮，讓我看見了它不真不善當然也不美。我在六四後發表的處女作中表示追求上進自由民主真理是我的人生目的。今年是六四十五週年，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至今矢志不渝，祇是思想境界有所提高。我信奉文人是良知的守護者和啓示者，不能為權力和物欲所操縱。六四可謂我人生和思想上的一大飛躍。

對匯聚在黃花崗周圍的仁人志士們，我祇想強調我從小信神熱衷修煉，在大陸時我愛讀「紅樓夢」等古書，看「簡愛」等外國電影，游離在馬列意識之外，在我識破中共的騙局時，已身在德國，并步入了德國知識界。就是說我的思想意識幾乎未受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像在西方的中國古董，現在把我對五四的看法訴諸筆端，是想給大家提供另一種視角。

五四

毫無疑問我也像所有在大陸上過學的中國人一樣背過中共對五四的定義。不過我早忘了。我祇記得大學後，我們班為慶祝五四青年節曾去歌樂山野營，在篝火中星空下徹夜不歸。同學們都興致勃勃，而我則昏昏欲睡，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體驗熬夜的滋味。連這樣的五四都不合我意，就不難想像我離以愛國主義的名義去打人放火的五四精神有多遙遠了。

還好我有一本現代漢語詞典，裏面在「五四青年節」下如此解釋「五四運動」：我國人民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份子領導下所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承認日本接管德國侵佔我國山東的各種特權的無理決定，運動很快擴大到全國。在五四運動中無產階級作為覺悟了的獨立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全國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準備。

雖然這是典型的黨八股：空洞不實，真假參半，但足以證明五四打著愛國的旗幟對共魔在中國的發展

壯大起的巨大作用。談及五四就得提到北大，因為那兒是共魔在中國的落腳點，以1918李大釗成立的馬客士（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為標志。另幾位五四旗手陳獨秀魯迅等都在北大任教。

我得感謝魯迅，是我上網後目睹的魯迅崇拜讓我把六四和五四聯繫起來，并認為六四是五四帶來的必然惡果，同時也可謂物極必反。當王丹劉曉波王若望等因六四被捕入獄時，我和金堯如等從此走上反共的不歸路，而後來人中則出現了清水君這樣因獲知六四真相而挑戰中共的許多優秀才俊……

我反感魯迅就像我喜歡白雲一樣與生俱來，真謂冤家路窄。可喜的是辛灝年等已提出驅除馬列邪教，清水君等開始質疑魯迅。我則認為魯迅作為中華文化（儒釋道）的殺手，像他所推崇的尼采，這個聲稱「上帝死了」的狂人一樣分別為納粹和中共的暴政提供了思想基礎，為其奪取和維持政權立了大功。就是說我不僅反共還進一步地對魯迅和五四運動（魯迅）以及所謂新文化運動（胡適）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稱他統帥兩支大軍，一支以朱德為總司令，一支以魯迅為總司令。此話就泄露了魯迅對馬列紅朝的豐功偉績。魯迅堪稱中共的頭號筆桿子！

李慎之的「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證明李慎之等中共筆桿子確實是在魯迅的誘惑下背棄先賢成為馬列子孫的。文中說：魯迅的著作永遠是對我心靈的啓示與激勵。甚至在被劃為右派以後，我居然還荒唐到自以為是「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年青的一代去寬闊光明的地方。」在這樣的心情支配下，我六十年來一直愛戴崇敬魯迅。

為了慎重我不得以去翻閱魯迅作品。雖有「一件小事」說明魯迅也會良心偶現，但總的來說：魯迅慣於自以為是中傷他人詆毀先賢，可謂言行不一缺乏道德。僅以「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為證。

修煉界的人都知道人心不正會招來陰間的妖魔鬼怪，這在中外的史書古籍中不乏例證。「白蛇傳」講的就是一個姓許的書生好色招來蛇妖，和他在即將被害死時為法師所救的故事。而雷峰塔據說就是法師用來鎮妖的佛塔。

魯迅這種因色迷心竅而導致兄弟反目的無神論者當然不可能識別其中的真偽，理解其中的道理，然而他却膽敢妄加評論和指責。鄉下人以為把佛塔的磚拿一塊供在家裏就能平安如意，導致雷峰塔倒掉，這確實愚昧無知，但拜佛避邪却非迷信。

孔子敬神畏天，所以才「不肯對鬼神宣戰」，魯迅不解却對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大放厥詞，用歪才之心度聖人之腹。他就這樣和李大釗等在「新青年」上誤讀孔子誤導後人，以致造就出大批不知天高地厚的新青年。我很慶幸我也有一個像魯迅的祖母一樣的外婆，并信神疑鬼從而能抵抗魯迅們之流毒。

被恢復了歷史原貌的「兩地書」是魯迅和其情婦的通信，其陰暗的心理和狹隘的心胸從中可見一斑。如把史料和經魯迅偽裝後的「兩地書」加以比較分析，更能看出魯迅不是偉人而是偽人。這種缺少善心正念的兩地書一版再版，把至真至善的鄭板橋家書等排擠到了無人知曉的角落。一位公認的「魯迅傳人」研究魯迅一輩子，離世時却沒能完成黨交給的為魯迅立傳的光榮任務，就很說明問題。

中華文化（儒釋道）教人敬天畏神樂天知命，而魯迅們則因狂妄自大無視道德蔑視傳統，先賢要人心中有佛，要親君子遠小人，而魯迅却偏要把心思用來編造狂人，阿Q和孔己己等小人。孔子說，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五四旗手們因為留學日本歐美，魯迅則更是邯鄲學步，連學位都未得到就忘了祖訓。他們要麼認尼采的瘋話（尼采確是瘋子。）和馬克思的邪說為真理，要麼視歐美浪漫派詩人一百年前點燃的愛火為人生目的，而濫情縱欲敗壞世風。與不管好自己，却老指責他人的魯迅相比，胡適還知道要改造社會得先改造自己。然而被他們批判的舊思想，舊傳統，舊道德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豈不更加高明？

當有人揭露陳獨秀愛逛妓院時，另有人稱這不妨礙他是共產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而在我看來正因為陳是個情操低下的才子，他才會崇拜馬克思，這就叫臭味相投。如果他敬天畏神品德高尚，就不難看出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因為無論哪個神都教導大家要與人為善，含辛茹苦，而馬克思則把人分成階級，教窮人造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

五四人不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是在宗教信仰亦即道德規範上發展起來的，却借民主和科學的名義毀滅傳統信仰和道德，言傳身教學生傷風敗俗。被他們大肆詆毀的孔子之所以為聖人是因為他教人「仁義禮智信」，儒生們都知敬重師長并致力於傳播孔子之道。拜在杜威門下的胡適或許比崇賞尼采的魯迅要略高一籌。然而正是他教的學生中有一位成了人民的大救星。以無法無天為榮的毛澤東不僅不聽老師的話，還恩將仇報，發動一場批判老師的運動。連被胡適命名為思杜的兒子也祇學會對父親筆伐！而魯迅則教唆北師大女學生和校長鬥，而且這位本該為人師表的有婦之夫還居然和找上門來的女學生通起奸來！

在此等老師的言傳身教下，於是北京學生在1919年火燒趙家樓，暴打政府官員，1948年在北大民主牆上謾罵美國大使：「趕快滾回美國去，你這司徒老混蛋。」別說1921年成立共產黨時（編按：是1920年8月由蘇共派維津斯基來中國成立了中共。1921年7月，蘇共又派馬林等來中國召開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北大師生為主，連文革也是北大領先，聶元梓的大字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拉開了文革的大幕，上演了一場學生群起毆打老師草菅人命并以此為榮的史無前例的中華悲劇。堂堂的高等院校淪為批鬥老師的暴力場所。北大紅衛兵還押著他們的一名老師去抄其岳父章士釗的家，走時在其家門貼上「痛打落水狗」（魯迅名句）！而年過80却遭羞辱的章士釗則表示，他當教育總長時，壓根兒不知魯迅是誰。

大右派之一的章乃器的「七十自述」也讓我感嘆不已。他因疾病熱衷氣功（修煉），可惜却寧信五四的新思想，而不信五千年的舊傳統，否定道家的圓滿方式「羽化」和「白日飛升」，而雄心勃勃地想「破除迷信，揭發真理」，把氣功「科學」化即章乃器化，結果祇能褻瀆神靈貽笑大方。雖然如此他却親身體驗了氣功的神奇，他不僅治愈了自己的不治之症還靠氣功在文革中保了命。像他這樣的無神論者可謂聰明正直，但欺軟（講人情的國民黨）怕硬（非人性的共產黨）。他想不通為什麼紅衛兵會把他往死裏打。難道這不是五四精神的發揚光大？老一輩不知敬重先賢，又怎能讓下一代尊重他們？

總之，五四前後成長起來的新青年是中共奪取和維持政權的先鋒隊。而否定神佛無視傳統的共產主義理想無疑於想在沙灘上建摩天大樓，當然祇能給神州大地帶來災難。中國的「軌道破壞者」非五四旗手莫屬。他們搞的破壞，「結果也祇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北大把校慶日改在五四，并在1998年百年校慶時與中共步調一致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以及想授予江澤民名譽法學博士等同樣證明「五四，北大和中共密不可分」。北大校方就聲稱「馬克思主義是北大的靈魂」！在其百年校慶前被流放海外的王丹則一廂情願地認為民主和科學是北大的靈魂。他在「天安門一代：理想與熱情的重新煥發」中說「我們需要擺脫幾千年舊傳統與幾十年新傳統的思想束縛」，我不以為然。因為幾千年舊傳統（所謂的封建專制）與幾十年新傳統（共產獨裁）有本質區別，前者一直傳承宣揚神佛的傳統文化，而後者拿來外來邪說，否定本土文化。

王丹和余杰堪稱眼下北大人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我專門拜讀過他們好些文章，發現他們都有魯迅作風，却無儒釋道的氣息，雖然前者肄業於歷史系，後者是中文系的碩士生。我就讀過的海涅大學是北大在德國的夥伴。在海大哲學系的七年裏我却在吸收「聖經」的營養時得以瞭解儒釋道，深得「道德經」之益。而在北大課堂上什麼專業知識都可能學到，也會在圖書館學會思考，懷疑中共獨裁，但學不到傳統智慧和對神佛的意識。北大過去出過林昭，現在又出了曾錚，都敢挑戰強權，但前者是基督徒，後者是法輪功弟子，就是說非北大培養了她們。北大招收的雖全是高才生，但實際上今日北大已淪為中共的幫凶。請看校園網站三角地論壇《敬告讀者》第一條曰：「禁止反黨反政府言論，違者責任自負」；第四條曰：「為法輪功張目者同作者刪除、砍帳號、封IP」。

被王丹等視為精神楷模的王若望15歲追隨左聯，19歲加入中共，但却因敢想敢說飽受迫害并被開除黨籍，在74歲時還被迫流亡海外并客死他鄉。像他這樣能在馬列意識形態下不失正義感，還有學識和膽量的中國人堪稱鳳毛麟角。我想這或許得益於他小時候受祖母的薰陶并幫她抄過「金剛經」，在他過

世後有追思會，說明他已入了基督教會。如果說我主要是從理論上得出「要愛國必須反共」的話，那麼王若望則是從實踐中得出必須反共。他的座右銘「愛是不妒嫉，……祇喜歡真理……凡事忍耐……」說明他像我一樣有心完善自己善待他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與爲了權利騙人害人的馬列邪教水火不相容。五四後中國知識界裏像王若望這樣德才兼備追求真理的男人還有誰？他的同輩人比如李銳「至今認爲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高理想」。

王若望說中國人的心中都有個小毛澤東，而我以爲更應該是魯迅，這個被毛澤東封爲「現代中國的聖人」，是以他爲首的五四人摧毀了中國人世代相傳的三聖圖（孔子老子釋迦）。遺憾的是魯迅這樣的孽子至今還受到余杰等的崇拜。

余杰被人譽爲小魯迅。但他不僅引用魯迅，也會引用聖經，而聖經裏一再強調，敬畏上帝是獲得真知的開始。遺憾的是他也像魯迅一樣詆毀孔子，說什麼孔子「待價而沽」。即使是君子也度不了聖人之腹！余杰還涉嫌把中共的罪惡算在無辜的傳統文化的頭上，把中共暴政與所謂的「封建專制」一視同仁，忽視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全都敬佛求道。（滅佛的「三武一宗」和排斥佛教的隋煬帝和宋徽宗都是末代皇帝。）封建帝王要聽天的話，每個朝代都有觀測天象

的官員，發生天災人禍時，皇帝還會下罪己詔。這樣的「封建專制」顯然和「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共產獨裁有本質的區別。

王丹說他與北大有不解之緣，希望能當北大校長。從他在88年五四時辦民主沙龍等言行來看，蔡元培、胡適該是他的榜樣，然而正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導致馬列邪說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最終顛覆中華民國，「全盤西化」大陸，雖然胡適非共產主義的追隨者，用馬列意識壟斷大陸非他的主觀願望，但他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用「個個和尚都說謊」等言論，動搖了老百姓對神佛的信仰，是他提倡大白話，新文學，而隔斷了中華文化的傳承。他妄自尊大要「再造文明」，結果怎樣？

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是西人的理論，對無神論者有誘惑力，但對人心都沒有約束力，所以追求主義的人多會爲了爭權奪利而無視道德。而民主不會降臨在一個不知敬神畏天不守傳統道德的社會。自由祇會讓人放縱以致墮落，唯神佛才能讓人自律達到圓滿。

總之，依我之見王丹余杰們需要擺脫的是五四或北大的思想束縛，而非傳統文化，因爲生長在五四後尤其是在五星紅旗下的大陸人根本就不懂何謂傳統文化。

黃花崗雜誌社 守則

- 一、未經雜誌社授權，任何個人不得代表黃花崗雜誌對外發言。
- 二、未經雜誌社授權，任何個人不得代表黃花崗雜誌對外募捐。
- 三、黃花崗雜誌是歷史文化理論刊物，不介入，不參加，不從事任何政治經濟組織及其任何一種形式的政治經濟行為。
- 四、雜誌社任何成員和義工，若有任何不符本雜誌宗旨的言行，不論後果如何，黃花崗雜誌概不負責。
- 五、雜誌社任何成員和義工，若有任何損害黃花崗雜誌名譽和事業的行為，即等於自動脫離本雜誌社。

論禮九章 (下)

謝選駿

四，對《周禮》的戰略性理解

有人說《周禮》像《老子》一樣，為「戰國陰謀之書」，然而這與經學何干呢。這是史學的事。在我看來，《周禮》實為「中華理想國」之良好表述，故二千年來常激勵中國志士為改良中國社會流血犧牲，豈是偶然哉！

《周禮》足以構成禮制天下統治之藍圖？

當然不能忘記隨時而易。「中國兩千年來之政，皆秦政也。」於是期間敢於復興周禮者，莫不自陷於滅亡之境，諸如王莽、北魏、後周、王安石、太平天國甚至人民公社等。自是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已進入了天下國家之封域，不再適用於周禮，這在二十世紀以後的全球時代，尤為如此。

那麼，周禮對我們而言，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呢？僅作為一種古玩嗎？在我看來，周禮的意義在於啓發一種未來的「國際王政」、「世界聯邦」、「全球周天子」的思考模式，而不在於真的照章辦事。這種「世界聯邦」的理想對當今陷入全球化恐慌中的世界來說，不啻是雪裏送炭……這就是周禮對全球化時代的價值所在。

以下五點雖然是屬於過去式的，但也可能屬於未來式：

1，《周禮》是間接統治的藍圖。它追求的不是直接統治所講求的效率；而是間接統治所注重的禮儀、秩序、穩定及其象征性。這並非一種「政治浪漫主義」；因為象征的暗示力量極大——它能激發奇特的生物潛力。

由於注重象征意義，《周禮》較之柏拉圖的《共和國》更為注重形式的完整而非精神上的方向感。《周禮》重視政治制度超過重視政治原則。在它看來，原則寓於制度之中；制度則由某個偉大的人格（稱為天子）來保證。

2，作為藍圖和理想國的《周禮》，失之於拘泥細節和嚴重的官僚化傾向。它對官位及其職能的信任，似乎超過了對傑出能力的應有信任。

《周禮》的這一先天不足，致使它的命運染上了悲劇色彩：對這一不足之處的誇張與誤解，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兩個半獨裁的社會主義政權的主要活動：

王莽、洪秀全、王安石（半個）。這還不算北魏等半開化政權（先不說它對中國現代種種社會試驗的影響）。這些都是打著復古主義的旗幟進行的。

就中國「國情」而論，這類極端形式的直接統治大多享祚不長。因此明朝想用它的藩王、清朝想用它的八旗來緩沖直接統治；於是形成了一種混合型。相比之下，宋朝的直接統治祇能以弱兵（其極端是殺害岳飛）和抬高文官（其極端是秦檜專政）的權位來抵補（這倒不如唐朝的藩鎮——還為唐文化的異常繁盛提供了肥沃土壤）。

3，獨裁政治是比專制制度更為直接的統治形式。專制制度主要施威於政治領域；而獨裁政治則集政治、軍事、經濟、宣傳、教育、意識形態……於一身。從而造就一個空前龐大的利維坦。但是，因其運轉不靈，會像恐龍一樣突然滅絕。在運氣較好的時候，獨裁政治則首先退化為比獨裁政治更重視集體領導的專制政治。這不僅也不能減輕它的嚴重僵化，反倒使它喪失了最後一點人性。

4，洪秀全一類政治騙子（他們的特點之一就是經常攻擊自己的同黨是政治騙子）的奇怪創造是：熔冶外來的平等學說和土產的等級觀念於一爐，鑄造了一個顯赫一時的巨大妖怪。可惜的是，這個怪胎由於固執己見，所以必須抗衡的內外壓力相形過大（這也由它強烈病態的先天針對性引起的），因而過早僵硬，終因缺乏活力和應變力而日益枯死。

再加上從氣質說，基督教的「創世學說」與中國宗教——《周禮》就是它的政治制度化的產物——的「自然觀念」，根本抵牾。

5，在我們看來，將《周禮》列為一篇間接統治的學說寓言，遠比將之奉為直接統治的施政經典有利得多，也真實得多。這方面的最好注解是《禮記·月令篇》。《月令》純是一幅中國理想的宗教政治的生活詩畫。

理解了這些，也就找到了「解答近代中國悲劇」的鑰匙了——那就是，自然主義的中國迎頭撞上來高度組織化和創造性的技術文明的列車。

五、李覲的《周禮致太平論》

李覲字泰伯（公元一〇〇九年至一〇五九年），《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三十五歲時作。他在《周禮致太平論》的序文裏說：「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是用摭其大略而述之，並序，凡五十一篇，爲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爲言之也。」可見連「解經」之作也都是「有爲言之」，而其發出點在「憤吊世故，警憲邦國」。

再看《周禮致太平論》本文，則充滿了幼稚的誤解。他竟把《周禮》這一間接統治（王道）的草圖，當作王安石式的社會獨裁主義的範本。這真是乖謬已甚。借《周禮》之名，行專政之實——這就是古今所謂「變法派」的真相。然而他們挽救王朝（如北宋和北京）的企圖，直使北宋和北京的崩滅，從速到來。

反觀《禮運》，則有「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之說。這不是像有的宋儒那樣鼓吹人欲消極的，而是積極修禮以耕之，從而使得中性的田得以歸屬聖人，這就是所謂「因勢利導」。

讓我們看看匈奴與突厥人曾經給歐洲人留下的恐怖印象吧！「人而無禮其猶禽獸乎」，這句話大概對草原民族特別適合吧，古代雅利安人大約也是這樣一群「禽獸」。而在亞洲，即使文明國家如中國、印度、日本等，古來也都是慣用肉刑與屠城的，完全沒有近代西方的戰爭法規（當然現代西方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已經相當徹底地破壞了這一法規），更不用說遊牧蠻族了。從此我更感到禮制的偉大，孔子的教訓是禮制復興的基礎。古代中國的禮制是人類世俗歷史中的黎明，那麼未來的禮制的天下統治，是否能夠挽救現代文明於最後的塗炭呢？

雖然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之內還用不上這樣的高級奢侈品。但正在到來的全球時代，已經提出了迫在眉睫的新需要——未來的歷史會證明，禮制的復興，正是人類得以消弭毀滅性戰禍的必要機制。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這揭示了禮的社會功用，是通過示範來消除混亂。當然，禮制並不祇是爲了民之易於使喚而設立的，民之易使祇是禮制秩序、理性勝利的一個表面的附帶的勝利罷了。

禮，禮貌、禮節、儀禮，是一種教養文化，它塑造人，將之定向爲一種「社會政治動物」。

禮，除了結構秩序以外還體現了親善仁良，即在區分了各種族、各層次、各文化的必然差別之後，又同時用禮來維護並緩和人們之間的關係。因此，禮還具有感情的因素，不像法那麼冷峻。

禮又是廣泛的。禮的精義在於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可以說，先秦中華文明就是原始的禮制文明，而禮正是保持社會摩擦力到最小狀態的機制。禮制中種種防微杜漸的措施，究其根本是要爲人們培養起一套既合乎結構秩序又合乎親善仁良的社會風尚與生活習慣。

沒有一般的禮節，禮的精神就無以寄托，禮的和諧也是難以達到的。一般的禮節還體現了文明的積累與文化的教養，可以說，禮本來就是要化爲禮貌、禮節、儀節、風度、習俗、慣例……的。沒有這些，禮的精神（層次、結構、秩序、教化……）也是曖昧不明的。因此孔子這位「禮的精神的闡釋者」比周公這位「禮的儀式的定規者」更有影響：每個大時代都有它的周公，但孔子永遠都祇有一位。儘管周公較其餘的定規者，影響還是要大得多。

在某種意義上，不妨認爲，原始禮制十分合乎「黃種人的種族特性」，其嚴肅、其執著、其注重實際，舉世矚目。到底是這種德產生了禮制，還是禮制培育了這種德？可能前者的成分大於後者。而僅僅認爲是中國的歷史與教化養成了中國人的這種德，可能反而是倒果爲因的說法。

中國文化的核心，它的本質精神，在那麼一個接近死亡的社會裏還開創了明清帝國的偉大局面。儘管這種局面有許多值得非議之處，但無可否認的是它取得了政治藝術的高度成就……在那種無望的情況下，若非中華強有力的傳統，中國文明的總崩潰則在所難免……然而，它沒有死，還在殘喘，直等真命天子來復興它。難道我們不能說，這象征了中國文化奇特的命運顯示了它無比的生命力量！

在西方式的社會組織和中國的政治觀念之外，再去創造何其難哉！不過，未來的人類需要的也許正是這個中和。

倫理學與政治，歷史學與文化——政治的技巧；
宇宙論與宗教，認識論與神話——神明的臨在。

此二者，一為社會的生存所需要，一為人性的昇華不可少。在亂世如當代中國者，前者似較後者為重要；但在各種正常的社會，則後者顯然是前者的基礎：後者崩解而前者完好者，未之有也。

六、從《書經·洪範》看中國的現有景況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是多麼深刻的斷言！

現代中國的特有景況，正是在無政府狀態和濫施刑罰之間搖擺不定。而這種嚴重的「刑罰不中」，確實是由於傳統的禮制崩壞，而新的社會習慣又遲遲不能確立（「禮樂不興」）。

禮制文化，並不負有破壞法律或僅僅緩解法律嚴酷性的使命。相反，它本來意味著從根本上強化法律的功能，所謂「心法」是也。它的作用在於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這不僅構成了中國精神的一個強烈特征，且是禮制文化的主要用意所在。

孔子重視以德治國。子路問「為政」應該如何？他說：「必也正名乎。」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這話的意思是說，為政必須正名。名義不正，說話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國家的禮樂制度就衰頹，刑罰就會錯誤，百姓就會無所適從。所以君子用詞，必須有道理，才能行得通。

換言之，禮樂興則刑罰中。禮與法並不相悖——漢成帝就已懂得禮表法裏的實質所在。

《書·洪範》因此堪稱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政治哲學。

洪範九疇如下：

- 1) 哲學、宗教。
- 2) 禮制、文明。
- 3) 制度、國家。
- 4) 歷數、大正。
- 5) 皇極、政統（王道）。
- 6) 君德、駕馭。
- 7) 明用稽疑。
- 8) 念用庶徵。
- 9) 因情設施。

其中洪範第八疇是論「氣象政治」即所謂「災異」之特點。

中國現有的景況是多麼可憐可悲！

缺乏禮制屏蔽的人們，等於沒有脫離動物的根性。結果，脫離了禮制的「人性」，實際上祇是互相殘殺（「階級鬥爭」的本質所在）的動物性。而最為高級的動物——哺乳動物性，其性不就是獸性嗎？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生生動動說明了人的這一動物處境。而缺乏禮制屏蔽的人們，就是實實在在的獸，遲早要露出本來面目。

七、我們愛自由也愛秩序

我們愛自由也愛秩序……愛自由，憤恨舊秩序的糜爛；愛秩序，也是憤恨糜爛引發的無政府狀態。

所謂「禮制的新文化」，不是文學及藝術的花樣翻新，而是更新人類精神的總體狀態。這有如荀子所說：「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荀子·樂論》）未來世界的新文化，內容應比以上各方更廣，因為現代世界比較古代世界，遠為複雜。新文化開啓新的文明並締造新的民族，古代中國的「天下」實際上預表了「全球」時代的降臨。

如《荀子·修身》所說：「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這實際上給「禮」下了一個更新的定義。此處的禮，一不是指秩序，二不是指等級，三不是指文明，而是含有「節制」、「中和」、「恰當」之意。因為綜合這一段落來看，治氣、養心之術的要訣，即在於中和與適當，而這些特點又須要通過禮，這樣，禮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和與適當的大德。吾人以是知之，禮本身絕非陳朽勢力的代名詞。如清末民初、五四運動以來魯迅幫會的文學青年所誤解鼓噪反對的那樣。禮的本質，實為社會的安定劑，可使一個解體中的社會，恢復秩序、結構、制度。

每個時代中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禮。而先秦禮制所體現的禮的精神，則是王道的精神。克己復禮的禮，可理解為一般的禮，也可理解成王道之治。一般

的禮祇是一種教化，而王道之治才是禮制的成功，而在先秦，王道之治有待於成湯、伊尹、文、武、周公的迭興。

八，以法代禮是文明的危機

國際爭霸時代，用法的觀念來代替禮的觀念，在近代歐洲也許體現了文化的進化；但在先秦中國，這卻意味著古代文明的嚴重危機。它說明古代禮治若不經損益便無法適應由貴族社會向大眾社會的過渡。當然古代中國與近代歐洲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貴族社會（西周、春秋時代的封建制度）的解體並未導向民主型的大眾社會，而是走向了專制型的大眾社會（秦漢帝國時代的官僚制度）。比起戰國的動態來，秦漢社會是相對靜態的，所以，漢代的禮治又步法家遺產的後塵而發育了，這是不同於西周禮治之習慣法性質的人造禮治，但兩種禮治還是有其共同點的：弱化強力而尊崇慣例。而慣例，大多是發軔於先前的法（任何一種禮治都是建立在先前的法治基礎上的），它把支撐法規的國家強力，軟化為某種道義信念和一套深植人心的習俗。這種禮治較之法治是更高的即更有文化的表現。它的困難在於常常受到等級制度的束縛，與各種集團利益牽涉太深，故在其不適性日漸暴露時較難調整，具有日益增大的惰性。

所謂自然法的觀念，用古代中國的術語來說，就是「天秩」，即天然秩序、自然法規。其實從更高的境界看來，這種天秩依然是人間社會的一種想望，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物理；性，人性；命，天命：本質上依然是人本主義的。

這樣一來，「天」就成了某種倫理學範疇，而所謂禮的精神到底是指秩序精神還是指恭敬辭讓之心抑或兼指二者，就成了兩說之事！這也是中國思想特有的混亂與模糊之處。所以有人說「恭敬辭讓」（給人際關係添加潤滑劑）是儒教的本質，有人說「修齊治平」（天下統治的政治精神）才是。

九，聖人的教化

「同民心」者，不是統治者與民同心，而是使民與統治者一心一德，是一種教化的權術。

《禮記·禮運》說：「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聖人」的本意，不是文人，而是天命之子、歷史之征、神意的代言人、上天垂象啓示的靈媒。（關於這一點，中國傳統與聖經傳統是截然不同的，後者的啓示是言語的，而非物象的。）

聖人所以能夠與天地並列爲三（「參於天地」），因爲他作爲「人類精神的最高狀態」，能夠通於天、地、人，奉天承運地引導人類前進，被稱爲王（王者，通天、地、人三造，故稱王）。

《禮運》因此說：「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真正的大君立於無過，祇緣他不爲一己的私利。故《禮運》又說：「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這就是禮制及其光榮表率大君的社會作用：它能令人愛其死而悲其生：祇要這種死是符合禮的要求與君命；祇要這種生是違背禮制與明君的旨意。

《禮運》又說：「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這其實可以理解爲「近似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設想」。也許君主立憲將來＝被證明是最爲中庸的政治制度。因爲百姓不則君就不能自治。何謂？首先，祇有大君才能自治以治人，故百姓不效法其德就無以自治；其次，百姓離開了大君的聖德就不能自治，蓋因群龍無首也。這兩個則字義不盡相同。而應以後義爲主，因爲從原則上說，百姓是不可能從大君處學到什麼真正東西的。百姓若不集聚在大君的旗幟之下，不以大君爲他們共同的精神紐帶、共同的調節器，不被大君無窮的德光所照耀的話，則不可能達到自治這一目的，而百姓若不能自治，則政治不可能臻於清明。中國歷史盡可以證明上述論斷。

百姓爲什麼要養君（很明顯，這絕不像是元明清以來的流氓政治家所說，是什麼「人民吃國家的飯」）？因爲百姓不養君不能自安。百姓需要君主在精神上、道德上，立於正義的統治，這種統治的無力（過與不及均屬無力），將導致社會衰蔽、百姓蒙難，所以百姓必須養君以求得安寧。同時，亦應明

白，君主不是被百姓所供養的。諸如此類的觀念實屬謬誤。

事實是：天命要求大君的充滿德光的正義臨落，天命要求人民在大君保護下生活；天命要求大群維護秩序、正義、道德、法律。所以大君與人民的區別，實為一種社會層次上的分工之區別。大君代表天命，人民因要服從天命，才服從大君的統治，並盡自己對大君的義務來換取生活的權利。所謂「天賦人權」，在這種互相依存的政治觀念看起來，不過祇是一種暴徒的煽動。

百姓祇能從事君中得以自顯，一切反抗正義之君的企圖（這種企圖要破壞秩序與正義）都祇能受到自然的嚴懲。用現代術語說，「為社會服務」就是事君，因為君主乃是社會的代表。百姓祇有在為正義之君、為社會服務的時刻才應得到顯揚與榮耀。故《禮運》又說：「故禮達而分定，故人者愛其死而患其生。」這就是禮制及其光榮表率大君的社會作用：它能令人愛其死；祇要這種死是符合禮的要求與君命；它也能令人悲其生：祇要這種生是違背禮制與明君的旨意。

其實，要從上述角度而不是從聖西門一類的社會主義角度，去理解《禮記》中「天下為公」的提法，才更為接近《禮記》原本的本義。

例如，其中所說的「三代之英」的大道之行（即「天下為公」），其要義在於「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其基礎是君主制度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例如，「選賢與能」的主持者顯然是聖君明主，而不是選民群眾；而「講信修睦」也是諸侯之交、區域領袖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普遍的社會法治狀態。所以，從「選賢與能」的君主政治理想和「講信修睦」的貴族政治理想派生下來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的平民政治理想，也就不可能是所謂「社會主義」的，而祇能是「禮制的天下統治」——並形成君主、貴族、平民的有機層次。這是相對於「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禮義以為紀」的國家制度統治的小康時代的天下一體的「大同時代」。如此看來，無論

在精神意義還是政治意義上，大同都是遠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高的的狀態，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祇是國家制度狀態，而且依靠階級鬥爭的暴力統治予以維繫。所以「大同」這一聖人的教化，當然也就不可能祇是社會主義的實踐甚或共產主義的理想，哪怕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和「人道共產主義」，或是換一個角度，大同這一聖人的教化當然也不會是不民主的社會主義和不人道的共產主義。

世界大同、禮制的天下統治（四夷來賓，百獸率舞），就是在各個社會層次（種族層次、文化層次、經濟層次、政治層次……）自治的基礎上，組合起一個間接統治、有效調控的世界性網絡。

由上述「論禮九章」可以得知，禮制與文化，譬若人的養料與精力：有時饑餓可使精力旺盛，然決難持久；有時養料充足卻精力萎靡，但靜極思動。而中庸之道則恰到好處地給予動靜（動，文化也；靜，禮制也）以適當比例。禮制與文化是互為表裏的。

蒙受天之明命的天子，不會站在貴族的立場上，攻擊「群眾專政」的積極參與者為「多餘的人」與「畜群」。因為天子是站在自己獨一的立場上，來行動的，亦即站在天命的立場，來行動；而不是站在「階級報復」和「清算鬥爭」的立場，來伸冤的。

群眾專政的多餘人，其實也可以並不多餘，他們也可以成為文化的培養基，雖非至要，亦不可少。作為社會的物質基礎，特別當人們安分的時候，具有建設的能量。至於什麼可以使之安分，那就是禮之功能所在。如果統治者並不遵循法規，為私慾而強迫多餘的人安分，那麼社會就變得更為腐敗與混亂，以致革命蜂起。如果是為了天命而要求人們安分，則是一代新文化不難建立。

新的光榮則歸於新的天子，「垂死的全閥」對青年中國的壓制和對古代中國的污蔑，是一對毒瘤，應當予以摘除。（本文作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之間，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曾經修訂，二零零三年十月和二零零四年七月在美國紐約《黃花崗》雜誌發表。）

敬啟者 為適應發行需要，本刊自下期起，每期出版日期為每一季度的第二個月二十七日。即：2月、5月、8月、11月的27日。特此通告。

本刊編輯部

一、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十六世紀初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經過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造成的艱難時世，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歐文等人的發展而成氣候，直到現在仍然很有市場。社會主義有多種流派。一般說來，各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如下主張：

一、工礦企業、金融機構和其

他一切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集體所有；

二、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賺取利潤；

三、企業乃至國家管理人員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

社會主義描繪了一個令人神往的理想世界，可惜至今沒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到達那個無限美好的彼岸。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他們或者在世界各國小範圍內作一些定點實驗，或者通過競選參加議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但是，正如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在其網頁上所宣稱：「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存在過。它既未曾存在於過去的蘇聯，也不存在於今天的中國。」

法西斯主義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其創始人是曾經擔任意大利首相的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也有各種形態，其主要特徵有以下這些：

一、鼓吹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民族團結、復興、強大和擴張為追求目標；

二、崇尚暴力與戰爭，強調紀律與秩序，反對民主，反對議會，反對自由化；

三、認為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利益須服從集體利益；

四、領袖意志決定一切，對任何反抗與不服從行為實行嚴厲鎮壓。

五、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反對自由經濟。

法西斯主義與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背道而馳，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為所有熱愛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所詬病與不齒。

表面看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格格不入，然而，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卻是許多著名的

法西斯主義分子都曾經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

以墨索里尼為例，他在童年時代就受到他信奉社會主義的鐵匠兼業餘記者的父

親熏陶。青年時代的墨索里尼聰明好學、博覽群書，對下層民衆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他曾經為當時的許多社會主義小報撰稿。一九一二年，年僅二十九歲的墨索里尼被聘為全意大利發行量最大的社會主義刊物《前進報》（Avanti）的主編。他為該刊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在極短時間內使其發行量又翻了一番。

另一公認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年輕時也相信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三十歲的他在慕尼黑參加的德國工人黨是一個反資、反猶並以下層民衆特別是城市工人為主要訴求對象的社會主義黨派。似乎是因為該黨名稱中的社會主義味道還不夠濃厚，次年負責宣傳工作的希特勒把它改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為「納粹」。希特勒對大工業時代德國工人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一九二四年，他因在慕尼黑參與領導了一場試圖推翻巴伐利亞地方政府的流產政變而被捕入獄，後在監獄中發表《我的奮鬥》一書，其中寫道：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這段話實在像極了《資本論》的語言。

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陳禮銘

二、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的產生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為標誌。共產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來自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榨；人類通往幸福之路是以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以此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脫胎於社會主義，卻把後者貶為「反動的」、「保守的」或是「空想的」（見《共產黨宣言》），並自封為「科學的」社會主義。

表面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發展唯一的動力，並且以反共作為其行動綱領之一；而共產主義者則在口頭上反對法西斯主義鼓吹的種族歧視及其對工人權利的忽視，並且標榜自己是反法西斯戰士。

然而，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所有以「解放全人類」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為己任的共產黨人，最後往往都變成了信奉專制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還祇是停留在紙面上，那麼從列寧開始的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君主則無一不是嗜血成性殺人無數的魔王。

一九九七年，四位法國歷史學家根據對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新近解密的原共黨秘密文件研究的結果發表《共產主義黑皮書》，揭露共產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罪行、恐怖與鎮壓。根據書中資料，從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在世界範圍內奪走八千萬到一億條人命，其中蘇聯二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一百萬，北韓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一百萬，拉美十五萬，非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

萬。這場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殺人比賽使人類歷史上包括德國法西斯虐殺六百萬猶太平民在內的任何慘劇都相形失色。直到今天，北京、平壤、河內和哈瓦那的法西斯政權還在繼續這場屠殺。在中國大陸，那數千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誰犯了死罪？每年被公開處決的數千犯人中有多少是無辜的冤魂？在腐敗的吏治下死於自殺或者惡性事故的幾百萬生命又有哪一條不值得珍惜？

面對那空前的慘劇，面對那累累的白骨，我們有責任思考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在被自稱為人間天堂的共產黨國家。

三、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



關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的問題已經有很多人注意到。寫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四位法國歷史學家就曾經將共產主義跟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對比，認為共產主義模式以階級劃分為基礎，而納粹模式以種族劃分為基礎；共產主義是階級極權主義，而納粹主義是種族極權主義；希特勒早已被歷史唾棄，但斯大林等共產黨魁則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們希望正視共產主義的罪行，確認兩者都是對人類的彌天大罪。

希特勒早已被歷史唾棄，但斯大林等共產黨魁則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們希望正視共產主義的罪行，確認兩者都是對人類的彌天大罪。

一九九九年，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學者辛灝年根據多年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的結果發表《誰是新中國》一書。辛灝年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從十六世紀黎德蘭革命至今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就是一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反復較量的過程。這一觀點為我們解讀紛紜複雜的世界各國政經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歷史意義非同凡響。辛灝年並著重指出：

「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祇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

爲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君王復位，王朝復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復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意所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號《中國研究》雜誌發表的「從歷史事實反思馬克思的學說」一文作者以猛總結道：「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列寧和希特勒宣揚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張對社會實施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控制，都把自己說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讓社會、人民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祇不過列寧是階級優越論者，希特勒是種族優越論者），都認爲爲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採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倆人都建立青年團體、培植告密者，都對媒體實行全面集中的檢查，都建立軍事化的先鋒黨，都把國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鎮壓的基礎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連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審來完善國家機器。可以說，希特勒是列寧最細心的學生。」

以上幾位作者都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共性作出了十分準確的概括性描述。下面我們再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用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己的言行來揭示這兩個主義之間的特點。

一、製造仇恨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割裂人類社會，並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間挑撥離間，製造仇恨。

共產黨人跟法西斯分子一樣，永遠需要製造一個敵人。正如毛澤東所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於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個敵人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爲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認爲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爲「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是因爲資產階級「奴役他人勞動」。

法西斯頭子希特勒一面承認資本家剝削工人，一面指出猶太人既是瘋狂剝削德國工人的資本家又是偽裝同情德國工人的共產黨，他們才是全體雅利安人的共同敵人。德國法西斯的敵人還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殘疾人、天主教徒等。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A B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法輪功邪教、腐敗分子、民運分子、台獨分子、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乾脆簡化爲「敵對勢力」四個字。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就叫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且「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二、擡高自己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二個共同特點便是他們的自命不凡。任何人挑撥離間製造仇恨的目的都是爲了把水攪渾以便從中漁利。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一面把人群分爲「我們」和「他們」，並且把「我們」的所有問題和苦難統統歸罪於「他們」，一面又恬不知恥地以「我們」的代表、導師和領袖自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接著寫道：「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並且「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和對立，以便……」顯然，共產黨人不是凡人：他們不但「勝過」被稱爲「無產階級群眾」的芸芸衆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爲遵從全能造物主的意志。我對猶太人嚴加防範是爲了保衛上帝的傑作（指雅利安人）」他又

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應該是民意的奴僕而應該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須主宰民衆而不是服侍民衆。」他的「人民啓蒙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我們來自人民，我們是人民一分子，我們把自己看作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又諄諄告誡道：「在我們爲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納粹〕黨就是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農利益的總代表。中共黨魁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欺騙工農群衆跟隨其造反打天下並且殘酷壓榨工農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個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腦滿腸肥、把中國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環境毀壞到無以復加地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居然還在厚顏無恥地宣稱它「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無論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還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都不過是這些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自說自話而已。事實是從來沒有人委託他們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徵求他們自以爲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見。他們的說辭祇不過是爲了他們出人頭地、進而奪取政權、或是爲了長久霸佔他們已經奪得的政權的一種騙術。

三、迷信專制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迷信專制獨裁，同樣憎恨議會民主。

馬克思把民主國家的議會斥爲「畜圈」，並嘲諷議會民主制度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曾經在《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和個人通信中多次談到這個概念。例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到他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在發表於一九一七年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祇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進一步說：「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爲統治階級

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祇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爲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爲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在重復了馬克思對議會民主的不屑與嘲諷後，列寧提出必須廢除議會制。爲了替他的「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集權尋找依據，列寧不惜把兩個針鋒相對的概念湊在一起，炮製出一個子虛烏有的「民主集中制」來，爲後來各共產國家的專制集權打下了理論基礎。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二年爲《意大利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作定義時寫道：「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有關國家的概念，亦即有關國家特質、責任與目標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認爲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他又寫道：「然而帝國要求紀律，亦即對各種勢力及其責任感與獻身精神的協調。這一事實可以闡釋政權實際運作的諸多方面，如國內各種勢力的特徵以及對某些人所必須採取的嚴厲措施。這些人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的這場自發的無可避免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們所信奉的十九世紀的過時意識形態（指民主主義）在任何勇於從事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地方都已被唾棄。這是因爲今天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權威、方向與秩序。」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反對並唾棄民主主義的整個複雜體系，包括其理論前提和實際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爲是多數數就可以主導人類社會，不承認僅僅通過定期投票表決而產生的數字就可以進行統治，並且確認人與人之間有不可變更且有益無害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決不可能通過普選之類的機械過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文化不是由多數人創造的。它們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個人效率的產物。根據這一原理，我們的運動必須反對議會制。即使我們加入議會，那也祇是爲了從內部摧毀議會。換言之，我們要消滅我們必須認爲是人類墮落最嚴重症狀之一的議會。」希特勒又說：「新運動（指納粹主義）的性質與內部組織決定了它必須反對議會制。也就是說無論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自身結構中都必須擯棄一切民主原理，根據這些原理

所有決議需由多數人投票作出，而領導人祇是別人意見的執行者。新運動的原則是無論大小問題，祇能由一個人享有絕對權威並且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共產黨人對專制獨裁也特別偏好。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寫道：「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寫道：「『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祇讓人民有發言權。」他接著寫道：「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祇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祇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這裏有三個問題。首先，誰是反動派，誰是人民，事實上祇能由共產黨決定。既然任何跟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歸入反動派的範疇而被剝奪發言權，那麼所謂的對反動派專政其實是對所有的人專政。其次，即使在所謂的人民內部，要「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也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樣的民主是槍口頂在腦門上的民主，這樣的自由是腳鐐手銬伺候下的自由，祇能用來裝裝門面。再次，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就連這樣一點裝門面的自由權和選舉權，中國共產黨也吝嗇到不僅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反動派，甚至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人民。

四、崇尚暴力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的無比尊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發號「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談到戰爭，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責任、鬥爭和徵服。」他又寫道：「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面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

希特勒一九三七年為納粹黨徒的暴行辯解時指出，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政治制度有種種弊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去除，即便這場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

一九一七年列寧策動的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把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理論付諸實施，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內涵。他說：「我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恐怖手段。」「專政的科學涵義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直接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並認為「用槍桿子來討論比寫反對文章討論強得多」。列寧的專政不僅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對於他自認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列寧說過這樣的話：「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必須在農民中抓一些人質，如果不把積雪清除乾淨，就把他們槍斃掉！」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蘇俄內務部長捷爾仁斯基接受《新生活報》採訪時說：「應該坦承，我們支持有組織的恐怖。在革命時期，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從逮捕到宣判祇有一天時間。幾乎在所有案件中祇要我們出示證據犯人就會招供。還有什麼樣的辯護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報紙《紅色報》這樣寫道：「我們的心腸將變成鋼鐵，並將在苦難的火焰與自由戰士的鮮血之中得到淬煉。我們的心腸要變得殘忍、堅強、冷漠，從而不再容得憐憫，從而不會在敵人的血海面前戰慄。我們將打開那片血海的閘

門。沒有憐憫，沒有寬容，我們將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的敵人。讓他們成千上萬地死去，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當中。爲了列寧和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伏羅達爾斯基的鮮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泛濫成災，我們要讓他們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精神變態的殺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類的文明時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揚暴力和恐怖行爲。

五、鎮壓異己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五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熱衷於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

墨索里尼說：「不憚自稱爲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他又說：「法西斯國家將一個民族組織起來，但也給個人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個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無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將〔由國家〕予以剝奪；而什麼自由可以保留、什麼自由必須剝奪則不能由個人而必須由國家來決定。」

德國法西斯爲建立一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國家用暴力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消滅殘疾人，並製造了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人間慘劇。

俄國共黨領袖列寧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僅殘忍地殺害了已經淪爲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其子女，還消滅了幾十萬反對派人士、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以及「懶惰的」工人和農民。接踵而至的內戰和新經濟政策造成的饑荒又奪走幾百萬俄國人的性命。他的繼承人斯大林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僅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殺害了七十萬俄國人，甚至連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過。

由俄共參養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暴力與殺戮的癡迷更不在其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兄弟黨之下。根據各方面估計，被中共害死的中國人在三千五百萬到八千萬之間。從一開始的殺「土豪劣紳」、殺「A B團」，到抗戰期間在敵佔區用恐怖手段對付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戰人士，再到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把未曾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的全國軍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僅長春包圍戰一役就活活餓死平民二十萬。一九四九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暴力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在一九五零年的一個電報中毛澤東說：「頃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一個縣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爲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

的。」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時寫道：「北京兩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人，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一千人左右也就夠了。……有些城市鎮壓得還很不夠，群眾要求繼續鎮壓，因此仍需大殺幾批，並爭取在七月底以前，殺掉預計數字的三分之二。」這股嗜血濫殺的暴戾之氣到文革時便發展爲全國各地的殺人狂潮和廣西等地的吃人慘劇，到現在便有了中共頭子江澤民「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的說法，便有了中國大陸每年處死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處死人數總和幾倍甚至幾十倍、人體器官連年“豐收”的光輝業績。

毛澤東的黨羽林彪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換言之，撒謊和殺人是共產黨和法西斯奪權與弄權的兩件如意法寶。

六、擴張勢力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六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爲擴張勢力範圍而樂於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從來不否認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暴力革命。

墨索里尼說：「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亦即民族的擴張是生命力強大的表現，而其反面則是墮落的象徵。」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法西斯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出兵希臘、法蘭西；法西斯德國侵佔大半個歐洲，兵臨莫斯科城下；共產俄國先與法西斯德國狼狽爲奸瓜分波蘭，繼而吞併波羅的海諸國，輸出共產革命，強佔別國領土或在別國培植共產勢力進而將其變爲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奴役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產帝國。後來從這個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共產中國也是窮兵黷武，好戰成性，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全不顧人民生靈塗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東南亞等地的共產勢力武裝叛亂謀取政權。中共參養的紅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滅了六百萬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創下按人口比例殺人的世界紀錄。在以蘇共爲首的共產帝國已經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惡政權仍然一面對民主臺灣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對以美國爲首的世界民主陣營竭盡詆毀謾罵造謠誣蔑挑撥離間之能事；

一面跟北韓、伊拉克之類的流氓國家暗通款曲沆瀣一氣提供援助輸出武器，並糾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野蠻專制的中華帝國。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而事實上那些極力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分子。二十世紀幾次大的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都是由他們發動的。

七、鉗制輿論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七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嚴厲控制輿論工具，鎮壓言論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個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幹部給列寧寫了一封信，提議應該允許出版自由，因為「在我們這裏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列寧讀完此信後大作文章，斥責米雅斯尼科夫「滾進了溫情主義的深淵」、「誤入了迷途」。他強詞奪理地說：「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出版自由會成爲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他進而把出版自由上綱上線成一個「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大量篇幅談論宣傳工作和言論管制的重要性。他寫道：「當一種有關世界和人類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經被灌輸給全體人民或在必要時強加給全體人民、而代表這一運動的中央機構則是掌握在爲組成未來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不可或缺的少數幾個人手中的時候，這一新的世界觀就必然會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他爲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起草的二十五條黨綱的第二十三條這樣寫道：「我們要求從法律上向媒體中有意識的政治謊言及其傳播宣戰。爲便於創建德意志民族媒體我們要求：（甲）所有德文報紙的編輯及員工必須是德意志民族成員；（乙）非德文報紙付印以前必須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資助或影響德文報紙，違禁報紙應予鎮壓，涉案非德意志人應立即驅逐出境。必須禁止出版損害民族利益的報紙。我們要求依法追究藝術文化領域中所有對我們民族的生活起破壞性作用的傾向，並查封違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機構。」

師承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按：早在江西“蘇區”）就在其統治範圍內鉗制輿論，甚至不惜殺害突破管制批評中共黨內弊端的文人王實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人們永遠祇能聽到一個聲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清廉；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畝產萬斤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共黨內有人醞釀制定出版法，遭到黨棍陳雲阻止。他說：「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爲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在中共的高壓下仍然是一片「萬馬齊喑實可哀」的肅殺景象。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對互聯網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害怕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是靠謊言和暴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他們害怕人民利用言論自由來揭穿他們的謊言反抗他們的暴力；他們是黑暗中的動物，手中沒有真理，而言論自由正是剝除他們偽裝還其本來面目的燦爛陽光。

八、壟斷經濟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八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反對自由經濟而主張用國家機器來壟斷經濟命脈。

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由共產黨來組織生產活動。自列寧政權以降的各國共產政權都熱衷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其災難性後果有目共睹，毋庸贅述。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黨人所贊同的。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稱爲『企業主義』（corporatism，又譯各階級合作主義）更恰當，因爲它主張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corporate，指工會、商會與黨組共同體）權力。」由於在墨索里尼看來國家權力是絕對的、高於一切的，因此他所謂的「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權力」其實就是黨國控制經濟的另一種說法。

至於德國法西斯則更是共產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的十條措施。除

了其中要求建立農工聯合企業的第九條以外，其餘九條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統統包含在納粹黨的二十五條黨綱之中。

蘇俄共黨發明的計劃經濟其實是用奴隸主的思維方法來管理現代的經濟，自然是一敗塗地。中共效法俄共折騰幾十年，直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才不得不放棄破了產的計劃經濟，改弦更張。過去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共雖然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謂的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在專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資本以苟延殘喘，是三十年代德國法西斯實行的獨裁政治加壟斷經濟的蹩腳翻版，是列寧所謂的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經濟的絕妙例證。這種極權控制下的經濟在短期內確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產資料翻了一翻，失業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是所謂第三帝國的經濟奇蹟，比中共這些年的所謂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壯麗多了。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將扼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它們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四、為什麼社會主義者墮落為法西斯分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的一個雖然美好但是不切實際的夢幻，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則是由此而演繹出來的一個雖然現實但是極其恐怖的夢魘。如果說天堂和地獄祇有一步之遙，那麼夢幻與夢魘應該也是近在咫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大亨們從憂國憂民的天使變成殺人無數的魔鬼這一現象就不難理解。其中既有他們個人及其信奉的理論所蘊含的內在原因，也有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人類社會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說，所有那些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獨裁者們都不是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也未必是生性惡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們在年輕時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銳的觀察力。他們對社會的不公充滿義憤，對他人的苦難滿懷同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社會的弊病以造福於他人。他們通過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而找到自認為正確的濟世良方。然後他們會毅然決然地、鏗而不捨地向別人宣傳他們的見解並鼓動別人追隨他們一起投入他們發起的旨在推翻現有秩序改造人類社會的運動。

然而，如同英國諺語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用好心鋪成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物理運動，它的軌跡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預測。因此，一個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正確與否也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即使由於人們對於某種社會變革理論直覺地認同，在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上也難免有不同的見解，而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平息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使革命運動不至於中途而廢，祇能由獨裁者以理論權威和革命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決斷。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們的好為人師、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社會主義者毛澤東在江西造反時攝



馬克思的朋友巴枯甯談到馬克思時曾經說過：「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

還有別的什麼人是上帝」，「他不僅仇恨資產階級，而且仇恨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爲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爲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這段評語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個獨裁者身上都十分恰當。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領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不容置辯的權威使他們的自我極度膨脹。而當一個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時候，即使他還沒有著手進行跟自己拯救人類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鎮壓人民的勾當，他跟魔鬼撒旦之間也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

另一方面，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他們自身的問題以外，他們所處的社會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必須承認，作爲一個整體的人類是有許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人類的第一個主要缺陷是輕信和盲從。作爲群體的人與人之間是以相互信任作爲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於別人的說辭，特別是對他們認爲是有學問的人的說辭，總是傾向於相信的。這是因爲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經歷不足，無法對別人的說辭進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這種說辭既有誘惑力又有煽動性，說話的人又比較具有個人魅力，那麼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鳴，變成一種富於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動人們盲目追隨他們的領袖做出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情來。這就是所謂的**群衆運動**。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第三帝國的崛起、中共偽政權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這種對革命的理論堅信不移、對革命的領袖忠貞不渝的**群衆運動**。

人類的第二個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膽怯。作爲個體的每一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質疑獨裁者的謊言意味著失去自由，那麼人們寧可選擇沈默；如果反抗獨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爲代價，那麼人們寧可選擇順從。殊不知沈默與順從的結果是獨裁者自以爲得計的竊笑，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劇和災難。等到人們忍無可忍作垂死掙扎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失去的生命永遠地失去了，已經錯過的機會永遠地錯過了。

人們的輕信和盲從使得獨裁者們信心大增，以爲自己從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人們的自私和膽怯又縱容了獨裁者，以爲自己可以爲所欲爲地用暴力消滅一切不同的聲音或潛在的威脅而不受懲罰，從而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

除了輕信盲從和自私膽怯這兩個人類共同的缺陷以外，獨裁者能夠得逞的另一個外部因素是貪婪無恥的奸佞小人的存在。這種人既不輕信也不盲從但卻工於心計；雖然自私卻不膽怯而且心狠手辣。他們如同蒼蠅逐臭一般地趨炎附勢，如同餓虎撲食一般地陷害忠良。爲了在獨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們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賣靈魂也可以出賣親友。他們爲獨裁者出謀劃策、歌功頌德、魚肉百姓、殘害無辜。越是在專制主義橫行的國度裏，這種人就越是興旺發達、繁衍不息。正是由於這種人的教唆與幫助，獨裁者們才漸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人類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著億萬人民的屍骨爬上專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爲虎作倀助紂爲虐的禽獸們最後往往還是死在他們所效忠的主子手裏，正所謂飛鳥盡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從亞戈達到葉若夫到貝利亞，從劉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曾經權傾一時威風八面的共產主義打手們曾經爲他們各自的主子殘害無辜生命消滅競爭對手登上權力頂峰立下無比輝煌的功勳，可是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共產主義絞肉機中結束他們可恥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終，如康生郭沫若錢學森之流，其生前之醜惡行徑也足以將他們永遠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千秋萬世遭人唾罵。

馬克思早年也曾經痛恨專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經幻想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大概沒有想到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議的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而並沒有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實現過。他還說過「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爲人。」他大概也沒有想到按照他的設想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一個「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爲人」的專制制度，更沒有想到「不成其爲人」的既包括被別人專政的人，也包括專別人政的人。是他所宣傳的那種思想和他所主張的那種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人變成了鬼。從利人利己的動機出發，以害人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馬克思和其他所有從社會主義活動家演變而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最大悲劇。

五、必須在全世界杜絕專制主義餘毒

經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類進入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人權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已經漸漸植根於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陣營自四十年代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之後，又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於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至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專制主義的桎梏而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以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某些極端教權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專制主義勢力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俄國，在日本，在歐洲，在美洲，到處都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物及其組織在活動。在中國，在北韓，在越南，在古巴，共產黨人仍然控制著那裏的政權，迫害著那裏的人民。他們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控制人民思想，剝奪人民自由；對外奉行國際恐怖主義，鼓吹超限戰，與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主義勢力相勾結，提供金錢，提供訓練，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窮兵黷武，喪盡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為後盾，以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為賭注，要挾恐嚇國際社會，為保住手中權力不惜與國際民主勢力決一死戰。他們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歷史證明，對專制的沈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為了制止正在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進行的迫害和虐殺，為了保衛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和我們的父兄親身經歷的苦難，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一邊，堅決果敢、不屈不撓地向以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和本拉登的基地組織（Al Qaeda）為代表的國際專制恐怖主義勢力作戰，直到在全世界徹底肅清一切形態的專制主義餘毒。

必須看到，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嚴重的欺騙性，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又多半是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因此世界民主勢力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及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儘管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禍害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烈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非但如此，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體中還有一定的市場。

正因為如此，批判共產主義之荒謬並清算共產主義之罪惡的歷史責任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肩上。祇要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專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俯首認罪，自動解散，我們就

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氣和熱情來揭露它，反對它，打擊它，直到把它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絕不輕信任何理論，絕不盲從任何個人。我們能夠支持和愛戴的祇能是像美國國父華盛頓那樣一心創立民主制度而絕不迷戀個人權力或者是像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那樣決意埋葬專制制度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政治家。

我們必須記住戈爾巴喬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我們必須反過來牢記《國際歌》中的千古絕響：「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記住《獨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由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得會損害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於其上的原則和據以組織權力機關的方式必須是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祇有當我們全體人民瞭解並且珍惜自己的權利，懂得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選擇並且監督政府官員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賢君明主的出現；才能識破貌似合理的專制主義思想，防止專制主義制度把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變成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防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勢力死灰復燃；才能保證人類永遠擺脫戰亂災荒與自相殘殺的威脅，讓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顆小小星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幸福家園。

公元二零零二年於洛杉磯

敬告作者

凡本刊發表稿，除請作者在本刊發表前不要自行上網外（如自己先行上網則不付稿酬），尚請在本刊出版後上網時，如署名本刊發表，則必須使用本刊發表稿。否則請不要署名本刊第幾期發表。本刊亦概不負責。

黃花崗雜誌編輯部

華夏復國告白

歐洲 王雍罡

本文編者按：旅歐中國民運人士王雍罡先生的這篇“華夏復國告白”，有新意，有文采，也飽含著激情和理性。或許，正是因為作者對他的“民運”深情難掩，更寄托著極高的期望，他的筆下才會如此地令人深思吧……。

(一)

華夏復國，不是組織，也不是啟蒙運動，而是一場屬於回歸文明的新運動。她來自於民運，却不同於民運，是民運的新開端，而非與之分標揚道。所以華夏復國就是民運！她是民運根脈的延伸，如同人是父母根脈的延伸一樣；但民運不一定是華夏復國，如同父母不一定是其兒女的道理一樣。

有人問，華夏復國來自於民運，但其與民運之間，究竟有那些不同？我們大致可以告白，他倆之間，有以下六個不同：

一、民運是啟蒙運動。但她隨著國門打開，中外交流，互聯網信息，和大批出國人員深造、移民和旅游；又目睹蘇聯諸國和東歐諸國的自我解體後，使之經過十幾年回歸後的民主改革，皆發生了巨大變化；再加上長期以來的人民，在中共的暴政統治下，歷經了各種恐怖運動，深受其害；尤其是六四開槍，當前的大腐敗，和鎮壓法輪功等宗教人士，迫使麻木的人民，不得不醒悟，由此徹底看清了中共，故爾，當今的民眾，不再需要太多的啟蒙，而是需要一個真理——「接下來該怎麼做」。然我們却明白這一點，所以在人民醒來之時，不再繼續嘮叨啟蒙，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人民，你們要拋棄各種幻想，進行華夏復國，重走原先民主共和之路。這就是第一個不同。

二、民運長期以來，因種種原因，側重邊緣政治。譬如熱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口號的邊緣

政治；熱衷呼籲、聲明、譴責，抗議等行動的邊緣政治；熱衷暴力和非暴力、民主改良和黨國修憲等爭論的邊緣政治。而華夏復國人士，則有所不同，她注重中心政治，直接提出『回歸民主共和』這一專一性的民主目標。中心政治，如同主糧和飲水，而視邊緣政治，則為菜肴和飲料。人無主食和飲水，無法果腹和生存；人無菜肴和飲料，難以下肚和解渴。中心政治和邊緣政治的關係，也是同樣道理。我們若要成功，在這當前的眼下，不是側重邊緣政治，而是應該注重中心政治；這與國內特殊情況下的維權運動，完全是二碼事。但誰主張放棄和輕視邊緣政治，同樣在犯新的政治錯誤；屬於另一種愚蠢的表現。邊緣政治是重要的政治，但她不是主要的政治，所以我們一貫認同和支持邊緣政治；祇是在當今目前，以中心政治為重，而以邊緣政治為輔。這就是第二個不同。

三、民運之中，有不少旁門左道的中心政治，譬如，提倡『主義救國』論；或提倡農民起義式的『推倒重來』論（即主張重建一個『由我制定』的私家國）；或提倡為黨國改良預備，以及為自己將來預備『新憲政』論等。而華夏復國，則與之恰恰相反，她公開反對『各種西洋主義』救國論，提出『民主共和』救國論；公開反對『推倒重來』私家國論，提出回歸『民主共和』公家國論；公開反對替黨國、或為自己預備『新憲政』論，提出使用現存的、經過百年考驗的『民主憲政』論。這就是我們第三個不同。

四、民運之中，魚龍混雜。其中有不少人，即不信仰聖賢偉人，也不信守中華道品，使其不良水分太多，尤其在民運中，沒有政治大旗，造成各人各說自己的主張，各人個做自己的事；從而產生分裂和內鬥，并被某些人吹捧為：這就是民主，這就是自由。導致她五花八門，難以成事，遭人非議甚多。而我們多數之人，信仰中華偉人，信守中華道品；視孫中山為自己的先生，視新中國為自己的目標；視『自強不息，謙謙之德』這一中華紳士的風格，為自己做人的基本準則；并提出這三個回歸，即**回歸中華祖先的共和精神，回歸中華祖先的道德文化，回歸中華民國公家國的民主共和與民主憲政**；把她作為我華夏復國的

大旗，使之軒高醒目，眾望所歸。這就是第四個不同。

五、民運的精神，就是求民主，反共黨。但有些人的反共，是文革叛亂精神的反共，他借民主的名義，懷疑一切，而無的放矢；反對一切，而無所顧忌；唯我獨大，過分看重名利，如憤青怒老，內心有種種私恨、埋怨和不服。反之有些人的反共，則出於民族感情的反共，有著我中華道品的精神，所以這類勇士，反共不反華，處處有的放矢；反黨不反民，在在有所選擇；而且守道明德，善待名利，如仁人志士，內心有寬容、謙卑和仁愛。由於這二種反共，才區分出誰是華夏復國人士，所以我們這些出於民族感情的人士反共，多數之人有著中華道品的精神，讓共產黨人心服口服，讓廣大人民敬佩叫好。這就是第四個不同。

六、民運追求的是民主。但民主這一口號，往往也給人們，常常帶來了困惑。因為在我們生活中，經常會碰到身邊這樣的人，他們時常把民主掛在嘴邊，其目的和作用，常常針對別人的，而不是對准事情的本身，更不能針對他的本人。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毛澤東、陳水扁等無數野心家，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民主口號，不時地被這些流氓利用，使之成為他們招搖撞騙的道具，或者成為他們攻擊別人的武器；人們經常因此被上當，甚至被無辜傷害，導致人民對之無法理解，甚至有些反感，使之號召，缺乏感應。而我們華夏復國人士，明白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知道『民主』一詞，祇是屬於理念性的口號，與實質形式的民主共和，則有完全根本的不同。理念性的口號，容易被人提倡，也容易被人利用。**這就是中國百年民主迷路之關鍵的問題。**所以我們為了防止流氓利用民主，防止野心家濫用民主，故提倡少言『民主』二字，多言『共和』二字，讓人一下子能辨別出，我們不是口頭民主的概念人士，而是追求中心政治的復國人士。這就是第六個不同。

因這六個不同，顯示了我們與民運不同的差別；如同顯示了母子形象不同之差別。大家知道，我們民運的民主，通常是一個很廣泛的文明概念，而不是一個專一的文明概念，所以民主二字，非常適應與社會和生活的層面，如適應在男女之間的夫妻關係上，適應在父母兒女之間的家庭關係上，適應在朋友之間、

或同事之間、以及上下級之間等等的社會關係上。而華夏復國提出回歸民主共和的理念，則完全與之有所不同，它是在民主這一廣泛概念的基礎上，升級為專一的一個政治目標，**即直接針對政治與制度之間的文明關係。**所以這一升級之為，就是對我民運的新補充——屬於一個正面的全新突出；使華夏復國成為民運繼往開來的新運動。

(二)

華夏復國，之所以『來自於民運』，是因為她和民運人士一樣，都是為了愛國的反共；華夏復國之所以『不同於民運』，是因為她深愛自己祖國的同時，也深愛自己原先的國家——民主共和的新中國；華夏復國之所以『是民運繼續的新開端』，是因為她從追求民主廣泛的概念上，直接進入『回歸民主共和』這一專一的政治目標。正因為是這樣的原因，是一切來自於民運的華夏復國人士，不論他們從海內，還是在海外，因大家的信仰和信守的緣故，導致我們之間，團結和睦，少有內鬥，各自皆在【三個回歸】的大旗下，自覺地進行華夏復國；讓人刮目相看，被人稱頌贊揚；使之流傳速度，不亞於國內某宗教。

宗教這一信仰，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而華夏復國，雖然不是信仰，但她勝過信仰，因為她是一種民族情感，屬於本能反應的追求；這種特殊情感，與生俱來，血濃與水，完全是中華基因遺傳的直接作用，所以她比宗教信仰的力量更大。但她却又不是西方那種法西斯民族主義的精神，讓人感覺有一種幼稚加極端的狂熱；其主要原因在於華夏復國，所追求的是「三個回歸」的精神，而不是追求『膨脹、復仇和擴張的法西斯精神。所以華夏復國的號召，能給人民帶來那種回歸故里的興奮，使大家的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舒坦、溫馨和盼望；即使在一旁的西洋人，也會被之感動，由此深深理解，而不再輕易說，這是「中國之威脅」；這就是『三個回歸』的精神，所起的神聖作用。

正因為如此，華夏復國的回歸力量，完全勝過了民族主義；華夏復國的道義力量，完全勝過了共獨、蒙獨、台獨等私家國；華夏復國的特殊情感，完全勝過了宗教信仰，使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對之神聖呼

喚，無法予以回避，內心不得不承認，她將代表的是我們的中華民族，而非代表某個政治黨派或集團利益；她將代表的是中華偉大的祖國，而非代表某個主義政黨的黨國；她將代表的是新中華的公家國，而非代表某個國產的私家國，或外來政權的私家國；讓民眾相信華夏復國運動，不是中共『整人』的運動，而是中華『回歸文明』的運動；不是文革『鬥爭』的運動，而是中華『恢復共和』的運動；不是共產黨「再繼續革命」的運動，而是中華「再重生復興」的運動。一言以蔽之，華夏復國運動，是要求『回歸文明、恢復共和、再重生復興』的新運動。

而且這個新運動，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她有自己明確的信仰；她有自己可靠的信守，她有自己認可的信念；以及她有自己明確的態度、立場和理念。

——她的明確信仰：就是我們的中華先聖和偉人——炎黃堯舜孔孟孫等；而非外來的邪教教主——馬恩列斯毛鄧江等。

——她的可靠信守：就是我們祖先的共和精神，和我們中華之魂的道德文化；而非外來鬥爭的哲學，和專政的學說，以及馬列主義，包括西方其他今生明死、走馬幻燈式的各種『主義』。

——她的認可信念：就是追求當今文明的民主共和；一心恢復我們原先民主共和的真中國。

——她的公開態度，就是反對『鬥爭、反叛、專政』等馬列斯毛鄧江的極端政治；提倡的是：仁愛、昌明、共和」的炎黃堯舜孔孟孫的道德政治。

——她的政治立場：就是打倒中華皇帝式的集權、西方封建式的專制、和西方法西斯式的一黨專政這一三位一體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意恢復中華祖先的共和精神、中華靈魂的道德文化、和中華民國的共和文明——這一三位一體的「中華特色的現代共和體制」。

——她的當前理念：就是終結黨國憲法，追求民主憲政回歸。祇有這樣，才能可靠地保障邊緣政治的各種訴求。如果不是如此，即是在明天的中共黨國，容許某些邊緣政治的存在，也祇是其手上隨便玩玩的案頭物品，時刻會被中共隨手一抬，扔進廢紙樓裏；因為黨國憲法野蠻規定，「一切言行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所以你我當要清醒這一點，時刻不可放棄自己的共和理念！

(三)

有人問，什麼樣的人，才算華夏復國人士？我們的回答很簡單，她祇有一條標準：祇要認同【三個回歸】的人，就是華夏復國人士，而且不需要任何手續登記；因為華夏復國，她不屬於某人、某黨、某派的專利，而屬於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專利，屬於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專利；屬於每一個真中國人的專利。

由於華夏復國『三個回歸』所產生的神聖，使之名字，讓人感到親切又溫馨；給人感覺嘹亮有氣魄。她不像『民主』口號，那麼令人興奮，却似乎讓人有些難懂；她也不像自由口號，那麼令人神往，却似乎讓人難以把握；而華夏復國爽口易懂的名字，同樣明顯地把『民主和自由』這一含義，被深深地包涵在其中，讓人一目了然，不釋自明。所以華夏復國的名字，不僅樸素自然，而且明朗正大；使人心歸神往，對之感召深深，讓人的下意識，在催奮自己的本能，要回家；要康復；要重生。

當人迷路了，就渴望回歸；當人累傷了，就盼望恢復，這是人的本能反應，不需要人來提醒。所以本能的反應，往往勝過理性的哲言。大家知道，主義學說，又太多的理性，讓人感到太複雜，令人頭疼，難以費解。況且在今天的中國，因馬列的太多理性，使我們迷路太深，因主義的太多極端，讓我們累傷太深。因此人民對之討厭，在醒悟之後，希望回歸，而不是『繼續前進』；為此民眾對之反感，在累傷之後，盼望恢復，而不是『深入持久』。

這就是民眾的心聲之呼，這就是時代的脈搏之跳。誰若掌握了民眾的心聲，誰若掌握了時代的脈搏，誰就是中國的新偉人。有不少反共英雄，願意做偉人，在此刻就是機會，您是馬還是驢，一溜便知。

有人勸稱，你不用刺激，我在你的前面，再造一個新的『私家國』，你不就省力了嗎；何必再要『回歸』。殊不知，天下不論集權的私家國，還是專制的私家國，哪個不是水深火熱之迷坑。有人勸說，你不要激將法，我在你的前方，再設置一個新的『主義』，大家不就省力了嗎，何必再要『恢復』。殊不知，西洋任何的『主義』，不論是民主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等，無一不是偏向極端之學說；至於馬列主

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更是屬於【超極端】的主義學說。因此，這以上的二種說法，在今天誰還會對之相信？

況且西洋『主義』，多數都是『內鬥、反叛、不服、標我的』添加劑。誰信仰它，誰就倒黴。共產黨信仰它，使中國人民倒了大黴；民運人士因受各種主義的影響，使我們的民運倒了大黴。我們要明白，中國不需要任何西洋主義，祇需要『民主共和和民主憲政』；祇需要三個回歸的中華道品；有了她，一切之事，就迎刃而解。反之相信各種西洋主義，除了引來互相爭鬥之外，其他的一切，則於事無補。祇是政治經驗的告白！你我當要警醒才是。

由於主義的流毒，使某些人士的反共，并非出於中華道品的反共，而是出於「主義精神」的反叛，純屬是一種【標我】的極端表現。所以這類人多數是掃帚星，走到哪裡，反叛到哪裡。譬如這類人，總是喜歡反叛中華民國公家國；反叛中國的民主偉人孫中山；反叛中華靈魂的道德文化；反叛神、佛、基督和菩薩等聖靈；反叛其他黨派和人士，甚至反叛一起坐牢、一起革命的同仁；而且反叛同仁，往往勝過反叛中共，還有其他等等反叛。像這類嚴重匱乏中華道品的反叛者，其心態極不正常，心理極不衛生，人格極為分裂；不管這類人如何反共，却始終無法取信與人。這就是西洋『主義』，害人的鐵證。

每當這類反叛者，在勸說我們的時候，似乎讓我們又聽到了那個熟悉的聲音，它仿佛類似黨國低沉、陰森的恐怖號角——前進、前進、再前進。同胞們，難道我們的人民，就命該如此，要像充軍發配的囚犯，跟著押送官的『主義』命令，必須無條件『前進、前進、再前進』地走下去？難道我們的百姓，就別無選擇，要像上路套車的牛馬，按著駕車人的『私家國』意圖，必須無條件『前進、前進、再前進』地跑下去？

我們走啊走，跑啊跑，整整走了一百多年，又跑了五十多年，我們不但走得迷路團團，而且跑得傷痕累累。難道我們還要這樣繼續『走』下去嗎？或者再推倒重來，換一個新的私家國；或換一個新的主義，作同樣無休止地『跑』下去嗎？

中共的私家國，已經帶著我們，走得太遠太遠了，而且如此紛飛迷亂，讓我們彌昏難受；中共的馬

列主義，已經把我們大家傷害得太深了，而且如此極端專一，讓我們痛苦不堪。人民為此上當受騙，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難道還要我們繼續再付下去嗎？

所以我們請某些反叛人士：

——當要體恤人民，不要因為你喜歡某『主義』，就要有意阻檔民眾的回歸，再重新誤導民眾，繼續讓其瞎走下去。請問天下民主國家，哪一個用『主義』治國的？

——當要體察民心，不要因為你愛搞某私家國，就要刻意阻止百姓的恢復，讓人民終身不得安寧。請問在中華民國公家國下的共獨、蒙獨、台獨等私家國，哪一個是得人心的？

——當要時常反省，不要再被各種主義感染，處處極端，常常『標我』，要有中華紳士的雅量，處世為人，風度翩翩，待人接物，謙德涵涵。請問如果我們沒有中華道品，這跟中共的反叛有什麼二樣？那麼將在今後，如何替代反動的中共政權？又如何開創眾望所歸的新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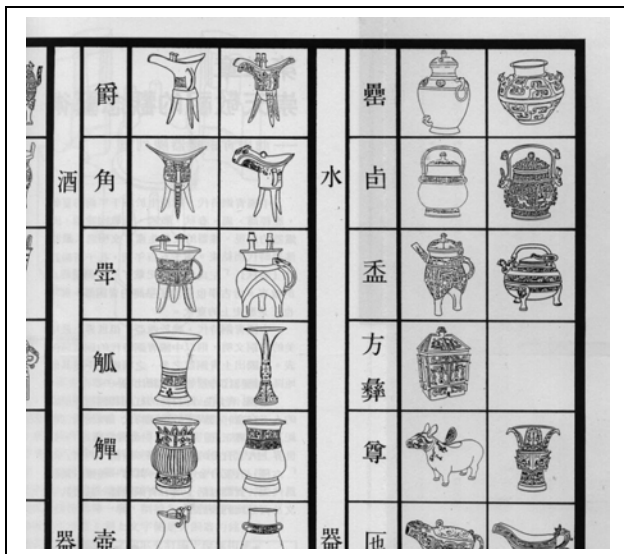
請你相信，人民是愚昧的，而且有時非常不可信；但你千萬記住，人民決不是弱智！在她發現迷路之時，她一定會自我渴望『回歸』；當她被多次累傷之後，她一定會自我要求『恢復』。你我作為她的兒女，應當孝順才是，在她迷路的時候，幫她『回歸』，在她累傷的時候，幫她『恢復』，而不是迷惑她，使其繼續前進；而不是催導她，使其馬不停蹄。你在此刻，反而要盡可能地想盡辦法，使其最後那麼一點氣力，盡可能地用在『回歸』的路途中，和用在『恢復』的過程中；并且儘量防止中共和其他新的野心家，對她作新的誤導性試驗，使人民剩下最後那麼一點力氣，再被他們無辜地消耗使盡，導致她可能徹底地累垮倒下。

……你要清楚地知道，如果大陸不幸崩潰，這對誰都沒有好處。到時中共和有些人，將負有不可逃脫的歷史罪責；所以我們請某些人的您，不要加入這一將遭歷史嚴厲審判的行列中。

有人又問，你們的基本言行是什麼？為此我們可以清楚地告白大家，至少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不信改良政治；不信黨國修憲；不極力鼓吹暴力革命，但不反對大家討論；我們不側重搞邊緣政治，而非不支持搞邊緣政治；我們決不容許『民主流氓』滋事搗亂

民運和華夏復國，更不容許有人無辜傷害他人。我們不僅與蘇維埃連鎖政權的中共，決不進行任何合作；而且與紅色二鬼子黨國的偽中國，決不進行任何承認；抵制推倒重來的各種私家國；抵制各種西洋主義救中國論；反對一切推翻中華民國這一獨一無二【真中國】的反革命言行，并與分裂【真中國】的共獨、蒙獨、台獨等私家國誓不二立。同時鑑於中華道品對我們的考驗，我們將時刻崇拜自己的祖先，信仰自己的偉人；信守祖先的共和精神，弘揚祖先的道德文化；并且支持國內各種維權運動，團結一切反共愛國人士；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的民運，一如既往的支持邊緣政治。我們將時刻警醒自己，決不搞頭重腳輕、虎頭蛇尾、拉幫結派、嘩眾取寵的組織；除非純熟的機會被來臨，我們才會籌建華夏復國團、或華夏復國社、或華夏復國黨，這一切將有大家來決定。我們要隨時歡迎願意認祖歸宗的海內外同胞，并且對他們要真誠友好，用華人的愛心，愛自己的華人，做到【以華愛華】這一高超的政治藝術境界，祇有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自覺地加入華夏復國，為我們回歸【新中國】，添上一份屬於他炎黃子孫的力量。這就是我們基本言行的要求範圍。

最後我們呼籲大家：我們中國的出路，不是主義救國；不是科學救國，不是唯物和金錢救國，不是推倒重來，再立新朝；而是腳踏實地的回歸民主共和，恢復民主憲政，重溫我們中華祖先共和的道德文化。這就是中國明天的唯一出路，也是我們華夏復國人士的究竟之圖！



稅務機構改革

——朱熔基政策的敗筆之一

曾仁全

最近盛傳朱熔基在滬自責哭暈的消息，五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衡山賓館會見上海各民主黨派和專業人士時，他兩度失聲痛哭；翌日在上海大公館會見吳邦國、陳良宇以及上海市委，講到黨內、金融界的黑暗腐敗時，氣昏暈倒。為自己在任內所做的違心事而深感內疚、自責和悔恨。這不是一個政治家的風範，這恰恰表明了他的怯弱和無能。

在他卸任之前，朱曾說他有五大遺憾，即：「違背了自己的信條和誓言（指不從政、遠離政治）；踏入了政治界，脫不了身；違背了自己信奉的哲學，做了違心事；違背客觀規律、現實狀況，開了不少空白支票，打了「白條」；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和立場，在不少問題上搞了折衷和中庸之道；違背了自己曾做出的承諾，會給下屆政府遺留下積壓著惡性循環的問題。」實際上，這種說法是為他自己所做的錯事、所實施的錯誤的政策開脫。

一九九四年，他時任副總理實施的國稅、地稅分設，其目的是為了保證中央那一塊的財政收入，十年時間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是推行的最失敗的政策之一。是朱熔基政策的敗筆。

一、勞民傷財的國、地稅分家

九四年六月，續八四年財政、稅務分設後，依照國務院指示，稅務部門內部分設為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操作系統的國務院明文規定不增編不增設備和基本建設，但執行系統的各、省、市到縣、市政府部門和稅務部門我行我素，令不行禁不止，說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首先，原有的機構全部分成了兩家。由於中國機構的對應性及互動性，兩個上層機構就有兩個下層機構，從省城到縣市分設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從縣市到鄉鎮，全國有千萬個鄉鎮組織，在原有機構的

基礎上就分出了千萬個基層稅務機構，機構增加了，人員及辦公設施也自然跟著增加了，機構猛增，官職也跟著猛增，省市一級的廳局長、處長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縣市一級和基層徵收組織的局長、科長、股長、所長車載斗量，為中國龐大的官僚體制又注入了新的污泥濁水。官員增加了，辦公設施也跟著猛增，三四年後的 2000 年，由於鄉鎮體制的調整和削減，又成建制地跟著削減，從上到下折騰來折騰去，隨意性的制度就有隨意性的機構。

其次，在人事編制上弄虛作假，留下虛空大量進人。機構分設之初，主執各縣、市基層國家稅務局局勢的領導人大量留著人員空編，機構分設後，人員進出的增編彈性也大了，一時間，國稅、地稅部門大量地涌進了政府首腦的親朋和職能部門頭面人物的妻兒好友，僅僅二三年時間，國稅、地稅的人員在九四年未分設的人員編制上翻了一番，四五百人的縣市基層稅務局，到九七年兩個機構已達到一千多人。同時，超編現象普遍存在，稅收成本大大增加。

第三、大興土木增加設施。增加了機構和人員，自然而然要增加設備，吃、喝、拉、撒、住的設施也就要增加，從九四年以來，兩個機構修樓房、蓋館所蔚然成風，而鄉鎮分出來的另一個稅務機構也就不願意「寄人籬下」，另起爐灶徵土徵地，又賒又借蓋置住房和辦公樓房，每個鄉鎮都是如此。隨著鄉鎮經濟的萎縮、鄉鎮體制的變更和合并，每一個縣市投資成百上千萬元的資產大量閒置在那裏，無數納稅人的錢財成了腐敗制度的記憶。

二、優化稅制仍然是一句空話，稅收任務永遠操縱著政策。

機構分設的初衷是優化稅制，通過排除地方干預、確保流轉稅的中央級收入，國家稅務局主要負責增值稅、消費稅的控管，國家把肥肉都挖去後，剩下的骨頭留給地方。地方稅務局主要負責營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二十多個零星稅收的控管，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政策和任務風馬牛不相及。

1、由於政策制定系統的不切實際，稅種、稅目、稅率在執行系統有很大的可塑性，導致操作系統無法把握。首先是稅率高，增值稅的稅率是百分之十七，其它的如營業稅最高 5%、資源稅（礦石）最高是 30/

噸、企業所得稅 33%、個人所得稅 45%，房產稅 17% 等，都遠遠地超過發達國家的稅率，高於經濟增長能夠承受的程度，其次是稅種繁多，納稅人繳納 17% 的國稅後，還要繳納地方各稅二十多種，如資源稅、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等名目繁多的稅種，很多稅種都是重復性地徵稅。

這些目名繁多的稅種和高額稅率在執行系統祇是一紙空文，因為嚴格地按這些標準執行，任何企業和個人都承擔不起。

2、機構分設後，仍然是任務掛帥，從中央到地方每年初都要像分餡餅一樣地分任務，而任務的確定都是以上一個年度完成的稅收任務為基數，一成不變地確定一個百分增長比例，縣市一級稅務局長與上一級稅務局長在討價還價中一錘定音，塵埃落定後再回到縣市增加一個比例後向基層徵收單位「分餡餅」，在斤斤計較中將任務一級一級地分給各徵收單位；以此類推，各徵收單位再在爭論不休中將任務分發給各綫的徵收人員。所以，從中央到地方，不考慮經濟實力，不注重稅源的變化，普遍都是按比例的增長稅收任務。

政策制定的當初就有很大的隨意性，當權者所關心的是絕對的任務完成情況，政策在執行系統也就扭曲變型了，祇要完成了任務，也就一俊遮百醜。政策在舞台跳舞，任務在後台操縱，政策最後祇能服從任務。「包稅」、「定稅」是順理成章的事；「啗口稅」、「人情稅」處處皆是，嚴肅的稅收政策，在執行系統成了有彈性的汽車輪胎，想跑多遠就跑多遠。所謂的「秉公執法」、「嚴格執行稅收政策」全是騙人的把戲。

3、按比例分任務的稅收加大了土域之間的貧困差距。由於稅負增長值都是按比例分配，各地的經濟增長良莠不齊，一面是少數發達地區稅源廣闊，偷逃稅司空見慣，很多的暴發戶在發達地區一夜之間發財；另一方面是貧窮的地區無稅可收、「顆粒必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富的地區，稅負越低，越窮的地區，稅負越高，越收越窮，越窮越收，在內地一些貧窮的縣市，十年前紅紅火火的鄉鎮稅收任務很低，到了九十年代末，鄉鎮企業普遍地倒閉了，但分開的國稅、地稅兩個單位的稅收任務已遞增到十年前的三翻四翻。到了年底為了保住烏紗帽，縣市及鄉鎮領導到

有錢的企業提前「預徵」，或到銀行、信用社貸款完成稅收任務的現象普遍存在。

三、「靈活變通」的稅收政策

俗話說：歪嘴的和尚念著一部歪經。稅收政策到了執行系統就變成了土政策，縣市當權者拿著鷄毛當令箭，「變通」地執行朱熔基體制的政策。

「屠宰稅」是與大眾利益緊密相聯繫的，政策規定由省府制定實施細則，規定在銷售環節從事徵收，但在內地農業縣市，「聰明能幹」的縣市當權者「游刃有餘」，「靈機一動」變為農民「代徵代扣」，即：確定農民為扣繳義務人，農民賣豬時找買豬人「代扣代繳」。

政策變通規定後，一級一級地下達屠宰稅徵收任務，縣市下到鄉鎮，鄉鎮下到村組，村組下到農戶，無論養沒養生豬，都要平攤三五頭豬的屠宰稅「扣繳」任務。最無耻、最黑暗的屠宰稅政策從朱熔基當政後的 1996 年直到 2002 年才在無數農民的反抗下結束。有的地區直到 2003 年才停止徵收。

四、政策混淆不清，兩家互爭「地盤」

從機構分設的當初，因為矛盾衝突和利益衝突，國稅機關和地稅機關對徵收範圍爭戰不休，引發納稅人的厭惡和茫然。

由於稅務人員普遍的素質低，再加上稅收政策操作中模稜兩可，一些從事混合經營和銷售行為的納稅人，營業稅和增值稅的徵收範圍互相攪拌在一起，在對個體經營者徵收中，常常就出現了國稅部門要收增值稅，地稅部門要收營業稅，各自為政、你爭我奪，就像黑社會的爭奪地盤，嚴肅的法紀蒼白無力，納稅人很難適從，人為地製造了紛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著，這不僅是政策性的軟弱，也是制度性的軟弱。

五、稅種「串種」現象層出不窮，機構分設沒有實際意義

機構改革的初衷是保證稅種分級次入庫，保障中央級收入的「大頭」和省級收入的「中頭」，剩下是縣市一級收入的「小頭」。但是，各基層徵收單位為了完成任務，常常是在中央級收入的「大頭」和省級收入的「中頭」上做文章，填補縣市級「小頭」的徵

收不足部份。

由於收入任務是以歷年完成任務的基數調整的，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給貧窮地區稅收徵收工作帶來巨大的壓力，而中央級和省級收入都集中在大公司和銀行業、金融業、保險業、交通業一塊塊肥肉上，依稅種稅率徵收就要超徵，地、縣級收入大多難以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基層稅務局都有招術——改變中央級和省級稅種，入庫到地、縣級收入，這種嚴重違反政策、掩耳盜鈴的方法到處存在。優化稅制祇是一句空話。

不可否認，在共產黨內，朱熔基算不上是一個壞人，還算是個多少有些民心的共產派政治家，但在這個風高浪惡的政治漩渦裏，他就像一個失去航舵的舵手，眼前一片茫茫然，又無力回天。時過境遷，朱熔基已退出了總理的角色，也許他當初的願望是美好的，但在這個百孔千瘡的制度下，他的一切改革制度都是事與願違，稅制改革祇是他在位時改革舉措的一部份，不能說不是一個敗筆。

(上接第 39 頁) 分裂中國一文參考資料：

1. 《AMERICAN HISTORY》，EDMUND J. GEOBEL、MARY RICHARDINE、JOHN E. O. LOUGHLIN 合著，LAIDLAW BROTHERS 出版社出版。
2. 美國獨立戰爭（1775 年～1782 年）2003-03-18 中安網
3. Reminiscences Of The Civil War, (Chapter I) By John B. Gordon, Maj. Gen. CSA
4.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by Randy Golden
5. 從魁北克命運看台獨公投 宋興無（多倫多）
6. 《開羅宣言》（1943 年 12 月 1 日）
7. 《波茨坦公告》（1945 年 7 月 26 日）
8. 從《馬關條約》到《開羅宣言》陳軍
9. Dr. Buckley's Political Science 7, The Cairo Declaration
10. THE POTSDAM PROCLAMATION
11. 美國前總統布什表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12. 日本過去絕對已將台灣交還中華民國（附重要文獻中英文對照）2003 年 9 月 27 日
13. 社魯門政府與中美之間台灣問題的由來 人民網（2003-01-14）趙力。
14. 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台灣的國際地位——歷史回顧，陳荔彤。
15. 台灣主權的重要聲明 「舊金山對日和約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16. 慈禧太后賜釣魚台等三島給盛宣懷的詔書（1893）之研究，丘宏達。
17. 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的歷史與歸宿問題。井上清著，郭明山譯。

絕不做專制的奴隸（歌詞）

北京 鄭易

黑夜慢慢，黎明將臨，
自由民主的陽光，
重將照亮東方的地坪。
不願做專制奴隸的人們，我們團結一心，
喚醒同胞，找回良知，我們要做反復辟的尖兵！
拿出力量，擔起責任，
決不做馬列之奴，我們攜手共進。
前進，掩埋共和先烈的遺體我們前進。
前進，擦乾自己臉上的泪水我們前進。
前進，我們共同前進！

中共官價知多少

韓國豐



眾所周知，在中共專制體制內買官賣官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和秘密，官權市場化進程隨著腐敗的擴散蔓延逐年加快。由於這種權錢交易盛行，人治代替法治，關係代替本事，物欲代替精神，一個本來就沒有什麼公平公正的社會，現在整體更加失去構成一個社會應有的起碼的平衡條件基礎。直接導致社會風氣下沉，道德倫喪，文化貶值，精神萎靡；直接導致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喪失；直接導致國家和人民財產的嚴重損失。但很多人就不知中共官價為多少，怎麼個批發零售，怎麼個操作運轉。其實，中共官價與市場物價沒有什麼區別，有按官位級別高低論價，有按肥差瘦差論價，有按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論價。

先講按官位高低論價。省部級以上權大位高，官價肯定是個天文數字，但有些無法估價，比如江澤民把職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期間弄出一大批走私等大案要案的賈慶林推上全國政協主席大位，這種十分應該追究而又不但不究第一政治責任，反而促其官升三級——從北京直轄市委書記到中共政治局常委到政協主席。這一過程裏面，如果說沒有相當利害關係在起作用

用就肯定不符合邏輯。為什麼江不把發生大案要案相對少些的其他省市書記提拔，而偏偏重用治理福建政治經濟一團糟的賈慶林，江再胡塗也不可能胡塗到此程度。江賈這種明目張膽的私人利益交易，可想而知當中隱藏著多少見不得人的秘密，也許今後歷史會復原江賈交易真相大白於天下。一般而言，省部級或以上官位的官價為幾千萬元人民幣以上；廳級官價為五百萬元人民幣以上；處級官價為二百萬元人民幣以上；最低的科局級官價也要五到幾十萬元人民幣。

第二，按肥差瘦差論價。級別相同的官位，因為管理範圍及對象不同，灰色經濟收入也不平等。所以就有同級不同價發生，如土地局和統計局其官價差價十分突出，僅縣一級土地局局長官價至少三十萬元人民幣，而統計局局長開價最多也不過十萬元左右，差價二十萬上下。因為土地局局長在開發，轉讓土地審批過程中每一筆交易都有沈甸甸的收入。而統計局局長只能幫上級和下級單位及本地區弄一些所謂政績的假數字假材料，就是人們常說的，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但土地部門又比不上財政，銀行等這些直接管理國家和老百姓錢財的部門官價高。在中共體制內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叫跑部錢進，不是跑步前進。即多跑上級掌權掌財的部門，以小錢換大錢，財政和銀行當然就是進攻對象。普遍來說，只要肯花上要求拔款或放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五至十左右作為回扣給審批主管官員，所申請要求基本上都能得到批准。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就這樣被一層一層的官員侵吞，銀行不良貸款及死帳壞帳一年比一年增多。

第三，不同地區不同官價。發達地區物價高官價也高，相比較來講，貧困落後地區的官價就低一些。同級別同部門不同地區官價差價因地而論，比如經濟好一些的廣東官價就比貧窮的貴州高許多，差價幾倍甚至幾十倍。在廣東一個縣級工商銀行行長官價至少二百萬元人民幣，而同一官位的貴州其官價大約二十萬元左右。

中共官價近幾年上漲相當利害，如縣委書記價有的地方已經從以前的五十萬元漲到現在的三五百萬元。上漲的原因很簡單，一方面賣官者要價提高；二方面買官者眾，競爭激烈，抬高官價；三方面買官當後利益越來越好。一個縣委書記就是一個土皇帝，他手下掌握著全縣鄉鎮領導班子和所有科局委辦室的領導班

子及大小國營企事業單位領導班子的殺生大權。一個縣委書記就是一個官權批發零售商，其代理人就是縣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幹部近幾年來跨地區跨行業交流頻繁，表面上說是培養幹部途徑，實際上是官價漲高直接推動的結果。幹部交流得越多，買官賣官市場空間就越來越大。中共一個買到官後調至新地方新單位上任，其下屬馬上爭相送禮，否則，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燒不送禮的下官，下官官位不保。逢年過節，如春節，元旦及中秋節下官必須給上官送禮，官權管理範圍廣的如中共各級黨委書記，要在逢年過節去給其送禮還得預約排隊等候，要知道這種事情，只要有心人在逢年過節時注意觀察他們的住家和辦公室及動向就略知一二。有的中共領導幹部平常想撈一把，又不想直接開口，乾脆無病裝有病或小病裝大病到醫院去留醫，留醫期間叫其下官分期分批到病房去所謂彙報工作，事實上是叫去送禮金。這種領導，中共的宣傳機器還開足馬力給其戴高帽子——為了黨國事業帶病工作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什麼的。

中共官權進入市場，有半公開交易和私下交易，有官內交易和官外交易。明擺著的像中共官員說的，只幹不送，原地不動；又幹又送，提拔重用。這就是對中共內部公開對老百姓不公開的半公開交易。私下交易過程就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了，一旦宣佈人事任免結果人們皆不言自明是怎麼回事。中共官權交易主要是官內交易佔大多數，即下官買上官，上官賣下官及黨內買賣黨內，這種交易比較安全保險一點，官官相護不容易出問題。官外交易，比如私營企業家花錢買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或名譽主席顧問什麼的，主要想尋找一把把政治保護傘，以利自己經濟發展。比如剛被捕不久的福州首富陳凱花錢買福州市政協委員當後，與福建省市縣各級黨政領導幹部進行官商勾結，警匪聯合，魚肉百姓。沒有花錢而當上中共官員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既漂亮又貪權貪財的女性，這是赤裸裸的權色交易；一種是中共內部的皇親國戚，只有全靠關係才能發跡。現在大陸百姓說的，有一個好頭腦，不如有一個官爺佬。

政治獨裁與經濟自由的結合，二者共同培育了中共龐大的官權市場，活躍的官權交易成了歷史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種市場，也培育出一批批中共新權貴階層。官權與官價市場是中共專制之下的特有產物，

這背後不知隱藏著多少罪惡的勾當。雖然這幾年中共也演了一些反腐敗秀的戲給世人看，但專制毒瘤根深蒂固，惡性循環，不可救治。臺上講反腐敗，台下搞腐敗，作人又作鬼，一人兩面。叫中共的人大去監督中共官員和叫紀檢去查辦中共官員案子，就如同叫山羊去驅趕吃稻苗的牛，不但不趕反而與牛一起吃稻苗，最後付出代價的就只有國家和人民。

面對這樣的政黨，面對這樣的體制，我們的人民還有什麼選擇呢。所以，我們要推翻中共這種愚昧而落後的專制，實行普世認可的民主自由政策，全面實行民主選舉各級政府，還政於民，還權於民，只有這樣而且唯有這樣才能根治腐敗，才能恢復社會的公平公正，才能培養國民健康的人格品行，才能提振整個民族精神，才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

賣湯婦

小區外，賣湯婦。
亂髮焦黃面如土，
凌晨五點獨當爐。
寒風如割顧客少，
身旁小兒睡猶熟。
東方漸白人漸早，
手頭生意忙開了。
催兒起來幫我忙，
生意真比昨天好。
忽然一聲呼，
城管到此處。
身邊小販競奔跑，
爐重火紅却難逃。
急欲收拾角落去，
城管皮靴已先到。
一腔煤火化塵星，
炭爐湯鍋盡踏倒。
湯已傾，
小兒驚，
怒目含懼不吱聲。
城管高罵意未已，

上前還要砸火爐，
舍子起身忙將護。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農家有田耕不得，
盡年勞作稅不足。
他爸礦山去打工，
落下塵肺白辛苦。
未忍兒子將輟學，
來到這裏謀生路。
可憐我家路將絕，
手下留情恩如山。
城管聞言不為動，
聽話正如耳旁風。
忍能當面為厲鬼，
豈顧母子雙雙哭，
鍋破爐碎頃刻無。
日出雲開都市鬧，
白領少年意氣驕。
寶馬奔馳流如水，
誰聞風裏哽咽聲漸銷？
垃圾車，
收拾好，
一派繁華淹沒了。

斯大林操刀分割中國領土外蒙古

龍勝熊

八國聯軍統帥，德國瓦德西將軍說：「至於俄國之利益，在於得一虛弱中國為鄰，此故系當然之事，不待智者而知；

因此彼雖對華極講口頭親善（此種親善效果在實際上只使中國土地日減月損而已）！而其方針卻在努力保持中國虛弱現狀，或者更使此種虛弱程度愈為增加」。——轉引自吳相湘著：《俄帝侵略中國史》第208頁

俄國是一個長期、一貫侵華的一個國家，就是到了蘇聯時期也沒有停止侵華。蘇聯分割侵吞中國外蒙古，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外蒙古的土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蒙古民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蒙族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也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元朝在科學、文化上都有突出的發展。元曲就是中國文學上的獨樹創造。

俄國在十九世紀侵佔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領土之後，進入二十世紀，很快就把侵略魔爪伸進中國的外蒙古。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由白俄軍佔領庫倫（即現在的烏蘭巴托）。十月革命後，蘇聯紅軍藉口消滅白俄軍，繼續侵佔外蒙古，並像換防一樣，白俄軍撤走，紅俄軍接著佔領。蘇聯一直在軍事上控制著外蒙古。

斯大林自始至終，是要把外蒙古從中國正式分裂出去。

在中國抗日戰爭後期，中國處在內外交困狀態，斯大林看到侵華時機來了。於是加緊了侵佔外蒙古的步伐。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蘇聯斯大林，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蘇聯克裏米亞半島雅爾達舉行會議。

這是一次秘密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擊敗德國的聯合軍事計劃，以及有關聯合國問題和戰後歐洲政治等問題。

但是，這次會議中，最重要的是三國首腦達成一項秘密協議，也稱雅爾達密約。這是一次沒有中國代表參加，而由三國首腦背著中國政府，秘密討論侵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最主要的扮演者是蘇聯的斯大林。

早在一九四三年底，德黑蘭會議時，斯大林就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之一，是要取得中國的旅順。以後，蘇聯更進一步向美國提出，要取得旅大，作為蘇聯對日參戰條件之一，即把侵略又從旅順擴大到大连。

當時，羅斯福說，大连應作為自由港，並不是將旅大租給蘇聯。

接著，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又曾奉羅斯福之命，向斯大林探詢蘇俄對日參戰條件時，斯大林更進一步表示：

(一) 千島群島與庫頁島南部歸還蘇聯。

(二) 租借旅順、大连及其周圍地區。

(三) 租借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

(四) 承認外蒙古現狀，即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

斯大林的要價，是越提越高，貪心無厭。

上述(一)、(三)、(四)項，都赤裸裸的表現出，斯大林的帝國主義者面貌。所謂「租借」，這是中國人民最熟悉的名字，就是在中國的國中之國嗎！中國人民早就對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的「租借地」恨之入骨。現在蘇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卻又企圖在中國的土地上重復帝國主義的老調。這不是成心欺負人嗎？

而蘇俄在這裏用「租借」一詞，還只是虛詞，是進一步侵略的引線。它的目的是要進佔，是要侵吞。

蘇俄為霸佔旅順，在蘇俄國內還大造輿論，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稱「旅順為蘇聯之寶貝，一如其他蘇聯領土」，且有專書出版，追述旅順之失（指沙皇時期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之後的事）視為遺憾雲（1944年11月

9日，顧維鈞呈蔣主席電，轉引自蔣永敬著：《抗戰史論》第504頁）。足見蘇聯侵華早有預謀。

早在沙皇時期就妄圖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但也尚能承認中國對外蒙古有宗主權，而斯大林卻比老沙皇侵華更徹底乾脆要外蒙獨立。

人們都記憶猶新，日本人佔據東北是對中國侵略，那麼蘇聯割據中國外蒙古，是不是侵略？中國經過八年艱苦抗戰，好不容易收回了東北，卻應該丟掉外蒙古？一邊收回東北，一邊丟掉外蒙。世間有這種道理嗎？

然而就是在這種蠻不講理的情況下，舉行的雅爾達秘密會議，惡魔斯大林提出了侵華的罪惡要求。

在會議中談到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時，曾由斯大林及羅斯福兩人會談一次；由羅斯福、哈裏曼、斯大林、莫洛托夫四人會談一次。

1945年2月8日下午，羅、斯二人會談時，羅斯福對蘇聯提出參戰的政治條件，指出：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群島交給蘇聯沒有問題；大連只能成為一國際共管之自由港。中東與南滿鐵路租借蘇聯或中蘇共管。斯大林則藉口為要說服蘇聯人，則應滿足他們的政治條件。後藉口時間急促，無法徵求中國蔣委員長之意見，斯大林要求先以三國同意，見諸文字。斯大林的所謂「見諸文字」，就是要先成立三國協定。羅斯福表示可以。

1945年2月10日，四人會談時，莫洛托夫提出蘇聯對日作戰政治條件的英文稿。哈裏曼對蘇稿提出三點修正：

第一，原稿之旅順、大連之租借所有權，應使旅順、大連為自由港；

第二，原稿之中東、南滿鐵路之管理權，應由中蘇共管；

第三，應加入對海港及鐵路之協議，尚待蔣委員長之同意。

後，斯大林同意大連成為一國際共管之自由港，但旅順應為蘇聯海軍基地。羅同意。

斯進一步表示，他贊同上述幾項事件須獲得蔣委員長之同意；但蔣委員長對外蒙之現狀，也應表示同意。後因丘吉爾介入，打亂了討論。接著匆促完成協定。

在這裏應該說明的是，俄國歷次逼迫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都是由俄國侵略者執筆起草的。這次雅爾達密約也不例外，仍是由蘇聯起草。從這裏不僅說明，蘇

聯是主謀，更重要的是從草約中可以看出蘇聯的陰險、惡毒。

1945年2月11日，「在最嚴密和最秘密的集會中依次由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急急忙忙的簽了字。當丘吉爾正準備在文件上簽字時，英外相艾登(Anthony Eden)企圖勸阻丘簽署這個協定，但丘撇開了艾登的爭論而說：「整個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地位也許在此一舉」。丘補充說：他將簽字，為的是英國可能在遠東立足。這份雅爾達密約，就這樣地簽了字。所謂英可在遠東「立足」、「地位」，意指因蘇俄佔據了外蒙古，英國可因此使在遠東香港的地位，得到鞏固了。

雅爾達密約，原名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協定〉，英文名為“Agreement Regarding Entry of Soviet Union The War Against Japan”。

(以上資料，參見蔣永敬著：《抗戰史論》第507-508頁

以上就是蘇、美、英三國政府首腦背離中國政府和人民，所開的損害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秘密會議的簡況。這是一次嚴重損害中國獨立和主權的會議，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侮辱和傷害。這是一次列強瓜分中國的會議，是一次極不光彩的會議。這次會議再一次開啟了強權政治統治世界的惡例。

雅爾達密約譯文如下：

「三強領袖——蘇俄、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致協議，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之二或三個月內，在下列條件下，蘇俄應即參與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一，外蒙古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應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零四年之侵攻，而被攫奪之俄國原享權益將予恢復，其中包括：

(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將交與蘇俄。

(二)大連商業港，列為國際港，蘇俄在該海港內之特別權益將予保障。蘇俄並得恢復租界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

(三)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將由中國及蘇俄合組之機構共同經營。三國同意，蘇俄之特別權益，應予保障。中國繼續保持在東北之完整主權。

三，千島群島將割讓交蘇俄。

三國並確認對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鐵路之各項協議，須徵求蔣介石主席之同意。羅斯福總統在斯大林元

帥之建議下，將設法獲取蔣主席之同意。三強領袖獲致協議，在擊潰日本之後，蘇俄上項要求，將毫無疑義地得以達成。

蘇俄表示樂意與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協定，俾得以武力協助中國自日本壓迫下求解放」。

（以上轉錄自陳鑑波著：《中華民國春秋》第840頁）

對這份密約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密約中公開提出「一九零四年」時的問題。很清楚一九零四年，還是沙皇統治時期。到了一九四五年，亦即四十年後，在蘇聯時期，斯大林仍要搬出老沙皇時期的舊帳。這豈不充分證明：斯大林是完全在繼承老沙皇侵華的衣鉢！

當時，這份密約，不僅對社會公眾保密，而且對中國政府，及中國最高領導人也保密。羅斯福也深知這份密約的嚴重性，他把這份密約牢牢地鎖在保險箱裏，甚怕泄露。直至他死後才被取出。

從該協定的內容，可以充分看出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是參加協議的三國以損害中國利益為資本的一筆政治交易，是列強在分割中國。

據若干史書分析，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已患重病，走路要靠輪椅。就在簽秘密協定的二月底，當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去白宮會晤羅斯福總統時，「使他大吃一驚，發現羅的健康極壞，形同枯槁。他聽說羅、丘、斯已經達成一項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秘密協定。羅則斷然加以否認」。赫爾利認為：「當羅斯福總統參加雅爾達會議時，他已經病入膏肓」。

據史家分析，羅斯福之所以急於要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是希望借蘇聯參戰，減少美國在戰爭中的損失。所以，不顧中國利益，拿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作交易。出賣了中國老朋友，出賣了中國人民。

後來，當羅斯福感到這份協定不當，要赫爾利去向英、蘇提出改變此協定時，已經晚了。羅斯福在簽訂該協定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即因腦溢血，突然去世。終年六十三歲。所以這份不公協定，也是羅斯福總統最後留下的一份禍害。他在九泉之下，不知知道否？

雅爾達會議及協定的主要禍首是斯大林。斯大林就是當代新沙皇，或者說是沙皇的化身。從問題的提出，到協定的討論，乃至協定的形成，都是斯大林一手包辦，所以，斯大林是雅爾達秘密協定的罪魁禍首。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會上發言不多，但是對斯大林的諸多無理要求，都是默認的。當時他心裏有虧，就是英國佔據香港。他為保住佔據香港，所以對斯大林，不敢說「不」。最後也是乖乖地在密約上簽了字。丘吉爾活的命長，到一九六四年才死，活了九十一歲。

這份密約，根本沒有徵求中國政府的意見，因此，對中國政府絲毫沒有約束力。

中國人對這份密約持何種態度，這是衡量有無民族意識，或者是否愛國的一個重要標誌。凡是愛國者，凡是熱愛中華民族的人，對這份傷害中華民族領土、主權和命運的秘密協定，都會非常氣憤，和無法接受。只有喪心病狂，甘心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人，才會為之叫好。

這份密約的出現，與美國決策者的判斷錯誤，有密切的關係。其錯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日本軍事力量估計錯誤，認為日本似乎還有強大的反抗力量；二是對蘇聯的對外擴張、侵略性認識不足。蘇聯對日參戰不是為了戰勝日本，而是為了侵略中國。這一點，美國決策者如果沒認識到，那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中共對該密約的出現，負有極大責任。首先在抗日時期，中共沒有認真抗日，而是不斷為抗日扯後腿，破壞全國抗日大業，致使國力遭到損害；其次，中共為參加共產主義廟堂，爭取成為這個廟堂的夥計，對蘇俄百依百順，獻媚取寵，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甚至不顧一切幫助蘇俄侵華，成為蘇聯侵華的幫兇。

據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美國國會的證言，中共是最早得到雅爾達密約的內容，即在簽約後的兩個月之內便探獲。（引自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第404頁）

中共既獲知這份密約，對這份是什麼態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是測量中共是愛國，還是賣國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實際的表現，中共沒有站在中國人一邊。中共完全贊成蘇俄製造的雅爾達協定。中共沒有指出蘇俄是對華侵略，沒有對蘇俄提出任何批判，沒有任何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表示。從這裏完全可以看出，中共根本不是愛國的，而是賣國的。

有三個國家首腦討論和決定另一個國家的命運，瓜分另一個國家的領土和主權。這根本是違反國際法的。國際法完全沒有這種規定，如果有這種規定，那也是錯

誤的。同樣，國際法也沒有規定任何一個國家向外侵略是合法的。

因此，這份雅爾達密約，至少在四個方面違反國際法：

第一，它破壞了一個主權國家維護領土和主權的神聖權利；

第二，它違反了不容對外侵略的根本原則；

第三，它背著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討論、瓜分這個主權國家的領土和權益；

第四，它開啟強權政治的惡例。任何幾個大國，就可隨便決定和瓜分另一個國家的領土和主權。這是國際法所不容許的。

所以，這份雅爾達密約是根本違反國際法的。這樣一份密約，對中國永遠沒有約束性。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可不遵守這份密約的所有規定。

任何國際法都沒有規定：一個國家對外侵略是合法的。蘇聯侵略中國，蘇聯就是違背國際法。

中國人完全有理由收回被俄、蘇侵佔的所有領土。這是中國人的權利和責任。

俄、蘇侵略中國，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特殊問題，是個個案。所謂特殊問題，就是蘇俄是侵略中國最長的一個國家，是使中國遭到最大損害和傷害的國家。特殊問題就應用特殊辦法來解決，不能用一般的所謂法律問題來處理。

一九四五年三月間，赫爾利繼續和羅斯福會晤，最後他說服總統讓他查閱雅爾達會議的記錄，找到了關於蘇聯參戰的秘密協定的簽名副本。他用鉛筆抄了這份協定，並加評註。他把這個協定的抄本拿給總統看，總統也為之不安。羅便給赫爾利一項特殊指令：要他去到倫敦和莫斯科向丘、斯談一談，尋求辦法，來彌補對中國的背信行為。（選自蔣永敬著《抗戰史論》第509頁）

1945年3月12日，中華民國駐美大師魏道明對國內打回密報電文：

「頃謁羅斯福總統，詢其雅爾達時斯大林所談遠東有關之事，究竟如何，總統謂：斯大林曾提三點：一，維持外蒙古現狀，二，南滿路所有權屬於中國，但業務管理，宜有一種委託制度，三，蘇俄希望在海參崴以南獲得一溫水軍港如旅順或附近之港，羅斯福意見，維持外蒙現狀，其主權仍屬中國，似無問題，南滿鐵路主權亦屬中國，業務管理只在增進效率，委託制度，大約有

三方組織之，中美蘇各派一人，但均應為鐵路專家，至第三點之軍港問題，是一新的要求，在前談大連之外。……總統意或以旅順長期借與蘇俄，主權仍屬中國，對與蘇俄遠東參戰，總統謂時機成熟，一定參加，此點必須極端秘密，以免敵人增加防範。中共問題，總統未與斯大林談及，但覺斯氏對於遠東一般態度尚好」。（引自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第405頁）

魏道明大使這份電報，充分說明了羅斯福所知道的和應允的，對與外蒙古、南滿鐵路與旅順港等條款的肯定解釋。並未承認外蒙古獨立，南滿鐵路並非蘇俄專管，或中蘇共管；而旅順港之主權，仍屬中國。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因腦溢血，不幸逝世。這是僅在雅爾達秘密協定簽字後的兩個月。這不僅是美國的損失，也給中國造成重大損失。

羅斯福去世後，斯大林就以雅爾達協定的權威自居，無顧無慮，對雅爾達協定任意解釋，無限擴大。

羅斯福總統去世後，有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

杜魯門匆促上任，對外交情況不熟悉，甚至不知中俄的關係史。他對華態度，遠較羅斯福為惡劣。他不想廢除雅爾達協定，卻支持重建在華的俄國帝國主義計劃。他派遣親共的戴維斯（Joseph E. Davies）去倫敦見丘吉爾；派遣將要死的霍布金斯去莫斯科見斯大林，向丘、斯表明杜魯門支持羅斯福所訂的每一項協議。（參見蔣永敬編著：《抗戰史論》第513頁）他不是如同羅斯福所指令赫爾利那樣，去說服丘、斯更改對華的背信行為。

駐華大使赫爾利，及駐蘇大使哈裏曼對中國態度都較好。哈裏曼早就主張對蘇採取強硬路線。但作為總統的杜魯門對華態度不好，作為大使的人也難以發揮更多作用。

1945年5月22日，赫爾利大使向蔣中正主席密告雅爾達協定內容。這時還只是「密告」，而不是正式告知。當然更不會是徵求意見。

1945年6月12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急忙將雅爾達密約面呈蔣主席。文件稱：「締結中蘇友誼互助條約的先決條件」。

蘇聯及俄國所有逼迫中國簽訂的條約，都冠以「友誼」、「友好」、「互助」之類的美名；實際都是侵略。中國人切勿上當。

彼得洛夫把密約通知中國的目的，是逼迫中國儘快簽訂中蘇條約，有了條約，蘇聯就可名正言順侵入中國。他們已經看到日本即將投降的形勢。早拿到中蘇條約，他們便可及時掠奪日本投降後的果實。

這年6月15日，赫爾利大使才奉杜魯門總統指示，正式將「密約」通知中國政府。時已是簽訂密約之後的第四個月。這是美國政府很對不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又一步錯。

雅爾達密約絕不僅僅是一個密約問題，而是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都有無法估計、至大且深影響的一件大事。

斯大林這一侵華步驟，有如重重一錘，即將把一個完整的中國打碎，不僅奪走中國的外蒙古，而且造成中國四分五裂。斯大林的這一侵華步驟，比俄國歷史上任何一位沙皇侵華都要嚴重許多；比日本幾十年的侵華罪行都要嚴重萬分。日本割佔臺灣五十年，但是沒有能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日本佔據東北十四年，也沒能把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可是斯大林的雅爾達秘密協定，卻把中國的外蒙古分割出去；不僅如此，還肢解了整體中國。斯大林給中國造成的傷害，遠比日本人給中國造成的損害要大得多，深遠得多。就其後果看，斯大林的侵華罪行，遠比日本侵華戰犯大得多。日本侵華，最後得到的是零；斯大林侵華得到的，是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巨大財富，並打碎了大中國。

這個雅爾達密約，是對中國的催命符。

1945年6月30日，在蘇俄緊鑼密鼓的催促下，中國國民政府在不得已情況下，與蘇聯代表在莫斯科開始談判。中國是非自願的，被迫的，與蘇俄進行極不公正的談判。

中方談判代表為：宋子文，行政院院長；
沈鴻烈
胡世澤，外交部次長；
蔣經國
傅秉常，駐蘇大使。

蘇方談判代表為：斯大林統帥；
莫洛托夫，外交部長；
彼得洛夫，蘇俄駐華大使；

索洛夫斯基，次長；

柏巫洛夫，翻譯。

這次談判，斯大林以新沙皇的角色，親自上陣。在每一次談判中，都充分表現出斯大林對華侵略的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以及蠻不講理的惡劣態度。

中蘇這次談判，共分兩個階段，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二日為第一階段；八月七日至十三日為第二階段。在兩個階段當中，一共會談十一次。對中國代表來說，是在極端不利的艱難情況下進行的。所謂不利者有，對雅爾達密約有所悔悟的羅斯福，已經去世。美國沒有有力量的人替中國撐腰，幫中國說話。新任總統杜魯門對蘇俄又怕得要命，不敢得罪蘇俄，不支持中國。丘吉爾老奸巨猾，多在一旁看笑話。而斯大林像任何一位老沙皇一樣，對「密約」條文內容隨意擴大，甚至無理耍賴。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談判的任務是異常艱巨的。幾乎每邁進一步，都會遇到蘇俄代表的無理敲詐和勒索；特別是新沙皇斯大林的蠻橫無理，實在令人難以容忍。

在中蘇談判過程中，斯大林竭盡勒索敲詐之能事。僅以外蒙古為例，斯大林就完全繼承沙皇衣鉢，硬行要強吞外蒙古。

雅爾達協定為：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予維持。

羅斯福的說明為：維持外蒙古現狀，主權仍屬中國，似無問題。

中國政府態度：外蒙問題「暫予擱置，亦即目前暫不討論」。杜魯門似亦默認此議。

斯大林對外蒙要求，則遠遠超過密約規定。他說：「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蘇聯在遠東之地位，日人亦已試過。如吾人在外蒙無自衛之法律權，蘇聯將失去整個遠東」，「日本即使投降，亦將再起。因此之故蘇聯在外蒙應有自衛之法律權」。

「為中國計，割去外蒙，實較有利」，「如此問題不能實現，外蒙古將成為所有蒙古人團結號召之點，此對中蘇兩國均屬有害。外蒙將統一所有自內蒙古至北蒙之蒙古人民。外蒙領袖認為外蒙以南尚有甚多之蒙古人民」。

「蘇聯曾承認外蒙為中國之一部，自為事實，但戰爭之教訓是吾人改變吾人之見解，外蒙之獨立，對中、蘇兩國均較有利，使蘇聯遭遇日本威脅時，可有權通過外蒙」。

「外蒙對中國及蘇聯均無實惠，但地理上之地位，實屬重要」。「外蒙為一防衛問題」。

「外蒙如不獨立，蘇聯進兵外蒙，即系進兵中國領土，易為將來衝突之源」。

以上，就是在談判時斯大林反復強調吞併外蒙古的「理由」。

斯大林完全是語無倫次，自相矛盾。他說蘇聯戰後，建設西伯利亞國防需要二十年，為防備日本侵略，蘇聯需要外蒙古。又說，日本投降後，二、三十年內不會對外侵略，但三、四十年後就可能又對外侵略。按斯大林所說，日本在戰後二、三十年內不會對外侵略，又何須為防日，而侵佔外蒙古？而二十年之後，蘇聯西伯利亞國防也已經建好；既建好，自可防日，又何須侵佔外蒙古？

斯大林上述各點，沒有一點是能夠站得住腳的。按照斯大林所說各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都可以成為中國人需要保持外蒙的理由。中國強大，不是也可以保衛蘇聯嗎！

中國代表與斯大林反復爭論，堅持不能承認外蒙獨立之理由；指出：「蔣委員長熟慮以後之意見，不能承認外蒙之獨立」；並指出雅爾達協議是「外蒙保持現狀」。美國國務卿電美駐蘇大使，也指出，所謂保持現狀乃系中國在外蒙法律上保持其宗主權。

斯大林則耍無賴說，所謂雅爾達議決案涵義即為承認外蒙獨立。他說：「該方案為蘇聯之方案，即系莫洛托夫所起草者，彼等（羅、丘）僅照式簽字而已，此語餘可在丘吉爾面前重申之」。說它可向英、美面質，等等。當時羅斯福已去世，只丘吉爾還活著。斯大林去找誰對質？莫洛托夫在旁幫腔說：「此為斯事之真相，吾人之方案涵義即為獨立」。

雖經中華民國代表一再與蘇方談判，但在蘇聯一再強迫下，及中共支持蘇方打壓中央政府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代表被迫提出：在蘇聯承認中國在滿洲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蘇聯能依據約定，協同消滅新疆叛亂，阿爾卑斯山脈原屬新疆，應仍為新疆之一部；蘇聯只對中國中央政府予以精神上與物質上之援助。如蘇聯接受以上三項要求，在中國擊敗日本後，准許外蒙之獨立，為避免將來糾紛起見，擬採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後，中國政府當宣佈外蒙之獨立。

接著，斯大林為了更多侵佔中國領土，又提出外蒙的疆界問題。中國代表明確提出應以舊地圖為憑。斯大林則堅持應以現有疆界為憑，所謂現有疆界，即蘇聯已把屬於中國的唐努烏梁海劃入蘇聯境內；另一方面又將新疆一部分領土阿爾卑斯山劃入外蒙。從此可見，斯大林侵華是步步逼人，寸土強奪。就這樣，蘇聯不僅侵吞了唐努烏梁海，割裂了中國外蒙古，而且又割去了新疆的一部分。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用了八年的艱苦抗日戰爭，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終於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收回了東北和臺灣。可是，斯大林通過一紙《雅爾達密約》，卻又奪走了中國的外蒙古。外蒙古的面積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而東北和臺灣的土地面積，合計也只是一百萬平方公里。斯大林割走的外蒙古比東北加臺灣的面積還多一大半的土地。世界上有這樣的道理嗎？

斯大林與東條英機有什麼不同？

中共「抗日」叫得震天響，為什麼對蘇聯侵華，割佔去比東三省還大許多的中國領土，卻一聲不響？中共對蘇聯侵華不僅沒有任何反對，反而大力支持，這不就完全喪失了中國人的立場了嗎，他們與溥儀、汪精衛又有多少區別呢？

中共或許在觀念上有一種認識，即把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國國家完全分開，似乎蘇聯侵華是侵略中國國民政府，而不是侵略中國；蘇聯侵佔的不是中國的土地，而是中國國民政府的土地。因此，對蘇聯侵佔中國大面積領土，不僅聽之任之，而且興高采烈。從這裏不難看出，中共還有一點中國人的味道嗎？中共把中國國民政府擠到臺灣去了，難道「老大哥」把割佔去的中國領土，交回給了削尖腦袋想做「小老弟」的中共了嗎？

外蒙古是一塊巨大的試金石。用它可以區分誰是帝國主義，或不是帝國主義。用它可以區分誰是愛國，誰是賣國。凡是侵奪外蒙古的，就是帝國主義，就是侵略，不管它是沙皇，還是蘇俄。蘇聯侵奪外蒙古，蘇聯就是帝國主義。凡是維護外蒙古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就是愛國主義，反之就是賣國主義。

斯大林侵奪外蒙古，斯大林就是帝國主義者。

就是斯大林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一個侵華惡魔。竟然被毛澤東吹捧為「聖人」、「導師」、「恩人」、「權威」、「經典作家」、「大救星」、「最親密的朋友」。等等。

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剛跨進莫斯科的大門，見到斯大林就卑躬屈膝的說：「維持雅爾達協議的合法性是必要的」。他堅決維護雅爾達協議，完全喪失一個中國人應有的骨氣，成為一個卑微的賣國小人。

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當杜魯門總統在白宮接見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時，宋子文院長當即對杜魯門總統提出中國政府對雅爾達協定中有關中國問題的若干保留意見。同時宣稱：「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同意讓蘇俄按照雅爾達協定的規定，在東三省行使這樣程度的控制權！中國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軍事行動來解決這一爭端——在今後五百年之內隨時都可以這樣做」。鏗鏘有力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決心和態度。表達了炎黃子孫，世世代代都不會忘記蘇俄帝國主義者侵略、割裂中國領土的罪惡，以及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恥辱和傷害，即使幾百年之後，中國人民也要報仇雪恨。

後來，蘇聯硬逼迫中華民國政府簽定一份《中蘇友好條約》。簽約之後，日本已經投降，蘇俄卻仍派大批軍隊侵進中國東北來「抗日」。日本投降了，還需要你蘇俄來「抗日」嗎？

蘇俄軍隊中，很多都是勞改犯人。這些蘇俄軍隊侵進中國東北後，燒殺搶掠，運走中國東北全部機械設備，搶劫東北銀行的黃金美鈔。把個東北洗劫一空。不能搬走的，全部加以破壞。

由於蘇聯一再破壞中蘇「友好」條約，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聲明，廢除中蘇並不友好的條約。

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部長葉恭超聲明指出：基於中華民國政府所提出之事實及證據，聯合國大會第六屆常會於四十一年二月一日（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通過決議案譴責蘇聯，指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就日本投降後對中國之關係而言，實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簽訂之友好同盟條約」。

蘇聯此種背信違約之舉，已使中國及中國人民受有嚴重之損害與不堪言狀之痛苦。

由於蘇聯不顧其在中蘇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下之義務，繼續對中國進行侵奪、敵對之行動，意圖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為一自由獨立民族之權利。蘇聯此種行動，迄今尚在進行之中，而其狂妄暴戾之程度與日俱增，從而嚴重威脅東亞及世界之和平及安全。

在此種情形下，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該約及其它有關文件既因蘇聯之行動而歸於無效，中國自有權解除其所受該約及其它有關之文件約束，爰正式宣告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有關文件為無效。中華民國政府並保留中國及其他國家人民對於因蘇聯違反該約及其他有關文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之權。

經中華民國外交部聲明廢除中蘇條約，很有必要。既廢除該條約，自然外蒙古仍應列入中國版圖之內。所以，中華民國地圖長期把外蒙古看成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應該說明的是，當蘇俄侵略外蒙古時，外蒙古的上層王公貴族和廣大蒙族同胞是不願意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只是由於蘇俄收買一批貴族敗類和叛徒，這些人就像中共匪徒一樣，對不同意分裂的蒙族同胞，一律殘酷殺害。所謂「公民投票」問題，也是在俄國刺刀下嚴密控制下舉行的，根本不能體現民意。外蒙人民並不願從中華民族大家庭分離出去。

由蘇俄新沙皇斯大林主導泡制的雅爾達密約，自簽字至今已經過去五十八年。這五十八年的歷史，不僅證明美國政府簽定這個密約是錯誤的，更嚴重的是它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和整個世界的佈局。它給世界造成嚴重災難和無法估計的損失。從美國來說美國簽訂這份密約，不僅是道義的喪失，出賣了中華民國這個在二次大戰中同舟共濟的老朋友，而是給中華民族帶來無限的災難和損失。由於這份密約，不僅使中國失去了外蒙古這一大塊領土，而且使蘇俄侵略軍隊得以長驅直入中國東北，燒殺淫掠，搶走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更為嚴重的是它使蘇俄帝國得以扶植中共傀儡政權；使大陸從美國的朋友變成美國的敵人，壯大了以蘇俄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使美國在亞洲變得很孤立。後來連續發生的韓國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這份雅爾達密約留下的禍根造成的。據說羅斯福總統之所以簽訂這份密約，是為了減少美國士兵在對日戰爭中的傷亡。可惜羅斯福總統未能活到五十年代，倘若他能看到韓戰及越戰給美國人員造成的傷亡和損失。不知他會有何感想。

美國政府簽了一份雅爾達密約，拋棄了一位朋友，惹來了一幫敵人。

倘若沒有雅爾達密約，就不會有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不會有戰爭的根源。世界和平就會早日實現，世界各國都可得到迅速發展。

所以這份雅爾達密約，不僅損害了中國，也損害了美國，更損害了世界。這是一份最壞的密約。

從美國簽訂這份密約，說明美國當時的政治家對共產主義政權認識非常膚淺，沒有看到這個政權的殘酷性、狡詐性；只顧一時的小利，而損害了長遠的利益。

現今中華民國雖然退據臺灣，但仍然存在。這個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獨立、合法的政權。接受雅爾達密約的教訓，美國今後應該大力支持中華民國，大力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支持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本來就是中華民國加入創立的。這是歷史事實，任何人都否定不了這個事實。中華民國並沒有消失，她依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任何人，任何國家，對中共政權不應姑息養奸，不應無原則退讓，不應只為了眼前的一點經濟利益，而損害根本的和長遠的利益。與中共可以做生意，但在政治上，在原則問題上不應有絲毫幻想及退讓。應該名正言順，就是要支持中華民國。

俄國葉利欽極力鼓動江澤民攻打臺灣的中華民國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華民國一直堅持外蒙古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在俄國人看來，把中華民國消滅了，就沒有人再說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了。江澤民拼命叫嚷：「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進而為俄國分割外蒙古合法化掃清障礙。江澤民賣國奴性十足，一聽到「中華民國」四個字，就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他就怕中華民國政府說：「外蒙古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實中華民國政府應該以毒攻毒，與江澤民賣國賊們對著幹。他們叫嚷「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就應該聲稱：「外蒙古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中國人民希望外蒙古人民在飽經俄國壓榨，遭受無窮痛苦之後，能早日回到中華大家庭的懷抱。但不是回到中共的統治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黃沙俄匪中華血

曾任臺灣在大學軍訓總教官的郭岐將軍，將他民國三十四年，任國軍四十五師少將師長時，在新疆與入侵的蘇聯紅軍激戰的史實，寫成《碧血黃沙戰新疆》一書。現將其中的《自序》等幾章刊出，以饗讀者。

——本刊編輯

自序

新疆古稱西域，為我國最大之行省，位於我國大西北，地大物博，民殷物富，國防資源特豐，致為北鄰俄國，多所覬覦，時圖染指。遜清同治末年回亂，帝俄藉口保僑，進軍伊犁，攫為已有，雖經外交交涉，仍不允撤軍。

時至光緒元年，左宗棠文襄公力主武力收復失土，乃率大軍入新。先將境內回亂平息，繼將俄軍驅逐出境，大好山河，金甌無缺。左公環視內外邊情，籌思久治良策，乃向清廷奏請建省。其奏中有云：“……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指臂相連，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非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宴安之日矣……”讀此一名奏即知新疆地位之重要。

民國鼎革，主政新疆的楊增新，一因才大認遠，治新有方；二因歐戰爆發，帝俄參戰於先，共產革命於後，因北領內部有事，無力外侵，新疆治安得保無虞者二十年。迨盛世才主新，為了保權護位，致被史達林所乘，竟將紅軍第八軍團，開進新疆，進駐哈密，就此新疆陷入鐵幕，達十年之久。

一九四一年，德蘇因瓜分波蘭未果，乃引起大戰爭，俄京被圍。史達林為解危救急，急調原駐新紅軍第八軍團離新應援。盛世才乃乘機擺脫俄帝控制，輸誠中央。

國軍於民國三十二年相繼入新。就在此時，德蘇戰事有了變局，俄軍在獲得大量美援下，於史達林格勒一役中，將德軍擊退，俄酋史達林在喘息之餘，仍未忘懷侵新故技。即時下令行軍哈薩克斯坦的紅軍第八軍團，

重任侵新主力，回師伊犁。這就是民國三十三年冬，在伊犁發行暴亂事件的由來。

著者原任五十八師少將副師長，率部駐防於河西首府所在地的涼州城。於民國三十四年元旦，奉命入新增援。原駐守伊犁山外精河前線，四十五師謝義鋒師長，正調升新二軍軍長。筆者適時趕到，就受命繼任為該師師長。雖在陣前易帥，幸而未辱使命，固守原陣地達半年之久，未使敵騎越我雷池一步。敵人攻勢受阻，乃繞道先進襲塔城，繼進攻烏蘇。烏蘇是軍部所在地，正是我四十五師的大後方。當烏蘇吃緊時，四十五師奉命放棄精河東援烏蘇。

結果敵騎先至，四十五師應援未果，全師被困於無垠的戈壁灘上。在彈盡糧絕，嚴重缺水情況下，大部渴死於沙漠中，小部作了敵俘。本人雖多活了十天，最後亦渴死於大自然的懷抱中。就在魂歸鬼門關時，竟被敵方救活。這就是著者作了忠烈祠裡再世人的原委。

著者現年八十有二，特將四十三年前往事，憶寫成書，決不是為吐死去活來的苦水，而是要以往事作證，籲請國人睜大眼睛，認識我國的真正敵人就是北極熊俄羅斯。這不是著者的管見，凡是新疆人或到過新疆的人，均有同識。猶憶道光二十二年，在鴉片戰爭失敗後，林文忠公被貶伊犁，在目睹邊疆實情下，曾慨乎而言曰：“終為中國大患者，其俄羅斯乎？”事過百餘年，林公的預言，已被肯定，一點不錯。筆者仍敢肯定的說：“再過百年，此一情勢，仍然不會改變的！”

本書付印之前，先經王成聖教授命名為黃沙碧血戰新疆，繼經李郁塘鄉兄逐字逐句加以校正，備嘗辛勤。又蒙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等撥冗賜序，倍增光彩。謹此致謝！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郭岐序於北京布魯塞爾

阿山亂平伊犁亂起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明令調盛世才出長農林部的同時，就特派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氏，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吳主席未到任前，由朱紹良長官暫時兼任代理。在朱紹良長官代理省主席時期，為了迅速收平阿山哈民亂事，首先發表阿山籍艾林郡王遺孀哈德邁女士出任迪化區專員，藉以平息哈民對艾林郡王無辜喪生的心理怒氣。進而再由哈德邁專員，以同胞關繫來爭取烏斯滿歸順政府作鋪路工作，此一作

用果然生效，烏斯滿反政府的行動，自哈德邁出任迪化區專員後，就行停止。十月十日吳忠信主席就任後，因烏斯滿表現很好，再由哈專員的推薦，省府正式發表烏斯滿為阿山區專員，此時阿山區的亂事一時平息。但伊犁區的亂事，已在七日展開。蓋因十一月七日為紅軍革命成功日，也就是赤俄的國慶日。駐伊城的蘇領館，竟於是日以擴大慶祝國慶為由，乃廣召當地野心份子進入蘇領館，每人發給槍枝一支，然後散在全區，舉起反漢族反政府旗幟，在伊區九城發起暴動。當時我入新國軍大部還停留在省城以東地區。駐守伊犁的部隊，還是盛世才時代的省軍。所持的武器，都是俄國不要的過時代廢物。當然不是手持俄製新式武器對手。尤且九個城祇有一營完整的兵力，其他不是保安隊，就是邊卡隊，都無正式戰鬥能力，因而戰亂一發生，就不可收拾。十一月十二日吳忠信主席就職後的第三日，李總司令鐵軍下令甫抵省城的預七師彭俊業團，馬不停蹄的馳援伊犁。於十六日夜趕抵伊城，守城情勢稍為好轉。史達林一見我方增兵，他乾脆將紅八軍團，改裝為亂民，參加戰鬥，並指派白俄老將波里諾夫為伊叛總指揮，擴大叛亂。伊區城較好的建築物，如專員公署，區警察局，以及土產公司等，先後被叛軍攻陷。原省軍李慶芝營在巷戰中全部犧牲。僅留下甫抵伊城的預七師彭團的兵力分駐空教隊，與飛機場兩據點固守待援。朱長官與李總司令鑒於伊城危急。於二十二日又命預七師副師長杜德孚將軍，於危難中隻身飛往伊城，作精神上的援助。然後再命駐於吐魯番的四十五師，星夜西行往援解困。

彈盡援絕軍民盡死

但謝義鋒師長率了該師一、三兩團兵力（第二團駐鎮西未便西上）趕到精河時，伊區九城完全失陷。再加之是年冬季氣候嚴寒，我軍裝備太差不能適應環境，結果凍傷的人數，比打傷的多，凍死的士兵，比打死的士兵多，以致無法軍援解危。而此時俄國老毛子，決心要把伊區佔領。對於被包圍的空教隊與飛機場，每日平均要發五千發炮彈，有時還要出動飛機來助陣。試問所謂叛民，那來的飛機與大炮？簡直就是與紅八軍團來作戰。此時坐鎮伊城據點的杜德孚指揮官，不時電請上級增援解危。直等了八十三天，眼看無望之際。乃電李總司令云：

“職決以最後力量，與俄軍拼戰到底，否則惟有來生再

與鈞座見面”。

在新疆地方一有變亂，漢族居民都要隨漢族軍隊轉移。原隨軍轉移的伊犁九城漢族居民，此時已羅掘俱窮，所有存糧，均已吃光。爲了守軍充饑抗戰，在萬般無奈情形下，祇有悄悄將自己子女殺死，將人肉都煮熟供給戰士當飯吃，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國門保衛戰，竟然感動當地善良的維吾爾族與塔蘭其族人，都要設法偷送一點乾糧，前來接濟抗戰軍民。祇可恨北極熊老毛子殘忍成性，硬是要將守軍困死，不讓求活。時至民國三十四年元有三十一日，伊犁漢族軍民，已經堅守空教隊八十五天。於今彈盡糧絕之情下，待援也無望。乃由最高指揮官杜副師長下令，作冒死向精河方向突圍之計。因爲此時突圍部隊人餓馬餓，速度太慢，衝出市區快到山口時，即被敵人乘車從後追上，即時開槍猛射。杜德孚將軍一看，自身既無法掩被，又無槍彈還擊，祇有死路一條。乃作最後的獅子吼說：寧爲國犧牲，也不作敵俘。話猶未畢，就舉手中所留僅有一顆子彈的手槍，自殺成仁。參謀長曹日靈上校，雖繼續率部向前猛衝。但敵軍行動迅速，愈來愈多，最後也犧牲於敵人炮火之下。此時所餘軍民，僅有數百人了，逐被敵俘，再被押返伊城。不幸當這批被押軍民走到城門口時，正逢瘋狂的叛民，以大頭棒迎頭亂殺，就此原駐伊犁九城的所在漢族軍民，乃全部爲國犧牲！慘哉悲夫！

烏蘇被圍死傷甚慘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旬，阿山全區被敵攻陷後，伊叛軍曾波里諾夫就回頭用叛軍全力進攻北疆交通孔道的烏蘇城。按烏蘇西距清河有一百五十公里；西北到額敏也有一百四五十公里；東南至綏來有一百公里。爲管轄迪化、伊犁、塔城三區的交通焦點，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那時我們在新的最高軍事當局，仍本此旨要想死守此一據點。但當時我駐守該地部隊，不僅兵力薄弱，尤且建制紊亂，再加有省軍與中央軍之分，省軍當時多屬騎兵，番號雖大人馬甚少，且多取運動戰，不能依爲固守陣地的戰力。中央軍的步兵雖可固守陣地，也因地面遼闊，兵力單薄。尤且強敵硬是採取迂迴包圍戰，斷我後路。因此時至九月一日敵騎由紅鹽池與老風口出兵，直指我最前線的車排子陣地。當時我駐守車排的主力，爲省軍騎一師韓團與暫三師的陳營，他們有見敵騎人數眾多，祇好放棄車排子陣地，向烏蘇方向後退。叛

軍追到老西湖，已接近烏蘇近郊。駐守烏蘇近郊各碉堡的守軍，乃係新二軍直屬各步兵，還有由精河預七師二十一團東調的唐營。在此同時原駐博樂通古陣地的岳奉恩營，爲了確保綏烏公路上安集海大橋的安全，乃奉命放棄陣地，退守安集海大橋。進攻博樂通古陣地的敵人，也就跟蹤向安集海地方進攻，以致形成烏蘇城四面皆敵，被包圍的不利形勢。

當時駐在新疆部隊，都有任務在身，尤且地面遼闊，再加車輛困難，根本無法抽調應援，祇等待由甘肅徵調新兵來補充。就在這時先有新兵倪中岳營開來新疆，繼有賀縱詩新兵一營趕來迪化。長官部爲了救急，即下令先後開赴烏蘇增援。倪營被分派城北第二道防線駐守陣地，賀營被分城南碉堡去守碉堡。時至九月五日敵人數千即展開全力猛攻，第一線的唐營全力抵抗。但因敵騎活動範圍太廣，人數也愈來愈多。我方各碉堡前後左右，都被包圍。謝軍長一看局勢如此惡化，要守烏蘇，可能步上伊犁之戰的後塵，結果，仍是死而不守。乃下令放棄烏蘇，要唐營與賀乘夜相機後撤，先到獨山子，後退安集海。而唐營是久經戰場的老兵，尚能保存了不少的實力退向安集海，與岳營會合。謝軍長先退獨山子與守軍第五連會合後，也相繼退到安集海。但所遺新兵倪營與賀營進攻既不能打，撤退也不能逃，結果兩營全數犧牲於烏蘇城外。

據守安集海的岳營與唐營已知大勢已去，固守此橋已無大用，旋亦奉命東撤，在且戰且走之情，因係久經戰爭經驗的老兵，尚能保持完整陣容，相互掩護，相互支援，雖然白天受日曬，夜晚受寒襲，在忍飢挨渴下，總算退過綏來縣境的瑪納斯河東岸，回歸國軍陣營，兩營的官兵生命才有了保障。苦戰烏蘇的一劇，才算落幕。

在烏蘇戰役落幕後，敵人自要清掃戰場。在一般戰爭結束後，受傷敵人，都有會受到醫院的待遇，然而伊叛份子則不作此想，他要斬盡殺絕，凡遇受傷未死者，再補上一刺刀，然後再將新死與舊死者，一齊拖到城外戈壁灘上，作了天葬，任由野狼與猛鷹去狂食狂啄。我軍此役慘狀，可謂是古今中外所少見！悲夫！

前進無門後退無路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五日，我部國軍四十五師奉命放棄精河，東援烏蘇。七日夜八時開始向東轉進撤退。經四晝夜血戰，抵烏蘇城西四十里的四棵樹地方。爲了明

瞭烏城戰況，乃由師部及各團所配電臺分向有關部門發電詢問。不幸得很，所接來訊，均言：“烏蘇縣城，七日陷敵，希勿輕進”等語。本人獲得此一噩耗後，深知本師前進無門，後退無路，已陷絕境。祇希望第一團劉掄元團利用騎兵在沙漠行軍的優點，繞過敵據烏蘇，創造奇蹟，轉進到國軍駐守的重地——綏來城，再為國效命，余願已足。至於由本人所率三個步兵團，既被敵圍，又陷萬里黃沙戈壁灘上。即使有幸能突破敵人的包圍圈，也衝不出大自然的包圍圈。因為本人曾巡視過烏蘇城郊，萬里黃沙一望無垠。於今本師不僅彈盡，尤且糧絕。無彈無糧之師，在無援的情況下，何再能衝鋒陷陣呢？當本人與念及此時，唯恐本師軍用電臺，陷敵以後為敵所用，那樣後果，影響整個新疆大局至鉅。乃下令電臺臺長毀電臺，譯電員焚密碼本。多數電臺人員，都能遵令實施。唯獨該譯電員，視密碼本如生命，先是支吾抗命，繼之與邱參謀長頂嘴。人到絕境時，大都向壞處想。本人也不例處，突疑該譯電員，心懷二志，想假密碼本，在降敵後來求生。本人想及此處，不禁怒由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突拔出腰中手槍，乘該員頂嘴之時，向其頭部連射兩彈。這是我自從軍以來，以長官身分，制裁部屬的第一次。眼見該員隨槍聲倒地後，則又引起不忍之念。過去在精河前線，同甘共苦快半年，於今大家同臨死亡邊緣。何必再凡自己人槍殺之。本人就因心生悔意，突然眼前一黑，失去靈智，而昏死過去，在場的人都聽到兩聲槍響，突見譯電員與我先後倒地，他們認為我已自殺。在場外的人，也都聽到槍聲，此時此地，除了師長為國成仁，舉槍自殺外，已無開槍理由。就此我的殉職死訊，不僅傳遍全師，竟然輾轉傳到迪化司令長官部。這就是我的靈位於民國三十四年冬，被供進忠烈祠的由來。

沙場喋血全團犧牲

當我昏死過後，全師官兵頓感眾龍無首，亂成一團。大家就共推邱參謀長為臨時指揮官發號施令。凡有馬可騎的人，如警察局、縣政府、郵電局以及商會等各機關的人，組成馬上逃難隊。由警局路池局長及溫世傑二人，為正副領隊，作自謀求生之途，不要再依靠本師保護。凡屬本師官兵，均組成突圍支隊，由第三團王克仁團長率領，掩護師部人員，繞過烏蘇城，直闖奎屯河上安集海大橋，以便過河後轉進綏來城。

按奎屯河上安集海大橋，為綏（來）烏（蘇）公路上最重要的交通孔道。此時已為伊叛軍占有，不僅派出大隊叛軍駐守，尤有飛機大炮戰車助陣。而王團長所率領的都是步兵，一因子彈缺乏，二因體力不繼，那裡是伊叛軍的對手。此役的結果，上自王團長與邱參謀長，下至士兵，全部為國犧牲，萬分可惜。

在我昏死以前，向我告別的趙沐如團與鄧爾登團，也因白晝行軍，行動暴露，先之遭敵機狂炸，繼之被敵騎猛追。當進抵天山山區時，每團僅餘數十人而已！此數十人，雖算逃出敵人包圍，仍難逃出大自然的災害。奔向焉耆的趙沐如團，仍然困死於白雪皚皚的山區內。僅鄧爾登團長率有五、六人，沿途以草根獸皮來裹腹。才衝破大自然的包圍，重返駐防阿克蘇預七師師部，亦云幸矣！

忠義相隨死而後已

楊副官一面為我裹傷，一面反駁我的話回說道：“師長為何對我出此言？我追隨師長已多年，此次大難不死，都是托師長洪福庇佑，我決不願離你他去。”

楊副官一面和我講話，一面和包圍我們的敵人開槍作戰，如手槍子彈臨時卡彈，他就交給我來退出卡彈，他以我的手槍去應戰。手中雖在應戰，但口中還在責備邱參謀長等人，不該在師長昏迷狀態時，甩下就走，並咒罵這些人不會有好結果。此時的楊副官神情激動，言語也有些反常，接下又祝福我說：“師長洪福齊天，天地鬼神都會保佑你的，絕不會在此役中為國犧牲的。我也就托師長之福，定會活下去的，即使為國犧牲，也要死在師長身邊！”

當時敵人並不明瞭據守該一高地的兵力，僅我們二人。但是當他每次派人前來搜索，一到手槍射程境內，就被楊副官打死。經過半天的纏鬥，他們接續死了八人。一直快到天黑時，他們才拔轉馬頭他去。但原和我同行的七八十人，除在半渡時先遭敵人奇襲，死傷過半外，未過河與過河的人，都又四散奔逃，不知所終。夜幕低垂，我左等右等也等不到一人，祇好和楊副官商量，來作二人行。在作戰時，祇知應付敵人，一切皆顧不到。及至又作行軍，這時已是北疆九月天，一入夜就感涼意，才知軍大衣遺失崖下。又因過河後想趁有水時將兩個水壺裝滿水，以應急需。因突遭敵人奇襲，致水壺遺在河邊，大衣失散崖下。楊副官想及前進無期，這

兩件東西都是必需之物。他提議由他趁黑去兩處找回，而我怕他一人前去，再行失散，乃全力反對。我二人研商結論認為水壺太遠體積又小，不容易找到，大衣祇在崖下，體積又大，極易覓回，就此決定祇找大衣。在他離我採取行動時，我還低頭看一下我手腕上的夜光錶，正指十時。我也認為時值深夜，敵人絕不會再在那裡監視。當他走了一刻鐘時，突然聽到清脆的一聲槍聲，我知情勢不妙。若是雙方交戰，一定有無數的槍聲。於今祇能一聲，一定是楊副官中伏，那就兇多吉少。在我想來如受輕傷，二十分鐘至半小時，定會返回。但我等到十一時，仍未見到他回來，想必是楊副官已為國成仁。當時內心非常淒涼，寒風凜然，夜蟲悲鳴，荒山漠野，敵騎縱橫，隻身孤影，何處容身。當時已是午夜十二時了，頓感身留此地，定被敵俘，一息尚存，絕不願如此。唯一辦法，就是乘敵人未到此地之前速離此危地。在敵人再行搜索時，若找不到人，就會推想原僅楊副官一人而已。他就不會再派敵騎來追擊。那我豈不就可脫身嗎？

無定河邊白骨遍野

就在此時橋上敵人汽車先後通過。為了一明敵情乃爬到橋邊向上一看，滿車都是老毛子（俄國人），向東奔去。因為公路上不時有敵人軍車來往，當不宜我行。祇好和那個死人，相陪共伴了半天。在此半天時光中，發現了一奇景，即在橋頭上空，有許多烏鴉和喜鵲，盤桓於橋的兩端與上空，並且相互大叫。在我想來，這大概是聞到剛死的人的氣味，想來天葬那個死人，奈因我在他的身邊，不敢下來，祇好在空中盤桓亂叫。一直等到夜幕低垂，我始離開小木橋，再沿公路邊的電桿，向東急走。沿途所見，不是焚毀的汽車，就是倒斃的馬匹，尤且腳下不時踢到死屍。由此證知，本人當時所走的路程，曾經是敵我的激烈戰場。此處的死屍，大都是我國軍的遺骸了。因為吃了敗仗，拋屍曠野，無人埋葬了。即景生情，就想起古戰場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所經實況，正是“沙漠無情，鷓鴣有意！”甫行死去的人屍，都變成鷓鴣們的美味。無怪我和那個死人躲藏小木橋時，天空

中有那麼多的鳥在盤桓。筆者就在那橫屍遍野，屍臭四溢的環境中，如孤魂野鬼般的游於無垠的沙漠灘上，內心中觸景生情，不禁想及本身不日也要步上死屍後塵，因而悲從中來。正在感嘆之際，忽見公路上的汽車燈光，由東而西向我身在之處馳來。好在當地遍地死人，本人乃及早躺在地下，與死屍為伍。敵人當然也不在意。我反而躺在公路旁來數敵人的汽車數目。第一輛是俄製小轎車，當然是敵人的較高指揮官，其後緊隨著有五輛大卡車，車上滿載荷槍的步兵，當然是前車的護衛。此時我的內心，突發奇想，如自己能帶幾顆手榴彈的話，豈就可一舉將此敵酋消滅嗎？即使自己粉身碎骨，也死的有價值。可惜當時身上沒有手榴彈，奈何？
狼嚎狗吠大野恐怖

沿著電桿走了一夜公路，再未遇到白菜與西瓜皮之類的食物。如再繼續走下去，因目標顯著，危險特大，必需另找蹊徑，躲敵耳目才是。乃於翌日黎明時，乃脫離公路行程，改向東北方向，長有矮樹叢的地方走去。當進入矮樹叢中，不僅隱蔽良好，尤且不時發現黃羊野兔之類的動物，竄出其間，空中也有各種鳥類翱翔迴旋。這說明此地已有生物可吃。可是如何才能將一蹦三跳的黃羊與野兔抓到手中，變成我的充饑解渴的食物，

則大有問題，懷中雖有一支手槍，一因射程短；二怕敵人知，不敢輕易動用。旋又想及，即便打到黃羊，又無法下手來吃。因為自己身上根本沒有小刀可用。走筆至此，才想到每一位游牧居民，如蒙古人、哈薩克、在其皮靴桶上，一定帶一把小刀，乃是他們隨時隨地求生的工具。可惜我們漢民族，因進入農耕社會，不作此

備。於今筆者身陷絕境，才想到隨身攜帶小刀的重要，但已遲矣！奈何！

九月十六日整天在行走，因有矮樹林作隱蔽，可以放心東行，充饑的食物，就是矮樹林中，發現了一個大蛤蟆，既嫩且柔，根本用不著小刀，抓到以後，就把它撕成兩半，連血帶肉，吞入口中，送入肚內，算是我一日的美餐。雖然在樹叢中還想找幾個嫩蛤蟆，已難找到。



中國真文學作品啟事

徵選前言：

我們稱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歷史時期為“復辟時代”，是因為它全面的、徹底地復辟了專制制度，將辛亥之後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進程，不僅倒轉了回去，而且建立了一個反動“洋教政權”，實行了中國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不獨將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的文化遺產，破壞得狼籍一片；將辛亥之後中國相當自由的文化局面，顛覆得無以復加；猶將中國人民因辛亥共和革命以來，已經獲得的思想、信仰、新聞、輿論和出版諸自由，剿滅得乾乾淨淨。由是，辛亥之後中國新文學的應有發展，豈但在專制復辟的血影之下，橫遭摧殘；當代的文學創作，更是在專制統治的黑暗之中，假花爛漫。由此而真善美橫遭踐踏，假丑惡競被高揚；假文學榜上高懸，真文學刀下隕命。其間，為文學而遭難者，為人而滅文學者，又何止於千千萬萬計……。而今，當我們回首“復辟時代的文學歷史”時，雖然田園荒蕪，轟不知真文學尚有凡幾；然而，於惡嶺頑石之際，是否還倔強著幾顆青青的野草，或低首著幾株鮮活的弱花，雖非當代人所能夠“認定”，卻也為當代人理所當然“關心”。況且，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決不至因復辟而永無向前豪邁之日；中國新文學的重生再續，亦斷不會因復辟而永墜倒退煙滅之中。是故，本刊才決意於萬里家園之外，回首於血染之地，拾荒於雜草之間，希冀於漫漫故園之中，還能夠採擷得幾株真文學的野草弱花，以為復辟時代中國文學之祭奠，以為未來中國文學之迎春，更為新時代文學之必然勃發而培土育枝……。此為本刊的一點冀望，惟望心同此願者協之，助之，一同參預之，本刊將不勝感謝之至。

作品選載範圍：

一九四九年之後迄今於中國大陸發表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等。以短篇作品為主，每期一篇，配以評論。發表後為讀者提供自由評論的園地，允許爭論，允

許批評本刊選載的“失誤”。

作品選載標準：

- 一、 未講假話
- 二、 也未講“半真半假”的話
- 三、 沒有為共產黨創作的“光明尾巴”
- 四、 不屬於“社會主義的主旋律”
- 五、 不歌唱“社會主義的心靈美”
- 六、 不是社會主義的“歌德文學”
- 七、 不是“打擦邊球”的文學
- 八、 不是“走紅地毯”的文學
- 九、 不趕“改革文學”的時髦
- 十、 不是逃避者“超凡脫俗”的性靈文學
- 十一、 不自命超然於無處不在的共產專制復辟政治之外
- 十二、 不將共產復辟時代的痛苦與骯髒栽贓於民國時代
- 十三、 不為袒護馬列和共產黨而誣蔑自己祖宗、丑化中華民族、詆毀民族文化

作品選載說明：

作品選載，祇按上述標準，不搞出身論、成份論、名氣論；不收紅包，不開後門，不搞關係，絕不勢利。惟遵循“歷史淘汰面前不得不人人平等”的法則，但願能為“復辟時代”留下幾篇“真作品”，評選幾個“真作家”。歡迎海內外、特別是中國大陸文學愛好者和專家學者向本刊推薦您心儀的真文學和好作品，還文學史一個公道，為中國未來新文學的建設積善積德。

設立“黃花崗文學獎”和“復辟時代中國真文學作品推薦獎”

初選選載之後，經本刊作者、讀者投票獲得公認者，將頒發“黃花崗文學獎”。對於積極參與推薦、評選、評論者，將頒發“復辟時代中國真文學作品推薦獎”。但不逐年評獎，有則評，無則不評。



《中國文學導論》研究

嵇義達

先君嵇哲先生的遺著：《中國文學導論》，最近在聖荷西灣區出版了；這部書表達了先君對文學的看法，他對文學下的定義是：「文學是以思想、情感、想像為三大要素，運用適當的形體，藝術的境界，來表現人生的觀念，和批評生活的現實，而能喚起人類的同感和同情，存在於文字上的一種科學。」文學為甚麼是一種科學？現代人有沒有必要研究文學史？本書有何特點？我想作一探討。

文章與文學

中國自從有了文字之後，便有文采和章法的作品，漸漸產生了文章，劉師培在《左龔集》探討文學出於巫祝之官：「蓋古代文詞，恆施於祈祀，故巫祝之職，文詞特工，今即《周禮》祝官職掌，考之若六祝、六祠之屬，文章各體，多出於斯。又頌以成功告神明，銘以功烈揚先祖，亦與祠祀相聯，是則韻語之文，雖匪一體，綜其大要，恆由祀禮而生。欲考文章流別者，曷溯源於清廟之守乎！」人的天性愛批評，有了文章，便有文學批評；在春秋時代的作品，如《易·繫辭》、《左傳》已有批評，孔子論《詩》，《左傳》的「君子曰」，引用《詩經》講出理論。《易·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方孝岳先生認為這是理論最精密的批評。

現代人為甚麼需要文學？

人類為甚麼需要文學？先君說：「文學是人類生活的記述，和抒發情感的利器，喜怒哀樂的情緒，離合悲歡的心境，是人生所不能免的；表現人生，和批評現實，都需要文學為工具，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情感的產品，便是文學；文學的價值，是要以自己情感，激動別人情感，才能喚起人類的同感與同情。」人與其他的動物不同：「人類生存在複雜的社會中，悠長的歲月裡，都要有一種好的思想，裁成情感和想像作用，是有賴於思想的表現。思想必須溶化在情感和想像的中間，而有控制

奔放的情感和活動的想像，既不為想像所湮沒，藉著文學工具，來表達思想，這才不失為真善美的文學。」人類需要別人對他的生活、思想、意見有同感，對他的遭遇、情緒、心境等同情，這便需要文學為工具。

研究文學史的重要性

司馬遷雖然把文章和學術分為兩事，但是這時候對文章的觀念，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到了陸機《文賦》把文章分為文、筆二種之後，就有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的說法，文章的界限，更加明顯地有了分別。昭明太子的《文選》，就明確地在講體例。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列傳》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摠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疏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偕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武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絕，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我們研究和欣賞文學，可以採取兩種途徑：第一是研究和瞭解這一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像巴比倫、埃及、印度、亞述等，它們雖然有文字記載，可是在文章、詩歌的流傳是很有限的，數量不多，而且出現多次斷層，加上這些文字已成古文字，就算是專家學者，也只是在考古和訓詁方面作研究，不容易融進他們的文學裡而產生共鳴。因此欣賞他們的文學很困難。中國則不然：她有悠長的歷史，文學延綿不斷，豐盛的真善美文學令人陶醉。第二是研究與欣賞個別作者的作品，可是作者的思維、文章的體裁、詩歌的吟詠、藝術的表達方式，可能與古人、學派、文友等有關，因此便要由文學史入手，才可明瞭。文學為甚麼是「科學」？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就會同意這個看法。

研究中國文學史，是一門大學問，先君撰寫《中國文學導論》，是基於以下的信念：「文學既然是人生必具的修養，我們就要從事實際的研究，文學著述，流行於世的，不可勝數；大多側重於源流正變，至於規律問題，往往格於體例，語焉不詳；所以本書要把文學上各種規律，分別的舉例說明，俾有志研究文學的人，得到進一步的認識，由了解而研究，由欣賞而創作，本書對

於這個問題，多少是有幫助的。」

書的特點

近代許多撰寫文學史的作者，都不是史學家，因此他們對於體例和規律的問題，往往語焉不詳，現代的學者以博引群書為學問，時常把史料當史學，牽扯太多，令讀者有雜亂、枝蔓之感。先君受到師輩史學家章太炎先生和金毓黻教授的影響，特別注重規律和體例，他承襲了劉勰、昭明太子、姚鼐、曾國藩等的傳統，把文章詩詞散曲戲劇的規律講清楚，條理分明，是為本書的特色。

對作者的認識

我在整理這本書的時候，對先君的學術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在尚未出版的《乾乾齋詩稿》內，有先君懷念已故師長陳衍先生的詩，作於一九四二至四三年間。陳衍，號石遺，著有《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等，先君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當過陳先生的學生，詩中說出陳先生與先君的感情：「開堂授哲詞」、「啓聾兼振聵，解惑更除癡」、「得句先遺我，知音更有誰？」這就是吟詩的知音。由於陳先生已經下世，先君以詩告訴他近來的成就和讀書心得：「辨道非朱學，論心愛陸師，精尋諸子誤，細發六經奇，近著王通學，初成易象辭」，隋朝王通在《中說》論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要尊崇儒家之道，不作無病呻吟；而《易·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這更給先君立下作詩的模範。可惜先君研究王通和易象辭的文章沒有流傳下來，先君推崇儒學，他對文學的觀點，我從《中國文學導論》便略知鱗爪。

六、附錄

本書的附錄，有先君的恩師孫世揚先生珍貴的詩文，這是要感謝武漢大學黃景熙教授，她代為蒐集了先輩黃焯教授、劉躋教授所收藏孫世揚先生的墨跡與文稿，慷慨地提供給我，放在附錄；黃焯與劉躋在紅衛兵時代，隱密地保存下來的文學作品，是對中國文化延傳，做出鉅大的貢獻；孫先生比較孔子弟子子路與子夏之勇的文章，對我們瞭解孔子弟子，有很大的啟發；孫世揚先生教學生治學的方法，亦記載於〈先考孫公鷹若

府君事略〉一文中，供後世讀者參考。

〔嵇哲先生乾乾齋詩稿將於下期始選載〕

死水憶波 瀾

死水憶波瀾

金漢平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語：

這篇文章是一位年逾古希的老人寫的。審稿時，讀了一半多，還是看不出文章的主旨。一直讀到最後，才明白老人的心意。為什麼開始的時候看不出來呢？就是因為老人在時過幾十年之後，還能根據當年的思想變化順序描下來。文章中最使人感慨的是孟老師的遭遇。孟老師擁護共產黨，渾身上下充滿了革命激情，而且是多才多藝的才子。然而，這樣的人，還是跌進了共產革命的刀山火海。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他效法祖狄聞雞起舞、師從班超投筆從戎，參加了抗日救國的青年軍。

日本投降已經一年，父親還沒有找到工作。他奔波了幾十年，最遺憾的是沒有讀書上學的命，無一技之長，就業很難。正好我考上萍鄉縣立中學，對我們家來說是一件大事。小學同班畢業的同學中只有兩人考上公立學校，另一位是卜梅生。他姐姐是福音教教會的專職人員，戰後工作調動，把他帶到武昌，考上了東湖中學。昔日無憂無慮的小學朋友為生計所迫，多數到商店、煤礦當學徒工，或者挑個擔子做小販。也有富家子弟考不上縣中，花錢去讀私立學校。

漢冶萍公司關閉之後，該公司在安源煤礦的全部辦公設施和房地產都交給了我們中學，校園之大和建築物之多在國內的中學裏是罕見的。高中部在盛公祠，初中部在張公祠，兩座樓為紀念盛宣懷和張之洞而命名，甚為壯觀。戰後通貨膨脹，大城市的老師叫苦連天，半年

前固定的月工資到了學期末只夠買幾個雞蛋。我們中學財力相對雄厚，給教員發實物，以稻穀折算工資，按每個老師的能力和聲望確定。受學生崇拜和家長讚揚的王牌老師每學期可得到一百二十擔穀子，吸引力很大，幾位大學講師級的教員也甘心棲身安源。我校教學質量揚名很遠，每年可以保送高中畢業的前三名學生去唐山的北方交通大學，不需要入學考試。我能進入當地的最高學府，對父親是很大的安慰。他留心鄰居高班學生和家長們的議論，對我校老師的來歷和專長了如指掌。

我每天走讀上學，見到姓王的小學同學站在校門口賣李子、酸梅或鹽水泡的刀豆，買的人很少。看到他，我就想到家中並沒有能力讓我升學，只不過父母親硬撐著。家裏完整一點的衣服，一具舊掛鐘，甚至連一包縫補用的針都賣掉了。眼看剩下的東西不多，全賣掉也換不了幾鬥米。父母的苦心和期待像無聲的鞭子，使我經常有一種緊迫感，和鄰居家的小孩慢慢地疏遠了。街上敲鑼打鼓定是有玩魔術或耍猴把戲的來此地表演，門外人聲喧鬧和急促的腳步聲在對我召喚，我有時動搖，丟下功課去看熱鬧，回來又譴責自己。隨著自製力不斷增長，漸漸地能夠抗拒那巨大的誘惑。有一次，我看到同學家牆上的條幅：「業精於勤而荒於嬉」，據說是錄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回家後把它抄在每本教科書的封面上，當座右銘。初一學英語，練習寫二十六個字母的楷書和草書，就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四個練習本。

然而，我畢竟還是小孩，不能每時每刻讀書。小地方沒有電影，主要的大眾娛樂就是皮影子戲。寬裕的家庭有老人生病，子女請郎中的同時往往向菩薩許願，如果老人病癒，他們一定雇戲班子還願，在空曠的地方連續唱十天或半個月的皮影子戲。這是鎮上的盛事，兒童奔走相告，天沒有黑就拿著凳子去佔位子。前幾年，母親限制我夜間出去，怕大孩子打我。現在，我覺得自己長大了，已經是初中生，讀書人品味應當高一點，再和那些流著鼻涕、亂喊亂叫的頑童擠在一起就是浪費時間。何況我能看懂「薛仁貴征東」和「封神榜」之類的章回小說，影子戲每晚只能唱其中的一小段，簡化了的事情節已不新鮮，看過兩遍也就膩味了。

我對影子戲失去了興趣，又沒有願望和體力參加籃球運動，枯燥和沈悶之中得知高中部的音樂愛好者成立了「韶風社」，定期舉行演奏會。初中第一個學期快結束時，我趕上了他們首次的演奏會，見到師生課餘獻

藝，真是別有洞天。兩盞煤氣燈把大禮堂照得非常亮，觀眾全體站著看，場內非常安靜。獨唱「海韻」和「上山」博得熱烈掌聲，在校園裏普及了趙元任的作品。「再見吧，香港」音調悲切，激起聽眾的愛國熱情。器樂合奏表演的是廣東音樂，如「餓馬搖鈴」和「雨打芭蕉」等，給同學帶來美感和對嶺南風光的嚮往。對我來說，最難忘的是孟文淵老師表演的節目。

孟老師出身書香門第，國學基礎雄厚。他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對白話文運用自如。而他在同學和校友中的威望來自他的新思想和他的愛國熱忱。1943-44年間國民政府號召學生參軍，計劃在美國幫助下訓練一支有文化的精銳部隊，從緬甸和雲南出發配合盟軍反攻，收復被日軍佔領的國土。他效法漢朝的班超投筆從戎，報名參加了青年軍。在他的帶動下，萍鄉中學的許多高班學生也穿上了軍裝。當時我上小學三年級，聽見哥哥那一輩的高中學生在議論，對孟老師肅然起敬，班超式的人物居然出現在我們身邊。這是後方的一件大事，鎮上的人有口皆碑。文具店賣日曆，在底版上都印了悲壯的對聯：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日本投降後，一部分青年軍開赴東北打內戰，其餘的復員回到學校。孟老師重執教鞭，服務家鄉。生活的經驗充實了他講課的內容，更加受到學生愛戴。他遠離內戰的烽火，心系祖國的前途和命運。

在師生界限分明的傳統社會裏，老師參加學生的演出已經是破例。選用對現實進行批判的內容，更需要膽量。他用朗誦的形式介紹電影「夜半歌聲」的故事，接著獨唱主題歌，別具一格。觀眾絕大多數沒有看過電影，個別人聽說過「夜半歌聲」的故事，也只是大概的情節。孟老師在上海淪陷之前看過兩次，相隔十多年，敘述起來栩栩如生，好像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

演員宋丹平少年英俊，很有才華，正在和一位純潔而執著的少女熱戀之中，一個豪門惡少雇流氓潑撒硝酸毀了他的面容，奪走了他的情人，斷送了他演藝的生涯。他逃離鬧市，躲在一棟廢棄的樓臺頂層，與蜘蛛、螢火蟲和老鼠為鄰，在淒風苦雨的時刻，他獨伴孤燈。每到夜深人靜，荒野裏隱約傳來他悲憤的歌聲。

孟老師平日講課時的那種激情，在銀白色的燈光下得到充分的發揮，他對宋丹平的遭遇感同身受，透過劇

情向聽眾傾訴了這人世間的不平。當他唱到「在這漫漫的黑夜裏，誰同我等待著天明，誰同我等待著天明？」許多女學生哭了。她們看完演出後，互相補充對方沒有記住的那部分內容，把歌詞和簡譜抄在筆記本上，校園裏到處可以聽到「風淒淒，雨淋淋，花亂落，葉飄零，……」「我要學那刑餘的史臣，盡寫出人間的不平。」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孟老師成了我們的歌星，使學校的音樂老師黯然失色。

初一第二學期，張有椿老師從陝西藍田師範學校畢業，來教我們的國文，取代了上學期那位仇視白話文的老古董。在張老師生病的那個星期，孟老師代課，出了一道作文題「睡獅」，要我們第二天上課時交卷。班上同學多數人只會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可惜積弱百年，常遭西方列強欺侮，就像一頭睡著的獅子。他們老調重彈，千篇一律，早在孟老師意料之中。令他驚訝的是，我把題目改為「醒來吧，睡獅！」文章指陳時弊，痛恨人們自私麻木，頗為慷慨激昂。因為我課後常到圖書館看報紙和期刊，其中有大量發牢騷、罵政府的文章，對中學生鼓動性很大。小孩子記性好，天天讀同類的文章也就學會了整套的句子組合，一股腦寫到作文當中去。孟、張兩位老師都很興奮，用紅紙把我這篇稚氣十足的作文抄成大字報，貼在走廊上。從此班上的同學叫我「醒獅」，一直叫到初中畢業。

一些初中三年級的學生在張公祠稱王稱霸，欺負低班同學。他們稱三年級的學生為「老爺」，二年級的為「學生」，一年級的為「坨股（飯團）」。一九四八年，我已熬到了「學生」的地位，再過半年就要躋身老爺的行列。新年後上課，最使我感到幸運的是孟老師當我們的班主任並且正式教我們的國文課。我坐在前排，端詳他的一舉一動。他比一般南方人個子高，五官端正，加上很淡的眉毛，一副嚴肅而又善良的長相。他穿一件長袍，文質彬彬，很像照片上民國初年的文人。第一堂課的頭二十分鐘，他沒有打開書本，而是在黑板上抄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爆竹聲中除舊夕，
一年一度歲華新。
聞雞起舞莫長歎，
憂患還須惜好陰。

這首詩刊登在一九四八年元月號的「中學生」雜誌上，作者是該雜誌姓夏的主編。

孟老師講解這首詩的時候，力圖喚起同學們的憂患意識。聯繫結尾兩句，他介紹了晉朝祖狄和劉琨聞雞起舞的典故，鼓勵我們效法歷史上的偉人，在艱難歲月裏互相砥礪，練就本領，立志報國。我們沒有那麼大的抱負，也不知道怎樣報國，只覺得年青人應當有朝氣，以祖狄和劉琨為榜樣，珍惜青春的時光。

孟老師熱愛蘇聯的文學，醉心「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在教育部頒發的課本外，他自己刻蠟紙，油印補充教材。如魯迅的七言律詩「自嘲」，矛盾的散文「白楊禮讚」，林覺民給妻子陳意映的絕筆書等傳世佳作，我都是在這段時間內讀到的。他的學識，激情和表達能力溶為一體，聽他的課實為一種享受。

高中學生組織了各種讀書社，以擴展文化視野，他們請化學老師講原子彈常識，物理老師介紹雷達原理，文學方面常由孟老師主講。每次見到他專題演講的海報，我都走二裏地到校本部去趕場，從不缺席。他介紹的作家從屈原、魯迅到高爾基，他分析的作品從「子夜」到「靜靜的頓河」，場場爆滿，許多人在門口和窗外伸著脖子聽。

日子過得很快，四九年春季已是我初中最後一個學期，學校也遷到縣城的新校址。我挑著行李，離開安源，開始住校過集體生活。浙贛鐵路沿著萍鄉城南，繞到城西，在那裏有兩座鐵橋橫跨萍實河及一條支流，進入火車站。我們的教室樓在西郊汪公潭的山丘上，離鐵橋的直線距離只有二百多米，火車的汽笛和過橋的隆隆聲常使我的視線離開黑板，轉移到窗外，河水、行人、鐵橋，以及車站的揚旗和信號燈盡收眼底。

華北和中原的會戰已經結束，國民政府敗局已定。三月開始，從東向西的軍車一天比一天多，車箱裏擠滿了士兵，軍官和少數家眷，平板車上載著塗有保護色的坦克和罩著帆布的大炮，顯然是從上海一帶撤向湖南和廣州。

我們不知道大局的變化對自己會有什麼影響，因循多年習俗，像上一屆畢業班學生那樣度過最後一個學期，每人省點錢到照相館去照張像，再買一本或大或小的題詞本。像片印得不多，只和親近的同學交換。題詞本很厚，前面幾頁留給班主任和有好感的老師題詞，後面幾十頁則挨個請班上同學留言，以作記念。多數同學不善於辭令，只好相互抄襲，找些陳詞濫調應付，最常見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更有牽強附會的如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老師態度嚴肅，一般要求將本子留下，第二天去拿，以便有時間斟酌，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寫點有意義的話。

我買了一本比較講究的題詞本，有緞子覆蓋的硬封面。我在孟老師的辦公室門外喊了聲「報告」，聽到他回應「進來」，便翻開空白的首頁，走進去請他題詞。他正襟危坐，拿起毛筆，取下銅套，在硯臺裏理順了羊毫，揮筆而就：

年青人不要做沼池中的死水，
應當做海洋中壯闊的波瀾。

使我驚訝的是他已經有詞在胸，可以不假思索。我深為感動，向他鞠了一躬，退出時隨手帶上了門。我站在走廊上等墨水晾乾，琢磨這兩句話的意義。他知道我想學理工，志在當工程師或科學家，而他的題詞婉轉地否定了我這平凡的人生目標，鼓勵我投身波瀾壯闊的革命風暴。

四月下旬，解放軍主力渡過了長江，佔領了南京，紅旗插到了國民政府總統府的屋頂上。湖南省的陳明仁將軍和省長程潛宣佈起義，使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狼狽不堪，向廣東和臺灣倉皇逃竄。解放軍還在幾百里以外，縣政府的唯一武裝力量是自衛隊，有一百多人。隊長姓胡，二十二年前他才十五歲，嚐過「打土豪，分田地」的滋味，此時見勢不妙，已隻身逃走。隊員自動解散，回家種田。五月初，縣長也跑了。學校五月三日放假，比往年幾乎提前了三個月。我們沒有期末考試，沒有畢業典禮，也沒有領文憑，一切都免了。初中畢業標誌人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我的初中畢業正逢改朝換代和兩個時代的分隔，其歷史意義超過一紙文憑。

國民黨在我們縣的統治已名存實亡，全縣變成了軍事和政治的真空。然而，長達五個月的暑假裏，方圓幾十裏內沒有殺人越貨的新聞，老幼尊卑的禮儀如舊，傳統的社會沒有隨著政府的崩潰而解體。湘東和贛西向來是一個自然的農業經濟地區，經歷過日軍長期封鎖而存活下來，偏安之中老百姓習慣了儉樸的生活，安貧認命，沒有人鼓動和組織是不會鬧事的。

在解放軍到達之前，縣裏的社會賢達和學界名人籌組了一個「應變委員會」，維持局勢的安定和政權的過渡。全縣唯一的官辦報紙「群報」停刊了，委員會在縣政府衙門外的東牆上手寫的大字報發佈新聞，採用中

性詞句，解放軍每佔領一個城市，大字報就說該城市「易手」，不用共產黨的「解放」，也不用國民黨的「淪陷」。

恩格斯說過「革命是勞動人民的盛大節日」。爲了迎接這個節日，孟老師和左派學生在離城不遠的農村小學裏練習扭秧歌，學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和「你是燈塔」等革命歌曲。在解放軍舉行入城式的那天，他們載歌載舞走在隊伍的前頭，表現了人民對子弟兵的熱愛和歡迎。戰士們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群眾隊伍中響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聲。工人、農民、市民和學生在革命的旗幟下組織起來，有著喊不完的口號，學不完的新名詞，還有開不完的會。百姓一反千年的個體舊習，有領導地忙碌，集體表達盛大節日裏應有的歡騰。

大軍過後，黨的宣傳團體前來佔領思想陣地。郭蘭英演唱的「翻身道情」把陝北的民風帶到了江西，「舊社會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萬丈深」，第一句就足以激發聽眾對剝削制度的仇恨。解放軍某部的文工團巡迴到萍鄉，演出革命歌劇「白毛女」，全城轟動。縣政府和各個學校的圍牆上，幾十年來寫著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大字被橫幅標語覆蓋。「看！舊社會怎樣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怎樣把鬼變成人。」觸目驚心的海報，新穎的題材和動聽的音樂吸引著城裏城外的年輕人，許多人沒有票，只能在劇場外興歎。

最後的一幕，翻身的農民在打穀場上開鬥爭大會，清算惡霸地主黃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兩個壞蛋跪在地上，由苦大仇深的貧雇農控訴他們的罪行，群情激憤。當喜兒披著白髮來到現場，以高亢持久的曲調哭訴她的悲慘遭遇，臺上的群眾演員和台下的觀眾喊打的聲音連成一片。靠近樂池右端的觀眾振臂高呼「打倒惡霸地主！」「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幾個農民爬上臺去，抓住扮黃世仁的演員就打，階級仇恨充滿了整個劇院。口號聲中，黃世仁和穆仁智被押到後臺，幕後響起了模擬的槍聲，復仇的子彈結束了惡霸地主及其幫兇的性命。八路軍和貧下中農盡情歌舞，解放區的人民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演員謝幕的時候我擠到了前排，仔細端詳那幾位看戲入神，錯把演員當作地主的農民。我大吃一驚，孟老師也在其中。根據外地的經驗，他和幾位高三同學裝扮了憤怒的觀眾，加強了演出的宣傳效應。

四九年以前，蘇聯的小說和詩歌早已引起孟老師對

革命的憧憬，此時他已身在壯闊的波瀾之中。正像當年投筆從戎參加青年軍一樣，他熱情地迎接共產黨和解放軍，積極參與學校的各項政治活動，走上街頭宣傳黨的政策，登上舞臺縱情歌唱。

職業歌手劉文幹來到我校當音樂老師，整個校園都增添了藝術的氣氛。他是福建音專聲樂系畢業的，曾在南京電臺專職獨唱，因逃避戰事而回到萍鄉的丈人家，暫時屈居在中學裏。孟老師羨慕他的歌喉，更希望他能發揮專長。革命的勝利使孟老師變得年青，精神煥發，他利用自己在教師和學生中的影響，竭力倡導和組織「黃河大合唱」的演出。他從我們高中部的同學中挑選了合唱隊員，動員初中音樂老師去拼湊樂隊，劉老師負責指揮，兼朗誦和男高音獨唱。學校裏有一批因為內戰而隨父母南逃的學生，他從其中發掘到女高音獨唱的人才。最後，孟老師自己登場，扮演對口曲當中的張老三。經過三個月的排練，一個礦區的中學居然演出了如此龐大的節目，並且形成了一枝土生土長的文藝宣傳力量。

我參加了合唱隊，每天和孟老師見面，關係應當比過去更為親近。但是，從他的眼神裏我看到一種失望，大概是因為我對政治宣傳尚未消化，對周圍發生的事情很不理解，沒有像他期待的那樣迸發熱情。

革命不再是優美的詩句或令人神往的情節，已經從理想和宣言變成了血的現實。只看贛西的歷史就知道，革命的成敗是以殺多少人或多少人被殺而記載的。現在是勝利者向失敗者算總帳和加倍討還舊債的時候了。在鞏固政權的第一個浪潮中，國民黨留下的兩位高中軍訓教官就被槍斃了，許多年後，學習了列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才懂得新政權為什麼要這樣做。

土地改革的波濤隨即衝進了學校，四九年前買田置地的老師難過此關。一天早上，我沿著河邊小路去學校，見到初中時教我們化學的宋砥之老師迎面走來，十一月的天氣，只穿著單衣和草鞋。他被五花大綁，後面有一個農民牽著繩子。因為宋老師禿頂，姓吳的同學笑他二十四根頭髮梳西式頭，班上的人都覺得很俏皮。此時我想到宋老師前面的刑罰，覺得姓吳的同學有點缺德。宋老師再也沒有回來，也打聽不到他的下落。初中教英語的胡老師解放後就失去了工作，他滿臉鬍鬚，戴近視眼鏡，加上他因脾氣倔而鬧過些笑話，同學們還念叨著他。班上和他住在同一個村莊的人回家過年，見到他穿一條短褲，光著身子站在簸穀的風車前面，農民對

他潑冷水、鼓風，這是當地「打浮財」的方法之一。

孟老師沒有土地，本人沒有太大的麻煩。他把老爸給他的金銀首飾和狐皮袍子等值錢的東西上交給農會，表示對土地改革的支持。為了宣傳黨的土改政策，他鼓動劉老師組織和排練「土改大合唱」，演出地點選在縣文化宮也就是過去的孔廟，教育了許多市民。接著又動員全校的人力和物力排演歌劇「赤夜河」。「赤夜河」的情節和「白毛女」大同小異，地主壓榨農民，強姦貧農的女兒，女兒的未婚夫懷著滿腔仇恨參加了八路軍，最後贏得家鄉的解放，嚴懲地主老財，為無產階級報仇雪恨。

朝鮮戰爭爆發後，孟老師又急於幫助學生和市民提高警惕，鞏固紅色江山。他和劉老師協同努力，排演了童話歌劇「幸福山」。幸福山象徵自由幸福的祖國，豺狼虎豹代表兇惡的階級敵人，狐狸則是狡猾的敵人。老獵人帶著大剛和小剛拼搏，消滅了全部野獸，少女們頭戴鮮花，輕歌曼舞，慶祝勝利。三十年後成了戲劇家的鍾傑英比我高一班，他演老獵人。唱詞最多的是大剛和小剛，兩位保衛幸福的主力。劉老師選我演小剛，我不敢擔當。孟老師對我做工作，告訴我「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革命的熱情是首要的，演唱的技術是次要的，目的在於提高群眾的警惕性。在兩位老師鼓舞下，我勉為其難，總算沒有出差錯。劇尾有大剛和小剛的一段二重唱：「幸福山在萬山之中，山外有山崗外有崗。山裏的虎狼全打盡，山外的野獸還猖狂。鋼槍緊緊地握手中，永保幸福萬年長。」經過多次排練和演出，我已深入角色，手握道具槍，似乎看到了幸福山外，美帝國主義的軍隊在朝鮮猖獗，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盤踞在臺灣島上。

一九五一年春節前後，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中小學教職員工中進行，教我班世界歷史的周胤之老師首當其衝。為了局勢的穩定過渡，他擔任我校解放後第一任的校長，已經完成使命。問題是他參加過國民黨的復興社，只有揭露他才能發動群眾。我校的教職員和周老師相處多年，一時打不破情面，對他的追查比較溫和，運動開始並不激烈。領導小組為了掀起鬥爭高潮，進一步發動年青教師，並且讓學生中的青年團幹部和積極分子參加，重新搭配力量，火力變得很猛。初中教地理課的女老師姓范，是從南下工作團轉來的，她因參加革命而輟學，政治上還是個「群眾」，有點兩頭落空。她為了

入黨，急於火線亮相，成爲鬥爭會上的急先鋒，敢打敢衝。同時，我們高二的黎大哥站了出來，成爲領導骨幹。他原是鐵路工人，身材魁梧，比我們大十多歲，四九年以前因地下工作需要混在附近一個私立中學念初中。解放後，他從暗處走到陽光下，成爲我們中學的精神領袖。在黎大哥和姓范的女將帶領下，老師們爲了自保，群起怒吼。周老師性情剛烈，向來律己很嚴，獨善其身，沒有受過此等委屈。他經不起輪番審訊和拍桌打椅地追問，從樓頂跳到山坡下，一死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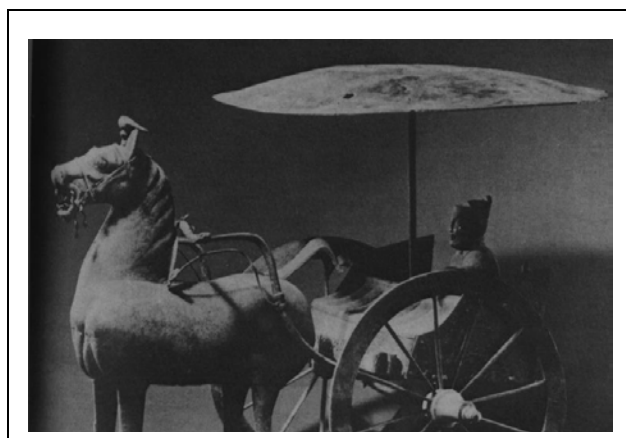
周胤之老師自殺的消息傳來，我有點內疚。有一次他講課，說日本人善於模仿但缺乏創造性，我打斷他的話，批評他「沒有把日本的勞動人民和日本的剝削階級區別開來」，他表示虛心接受我的意見。由於黎大哥和班上的積極分子多次指責我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太重，不敢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在課堂提問中搞階級分析，無非是刁難老師，向班上的政治領導表白自己，欺負了弱者。另一方面，我又原諒自己，「天地君親師位」已廢，聽黨團組織的話是時代的要求。周老師皮膚黝黑，戴副近視眼鏡，當時沒有世界史的課本，他從英文書摘錄教材寫講稿，給我們印象很深。他從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講起，只上過幾堂課就消失了，我一直爲他惋惜。他身體碩壯，精力充沛，在正常環境裏能多活很多年。後來，他的兩個女兒都參了軍，並且嫁給解放軍的高級將領。

鎮反的頭號目標消失了，鬥爭的鋒芒立即轉向孟老師，他參加青年軍的那段歷史成爲我校的重大敵情，繼續發動群眾的好材料。他以「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氣概參加青年軍爲的是打日本，保家衛國。日本投降後，他已被遣散回到學校，留在青年軍的人被國民黨派到東北去打共產黨。一個籠統的歷史責任落到了他個人頭上，把他定爲反共罪人。按鎮反的規定，國民黨連長以上的軍官，三民主義青年團區隊長以上的幹部都夠得上反革命。他這位曾有過少校教官頭銜的人在劫難逃了。多年的同事在鬥爭會上突然變臉，姓范的女將陣陣尖叫，逼他交待。他對土改的積極支持，此時也變成了反動派退卻時施放的煙霧彈，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一位久經風霜的老教員私下勸他要想得開，「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受點委曲，低低頭也就過去了。」他卻堅持「士可殺不可辱」之類過了時的概念，步上了周老師的後塵。

他從教室樓的四樓爬到房頂的老虎窗，再往下跳。當他滾到屋檐邊的那一瞬間，求生的欲望戰勝了知識分子的尊嚴，他抓住白鐵皮的水槽，最後還是落到地上。他雙腿折斷，牙齒全部磕掉，但他還沒有死。班上一位同學見他在那裏蠕動和呻吟，含著滿口鮮血，反復咕嚕三個字，好像是「可惱火」。校醫趕到現場後聽懂了，說孟老師要求打一種止痛針。同學中幾位落後分子去醫院看過他，孟老師對他們說「有的人是披著羊皮的狼」，大概是指那位從南下工作團轉來的范老師。書生無用，自殺已是徹底失敗，到死亡的邊緣說點氣話，動不了運動積極分子的一根毫毛。

五二年秋天，我去武漢上大學。一位姓王的女生還念師生之情，打聽到孟老師住在城隍廟附近，約我一道去看他。她比我低一班，參加過「幸福山」的演出，後來上醫學院，當了醫生。沒有她的提議，我一個人還沒有如此膽量。城隍廟當時已是縣紙漿公司的倉庫，孟老師住的破屋子靠著廟的西牆，搭了個斜屋頂。他沒有床，被褥鋪在一層稻草上，罈罈罐罐全放在牆腳，家徒四壁，一看就知道他是從原來的住處掃地出門的。他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顯然腿已殘廢，站不起來。他妻子正在爲他熬草藥，旁邊站著一個三四歲的男孩。他臉龐變形已長短易位，什麼也沒有說，我們也看不清他有什麼表情。我們安慰了師母幾句，向孟老師告別。姓王的女生說孟老師向我們點了頭，但是我沒有看出來，至少是他的動作不明顯。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孟老師，聽說他傷勢好轉後被送到縣的監獄，不到半年就死在裏面。

許多老師認爲孟老師不應當死，因爲當地政府沒有打算要他死。解放後，軍訓教官被殺，初中的化學老師（下接第 40 頁）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718-898-9100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本刊電子信箱：hhgang2001@hotmail.com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美國為 \$ 22.00；加拿大為 \$ 44.00；其它地區為 \$ 55.00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_____

我的郵寄地址是

_____ (姓名)

_____ (中文名字)

支票抬頭請寫：

_____ (街名)

THE MODERN CHINESE

_____ (城市)

_____ (州名)

_____ (郵編)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MCHS)

_____ (電話)

_____ (email)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編 後

本刊懷著歉疚之心，要首先向讀者道一聲“對不起”。因為，本期推遲了將近半個月才與大家見面。原因，一是某些來稿過遲，耽誤了；二是主編分身無術，終於累得病倒，誤了期。

本期在欄目上有些調整，突出了關於中華民族民族文化問題的探討。其中幾篇文章都有代表性，也有挑戰性。特別是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位前輩文化名人合撰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連載)，則希望凡我中華兒女，都能夠視為必讀之文，以熔冶虧缺了起碼民族文化教養的我們這幾代人——“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本期還贈設了“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以標明我刊要在思想文化上為“中國民主統一”盡責盡心之意，也要提醒大家，防獨之時，切勿忘了反共，更不要因台獨勢起而“投共”，這才是“愛國之本”。

紐約艾姆赫斯特有一間教堂，已經建造了整整十一年，仍未建成，原因，就是這家教堂全部依靠的是“義工”……本刊多有不到之處，請大家體諒我們的艱難。謝謝了！

因最近有不少讀者來信來電詢問如何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本刊特回復如下：

- 1、《誰是新中國》定價：\$38.00 美元；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八折：\$ 30.40 美元；美國銷售稅為\$ 2.66 美元，其它地區免稅。
- 2、郵資自付：美國為 2.81 美元；歐洲空運為 \$9.00 美元，海運為\$ 3.31 美元；亞洲空運為\$9.00 美元，海運為\$4.46 美元。
- 3、美國藍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英文縮寫：BSPH 信箱：P.O.BOX 2468 NEW YORK, NY 10163
- 4、郵購者請寫明地址、電話和要求，支票抬頭請寫明 BSPH.

誰是新中國
訂閱

長篇歷史電視連續劇《孫中山》劇照選登



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上講演：我們革命的
目的是在廢除專制皇權，創造共和，振興中華……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誓詞：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
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



孫中山告訴黃興：把革命二字藏在我們的心中，用
同盟攜起我們的手來……



孫中山：是到了該徹底推翻它的时候了！



孫中山告訴陳粹芬：驅逐鞑虜，恢復中華……這
個腐朽到了極點的滿清王朝是不能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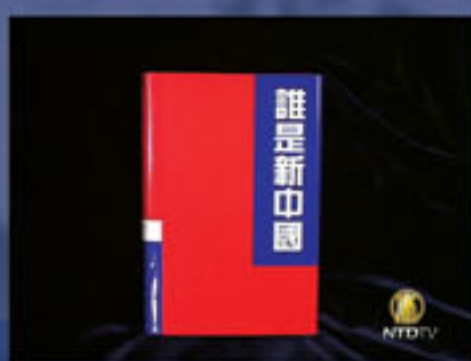


孫中山對康德黎說：革命二字，中國古亦有之……祇不
過，我們的革命是要把民權跟民主引到中國去……。

誰是新中國



一本反思辨析還歷史真實的史書
一本動搖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奇書
一本在大陸民間廣泛流傳的禁書
辛灝年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



《透視中國》專題節目-專訪辛灝年VCD

奇書共賞 (全三集)

1. 辛灝年談《誰是新中國》
2. 從文學家到歷史學家
3. 如何辨別歷史真偽



反思歷史 了解真相 還我知情權



新唐人電視台

《黃花崗》雜誌社 聯合製作